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英雄悲歌——广州暴动纪实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幕

共产党人被激怒了。在广州市中心一座楼房三楼的一间小屋里，此时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表情严峻，慷慨陈辞。张太雷断定是蒋介石在搞鬼。毛泽东提出要用武力坚决予以回击。陈延年举起双手赞同。他们掂量了一番双方的实力：在广州及其附近，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还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蒋介石实际只把持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凌晨3点。

寂静像茶色玻璃一样被狂暴的砸门声打得粉碎。七八个挎着驳壳枪的凶蛮汉子闯进李之龙家，抡起巴掌就抽耳光：“兄弟奉欧阳副校长之命来捉拿你！”李之龙被捆住双手，蒙上眼睛，嘴里还被人用枪管捅进了毛巾。被押解的路上，李之龙暗忖，这难道是黑道搞绑架？途经一个军事机关门前时，觉得情形有些怪异的卫兵走过来盘问。昏黄的灯泡下刷地亮出了蒋介石的手令——谁敢多事！

蒋介石委实是谋林高手。他指使他的把兄弟欧阳格传他的令，让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急调军舰到黄埔。再传他的令，以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私调中山舰到黄埔图谋不轨为由逮捕了他。以同样的理由，蒋介石又亲自发布命令，在广州和黄埔实行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这就是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自从一年前孙中山病故，国民党内的权力和门派之争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当时，孙中山麾下“三杰”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有根有底强悍有力的人物，他们都有接班的资本，也就都成了靶子。孙中山尸骨未寒，左派领袖廖仲恺就遭暗杀。蒋介石把调门提高了八度：“准要是背叛孙中山，就一枪毙了他！”利用廖仲恺的死，他拉住汪精卫，借着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把胡汉民扔进了政治酱缸。接着，国民党右派有意联蒋倒汪，正好被蒋介石牵住鼻子，导演了中山舰事件。

事发当晚，周恩来乘车急往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途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时，遭到卫队的乱枪袭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即身亡。热血喷溅到周恩来脸上。周恩来毫不惧缩。他推门跳下汽车，挥手喝道：我是周恩来！谁敢开枪！周恩来怒火中烧，到达卫戍司令部所在地铸币厂后，严辞斥责了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的行径。

周恩来也赞同以武力回击蒋介石。

然而，这个主张被陈独秀否决了。陈独秀有一个理论，叫“二次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在大革命中只能是帮资产阶级打天下，等到资本主义成了事，无产阶级再为自己打天下。据此，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问题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苏联人也不同意以武力回击。苏联驻广州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对陈延年说：左派的力量还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团长布勃诺夫怕影响中苏关系，也不赞同。他们谁也不想同蒋介石闹掰。

蒋介石不但有野心，他还是个能驾驭野心的人。他对自己“单枪匹马，

前虎后狼，孤孽颠危”的孤悬处境心中十分有数，加上嘴里还嚼着、眼睛还盯着苏联的“草”，便又翻转手来。他说事情的责任只在于李之龙个人，不应牵动大局。同时颇有胸怀地“自请从严处分”，说由于事起仓卒，处置的时候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这个呈文的前提，是把李之龙等企图政变指认为事实。

于是，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便被说成是一场“误会”。于是，特意在汪精卫的病床前开了个解除误会的会。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一个劲地向蒋介石道歉。蒋介石却像个干了一件不得不干的事而受到委曲的正人君子，拉着脸一声不吭。

又于是，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共产党的提案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得以通过。本来准备收拾蒋介石的各军头领，也转而大拍他的马屁。季山嘉等人蒋介石不喜欢，只得打道回国。共产党员撤离第一军。不久，鬼使神差似的，国民党右派头目胡汉民和左派领袖汪精卫搭上同一条船，黯然漂泊出境。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石双鸟：一是向共产党开了刀，二是气走了汪精卫。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被罩上了沉重的阴影。

为了篡夺最高权位，蒋介石倾其老本和前程投注了这一次狂赌。蒋介石赌赢了。他成功地把给自己规定的角色从“左派”挪到了“中派”的位置上。他又抓住时机，抛出了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尽管有的会给他帮倒忙的 22 封信。他的好运来了，这一年的 4 月到 7 月，他连中三元：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一下子有了三张脸。

干得漂亮，但这只不过是开始。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全国工农运动像洪水暴涨。而北洋军阀那些头目也各自忍下一口气，在相互的混战中勾结起来，都腾出一只手打击革命力量。革命志士的头颅又摆上了北洋军阀的祭坛。

蓄势已久的北伐呼啸而起。

5 月底，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打响了北伐的前哨战。7 月，国民革命军浩浩荡荡出师北伐。靠着民众的支持，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珠江流域一鼓作气打到长江流域，尽毁吴佩孚和孙传芳主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就当革命军大举“军事北伐”之时，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旨在分裂革命阵营的“政治南伐”。它们向蒋介石抛出了绣球。蒋介石接个正着。他一反原来的主张，在“迁都”问题上向左派发难。

1926 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移都武汉，大批机构和人员北迁。蒋介石为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把首都改迁他所把持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并称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傀儡。武汉方面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分裂行为，撤消了他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削弱和压制他的权力。同时还发起运动，呼吁“大左派”汪精卫回国复职。

然而，这时候的蒋介石已模仿起拿破仑，把两手交叉在腹部，噘起下嘴唇，透出一种自认为是领袖人物才有的深涵与威仪。北伐的巨大胜利使他的声望暴涨，也使他的实力激增。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队换个旗号，都归到他的门下；大军阀的门客，反动思想家，买办，流氓，恶棍，纷纷奔忙于他的鞍前马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同他的交易；大买办虞洽卿衔英、美之命，答应蒋

介石到上海后，施巨资助他反共。

他我行我素，摘下了系在脖子上的红布条，向工农运动举起屠刀，从南昌一路杀往南京、上海。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冒死举行第三次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推翻了军阀政权。3月26日，带着屠杀革命工农的血腥气的蒋介石不费一兵一弹便堂而皇之地开进了上海。

帝国主义势力用软硬两手鼓动蒋介石公开反共，蒋介石也早已把共产党视为他实现独裁梦的最大威胁。消灭共产党，挖去心腹之患！他要再做拼死一赌。他忽而是个乞丐，伏在租界的门槛上，讨得帝国主义给予帮忙的承诺和巨额经费。忽而是个身穿八团花绸马褂的帮主，令黄金荣、杜月笙等黑道的大哥们举坛拱手，发誓要为他两肋插刀。齐了，他便周密地调兵换将，清扫上海外围。同时大放烟幕，给上海总工会送去他题写的“共同奋斗”大红缎轴。

死亡的阴影和恐怖气息在大街小巷悄悄蔓延，包裹着丝丝清凉土腥味的炽闷空气预示着大灾大难的来临。革命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头颅就要在钢刀下落地，就要血淋淋地被挂到电线杆子上。

陈独秀在上海湖州会馆的一间厢房里蹙着眉狠劲抽烟。他仍然一厢情愿地抱着自己的幻想，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国民党左派的千呼万唤下，汪精卫终于从欧洲归来了。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一反常态贴了上来，要汪精卫同他一道清除共产党，一道去南京另立政府。汪精卫是被蒋介石挤轧出国的，此番回国是想恢复最高权位。他是垂钓者，而不是诱饵下的鱼。汪精卫顾左右而言他：“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蒋介石一伙缠住不放。汪精卫成天陷于唾沫横飞的规劝恳求之中。在一次“清党”会议上，汪精卫与蒋介石一伙发生了争执。老右派吴稚晖竟然扑通一声跪下身子，恳切之情无以复加。汪精卫懵了，急忙绕行退避，吴稚晖用老膝盖跪步追随。汪精卫逃到楼梯上，一个劲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如此几个来回，汪精卫得巧卖乖。蒋介石倒不含糊，即通电拥护汪精卫，“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

汪精卫被蒋介石拉住做婊子。陈独秀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为正在喝壮胆酒的刽子手遮护，为蒋介石行将清除共产党、镇压工人的阴谋“辟谣”：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和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陈独秀滑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潭。

事后，陈独秀就陪同汪精卫登上轮船，前往对汪精卫千呼万唤的武汉。

1927年4月12日，一个大分裂、大流血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3时，法国租界突然轰响的汽车引擎声震撼了上海全城。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身穿工人纠察队样式的浅蓝色裤褂，从法国租界向

各区的工人纠察队猛扑。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在蒋介石精心策划下，刚扎进蒋介石怀抱的军阀周凤歧以及白崇禧等人借口“工人内证”，指挥早已埋伏在四周的部下冲杀出来，袭击总工会，强缴工人的枪械。工人纠察队不及防备，死伤 300 余人，枪械被缴。此后的三天里，警笛吼叫，狼犬狂吠，枪弹嘶鸣，反动军警和流氓打手疯狂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奋起抗争的进步民众。工人又有 300 余人被杀，500 余人被捕，5000 余人失踪。是时苍天恸哭，繁华的上海滩血滔滚滚。黄浦江水，为之染赤。

此前的 4 月 11 日深夜，帝国主义军队在租界内外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 1000 余人，交给了蒋介石。

此后的 4 月 15 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残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一步一步实现了他独裁统治的梦想，同时也彻底完成了他从投机革命到反叛革命的转变。

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拐杖。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典礼。当晚举宴庆祝。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在宴会上致词。他们破口大骂共产党，一个比一个声嘶力竭，后来竟演成了歇斯底里的狂呼乱叫。

4 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声明。历数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等 12 条罪状，谴责他“力图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要把他拿解武汉惩治。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一个是盘踞在北京的张作霖的旧军阀政权，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新军阀政权，一个保持着国共合作的武汉革命政权。

而在狂涛恶浪重重包围之中的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又一同来到了另一个岔路口。

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

混沌的暗夜像巨大的问号困扰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像阴险的蒙面杀手，逼杀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

英雄悲歌

第一章 炼狱

天塌下来有人撑着

1927年的4月，广州的气候就像当时的政治气氛，多冷雨、晦雾，人们被憋闷得透不过气来。

龙藏街横巷的一座小楼在铁青色的雾气裹拥中似浮似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菘穿上平时很少穿的浅灰线机绒长衫，准备出门。妻子陈六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还没起床。他向眼

中满含焦虑的妻子点点头，又俯下身子亲了亲仍在睡眠中的儿子。木制的楼梯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来人是油业工会的工人骨干陈功武。他进门就问刘尔菘要去哪里。刘尔菘说去长堤大东酒店。

陈功武说：“你不能去！军警已经截断马路，正在搜查车辆行人。”

刘尔菘说：“我知道。可国际工人代表召开的会议，我不能不去。”

陈功武一拳击向自己的脑袋，蹲下身子：“这帮契弟！干就跟他干吧，工人不做衰仔！”沉沉的声音像是在地底下奔突。

刘尔菘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那好吧，你再出去看一下情况。”

刘尔菘对眼下的局面已有所预料，但事态来得太快了。

4月2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急电，赴上海参加筹划清除共产党的秘密会议。12日返抵广州，即彻夜布置“清党”。14日晚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租界为由，下令广州戒严。

今天，也就是4月15日，李济深步蒋介石的后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此刻，他正指挥他的爪牙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

一群抓捕刘尔菘的黑衣警察出了维新路公安局，杀气腾腾地向龙藏街跑来。

陈功武拐出巷子，沿着四牌楼向惠福路口走去。把在路口的有警察，还有几个国民党右派豢养的机器工会工贼。这些工人中的败类手里拎着棍棒，一边贼溜溜地辨识着来往行人，一边狠声恶气地嚼着牙巴。“共什么产？罢工有我们的什么好处？共产还不如铲共。”陈功武忿忿地想：“契弟！罢工时你们在工人里头拉后腿搞破坏，这会儿领了几个臭钱就出卖工友，人活的狗屎不如！”这时迎面驶来一辆龟壳小汽车，里面坐着工贼头子、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曾西盛。陈功武认识这家伙，还同他干过仗。他转身到一家店铺前，装作看陈列在那里的一具雪柜。就听到曾西盛喝问：“那是谁的手车，敢停在路口？”车夫说：“惠福路口不准停车？”曾西盛叫道：“丢佢老母！揍他！”车夫说：“讲不讲道理？”话音没落，棍棒就噗噗有声地砸在人体上。“丢佢老母，这个就是道理！”

曾西盛撒了几大把传单，龟壳车冒出一股黑烟开跑了。陈功武拣起落到脚边的一张传单，折回刘尔菘家中。

情况万分紧急！

刘尔菘蹙紧眉头，看了看陈功武递过的传单。什么共产党“心怀不规，

扰乱治安”，什么国民党实行“清党”就是要叫市民安居乐业！他把传单撕个粉碎，动身要走。陈功武劝阻，刘尔菘说你没见我化了装吗？刘尔菘平时穿的是黄斜企领文装，有时也穿一件大翻领西服。陈功武争拗不过，就说那我在前面探路。其实，刚才他前脚出门，刘尔菘就跟着出去，但走了没多远就给挡回了头。刘尔菘笑了，说：“好吧。”

他们还没出门，楼梯上突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陈六大惊失色地从内室冲出来，一把将刘尔菘推进厨房。这只是她在情急中的一个下意识反应。他们的居室十分浅窄，只有一个门，一个小厅，一间小屋，后进是厨房，这里无法逃走，也断然藏不住人。

门被枪托砸开了，一群如虎似狼的警察扑了进来。有个家伙当胸抓住陈功武喝道：“刘尔菘在哪里？快说！”

刘尔菘神色坦荡地出现在厨房门口。他异常冷静而坚定：

“我就是刘尔菘。”

几支枪筒立刻顶住了他的胸膛。

这时候，黄埔军校本部、沙河入伍生驻地和鱼珠学生军营区都处于枪口的包围之中。

驻沙河的黄埔军校入伍生正徒手集合在操场上，他们是在睡梦中被急促的集合号音驱赶到这里的。团长李亚芬站在讲台上，用有些嘶哑的嗓音大声说：“今天奉到命令，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籍的学生分别开来，目的是为了分别教育。当然，你们中间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真正用意。但是你们抬头看看，白云山和瘦狗岭的山头上都架起了机枪和大炮，我们已经被紧紧包围了。你们的枪支机柄早已被卸走，万不可有任何侥幸和不智的想法。现在，凡是共产党籍的学生，都站到队伍的前面来。”

李亚芬已经宣布三遍了。他还曾说，可以发给共产党员路费，用专轮把他们送到武汉去。

下面仍然是一片窸窸窣窣的沉默。

时间像倒脚声和克制着的咳嗽声一样尴尬难熬。

队列里终于有了动静。

二营五连一个叫魏琴鹤的湖北籍学生迈着雄武有力的大步走到前面，大声嚷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整个队伍里的人都笑了。李亚芬的这位患有精神病的老乡并不是共产党员，这会儿他是受到刺激了。他的举动非但没让李亚芬松口气，反使他万分恼火。

“好，好，你到前面来。”李亚芬欲笑欲哭地说。随后他气急败坏地吼道：“谁是共产党员，我这里有名单。你们大家在一起相处九个月了，心里也都清楚。我请大家把他们检举出来！”

此语一出，顿时引起乱哄哄的嘈杂之声。几天来盛传入伍生要开进广州示威，黄埔学生军要据守东江反抗政府，是真有此事？或者是谣传，是李济深为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而采用了蒋介石玩熟了的那一套？王雷云及身边的几个进步学生忿忿地议论着。这时有人被指认出来，有的身份半公开的骨干瞒不过去也站了出来。

五连连副朱家福红着脖子，神情窘迫地安慰大家说：“各位同学，我们左派是革命的，我们要拥护校长！共产党不合作，只好送他们到武汉去。”

王雷云压抑着怒火骂了一声：“羞你妈的先人！”

共产党员被押解到维新路公安局监狱，也有的被关进了河南的南石头惩戒场监狱。广州人管珠江叫河，珠江以北叫河北，珠江以南叫河南。

4月15日这一天，从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市郊，到处是杀气腾腾横冲直撞的反动军队、警察、流氓团体和地主武装。在城区东部，一群军痞闯入东山医院，把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共产党著名活动家萧楚女从病床上拖下来，用枪托和枪筒一阵乱打，患有严重肺病的萧楚女感到喉腔涌起腥热，他大喊一声，把一口鲜血喷到打手的脸上。在城区西关长寿路，青年团员范桂霞的家被抄，她由于躲在邻居家的厨房烟楼上幸而脱险，她的父亲被打得耳鼻出血，躺在满地的乱瓦碎砾中死去。市区西南郊大镇的地主土劣邝拨文纠集二百人的民团，向农会发动袭击，从大镇到龙溪、东塘，走一路烧一路，抓捕了数十名农会干部，并当场枪杀了十几个人。中山大学的铁栅门前警戒森严，校园内一片混乱，军警拿着名单闯入教室和宿舍点名抓人，40多名学生被捕，其中有身为中大学生的地下党员毕磊。住在中山大学宿舍的陈铁军，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幸亏得到一位叫沈卓清的女同志的及早通知，两人一同化装逃出校园。尔后，陈铁军装扮成穿旗袍戴耳环的贵妇人，沈卓清扮成她的女佣，冒死把在一家私立医院中分娩的邓颖超接出来，送上去香港的轮船。

海盗出身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的军队攻击铁路工会时，受到了铁路工人纠察队的激烈抵抗。血战进行了将近一个白天，终因势孤力单，工人纠察队被打散，其中有一百多人突破重围，从石围塘车站退到南海县九区木寮村，依靠农民兄弟的掩护，潜伏下来。在佛山普君圩，南浦乡农团团团长吴勤等人迎面遇到一伙全副武装的警察，为首的警官认出吴勤，拔出手枪惊乍一声“散开！”吴勤早已闪入打铁铺的后院，一纵身子上了屋顶。警官找来一条凳子踩上去吭哧吭哧往墙头上爬，只感到额头被冰冷的枪口点得一麻，抬头一看，满眼是吴勤的黑布裤裆，吓得他像个断蒂冬瓜哐地一声砸到地上。吴勤消失得无影无踪。

广州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三个工人和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被反绑着双手，由一队士兵押着走在大街上，路边的市民默默地低下了头。他们被押到位于东山附近的西广场，在广场边一个不大的土岗子前停下来。士兵吆喝着，用枪托撞击着，要他们面向土岗跪下。五个士兵向他们举起枪，没等下令就扣动了扳机。就在枪响的同时，一个工人猛然转身站了起来，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他圆睁的双目燃烧着永恒的怒火。

从4月15日开始，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在发生。

在大屠杀中，广州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学生有2100余人，其中有100余人被杀害。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熊锐，广东工人领袖刘尔崧、李森、邓培、何耀全、李亦愚，学生运动领导人毕磊等都不幸被逮捕杀害。刘尔崧在南石头受尽折磨，一字不吐，就义时他大义凛然，一路气出丹田地复诵着唐朝太守张巡临刑前对部将南霁云说的一句话：“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他被装进麻袋投入位临沙面的珠江白鹅潭中。

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党和工会的领导机构均遭破坏。

以李济深为头子的反动势力并没有正式封闭一切工会，而是指定亲信和在工人中的爪牙以“改组委员会”的名义，没收工会的财物和会址，把革命的工会改组为不革命的工会。这样，一方面好欺骗和控制工人，一方面好与

异己的政敌抗衡。资本家长长地吐了口恶气，他们纷纷推翻过去与工会订立的条约和协定，任意降低工资，延长工时，解雇和开除工人，谁要是反抗，就交给“改组委员会”，以共党分子的罪名逮捕。香港总督金文泰亲到广州拜访李济深，李济深率官员候在码头，鸣礼炮二十一响欢迎。不久，李济深又乘坐有四个烟筒的飞鹰炮舰去香港回拜。工会、大学、军校中的孙文主义抬头了。由戴季陶主义毒素培植起来的“孙文主义学会”不再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传统”，阶级斗争破坏了国民革命，而是赤裸裸地发表了反对共产党的宣言。城里的墙壁和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的标语。

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的广州倒下了。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倒下了。阴冷的雨雾中卷起一阵阵又腥又咸的凉风，卷起一股股人血的味道。

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屠杀在蔓延，白色恐怖在蔓延。

正如鲁迅说的：“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

这在我们古老民族充满了希望和恶梦的险要关头发生的惨痛一幕，被中国共产党人铭刻在了骨头上。

被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铭刻在了骨头上。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这惨痛的一幕。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又听到一阵枪响。他走到窗前，凝望着离领事馆不远的西广场的方向。过了好一阵子，他回到书桌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题为《温泉关口墓碑铭》的诗：

过路人，请传句话给斯巴达人，
为了听从他们的嘱咐，我们躺在这里。

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不少同志逃到香港。广东区委也转移到了那里，开始了秘密的斗争。

大屠杀发生后第三天，当时留在广州的广东区委和工会领导人周文雍、穆青、杨殷、赖先声、任卓宣、吴毅等人又聚合在西堤东桥的一间民舍里。他们默默地抽着闷烟，密不透风的屋子里烟雾腾腾。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像堵满了石头。

沉默了许久，杨殷一挥手，闷声说：“我就是搞不明白，早就看出蒋介石要下毒手了，为什么我们偏要轻信他！”

吴毅操着四川口音接道：“陈独秀说广东左到了天上，我看他是右到裤裆里了。”

周文雍拿起桌上的烟缸重重墩了一下，说“蒋介石、李济深有军队，我们有群众，不管他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这次紧急会议成立了新的广州市委，书记由吴毅担任，周文雍任组织部长，徐文雅任宣传部长。周文雍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

共产党人洗去身上的血迹，又站立起来。但是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残酷而复杂的局面。他们不知道怎样把握这种局面，只感到胸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苏兆征、黄平等广东区委部分领导人当时在武汉，他们得到消息后满腔悲愤。黄平真想像轿夫那样用针在自己的身上放放血。他们是为参加党的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路舟车辗转来到武汉的。在乘轿子过大庾岭到衡阳的途中，黄平看到了走了一天的轿夫在夕阳下扶着墙壁让人帮他放血的情形。

黄埔军校的“清党”毒焰越煽越凶。上自学校特别党部，下至连党部执行委员，都换上了一批孙文主义分子，像王雷云这样的进步学生整天处于被盯梢和谩骂之中。军校实在待不下去了，他们三三俩俩想出种种办法，绕道至广九铁路，扒上开入广州市区的火车，躲进四川会馆或亲友家中，从当铺里买件旧衣服换上，混上轮船至上海转赴武汉。

不知是来自天上，还是地下，来自昨日，还是来自明天，革命者仿佛都听到了一种类似黄钟大吕发出的声音。

日后站立在敌人绞架下的李大钊说出了这个声音：

“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斯大林也不是神

张太雷给他的那只金链怀表上着弦，往屋门口走。他的爱人王一知一把拉住他。张太雷看到递至嘴边的热牛奶，抱歉地笑笑，摘下近视眼镜一口气喝个精光。自从在一起生活后，王一知总感到他高大瘦削的身躯里时刻都滚荡着灼烫的热情和精力。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太雷白天要接待很多人，处理纷繁的事务，他手写、耳听、口答，是那样敏捷和果断；而晚上常常是彻夜为鲍罗廷翻译材料、撰写文章，成天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屋里一暗又一亮，太雷出了房门。

张太雷和鲍罗廷从他们同住的汉口德国租界来到华界一条小街上的黄陂会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李济深之流下毒手后，政局突变。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首要分子令；并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封锁和破坏。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区的农民运动仍很激烈，不少地方的农民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还出现了均分财物、禁米出境、铲除烟草、禁止酿酒、随意捕人、用强制的方法反对旧礼教和封建迷信等农民的自发行动。这激起了与封建地主沾亲带故有利益关系的北伐军官和武汉政府官员的仇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尖锐。

在党内，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致电中央，建议迅速东征讨蒋。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先进行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打垮奉系军阀张作霖，然后回过头来打蒋介石。并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等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反对在此之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正符合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妥协的心理，所以立即得到武汉政府的赞同。4月21日，北伐军沿京汉路向河南开封进发。

就当革命处于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的力主下，中共五大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

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进大门穿过戏楼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顶头的三间正厅里用门板搭起主席台。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照片、中共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台后的隔轩是讨论和休息的地方。院子里摆放着长靠椅和条凳，是代表席。

因为局势动荡，中央派叶挺的部队担任大会的警戒。代表们只凭“冲锋”之类的临时口令代替出入的证件。

张太雷和鲍罗廷走进会场的时候，先已到达的叶挺迎了过来。叶挺穿着白布衬衣和草绿色马裤，也许长时间没换洗了，显得有些脏腻。这与北伐临出征前的叶挺真不能比。那时的他身着崭新的青色军装，脚蹬锃亮的长筒马靴，给人一种英俊爽洁的印象。时隔一年，何以致此？张太雷心中泛起一缕苦涩。这时，心细的黄平在叶挺的衣袖上发现了一个虱子，便指着问他：“你看这是什么？”叶挺用拇指和食指一下捏住，一边使劲捻一边说：“是吴佩孚吧，捻死他！”站在一旁的恽代英又在他的衣领上捏住一个，边捻边问：“这个又是谁呢？”叶挺笑笑说：“这个么，你当然晓得罗。”与其说这是个幽默的玩笑，倒不如说是个智慧的诅咒。受到诅咒的自然是蒋介石。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80人，代表着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金斯基，身份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及

职工国际代表团。由谭延闿、孙科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到会祝贺。

第一天上午由陈独秀作报告。他穿着青布长衫，说的普通话夹着安徽口音。足足讲了5个小时的报告，通篇都在为他的主张和后果作辩护。他说，对中山舰事件妥协退让、限制土地革命等是“正确的策略”，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如蒋介石强大。他还正式提出了“向西北去”的理论，主张革命应退到帝国主义影响薄弱的西北各省去聚集力量。

整个会场安静得只有一个学者教授式的声音。

站在主席台对面戏楼上旁听的叶挺早已耐不住性子了，他一次次松开又紧紧抓住木栏杆。他忧心忡忡地问身边的羊牧之：“他的讲话不要经过中央讨论么？”代表们对这个报告强烈不满，议论鼎沸，有38人签名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议案。瞿秋白散发了他写的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错误。他把党中央比喻成一个沉疴在身的病人，要用锋利的手术刀才能挖除病根。恽代英摇晃着小册子对叶挺说：“鲜明，尖锐！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他贫血的脸上兴奋得泛起了红晕。

在隔轩里进行的小组讨论会上，张太雷与彭述之一枪一盾，争得面红耳赤。

张太雷说：“我们北伐军本来几经激战，一路顺利，谁知蒋介石到达江苏后马上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杀了大批共产党员；目下他又有进逼武汉之势，大好时局顿时恶化。他敢这样做，一是依仗军力，二是有背景的支持。对此我党教训惨痛，我党领导者咎不得辞！”激烈辞锋触及的创痛，使他的脸上闪烁着泪光。

彭述之说：“蒋介石所为，应与我党一贯政策分开。国共合作这一我党的一贯政策，为共产国际所指示，大家所公认，无可厚非。请问，没有合作，哪有北伐的胜利？”彭述之的语调要冷静、缓慢得多。

张太雷直点要害：“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为了合作，党就必然要实行右倾政策。如不要搞农民运动，工人不准武装，为图合法生存而一切都迁就国民党，等等，请问这还有什么共产党？”

彭述之低沉了下去，重复道：“我们要听共产国际的。”

应该说，彭述之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

为了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也召开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执委会全体会议。会议刚开始的一天晚上，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布哈林、艾尔科勒和特伦之间发生了争论。

布哈林谈到，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对土地运动不加遏制，我们将失去左派同盟者，而不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特伦认为问题不是牺牲无产阶级所有的同盟者，而是应牺牲哪些同盟者：是已经起来的农民，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指望国民党通过一项实现革命的正式决议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立即把农民暴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

他们各执己见，争论了很长时间。布哈林觉得很难办，便打电话请斯大林来，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

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它的领导。它有理论和经验，但也不是神仙。它对中国的了解不可能透彻，何况

是剧烈动荡中的中国，因此指导中国革命常出现反复多变甚至是混乱的情形，尤其是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还说：“按照蒋介石的阶级性，虽说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只要他暂时尚未反动，尚未变节，只要他能积极实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蒋介石转向后，斯大林即在《真理报》上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然而，他立即又遇到了难题。

不到抽完一支烟的工夫，斯大林来了。他同往常一样穿一身士兵服，肩上没有级别标志，一双粗牛皮靴子肥大笨重，十足像个复员的农民。

斯大林刚一落座就声言同意布哈林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实质。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而中国军队又都是些雇佣兵，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把他们拉过来。

特伦指出，雇佣兵一般都是破产农民，如果我们支持土地革命，他们为了分到土地就会开小差回家。斯大林说，这样讲一般来说是对的，但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资产阶级左派的军队不会一触即溃，等不到农民暴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在内战中被打败。斯大林读了几份鲍罗廷从中国发来的电报，表明国民党领导决心要反对土地革命，甚至不惜因此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

斯大林盯着特伦的眼睛：“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是斗争，还是讲点策略？”

特伦看着斯大林鼻子下漂亮的胡须：“我们应该斗争。”

斯大林说：“现在进行斗争就一定会失败。只有讲策略才能赢得时间，加强我们的力量。”

特伦有点冲动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斗争就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反对农民运动，那么今后就难以再得到农民的支持。”

斯大林腰杆挺直，坐得纹丝不动：“不是反对，是限制。讲策略不等于彻底妥协。土地革命吓坏了国民党，只是因为它直接危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的利益，我们只是反对没收和平分他们的土地。我准备给鲍罗廷发个指示。”

“事实上，”特伦说，“农民也许不会把这样的禁令放在眼里。如果农民的行动超出了斯大林同志划出的界限，国民党定会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决定。我要再次强调：是斗争还是讲策略？”斯大林的面孔像一块铁板，只有那撮胡须能动。

“如果讲策略是必要的，策略也只应该是策略。那么，我们同时应该反对国民政府用武力来限制土地革命的企图。我要求把这个态度也一并下达给鲍罗廷。”说服不了斯大林，特伦只好做出有条件的让步。

“对问题的实质，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没有出现的问题，没有必要发指示。”会议已开了一整夜，斯大林用双手按住桌沿，准备结束讨论。

“既然斯大林同志说了，他同意你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我认为，特伦应该相信斯大林同志。”艾尔科勒这才插话。

“你们是多数。但如果不把我的补充命令下达给鲍罗廷，我将在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公开阐明我的保留意见。”特伦说。

“少数必须服从纪律。希望特伦同志放弃自己的打算。”布哈林说。

斯大林已经按着桌沿站了起来。

也许特伦想缓解一下依然显得紧张的气氛，说：“我真怕你们一道对我动武。”

“别开玩笑了。”斯大林的胡须又动了动。

在克里姆林宫发生这场争论之前几天，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否定了陈独秀的右倾主张，批评了他的错误。指出：“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没有“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完成北伐再进行土地革命“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向西北去的主张是“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大会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纲领相对立的决议案，指出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建立农民的武装和政权，在城市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武装。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左右着局面。但是，就同斯大林一样，提出了“做什么”，还要面临一个“怎么做”。对于这个更为复杂的

问题，罗易自然也摸不到门。

中共已经认识到了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迫切性。但具体该怎

么办，怎样改造武汉政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等，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并且，由于罗

易竭力为陈独秀开脱，使他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会议的一些决议到头来又被否定。

“做什么”和“怎么做”，往往就如同一长一短的两条腿，造成了路的崎岖和颠簸。

在从会场返回住处的路上，黄平问张太雷，为什么大家推荐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顶替他父亲，他本人不愿意？“因为陈独秀是他的父亲，还是他根本不赞成推翻陈独秀？”黄平在会议开始之前听张太雷说起过此事，也听说陈延年骂他父亲混蛋老糊涂。他想当面问问陈延年。但已经去了上海的陈延年没有参加会议。

黄平只有二十多岁，张太雷也不到三十岁，但张太雷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我们不仅要发展我们的身体，更要紧的是要发展我们的脑子。”

两路叛军一灭一逞

汉口码头上排列着“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罐，英舰“柯克杰姆”号在江中突突地吐着浓黑的烟。一艘轮船与它们擦身而过，沿着汉口的滨河大街行驶。岸上的一堵高墙上有幅宣传画，画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同戴着高毛皮帽的苏联人握手，下沿的标语是：“英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紧密联合苏联”。

轮船横渡长江，拖着白浊的水花驶抵武昌码头。穿长衫的商人，短打扮的脚夫，洋人和乞丐，卖唱女和军官，岸上的和船上的，全都嗡嗡嚷嚷地杂织在了一起。这情景像是浑身膻臭的猪贩子和妆扮得油头粉面的贵夫人交臂而过时融合的气味儿。王雷云和梁德贵等几个四川籍的同学一下轮船，就听到在不远处的人堆里传来亢奋的歌声。他们在路边的小吃摊上买些豆皮，边往嘴里塞边凑了过去。

“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我们大家起来，我们大家起来，打倒他！打倒他！”一首歌唱完，激起了一阵掌声和喝彩声。原来是武汉军校的学生在搞街头宣传。王雷云挤进人群，拉住一位像是领头的高个子女生，三言两语说清了原委。那位女生剪短发，腰扎皮带，臂上有一块用蓝布缀的“w”标记，很是神气。高个子女生自称游曦，她眼睛一亮：“得，四川同乡，我带你们去见恽代英！”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由随军北上的黄埔军校政治科为班底，在两湖书院创办了武汉分校，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等。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周恩来、陈毅、聂荣臻也曾参与工作，军校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学生主要由在武汉三镇招收的第六期入伍生和驻在武昌南湖的学兵团组成。这些来自湘、鄂、黔、沪、豫、鲁以及辽沈等地的青年中间，多数是学生，也有懂得几国文字的博士硕士，设私塾授徒的先生，商店学徒、小贩，还有挣脱了封建枷锁的童养媳。军校设军事大队、政治大队，还有一个183人的女生队，共四千人左右。

游曦、王雷云一群人快到军校时，遇到一拨工人纠察队。队员们穿着蓝色制服，红色的帽徽上有“劳动”两个字，手里的武器是一根与身等高的木棍。

军校内到处贴着标语：“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严惩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反对独裁”等等。这些标语的底色和墨迹已被风雨洗得发白。以汪精卫的口号“是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书写的大红对联，也在大门口变得斑驳陈旧，披垂下了一角。王雷云、梁德贵几个人随游曦一群人来到军校，找到恽代英。

穿着一身旧制服的恽代英虽然长得瘦小，但浑身上下透着精神和干练。他托了托白丝边眼镜，眉宇间一忧一喜，说：“来得好。广州黑了武汉亮嘛！”

也许是由于话说得过多，过于用力，恽代英的嗓子有些沙哑。

离开恽代英的办公室，游曦就向王雷云介绍开了。军校每天进行三操两讲，军事课程有战术、兵器、筑城和地形四大教程，还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每天有四小时的政治学习，课程有《社会进化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游曦的两片薄嘴唇翻得奇快。王雷生听得喘不过气来，肩上还挨了游曦一记重拍，心想：“这准是个又尖又红的辣妹子。”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重入军校后没几天，就发生了夏斗寅举军偷袭武汉的叛乱。

已经说了，武汉政府当时面临的局势是，一方面受到美、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的封锁围困；另一方面，它所管辖的湘、鄂、赣各省区的工农运动仍然猛烈发展，使得武汉政府军队中许多军官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军队中滋长蔓延着背叛的情绪。

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夏斗寅率先举起叛旗。

夏斗寅的独立第十四师驻扎在鄂西宜昌一带，本是防范四川军阀杨森进犯武汉的。惯于改换门庭的夏斗寅为了投靠蒋介石，反与杨森结盟进攻武汉。夏斗寅、杨森出发时带着鸦片烟枪，大模大样地坐着轿子，像黄鼠狼扑鸡似地督促部队“赶到武昌过端午节”。

武汉方面对此一无所知。武汉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和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正率主力在河南与张作霖和吴佩孚鏖战。留守武汉的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和政府警卫团，兵力单薄，防务空虚。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进抵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镇，公布了反共通电。武汉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叶挺奉命率七十二、七十五两个新兵团和由武汉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一师反击叛军。

在北伐中，叶挺带领独立团一路斩获，名声大震，被誉为“铁军”。平时他沉静宽厚，一派儒雅俊杰风度，然而打起仗来，却行动果决，指挥斩钉截铁，像发威的猛虎令人生畏。19日拂晓，叶挺亲赴纸坊前线，即以大部指向铁路正面，以一个教导营为右翼，向叛军展开了全线猛攻。

子弹带着哨音在空中纵横交织，铁路的基石和朽烂的枕木被手榴弹崩得碎渣横飞，弹片打在铁轨上发出极有弹性的刺响；不断有人被片了脑袋，不断有人突然倒在地上长嚎或短吟。尽管夏斗寅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这支由军阀那里投顺过来又反叛过去的军队里充斥着土匪、小孩、七十岁的老头、瘸子、大烟鬼、梅毒患者，他们有的吓得拖下了鼻涕，他们的枪有些是用铁丝把枪床和枪托捆在一起的，但是，叛军的旅团军官都是保定军校出身，他们能使这架破旧的机器喷吐出致命的火焰。

战争是恐怖的。独立师一团团长兰腾蛟指挥的军校生没有实战经验，他们沿着铁路的攻击进展迟缓。

趴在一个小土堆后面的王雷云刚抬起头，就被迎面射来的子弹溅起的沙土迷住了眼睛。

叶挺见兰腾蛟的部队进攻不力，即亲笔写了一道手令，曰：“限一小时内夺取敌阵地，如有迟疑，将以军法从事”。兰腾蛟与叶挺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他对叶挺在作战中的钢铁风格只有耳闻，从未目睹。“妈的，果然是咄咄逼人！”他挥动左轮手枪呐喊着向敌阵冲去。一时间铜号激越，杀声震天，军校学员冒死向前赴杀。大惊失色的叛军弃阵狼狈溃逃。

叶挺下令穷追猛打。

部队到达土地堂附近时，叛军已收拢起残部，用黑森森的重机枪枪口封锁了铁路通道，倾其全力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必须扬起铁军雄风才能赢得这场战斗。攻击开始后，叶挺冒着纷飞的弹雨来到主攻阵地上。他以自己的镇定自若和机智果敢，使部队的战斗力得以发酵膨胀。他看到几个战士在浓烟烈火中相继中弹栽倒。又看到一个战士离开阵地跑到

一棵大树后面藏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那个战士还没回到阵地上。叶挺按捺不住地奔跃过去，厉声喝斥。他的部队必须不顾一切地猛打猛冲，一冲到底，而决不允许有怯懦退缩者，尤其是火线上的逃兵。

叶挺稍作斟酌，决定枪决这个逃兵。

在生死搏杀的战场上，有时必须以自觉的牺牲来换取致胜的勇气和力量。这是激情的选择，同时也是理智的选择。

这是战争的残酷，是一次挥泪问斩。王雷云用滴在烧红的枪管上瞬即蒸发的泪水送走了他的同乡梁德贵。

叶挺是对的。梁德贵被处决后，官兵们心怀敬畏，心怀悲壮之情拼死搏杀，终于打破了长达两小时的胶着状态，冲垮了叛军阵地。叶挺传令继续向贺胜桥以至汀泗桥追击，以扩大战果。这个时候小灶送了上来，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粉碎叛军上的叶挺这才感到饥肠辘辘。但此时苦战了一天的官兵们仍在空腹进击，他拒绝开饭。他要等到收兵后再开饭。他要把他统帅的军队都铸造成为“铁军”。

游曦和赵一曼所在的女兵队也参加了战斗，游曦还抓住了一个刺探军情的土豪。

独立师攻占咸宁后的一天，游曦在驻地的妇女协会值班，为妇女协会挑水的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说城关厢有个光头男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游曦跟着女孩跑步到城关厢。那光顶男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游曦大喊“站住”，光头男人像受了惊吓的野猪，在潮湿的田塍上跑得啪叽有声。游曦倒不急，她不紧不慢地拉动枪栓，不紧不慢地抬高枪口，嘭地朝天放了一枪。光头男人立即被“击”中了，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还“痛”得直抽抽。用根综绳捆住一盘问，原来是个土豪，是受叛军的差遣天没亮就溜进城来刺探军情的。事后，游曦和赵一曼等押着这个土豪到他离咸宁十几里的家中，把他家贮藏的一罐罐腊肉和香肠分给了当地的农民。

杨森的军队人称“川老鼠”，在进抵金口仙桃镇时被从河南回师的第八军团团团围住。军校生组成的独立师之一部也协同围攻。这简直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徐向前带着一群军校生冲进街里，尽找堆放霉烂稻草陈年杂物及阴暗潮湿的地方轰赶“老鼠”。杨森最后丢下七个团的兵力，只身窜出包围圈逃走。

夏斗寅和杨森连大烟枪都丢了。他们的军队会成为军校生进行战斗演习和实弹射击的活靶子，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当叶挺率军在武汉追歼叛军正酣之时，5月21日，在蒋介石策动下，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掀起了黑色旗幡。

长沙由于工农运动搞得十分红火，时有“小莫斯科”之称。连寺庙大殿里的柱子上都贴着“和尚尼姑都是无产阶级”的标语，以免受冲击。五一节那天，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门前都挂起镰刀斧头旗。但是到了5月中旬，长沙突然出现了“左社”、“拥蒋棒喝团”和“保产党”等名称古怪的组织，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已攻入武昌了”、“武汉政府倒台了”。市民人心惶惶，抢购之风大盛。搅合得够了，许克祥又伙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头目仇鳌使出栽赃诬陷的毒计，指使手下的罗喽沿街张贴“打倒新军阀汪精卫”、“缴许克祥的枪武装工农”等标语。

汪精卫不是左派领袖吗？许克祥又没叛变，干么子要缴他的枪？朱道南和公今寿在街上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口号感到纳闷。他们一路议论着回到了小吴门外，看到了校门横匾上每个都有八仙桌面那么大的黑字：“尽量左倾”。

公今寿和朱道南是山东的穷学生，凭着满腔热血投奔武汉分校，结果是被长沙分校录取，很快入了党。长沙分校比武汉分校成立稍晚，也有一大批进步师生。

晚上，朱道南躺在床板上思索白天没有想透的问题。大约 10 点多钟，他听到西南方向响起两记清晰的枪声。是农民枪毙土豪劣绅吧？不对，外面的枪声像炒黄豆一样连成了一片。他和公今寿、赵柔坚几乎是同时翻身下床。他们提着枪来到操场，院外的枪更加猛烈，还夹杂着机枪声、炮声和人的惨叫声。“走！到外面去看看。”但反动教官孙得胜把他们堵了回来。赵柔坚闪到一棵樟树身后避过孙得胜。孙得胜在宿舍楼前大声叫喊：“都不准乱动，不准说话，不准拿枪，步兵大队全体人员下楼集合，按连排全部坐下！”

全校的灯光一下全黑了。几乎是同时，雪白锋利的闪电劈开了黑暗。也许是老天有灵吧，从高空直贯而下的巨雷震动得大地像怒狮一样抖动。又是一道闪电。他们看到了从校门口往回跑的赵柔坚，继而听到他激愤的喊声。

“我们被叛军包围啦！快向外冲啊！不要坐着等死啊！”

朱道南和公今寿把子弹推上膛，跳出窗户。赵柔坚在惨白的闪电中边喊边跑。他们掠过墙角向赵柔坚跑去。墙角有人放枪。赵柔坚随着枪响倒下了，但立刻又爬起来，一颠一跛地跑着，喊着。朱道南和公今寿转回身逼向发出枪声的墙角。又一道闪电临空劈下。“老子扒了你的皮！”公今寿的吼声和当顶炸开的雷声交织在一起，两把刺刀同时将蜷缩在墙角的孙得胜扎了个透膛。

赵柔坚的脑袋变得像石头一样的沉重。公今寿把他轻放在地上，凄楚和仇恨像火团从胃里直窜咽喉。“奶奶的，快冲出去！”他们肩顶臂援相互帮衬着翻出围墙，沿着围墙向西面闯。学校里响起了激越的冲锋号声。早已埋伏在校门外的机枪像受到刺激的疯子一样对着校门疯狂地扫射起来。公今寿和朱道南闯进了小胡同，与一小股叛军遭遇，公今寿立马用刺刀捅死一个。他们退到一个拐角，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暴雨倾盆而下，电闪之中青石板小路上雨烟腾腾。不一会儿，黑里透红的积水裹带着土腥味和血腥味漫淌过来。

这又是一宗大血案。许克祥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残杀了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党校、农运讲习所和工运训练班等一切革命组织，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

公今寿、朱道南等 30 多名学生在小吴门外扒上火车，逃往武汉。

他们组织请愿队来到了国民政府找汪精卫。一个官气十足的大块头只说了一句：“汪主席不在，你们回去吧。”

他们到武汉军校找到了恽代英。恽代英同意他们入校，并帮助偿付了住旅馆的 98 元欠债。恽代英说：“许克祥打你们，汪精卫不见你们，这些都要引为教训。我们要记住，无产阶级的事业全靠我们自己！”

叶挺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把夏斗寅的叛军彻底消灭的，但汪精卫提出了调解的主张，以致于纵敌逃逸。“马日事变”之后，叶挺又接连给武汉国民政府发了几份电报，请命开赴长沙镇压叛军，捉拿魁首。汪精卫又是不同意。他认为问题出在工农运动“过火”上，而陈独秀和鲍罗廷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经鲍罗廷提议，汪精卫决定由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等组成一个查办团，既查办叛军，也查办农运，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来收场。岂料查办团到岳阳时，驻军头目周盘出示了许克祥打来的将谭平山等人就地处决的电令。查办团闻讯大惊，走为上计。

许克祥在长沙一连屠杀了七八天，砍手足、剜眼、割耳、斩腰、剥皮，用种种野蛮之极的手段残杀革命者。此时，湖南各县有 500 多万农协会员，凝聚在一起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 10 余县的农民向长沙进军，终因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而撤消计划。浏阳的一部农军因未接到计划撤消的通知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击溃。查办团被吓跑后，许克祥更加肆无忌惮，把部下派到各县去屠杀工农，摧残革命团体，半个月的时间内，长沙附近各县有一万多人倒在了血泊中。他在挥舞屠刀时挂在嘴边的护身符是：“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还有一句是：“拥护蒋、汪合作”。

以恐怖反击恐怖

被装在麻袋里投入白鹅潭江中的刘尔崧并没有死！

“四一五”之后，关于白鹅潭的古老传说被赋予了现实的生命，在民间被一种痛苦而又充满期待的感情掀起一个传述的热潮，激荡着成千成万颗心。

那是明朝正统末年的事了——叙述人一般都是这么开头。

广东南海冲鹤堡有个叫黄萧养的穷人，不堪封建暴政的残酷欺压，带领农民起来暴动，各地农民响应之众，竟使他很快纠集起数百艘战船直捣广州，在“五羊驿”自封为“东阳王”。下一步，就是夺取大明皇帝的宝座。他的一位神机军师告诉他，在黄道吉日那天，当军营外的竹笋长至齐眉时，只要他拉满了弓朝着皇宫的方向一箭射去，就能射穿皇帝的心窝。那天天还没亮，军营外的竹林里果然有棵竹笋缓慢有力地顶破了泥土。由于内心焦急，黄萧养跪在了地上。竹笋长呵，长呵，慢腾腾的一点一点地长。它的尖儿刚触到黄萧养眉尖，他便霍地站了起来。像流星闪

电一样的箭簇划破了黑黝黝的夜空，穿过了阴森森的宫殿，不差分毫地钉在了紫檀木九龙宝座的靠背上。可是黄萧养呵，你为什

么要跪下呢？竹笋还没长到时候，那狗皇儿还没有登殿哩。事情坏就坏在太性急了。狗皇儿看到朝他心窝飞来的箭，看到箭杆上

的“黄萧养”三个字，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号令三军，剿杀黄萧养。经过几十场血战，黄萧养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直退到珠江边上。这里因连年兵燹，加上水旱天灾，只剩下光秃秃的丘陵。大英雄面对滚滚珠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了。就在这绝望无援之时，白茫茫的江面上忽然涌出两团烂银似的白光，向岸边飞

闪而来。这是两只硕大无朋的白鹅，它们一到岸边就伸颈拍翅。

于是，黄萧养乘着它们驰往白茫茫的江心，消失在白茫茫的江水和雾气里。

在工人们的感受中，刘尔崧没有死，他就同黄萧养一样，是被美丽的白鹅接走了。他也就永不间断地到来，到来。

“四一五”大屠杀制造的白色恐怖没有压倒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英雄人民。那些倒下去的烈士化作了滔滔江水，化作了愤怒的泥土。

“五大”之后，瞿秋白我黄平谈话，要他回广州。鲍罗廷告诉他，回广州的任务是要组织搞破坏，比如破坏水陆交通、在工厂

闹事等，以干扰颠覆李济深的反动政权。汪精卫给了他一张八千元的香港支票，作活动经费用。

黄平从武汉乘船先到上海。他冒充武汉中国银行的职员，混过了码头上特务的严密盘查。后在他姐夫开的烟纸店落脚，与陈延年在狄思威路的一个秘密机关接上了头，把中央要求在往返于上海与武汉的轮船上建立一个交通网的指示传达给他。6月上旬他乘船到香港。

他被一位少妇带到了位于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小洋房里。

这是一个颇为富足的人家，屋里陈放着挺考究的藤椅、藤几之类的家具。藤书架上摆设着耶稣像、十字架和圣经。“饿了吧？烧些藕粥给你吃。”少妇从盛盐的密封陶罐里掏出些干藕节。她告诉黄平，她叫范桂霞，是“四一

五”后从广州跑出来的。这儿不是她家，又是她家，是广东区委的招待所。黄平对穿着一件黑色通花丝质旗袍的范桂霞打趣地说：“原来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呀。”

黄平出身于小买办家庭，走出校门后，初在北京英文导报当校对，英文进步极快，又被介绍到苏联塔斯社的前身远东通讯社当翻译。在一次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听到关于苏联革命的成就很受感动，便问苏联大使加拉罕：“世界上有没有学习革命的学校？”加拉罕说：“有，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学校，你要去，我给你签证。”于是，黄平就进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赵世炎、任弼时、聂荣臻、叶挺、陈延年等一块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与了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发动工作，后担任广东区委工委书记。自从苏联归来，他喜欢以无产阶级自称。

当晚，范桂霞找来了广东区委委员杨殷。黄平把八千元支票交给他，听他介绍了区委一些同志在香港的工作情况。杨殷说，广州市委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坚持着秘密的斗争，他们干得非常出色。

4月20日，周文雍和陈郁召集广州工代会所属的工会领导人开会，以区党委、区团委、联合罢工委员会、省革命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市农民协会、省妇女解放协会、广东新学生总社等组织的名义，共同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残暴大屠杀的宣言》。23日至25日，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海员、汽车、手车、印刷、渔业工人及店员、银行职员阻滞着城市的运转。他们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及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东家的进攻！罢工中又有数十名工人被捕。劳动童子团副团长邓金娣和童子团女童部长罗大妹在一德路、太平南路散发《宣言》时，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敌人用“吊飞机”的残暴酷刑，把她们的头往墙上撞得鲜血四溢，也没能从她们口中撬出一个字。最终，在罪恶的枪口下，邓金娣永远地活在了十九岁，罗大妹永远地活在了十八岁。在被押赴东较场刑场的途中，她们挥舞着从红毯子上撕下的碎片。邓金娣奋力高喊：“工人兄弟们，我们去休息了，你们要继续同他们干！”

邓金娣和罗大妹牺牲的第二天，周文雍和陈功武来到文昌巷口的西南茶楼，穿过林林总总的茶客，拣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他们沉沉地喝了几杯岩茶。

周文雍挪了挪身子，凑近陈功武耳边说：“有个任务——”

“好！跟他们干！”没等周文雍说完，陈功武像是要吐出淤积在胸口的闷气似地低吼了一声。

周文雍按住他轻擂在桌上的拳头：“你急什么？小心狗！”

陈功武又低头喝了一杯岩茶。

周文雍说：“还不是硬干的时候。我们要办一份小报，给工人看，你来编，再找人帮你手。”

陈功武粗糙油腻的大手发窘地捏住空茶杯。

周文雍鼓励道：“这事很要紧。武来武对，文来文挡，他们的报纸跟我们涂污泥，我们就要戳破鬼皮，穿他的褰！”

陈功武用力地点了点头。

陈功武担任编辑，组织上派来了地下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朱耀文缮写钢板。他从工会抱回一部油印机，还有一些纸张油墨，就在家中干了起来。楼下经营顾绣的两夫妇并不理会。他们印了几张五颜六色的“膏丹丸散，道地

药材”之类的广告纸贴在墙上，自称做印制招牌纸的生意。这份叫作《工人小日报》的报纸印好后，由各工会来人取回去散发。秘密的消息在地下四处传递。

工人群众开始了新的战斗。当时争夺工会的斗争十分激烈，反动政府一方面利用工会中的内奸捕捉革命同志，将“改组委员会”掺进来，改变工会的性质；一方面下令将工人代表会解散，强迫工人加入国民党控制的机器工会。周文雍等工运领导人则针锋相对，一方面用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在被拉过去的工会里暗中成立进步工会；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会，把各工会原来的纠察队和会员组织起来，建立起了秘密武装团体，如手车夫中的剑仔队，海员中的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等。斗争呈胶着状态。一部分工会被反动政府控制，如火柴工会、汽水工会等；另一些工会则牢牢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如油业工会、手车工会、汽车工会等。此外，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打入了“改组委员会”。土木建筑工会、酒米工会的领导人被捕后，顶替他们的仍是打着“改组委员会”招牌的共产党人。

这段时间，广州郊区南海等地的党组织和农民武装也得到了恢复。

省农协特派员梁复然受杨殷的指派，于5月中旬从香港潜回南海县。他来到林岳村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民团团长的郭植生家。郭植生告诉他：陈道舟、周侠生和谢颂雅已组成了新的南海县委。吴勤在雷岗一带活动，钱维芳隐蔽在山紫村集结力量，周侠生负责领导全县的地下武装。目前反动民团十分猖獗，城镇里的“改组狗”也四处出击，地主豪绅忙于复仇，不断有农会干部被杀害。“困难呐！每走动一步都得多带一只眼睛呢。”郭植生忧心忡忡。梁复然在林岳村挂起了医馆的招牌，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在大沥松岗武举人绅矜连家找到了南海县委。吴勤还是那样精壮，透出争强逞胜和过于自负的气质。鬓发飞霜的钱维芳神态坚毅，如足下有根。周侠生两眼平射，言谈举止蓄敛着锋芒，他一开口就说：“留下了筋骨，不怕皮肉长不好。”他告诉梁复生，全县的地下武装正在神出鬼没地骚扰敌人，保存和不断壮大自己。

东江、海南岛、北江、西江和南路等省内各地的农民都揭杆而起，同反动势力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

6月23日是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两周年纪念日。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会议特委会议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要在这一天召开群众大会。就像阴晦的霉雨天被揭了盖一样，手车夫石喜的脸上晴光朗朗。接着，他的脸上又掠过剧痛的表情。他咬破食指，用鲜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下“誓死斗争”四个字，他要把它带到大会上去。他同几位工友出了万福路车夫馆。

到会的工人有三万以上，许多人手上举着红纸做的小旗子，上面写着：“保持罢工工人一切权利！”“打倒委派的改组委员！”“保持4月15日以前工人和资本家所定的协约！”在会上散发的宣传品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写的小册子。石喜得到了一本李卜克内西写的《不顾一切》。会场尽管被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但气氛仍非常热烈。“改组委员会”也派出几个代表出席，这引起了一阵骚乱，愤怒的工人在一片喊打声中把他们及随身卫兵赶了出去。

在此之前19号的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日也举行了同样的活动。

这两次大会之后，反动政府进行了第二次“清党”，大批军警包围搜查

了罢工工人宿舍，逮捕二百多人，抓走的全都是工人中的骨干。这是“改组狗”的刺探和告发的结果。工人们恨不能抽了这群赖皮狗的筋。他们强烈要求“以赤色的恐怖反击白色恐怖”，用暗杀的方式来收拾这帮败类。他们自发组织起了“赤色恐怖队”。

这种原始的冒险行为也许是不智的，因而受到市委的阻止。但周文雍等人赞同这么干，因为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压制“改组狗”的气焰。周文雍还亲自参与了策划和指挥。

黄平这时回到了广州。离开香港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陈延年被杀害的消息，被捕地点就在不久前他们会面的上海狄威思路。又是叛徒告的密。黄平感到忿懑和压抑，他赞成这种极端的做法。这也符合鲍罗廷搞破坏的要求。他说：“最好的方法是用匕首把他们捅死。这样做没有声音，我们可以从容离开。”

“赤色恐怖队”拣最歹毒的家伙下手。几位工友讨好似地把两个改组委员请到五仙门的一家小酒馆，点了生筋田鸡，豉汁排骨，每人一碗双蒸酒。这两个家伙曾带着军警强占火柴工会会址，横行惯了，喝到面红耳热，把一口烟喷到石喜脸上，还伸手在卖艺唱歌的女孩身上抓挠。石喜快要爆炸了。他破坏了原计划，腾地站起，一手按住脑袋，一手持钢刀往脖子上一抹，那家伙就不再进气，只在脖子的伤口处滋滋地冒血沫子。另一个家伙像猛地跌进了冰窟窿，激凌得哭爹喊娘撒腿就跑。石喜他们追赶几步，撞上了巡夜的警察，又反被警察追赶。“回你的望乡台！”一工友甩手撸动撸子，像推倒一堵土墙似地撸倒了警察。

复仇的行动并不顺利，除了又杀毙一名残暴的警官，击伤两名作恶多端的改组会员，其它计划均受挫。“赤色恐怖队”成员曾潜入南堤国民党市党部，在曾西盛的皮转椅下安上手榴弹，可惜引爆早了点。还有人在市党部围墙上挖洞装上渔炮，炸倒了一面围墙。对李济深也组织了三次刺杀行动，都因技术不佳，准备不周而未果。这带有原始的神秘威慑力的行为引起了震动，尤其使掺在工人中的“改组狗”们闻之丧胆，人人自危。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非常局部的、无力的，它如同蜜蜂倾注了全部生命的蜇刺，对于一个宠然大物，这只能是复仇意志的一种表达。暗杀行动激起反动政府的报复，带着恐惧心理的疯子般的报复，上百名无辜的工人因此而吃足了苦头。

渗透到各个领域、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对抗，更加尖锐火炽。斗争环境也急剧恶化。市委的活动只得更加隐秘，吴毅、周文雍、黄平等人商量工作基本都是单个接头，开小会。

工人们必须在这令人窒息的处境里找到一条出路。

他们怀念大革命时的广州，常常耽想于那热烈的节日幻影中翘首北望，期待着武汉政府回师南征。他们准备起来作内应。

大革命遭到最后一击

广州的工人指望武汉政府，未免是过于天真了。当时的武汉政府在加速变质。

汪精卫认为，当时武汉的革命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急剧向右转，陆续制定压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把工农运动当作洪水猛兽加以扼杀。武汉政府就像是某种断了命源的生物，在炙蒸的政治气候中急剧地腐烂发臭。

武汉的政治空气紧张、紊乱而动荡不定。

反共宣传队走上了街头。他们破口大骂共产党，言辞不仅恶毒，而且肮脏。围观的市民摇着芭蕉扇，脸上依然是汗水涔涔。游曦、朱道南等一群军校生闻讯赶来迎接挑战。他们在离反共宣传队丈把远的地方拉开场子，齐声高呼：“反对新军阀！”“拥护大革命！”群众被拉了过来。

游曦向街旁店家借来一条长木凳，站了上去。

“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一心希望北伐军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可是这些流氓，”她指着恶狠狠地瞪着她的那些人，“却和南京的蒋介石穿一条裤子，到处造谣生事，诬蔑大革命的中坚力量共产党，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像一块石头砸在污物上，溅起了一群绿头苍蝇，那帮流氓羞怒地叫喊：“打倒共产党！”“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欺侮军校生中女多男少，咆哮着扑过来：“打啊，打这群共产婆！”军校生们挽起了臂膀，骂他们衣冠禽兽。市民们也感到不平，爆爆地吼道：“谁敢动一动手，就揍死他！”任凭这帮流氓闹嚷捣乱，游曦仍在滔滔不绝地演说。

这时不知从哪儿跑出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反共宣传队借势又狂呼乱叫地往前扑。市民被冲散了，又冲击军校生的人篱。狰狞的面孔，勾紧的手臂，用力在地上蹬踏的脚，汗水，拳头，尘土，叫骂声，汇成了一个喧沸的漩涡。人篱被撕开了，长条个警官拔出盒子炮指住游曦：“把她带走！”

正在这紧急的当口，公今寿出现了。他咬着嘴唇挥起枪托就向警察头上砸。长条个警官凶神恶煞地下令：“抓住他！”王雷云等几十名军校生从拐角处跑过来，个个端着枪。长条个的脸一下托圆了：“同志同志不要误会……”“你老子是专磕黑乌龟的！”公今寿话刚出口，枪托早已砸到警官的肩上，盒子炮当啷落地。警察都逃出了圈外，怯怯地望着被公今寿踏在地下挣扎的警长。

“你们还反不反共啦？”

“不反不反！”

“你认识你祖宗啦？”

“认识，认识！”

公今寿把盒子炮里的子弹全退了，扔到地上，说：“把头抬起来，叫三声‘我是警察局的’，我就放你走。”

警长使劲翘起头，哭丧着脸连喊三声“我是警察局的”。

公今寿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滚吧！”

这时游曦已向恰好路过这里的恽代英说明了原委。恽代英说：“招呼大家回校吧，事情闹大了不值。”说完就前往德国租界原是西门子洋行的鲍公馆，也就是鲍罗廷的住宅。

鲍公馆是一座德式小洋楼。上了二楼的外间，有一张摆着牛奶瓶和玻璃杯的长桌，来客可以自助饮用。里面一间摆放着一圈椅子，没有会议桌，灯光发暗，窗帘紧闭。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会议。恽代英来时，瞿秋白、张太雷等早已到了，张国焘随后也到了。恽代英向罗易打个招呼：“阿三来啦？”印度“阿三”罗易友好地笑笑。外国人还有法国的白理安、鲍罗廷的女打字员等。陈独秀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

鲍罗廷出来了。他身材高大，神情深涵，漂亮的八字胡须和一双目光敏锐、深邃的眼睛，使人感到他具有强悍的内心和富于魅力的外表。自从1923年9月到中国后，虽然身为国民政府顾问，但他实际上一直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与指导中共的工作。到中国不久，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上课时说：在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是一个很健全的火车头，但为什么一开出去就坏了呢？照我看，坏就坏在两根轨道上。你们想想孙中山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一种是军阀、土匪，这些家伙就知道你杀我，我杀你，抽大烟，吃地皮，用他们做轨道就像一很大碌竹，一压就烂。另一种是国民党右派，像胡汉民、吴稚晖这帮家伙，这些帝国主义舶来货也不可以做轨道用。”鲍罗廷作出结论说：“我们要的轨道，一条是农民，一条是工人。”

到了1927年5月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鲍罗廷是这样看的，他认为问题出在工农运动过火上，我们的同志太幼稚，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我们必须向左派让步，假若现在同左派决裂，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而刚来中国半年的罗易则认为，严酷的局面是由武汉国民党领导核心中的反动派造成的，他们占了高层领导的大多数，我们必须帮助左派除掉这些人，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罗易与鲍罗廷的共同点是，要拉住汪精卫，共产党要留在国民党内。

也许鲍罗廷看得不如罗易那么客观，也许罗易看得不如鲍罗廷那么复杂。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革命的进程是异常艰难曲折的，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是极为艰难曲折的。

会议开始后，鲍罗廷坐在高背靠椅上，两手置膝，操着英语第一个讲话。他发言的中心内容是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精神，也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精神。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期间，斯大林否定了特伦的意见，给鲍罗廷发出关于限制土地革命的电报后，又很快改变主意撤回了这个电报。全会经过辩论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指出：“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者，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地畏怯，尤其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

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紧急的“五月指示”，其要点是：一、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成为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三、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其中的第三条提出要建立共产党

领导下的武装，这在共产国际还是第一次。

接着鲍罗廷的发言，中国同志展开了讨论。他们观点不一，议论纷纷。瞿秋白表示要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赶快着手武装工农，到处暴动。张太雷坚决支持，他说：血的教训已无情地告诉我们，靠国民党军队，我们革命不会革掉敌人的命，而只会革掉自己的命。

同往常一样，张太雷在会上还充当着翻译的角色。他把鲍罗廷的话译成汉语，又把中国同志的发言译为英语，译得非常准确流畅。张太雷翻译鲍罗廷的话时，句句铿锵有力，并不断地重复，有时并加进自己的意见。

“五月指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对中共“五大”决议案极为重要的补充。但是，仍然是陈独秀把持的党中央拒绝接受，甚至予以扣压，不让更多的同志知道。更为严重的是，不该知道的汪精卫却知道了它的内容。

罗易犯下了一个严重泄密的大错。

由于在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缺乏主见，同时对汪精卫抱着幻想，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的绝密电报，次日又交给他一个副本。

汪精卫如获至宝，他对唐生智说：“莫斯科搞国共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骗局，这个电报是要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他又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再想想吴某的话’，我只是一介书生啊。”他以此为借口决定公开叛变革命。6月17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等顾问的职务。

罗易所为引起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愤怒。恽代英指责他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蠢事，是个项伯式的人物。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在鸿门宴中他把项羽欲谋杀刘邦的事告诉张良，项羽失败后又投靠了刘邦。恽代英说罗易就是这样的人物。

其实，狼绝不是识破了猎人下的套子才因此变成狼的。早在4月初的上海秘密会议上，汪精卫就参与了“清党”密谋。他当时对蒋介石说：“共产党素来不轻易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与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汪精卫没有同蒋介石联手“清党”，是因为不想做人家宴席上的“鱼”，并且，在“清党”的时机和方式上也有分歧。当个人的选择已转化为历史对他的选择时，他就不再会改变了。

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

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江西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冯玉祥倒向蒋介石，电促汪精卫倒旗叛变。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发布了屠杀令。

埋藏在国共关系中的最后一颗炸弹的火药捻子已滋滋点燃

陈独秀到了这时还想退而求生，他要求放弃革命领导权，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瞿秋白向陈独秀的投降论发起猛烈攻击，主张以工农的进攻来战胜反革命的进攻。

恽代英质问陈独秀，到底是要进攻还是退让，要死还是要生？

陈独秀焦躁不安，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任弼时逼迫陈独秀公布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并拿出他与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的名义起草的意见书。

陈独秀逆火攻心，跳起来夺过意见书，撕碎抛于地下，用脚使劲践踏。

共产国际断然处置，把陈独秀撇到一边，指令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

李立三、张国焘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化妆后秘密出走。

鲍罗廷被驱逐出境。武汉国民党要员全数出动，车站上劈刀掌号，为尊贵的“魔鬼”送行。

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无耻叛变，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

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共产党员要刻不容缓地退出武汉政府。但不是退出国民党，要和它的基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退出武汉政府。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他要“在夹攻中奋斗”，说是“既要反对蒋介石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要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中奋斗”。随之而来的又是大逮捕，大屠杀。

就在三个月之前，汪精卫还情绪激愤地说：蒋介石“对付民众，捉拿革命党人的手段，比北洋军阀还要凶狠！”而今的他呢？

也许因为这个衣装考究、油头粉面、一招一式都井井有条的汪精卫是个性格脆弱的人，也许带着恐惧的仇恨是疯子般的仇恨，所以，当他连同自己一古脑地跌入自己制造的地狱中时，便歇斯底里地叫喊：“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

火药捻终于引爆了最后的炸弹，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革命又受到一次鲜血的洗礼。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被砍去头颅的颈腔和胸前的弹洞里喷涌出的热血，像是为大革命隆重下葬的花瓣。

毛泽东说：“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把中国共产党逼上了绝路。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

也许逼到眼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要么奋起抗击。

就在失败前夕的7月12日，新生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议决定：1. 在张发奎部队中举行军事暴动；2. 在湘、鄂、赣、粤发动秋收起义。

牺牲者的生命注入了革命者的思考和行动，将成百倍地复活。

第二章 热 血

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识破了唐生智的毒计。情势万分危急！怎样才能扭转局面，保住这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武装力量呢？夜已深了，这位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紧蹙剑眉，用右手托着左臂的臂肘，左手掐着下巴，在居室里焦虑地来回踱着步子。

他决定去找张发奎。

7月15日这一天，天还没亮，武汉军校的全体师生就带着背包、雨衣和枪械，全副武装地向武昌城外的洪山出发了。他们要去打野外，也就是搞野外军事演习。奇怪的是，搞三天的实战演习，为什么不准带弹药呢？当时的险恶形势让朱道南不能不琢磨。管他个球，想带就带，想带多少就带多少。公今寿说。

朱道南所疑惑的正是被叶剑英所识破的。在动荡的局势下，有不少学生逃往南京，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也已撤离。唐生智把剩下的1700余名冥顽不化的“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于是玩了个打野外的诡计，要把这些“赤子赤孙”一口吃掉。

钢亮的太阳像个滚烫的熨斗。起伏的山峦被熨得丝丝冒气，人被熨得头晕脑胀。酷热的天气使师生们把这场演习看作是真正的战斗。“红军”与“白军”对抗着，冲上山又下山，下了山又冲上一座山，搜索警戒，迂回包抄，冲锋陷阵，乃至白刃肉搏，一个个的衣服都被汗水浸得透湿，只有打得紧紧的绑腿是干的。

王雷云咬紧牙冲上山头，重重地靠在一块滚荡的岩石上。他摇摇水壶，拔去塞子举得高高的，可皴裂的嘴唇半天也没润一下。他感到突然的飘忽，眼前腾起一片黑雾。

中暑的人不少，救护队的女战士们给他们刮背脊、掐人中，还找来一些痧药水，使他们即时得到恢复。

当醒过来的时候，王雷云抱起枪就往山下冲。他听到身后传来咯咯的笑声，便停下了脚步。他看到在柔和的阳光里邱继文向他晃动着水壶，甚至听到了叮咚叮咚的泉水声。

“红军”以他们的顽强和勇敢取得了胜利。

此时，唐生智的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部将洪山团团围住，架上了机枪。

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匆匆来到张发奎的指挥部，把唐生智的诡计和盘托出。他洞悉张发奎的心理。当时的新军阀都有自己的地盘，惟独身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没有地盘，为此他们之间互相仇视，剑拔弩张；再者，张发奎的嫡系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最多，且多为骨干，急于打江山的他不能在这会儿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尽管张发奎抱定了汪精卫这个政治支柱，但对反共仍在犹豫。

南方夏天的傍晚是灿烂的。吃过晚饭，王雷云躺在草地上，彻底松开了浑身筋骨。邱继文背着手，夸张地踮着脚走过来。王雷云坐起来看着她。邱继文突然像变魔术似地把一束野花捧在胸前：“来慰问慰问你这个‘伤员’呀。”

清风吹动，花香如饮。

这时忽然有人发出惊呼：“我们被包围啦！”

山上顿时出现了混乱。有人情绪激昂地主张硬往山下冲，有人坐在地上揪着草根，有人惧怕得捂住脸哭了。

教官王侃予站了出来，他说：“大家不要急，恽代英主任不是说了吗，叶挺的部队也在附近打野外，不要怕。”

另一名叫陆更夫的教官吹响铜哨，高声喊：“请各连的骨干到这里来集中。”

大家这才注意到拥护汪精卫的教官溜得一个也不剩。

情况紧急，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自动地走到了一起，有威信、有战斗经验的被选出来，成立了山头临时指挥部。王侃予和陆更夫也在其中。

山上响起了《少年先锋队队歌》，雄壮，有力，就像大山在唱：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战斗的激情在夏夜的山岗上熊熊燃烧。大家选择了有利地形，拼命地挖筑工事。偷着带来的弹药集中到了一起。收集的石块堆成了堆。

熏红的月辉照着静静伏在工事里的战士。这处于生死线上的时辰渲染着悲壮、崇高和传奇的诗意氛围，渲染着一种大感动。

血战迫在眉睫。

叶剑英劝张发奎趁解围之机，把这部分武装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张发奎接受了叶剑英的劝告。他警告各方：“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属于我的，谁什么时候向学生开枪，我就什么时候给他厉害看！”张发奎在北伐中打出了威风，说话掷地有声。无奈，洪山下何键等人的兵械只得撤去。

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用他的精明与果敢临危解难。军校师生免去一灾。他们并且在军事上和精神上又受到了一次血火锤炼。

武汉政府在“第二次北伐”中大败奉军后，即兵分两路，令唐生智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沿长江两岸“东征讨蒋”。唐生智要回湖南“清乡”，压根儿不准备搞什么“东征”。张发奎不一样，他没有地盘，他要打回老家，把广东从桂系军阀李济深的手中夺回来。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所辖各军及负责人员是：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
参谋长	谢膺白
秘书长	高语罕
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兼党代表）
第四军军长	黄琪翔
参谋长	叶剑英
第十二师师长	缪培南
第二十五师师长	李汉魂
第二十一师师长	富双英
第十一军军长	朱晖日

副军长 叶挺
参谋长 吴涵
第十师师长 蔡廷锴
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兼）
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PGN0050.TXT/PGN>
第二十军军长 贺龙

第二方面军中的高语罕、郭沫若、叶挺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中共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也准备以自己掌握的部队为骨干，联合张发奎回师广东，实现土地革命，重建根据地。

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贺龙、叶挺等部队沿长江南岸先后抵达江西九江。

九江这座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的临水山城热闹起来了。大街小巷、城里城外随处可闻“同志”的称呼，笼罩着大革命鼎兴时期的广州、宁汉对立时武汉的红色气氛。官兵们压抑已久的面孔为之振作。

为了使军队中的中共党员了解中央的意图，临时组成的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等奉命来到九江。他以秘密的方式，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走访。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也随之到了九江。几乎是同时，汪精卫也窜至九江。

被汪精卫的屠杀暴行所激怒的李立三到庐山后，发现张发奎已站到汪精卫一边，便主张抛弃对张发奎的幻想，马上举行南昌暴动，给汪精卫和蒋介石来个痛快淋漓的反击。

汪精卫也察觉了中共在军队中的活动，并感到贺龙和叶挺部队的“共产党人多，太红了”。他同张发奎、唐生智、朱培德等经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开会，予以扣押。同时令他们的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三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

第五路军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出面设鸿门宴，邀请贺龙、叶挺赴席。席间，朱培德转述张发奎口信，对于真实的意图，朱培德守口如瓶。

这对于由中共掌握或影响的军队，又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

第四军军部驻扎在庐山脚下的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与叶剑英是广东梅县同乡，在北伐中并肩征杀，素有交情，每有军机大事多与叶剑英商议。通过黄琪翔，叶剑英察觉到了汪精卫的阴谋。

此事又是十万危急。叶剑英连夜赶到星子县境鄱阳湖畔的叶挺住处，以实情相告。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会面，共商对策。

夏日的湖面上轻泛着一叶扁舟。然而，聚集在舟上的将领们却毫无心思领略名胜、碧波、清风。

叶剑英把汪精卫等人的阴谋和盘托出。没容他把话说完，贺龙就抢着问：“他们叫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叶剑英说：“名义上是避暑，商议军情，实际是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

叶挺把脸转向贺龙。

贺龙粗门大嗓地说：“明摆着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坚决不去！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廖乾吾和高语罕均支持贺、叶的意见。

大家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龙和叶挺不上庐山；二、贺、叶部队不理睬张发奎调其到德安集中的命令，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去南昌；三、叶挺先行，贺龙继后。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对叶挺和贺龙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前，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李立三等人的提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武装暴动。

次日，叶挺率部先行，贺龙随后，沿南浔铁路线开赴南昌，去参加八一起义。

叶剑英在危急时刻又立下了大功。毛泽东后来送给他一句赞誉的话，叫作“吕端大事不糊涂”。

自洪山打野外后，武汉军校被张发奎宣布解散，改编成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全团编成三个营，还有炮、工、辎重、警卫各一个连。女生大队 300 多人被遣散，游曦等 30 多人坚持不走，编成了一个女兵队。团内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 100 多名朝鲜学生。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但实际上这个党部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数也是地下党员。全团共有地下党员 100 多人。

学生的情绪动荡不定。有的认准了张发奎，有的感到张发奎靠不住、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也有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叶挺身上，说：“他们打谁，咱们也打谁，他们去什么地方，咱们也跟着跑。”

7 月 30 日晚上，换上新装备的教导团出师“东征讨蒋”。他们来到武昌煤炭港码头，分乘四五只轮船及其拖挂的若干木帆船，向九江进发。江上饱含水气的风流使他们对给过他们梦想和痛苦的武昌恋恋不舍，而与叶挺、贺龙的部队走上了同一条道又使他们感到前程像江面一样阔远。久违的兴奋和欢快的气氛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岸上的老百姓见有女兵，新鲜得追着船边走边喊：“女兵同志唱个歌。”

歌声就伴着滚滚江涛涌向了两岸：

喇叭铜鼓声，飘飘鲜红小旗帜。先有马克思，继有列宁者。头颅虽小血自热，心肝虽小胆不惊，前进，前进！小朋友们武装起来，要向压迫者进攻，不牺牲，安得生！血染全世界，杀尽那敌人！快来快快来，谁云我们不知兵！爱本阶级如亲，爱同志们如身。高呼劳动童子团万岁！万岁！万万岁！

教导团的官生们把新发的汉阳造步枪擦得光可鉴人，每颗子弹都用滑油打过。有的说：“我这颗子弹专留着打蒋介石！”有的说：“我这颗子弹要打何应钦！”由于戴季陶以“道统”自负，被用谐音称为“尿桶”，因此有人说：“这颗子弹要打烂‘代尿桶’！”引起了一阵哄笑。船上洋溢着天真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氛。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九江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斧头、镰刀和枪杆子

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三教街上，排列着一溜建筑样式完全一样的欧式公寓楼。它们的一层是做买卖的铺面，与之隔断的二楼必须从临街的雨廊直接上去。街上有家惠罗公司，专卖些用银子、兽骨、宝石、毛皮制成的贵重玩艺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1927年8月7日，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就在这条街上的41号召开。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会场设在二层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1人，主持会议的瞿秋白和执行主席李维汉坐在一张简陋的三屉桌后面。这会儿是毛泽东在发言。

“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而我们独不管。新的政治局要注意此问题，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加重了语气，“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罗亦农接着说：“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就出自于没有一个坚定夺取政权的决心，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

“这是非常错误的，”瞿秋白说，“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此时已是午后。这所房子的主妇洛卓莫娃进来招呼吃午餐。张太雷拿京腔唱了个喏：“有谢老祖母了。”洛卓莫娃三十岁上下，大家戏谑地用谐音“老祖母”称呼她。午餐是面包，茶水，还有像油漆筒那样大罐的俄式午餐肉。气氛变得松快起来。

洛卓莫娃夫妇因是房主而有幸被作为会议的代表记录在案。其实，真正出席会议的外国人，只有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八七”会议猛攻右倾机会主义，结束了陈独秀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作出在湘、鄂、粤、赣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它将导致自1927年秋冬至1928年春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爆发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立下了重大功绩。尽管它也犯了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推到对立面，使革命发展阶段混淆不清的“无间断革命”的急性病。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作出了成立南方局的决定，并发出了通知：

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

兹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地区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议决，并根据之整顿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以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

再临时政治局决以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特此通知。

会议结束后，张太雷衔命南下，到香港找到了杨殷。杨殷说你来得正好，

同志们先被汪精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又被叶挺、贺龙起义军南下的消息点燃一把火，烧得血液沸腾，正好趁热打铁。一淬一炼打出的铁用来制刀，准是那种吹毛立断的快刀。8月20日，张太雷即召集原区委及有关人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议以干柴对于烈火的热情完全接受“八七”会议的决议，立即制走暴动计划，积极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广东省委也正式成立。

张太雷随后秘密潜往潮汕地区，从事具体的发动工作。

叶挺、贺龙得到叶剑英的密报，便率兵到南昌举事，让守株待兔的张发奎们空守庐山。8月1日凌晨，当朱德把几个灌得像醉狗似的守军团长送出大士院一号时，裹挟着赤焰的狂飙般的义旗就搅碎了古城的夜空。叶挺挥戈直捣贡院、天主教堂；贺龙率师主攻伪省政府；刘伯承驰兵猛袭藩台衙门；周恩来在松柏巷指挥各路兵马，军令如织。南昌城里如霹雳大作，蛟龙翻腾。到清晨6时，城内抵抗的3000守军全数被歼。

当日下午，聂荣臻按计划从李汉魂手下拉出了一部义军，带着他们向南昌汇拢。当开进到德安的一座铁桥旁时，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至。张发奎扒着车门隔桥喊话：“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张总指挥，我要你们停下！”聂荣臻令一位排长：“叫他乍，不开车就朝天鸣枪。”张发奎硬犟着不挪窝。聂荣臻的手慢慢地举起，张发奎凝神屏气地盯着。聂荣臻猛然一劈手，排枪炸响。张发奎跳车便跑。跑回九江稍一定神：奶奶的，挂在脖子上的重要行头望远镜给拉下了。他命令一个参谋：“去，把望远镜给我要回来。”

起义军在南昌进行了整编，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为贺龙，党代表为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为叶挺，党代表为聂荣臻；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8月3日，起义军按原订计划，退出南昌前往广东，准备在潮汕地区占领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建革命根据地。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一个军和近两个师被共产党拉走了，张发奎心急上火，嘴巴上一夜之间爬满了燎泡。他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叶挺、贺龙背叛我，于公谊私情均为天之不容！”朱晖日竭力主张纵兵追击。关键的时刻，又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以柔克刚。“这并非上策。”叶剑英说，“叶、贺南下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双方争斗必有伤耗。那时再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去广东立足，就由不得李济深了。”想回广东、又与李济深素有倾轧的张发奎认为言之有理，况且以尚存的一万兵力去对付两万多“叛军”，没准会让李济深作壁上观了。为避“通共”之嫌，他拖怠着只是象征性地派出部分追兵，敷衍武汉政府。

叶剑英的“上策”实际上是个“计中计”。正是他的这一着巧棋，使得南昌起义军减少了被追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起义军踏上南征之路后，困难和挫折接踵而至。出发第二天，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就领着他的队伍脱离起义大军，转往浙江投奔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此事对叶挺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蔡廷锴参加起义原就是勉强应承的。暴动之前，周恩来和叶挺对他作动员时，他的神情颇为慌张、迟疑。叶挺再以同乡袍泽的口气劝道：“高佬，就这么干吧”，他才吞吞吐吐答应了。但许多同志对他并不放心，建议把第十师的干部作一些调换。叶挺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让这个师担任前卫先走一步，以致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叶挺感到很痛心，责怪自己过于信赖老同乡老袍泽，没有用政治眼光加以考

查，未免失之于天真了。

由于沿途蒸腾着使人窒息的暑热，加上饥渴困扰，在崎岖的丘陵山道上行军异常艰难，一些重型武器及装备被迫丢弃，染疾、逃离造成的减员也十分严重。

起义军一路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长汀。沿途经激烈战斗，以沉重代价击溃了前来截阻的桂系钱大钧、黄绍竑所部。在攻打会昌的恶战中，叶挺再展铁军风范。

几经艰难征战，南昌起义军到达广东三河坝地区。前委决定在此地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二十师留守三河坝，在起义军侧背监视钱大钧部；主力直下潮汕。

张太雷这时已到潮州。为把汕头与潮州敌军隔断，他发动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还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达三昼夜。9月23日，起义军进入潮州。为了迅速占领汕头，张大雷又组织铁路工人连夜抢修铁路。24日，起义军从潮州乘火车进占汕头。汕头市人民政府于当日成立，并在牛屠地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大会。这时传来了湘赣边界举行秋收暴动的消息。

汕头市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入夜，滨河大街一旁的公园里人声鼎沸。小酒馆老板的脸开心得揪成了一朵老菊。小动物园竹笼子里的蛇和海狮惊吓得支楞着脑袋。用竹子临时搭构的大棚戏台上的戏开演了。是出古装戏。一小童抱着写有故事发生场所等要点的字牌绕台一周，脸上涂得面目全非的武生便骑着竹杆登场了。喝着茶大声说笑的看客戛然止住。他们在想象中看到了飞踏的马蹄、滚滚沙尘和开阔的疆场。这时毛巾把子飞了起来。戏台旁，一个小伙子从木桶里拈起热气腾腾的毛巾，拧干，扔给站在客席过道上的另一个小伙子，再由他扔给看客。看客接住毛巾吆个好，擦去脸上粘乎乎的汗水，顿觉神清气爽，又吆个好扔回毛巾。小伙子来劲了，毛巾把子在空中飞来飞去，他们甚至都不用看，一扔一接极其准确。戏场里吆好声此起彼伏，也搞不清楚是给戏吆的还是给毛巾把子吆的。

这会儿，在市政府的一间大厅里，却是另外一种气氛。周恩来、李立三等人正在听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为时一天的“八七”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随后与会同志对报告展开讨论。再由瞿秋白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并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与会同志及罗明纳兹的报告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罗明纳兹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共产党失去独立性，以致被国民党赶跑、杀戮。陈独秀的理论和实践是“少数派的”、“不革命的”。蔡和森情绪激动地说，陈独秀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是和国民党穿一条裤子。毛泽东的发言颇具文学意味，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去住的空房子，而陈独秀等人总以为这所空房子是人家的，后来勉强搬进了空房子。也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始终没有当房主人的决心。

大家还激烈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没有领导土地革命的决心、家长式的霸道工作作风等错误。

瞿秋白代表常委作的报告，强调要开展土地革命，党的策略是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

在传达中，张太雷对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农民起来暴动，作了特别的强调。

传达完“八七”会议精神，屋里已透进了朦胧的曦光。连日的奔波操劳，使张太雷面色苍白显得清瘦，白布衬衣、西装裤和黄皮鞋上也满是泥渍。但他仍似有用不完的精力。他看了看金链怀表，接着说：

“中央还决定，让我们丢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斧头镰刀红旗。另外，中央要我们放弃潮汕，去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建立根据地。非武装人员转往香港或上海。”

想象中来自海上的国际援助并没有出现。相反，躲到海上的敌人却在帝国主义兵舰的支持下，不断骚扰起义军。更为严重的是，反动军队正以重兵向潮汕压来。

这时，跟踪起义军的黄绍竑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到了梅县以东的松口镇，逼近三河坝；陈济棠率三个师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决定进军揭阳迎击敌军。由于又分兵留守潮州，兵分三路的起义军实际上已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险恶局面。此后，又因情报不准造成了致命的错误。

27日，叶贺指挥部获悉有一千敌军集中在揭阳西北的汤坑圩一带，便决定把它一口吃掉。但实际上敌人兵力数倍于己。

这是一场见到敌人就打的莽撞仗，也是起义军数次作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为了争夺一座山头，一片谷地，你拼过来，我冲过去。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叶贺指挥部往往刚转移，密集的炮弹就落了下来。“猛虎营长”廖快虎中弹倒地，让传令兵把他扶起，硬是面对敌人的炮火坐着不动，直到再次中弹牺牲。深夜，急于求胜的叶挺命令突击队到敌阵中去摸营，遭到敌军的包围夹击。在血肉横飞的拉锯战中，起义军伤亡两千有余。

叶挺的部队还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现在只有撤出战斗。上路之前，部队吃了两天里惟一的一顿正经饭。各炊事班按原来的量做，但吃的人少，有的连队生者不过一半。触景生情，官兵们吃的是眼泪拌饭。叶挺见一位老炊事兵蹲在地上哭得伤心，便到他身边蹲下，劝慰道：“别哭，打仗总是要有牺牲的。我们的部队还要扩大，你说不定哪天要做连长呢！”老炊事兵哽咽着抬起头，他看到叶挺钢铁的面孔上镀着泪光。

在往潮州的途中，得知潮州已失守。叶挺从军事形势的角度出发，主张把部队拉往福建。聂荣臻根据组织观念，要求向前敌委员会聚拢。

败走汤坑，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一个转折。

当叶挺、贺龙与薛岳、陈济棠激战时，黄绍竑率两个师直攻潮州，于9月30日进占。起义军前委闻讯，于10月1日撤出汕头，向海陆丰转移。张太雷也随往。经揭阳炮台、贵屿，于10月2日抵达普宁县流沙镇。指挥部设在道旁的天后庙。

叶挺、聂荣臻赶到时，指挥部正在这座庙里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

周恩来起身同他们握手，请他们坐下，说情况都知道了。见周恩来脸色铁青，身体虚弱的样子，叶挺征询地看看张太雷。张太雷低语道，恩来同志

身患恶性疟疾，正发着高烧。会接着开下去。周恩来吃力地分析了这次起义的失败结局和原因。接着，根据中央精神研究善后的具体部署。

张太雷把“八七”会议精神又简扼传达了一遍，并特别强调了中央对南昌起义军的决策。

周恩来说：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会员带路向海边疏散，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叶挺仍然坚持从军事的角度列举利弊，提议去福建而不去海陆丰。

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先往海陆丰的二十军在流沙以西遭到陈济棠的截击，不少起义军被缴械，只有一部分部队继续赶往海陆丰。

这个新情况，对叶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但中央的决策是从开展土地革命的大局考虑的，这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他将同部队一道去海陆丰建立苏维埃。叶挺的建议没被采纳。

受到沉重打击、几天来一直情绪压抑的叶挺满腹悲情地说了一句：“到了今天，只好去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下午2时，城外山头上发现敌人的尖兵。叶挺就近集合起一个营的部队抢占山头，掩护机关转移。黄昏时分队伍被敌人拦腰冲散。天黑之后，远近到处都响起了枪声，撤退的队伍在东奔西跑中形成几人一支的小队。周恩来神志不清地躺在担架上，叶挺和聂荣臻不离左右，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引领着，来到陆丰县南塘区黄盾寮村，在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中隐蔽下来。

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与钱大钧部激战3昼夜，突出重围，与留守潮州的突围部队在饶平汇合，一部分奔向海陆丰，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退出广东，去了湘南地区。

存在了两个多月，艰难征战数千公里的英雄的起义军，终于被强大而残暴的敌人剿杀了。但它并没有彻底失败。这是又一次大悲壮，而绝不是大悲哀！

广州工农民众的期待又一次落空。

拉了弦的手榴弹

运载教导团的船队离开武昌，曾在黄石港、石炭窑一带被何键的部队阻滞，于8月4日中午才驶抵九江。没容靠岸，就接到张发奎命令，所有轮船和木帆船全都拴连在一起，泊在江心待命。随之从岸边发来一只小划子，把营长吴展、宋湘涛、刘先临等人接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官生们都拥到了舱外，只见两岸布满了如临大敌的部队，机关枪和迫击炮虎视眈眈地对着他们。这引起了船上的不安和骚动。团党部通过党员要求大家抑制住感情，不要急躁和冲动，到底怎么回事，已去人交涉。

几位营长刚跨进指挥部，张发奎开口就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可共产党对不起我！叶挺、贺龙已在南昌暴动了。你们立即回船上去，收缴教导团所有的武器，送到总指挥部来。”经吴展等人力辩，张发奎答应先收缴子弹。几位营长回到船上，官生中间立刻旋荡起一股三月的风。这风吹得人脉管贯张，血流加快，又使人触摸到一种隐隐的冷。

傍晚，教导团全团整装、持枪上岸。他们被领着跑到一座大院子里的广场左侧，架好枪，齐步走到广场席地而坐。

广场被挂在竹架上的几盏大汽灯照得雪亮。张发奎站在由四张大方桌拼成的台子上。谢膺白陪着他站在桌上。身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的谢膺白，兼着教导团的团长。因为没有麦克风之类的东西，谢膺白扯着嗓子叫道：“同学们坐好了。现在请张总指挥训话。”

停了好一阵子，张发奎开训了，是声色俱厉的喊：“叶挺、贺龙在南昌叛变了，我们同共产党分家了！他们事前不告诉我，不相信我，不同我合作，”锯齿般发抖的嗓音变成了哭腔，“我的第二方面军被他们带走了十之七八……”

张发奎伤心得噎住了。他原是李济深第四军所属第十二师师长，率师北伐中，由于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官兵和叶挺独立团英勇无畏，也由于他本人有勇有谋，因而打了许多漂亮的战役，遂名声大噪。该师扩编为第四军时，他升任军长，复又跃升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职位上。而今，所辖三个军仅存其老底子第四军。一年里有如此大起大落，想起来怎能不凄惨悲切。

流了两行辛酸泪，他抹了把鼻子，很是诚恳地放低嗓门说：“我张发奎是革命的，我知道你们也是革命的，我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还要合作，我们是殊途同归的。”

说到这里，他转动着脸向台下的人看了一遭，突然脸色一变，嗓音又拔了上去：“凡是CP同志，就站出来，或者到总指挥部去报名，我发给路费、衣服，派专车送到南昌，保证安全，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留下来跟我走。”随后叙述自己应叶、贺邀请，乘南浔路专车至南昌附近，发现车轨被截断，险些翻车，叶、贺的派员来接他，始获悉二人已在南昌暴动，他掉转头回到九江。话中有实有虚，望远镜的事硬是没提。

最后话又说了回来：“我把你们的枪收下了，这是出于不得已的。”他命令教导团徒手到一所学校宿营。

晚上熄灯后，宿舍里的床板吱吱嘎嘎响个不停。

“咱们能去领路费吗？”黑洞洞的有人问了一声。

“你以为张发奎当真不吃肉啊？用不着求假菩萨，想走就走，想溜就溜，还能饿死咱这号老憨！”油火脾气的公今寿一点就爆。

此时叶剑英正在谢膺白住处，同他谈论教导团的问题。叶剑英运智谋思，巧设机关，使得谢膺白蒙头转向，思绪如麻。

谢膺白牢骚满腹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

叶剑英不动声色，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

对于张发奎来说，教导团是个大伤脑筋的事。一方面，它训练有素，有很强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受共产党的影响很深，容易出乱子。他把教导团比作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捏在手里炸自己，而扔出去可以炸别人。叶剑英毛遂自荐当团长，而且要用它来炸别人，自然是张发奎巴不得的事。

教导团被缴枪后，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悲观失望的学员纷纷离队，还有一些学员追赶南昌起义军去了。动荡不安的情绪在持续。针对这种状况，叶剑英反复耐心地做劝导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有志的革命青年，从武汉出发这一路吃苦闯关，在斗争中长了见识，这是无价之宝。革命是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要受挫折，但是要记住，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出路总是有的。叶剑英在第四军中享有“儒将”的盛名。他的话使学员们阴霾笼罩的眼中又亮起了烁动的灯盏。叶剑英要回了枪支弹药，把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不日随第四军开赴南昌。

经过庐山脚下时，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地站着杀气腾腾的军警，上了刺刀的枪平端在手，当中只留两尺来宽的走道。据说汪精卫此时正在山上。

南昌留下了房屋的废墟和战火的余烬。街上行人稀少，无人收殓已发胀腐烂的尸体上聚满了苍蝇。江边的滕王阁一片瓦砾，百花洲满目疮痍。

江西新军阀朱培德被南昌起义军狠揍了一通，三个军有两个被打得缺胳膊少腿，恨得他牙根痛。他想把教导团的“赤子赤孙”捣烂制成膏药，捂在他的伤口上煞毒解恨。张发奎犯不着为这颗捏在手里的手榴弹同朱培德兵戎相见。正在他犹豫时，叶剑英又临危而出，力陈这颗手榴弹扔出去炸别人时的威力。说得张发奎点头时，叶剑英提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把这个团由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叶剑英说，这样一便于管束，二可以对朱培德说该团已经过整肃，缓和同他的矛盾。张发奎欣然同意。

叶剑英兼任了改编后的教导团团长。朱培德终未敢下毒手。

“东征”的路线被拧了个180度。8月中旬，教导团在叶剑英的率领下开始了沿赣江到珠江的千里跋涉。他们与南昌起义部队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不过是晚几天。

组成这支队伍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着一色的月白浅灰军装，绑腿短裤，赤脚草鞋，肩挂水壶粮袋，头戴晴雨两用竹笠，精神饱满，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炎热的气候忽晴忽雨，携带着全部行装的官生们不是一身汗水，就是一身雨水。灼烫的碎石块割破了草鞋，雨天的红泥道像浇上了一层油巴不住脚。

日头喷着毒焰，一股特殊的恶臭向人们袭来，热烘烘地抓心剜肺，那是一具死在路边腐烂了的军马。赣江里有时能看到顺流漂浮的人的尸体，有时也能看到渔夫驱使鱼鹰在秀丽的江面捕鱼的情景。

下到一个山谷，又要翻一座山。大家像鱼一样张大嘴巴直喘。有人骂娘了，不知是谁喘吁吁地哼起了“断肠人在天涯”的小调。在一片杂树丛边，女生邱继文一屁股坐在道旁的坡地上。又有几个女生坐了下来。前面的人纷纷回过回头。就像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队伍的步伐如同拴着沉沉的石头。

“走啊，快起来走啊！”游曦顾前瞻后，急得往起拉邱继文。

邱继文撩开遮住眼睛的一束湿头发，用竹笠扇着风，像是在同谁赌气似地偏着脸。

慢腾腾的队伍打了几个结。

“怎么？是把休息当饭吃呢，还是吃饱饭再睡一大觉？这十里之内可是找不到吃的。”叶剑英站在了她们的面前，他佩着的武装带周围淌出深色的汗水，原本白皙的脸透出紫铜的粗糙，“从你们的两条腿，就可看出小时候娇生惯养。要换上劳动人民的筋骨，就要咬紧牙关。革命不是简单的事呀……”

叶剑英往前面看了看，叫拉过马来。一位男生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滑下马背，拐着腿把马牵了过来。这是叶剑英的马。

邱继文高高地骑在马背上，她就不能再蔫头搭脑的。汗水一抹，挺秀气的一个姑娘。

烈日下汗水淋漓的队伍抖起精神向山上攀去。

恶劣的气候，崎岖泥泞的山道，还有饥饿，土匪，地主武装；还有数不清的像黑芝麻粒一样的小咬飞来飞去的咬人，人被咬后会从皮肤痒到心、继而红肿溃烂。为了克服这重重困难，叶剑英日夜操劳，比官生们付出的更多。他每天都要派人侦察敌情和行军路线，亲自调查社情民情；大家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召集军官研究教育及露营、野炊、救护等等问题；他常讲韩信、岳飞等带兵打仗的故事，激励和启发连排长们“学战于战”。他总是坚持徒步行军。谁要是骑在他的马上，包括病号都会感到深深的自疚。

多才多艺的叶剑英还时常拉琴，和大家下棋、唱粤剧、京戏，调节部队的情绪。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见一时无人猜中，叶剑英向恰从江中撑过的竹排撇撇嘴，几个学生异口同声道：“篙！是篙！”

快到万安的时候，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叶挺、贺龙在会昌痛歼钱大钧部，钱大钧只身化装逃脱。

大家使劲克制着内心的兴奋，而兴奋了一通。

晚上，队伍在一个村子里借宿。朱道南找不到公今寿。他掉队了，走失了？会不会——朱道南不禁想起沿途所见到的惨烈情景：燃烧的村庄；农民与地主武装对峙着；机枪响了，手里拿着镰刀、斧头和削尖的毛竹、赤着膊高呼口号的农民像稻草棵一样跳起，摔倒在地上……朱道南突然地想哭。他赶紧叫上几个人往回找。

深夜，他们又从黑茫茫的野地里摸了回来。他们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朱道南又想哭。

“你们回来啦？”黑暗中传来公今寿平静的声音。他稳稳当地坐在祠堂门前的一个石墩上。

朱道南的身子像是被殛雷击中似地发木。等他的身子醒过来时，已经被公今寿紧紧地抱住了。

原来，公今寿在行军时渴得厉害，又不让喝稻田里的水，他就离开大道，到一处有农家的地方找水喝。到了一口水井边，刚伏下身打水，就被几个农民按住捆成个米粽。他被囫囵着吊在树上，农民用棍子打了一通，便要下菜刀。公今寿申辩根本没人听。多亏一位私塾先生出现得及时，不然就下刀开

砍了。

公今寿说：“吃过饭，他们给我打了张路条，还送了我一程。”

“打路条？”

“这里农会的力量很强，我穿着军装，一路被盘查了好几次。要是没路条，早被农民给宰了。”

大家被他说得像是地下有一股壮力顺着脚跟往上走。

第二天，队伍抵达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一所隐蔽的小屋里，叶剑英第一次公开参加了党的会议。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运来几十船的弹药和军需品。王侃予等人提出在万安举行暴动，夺下这批武器、弹药。叶剑英分析了敌我力量和地理条件，提出否定意见，主张到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暴动。团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叶剑英的主张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设想不谋而合。

到了广东南雄，叶剑英召开全团军官会议，要求备营连抓紧训练，整顿军容，并指示各伙食单位清查公布账目，改善生活，防止贪污行为。

叶剑英说：“教导团是军官教导团，要挑起革命重担，要在第四军内外起表率作用。”

而后，叶剑英先期赴广州开会。

广州在即，“双十”节在即。又一个鬼门关在即。

教导团进抵韶关后，洗衣服，整内务，挖厕所，按时出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它洗去一路的风尘疲累，爽亮的姿容透着朝

还有压抑在内心的沉重。官生们已得知南昌起义军失败的消息。

10月10日早晨，教导团雄赳赳地唱着军歌，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进入会场。小伙子个个精神，肩扛汉阳造和缴获奉军的日本造三八大盖步枪，上着发亮的刺刀，身上褪得发白的军装洗净后格外提神，脚穿黑布袜、麻线草鞋。右边是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左边是第七十四团，夹在中间的教导团把它们比得黯然失色。

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一个足登黑色长筒皮靴的军官走上主席台。他打开一张纸，宣称：“奉张总指挥急电，有人密告教导团要在‘双十’节举行暴动，配合贺、叶军夺取广州。为维护后方安全，防止万一，着令教导团自动交出武器……”

确是有人告密。教导团还在赣州时，团党委曾油印了“南昌起义的意义”的学习提纲，发给秘密的群众性组织“工农兵革命同志会”讨论。暗藏的两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窃得油印提纲，密报给了黄琪翔。张发奎和黄琪翔正好又借题发挥。

教导团官生怒不可遏，没等电文念完，各连都对“不要动、不要动”的喊叫声充耳不闻，不约而同地持枪跑步退出会场。

多数连队奔上城墙，占领城门洞口。也有连队跑回驻地严阵以待。许志锐的部队早已在城内外各要道及制高点布下重兵，架设好机枪。

双方枪弹对峙，只要一枪打响，战斗即刻爆发。

有人要求马上宣布起义。但这正中诡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团党委负责人叶镛、唐维、陆更夫、蒋日等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动员党员分头进行劝导，为了保存力量，暂交出武器。

教导团徒手进驻花县新街。这是个很具地方特色的小镇。防盗匪的“碉楼”，门前标写着“谈话处”的鸦片烟馆，众多的经营香烛纸箔的铺面，家

家供奉的天后圣母，吃小狗的习俗，枝叶独异的南方植物等等，对北方人构成了新鲜感。

公今寿、朱道南几个人心情苦闷，在街上无目的地逛着。出小镇的道旁长着果实累累的柚子树。公今寿拣起石头向最大的一只柚子砸去。投了三块石头也没砸到，却砸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更糟的是随之从田里奔来十多个拿着农具的妇女，而且很快又出现了三五个掂着尖串的男人，嘴里怒气冲冲地骂着“丢那妈法海”。公今寿们转身加快了脚步，后来干脆撒开腿跑。尖串、棍棒，足有三十多个农民操家伙猛追上来，奶奶的，个不大，腿却捣腾得飞快。

“啥熊玩艺儿，没打到果子，就这么野蛮！”公今寿边跑边嚷。

面前是条大河。

“扑通”，一个湖北籍的学生跳了下去。公今寿没下过河，只在家乡村南口的水坑里洗过澡。他直愣愣地转过身，准备挨揍。

“你们干什么？我们是共产党！”朱道南大喊一声。他也只是在黄泥坑里洗过澡。

相隔二三十步，农民站下了。他们一边打量着对方，一边商量着什么。

“你们是共产党？知道彭湃么？”

“是说彭湃吗？彭湃在海陆丰领着人们闹革命，分田地呢！”

由于都很难听懂对方的语言，为了听得明白，双方渐渐走到了一起。后来大家说说笑笑，扯扯拽拽地进了村。热情的主人要杀小狗。学生们客气了半天，最后一人收下了两个大柚子。

王雷云一到新街，就经申请到维新路公安局监狱探望了被关押的学友。

游曦邀上邱继文来到白鹅潭边，遥对着启蒙教师萧楚女的死难地南石头监狱低头凭吊。1924年，游曦考入家乡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时，萧楚女正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重庆工作。萧楚女不但到学校演讲，还曾约游曦等进步学生传授革命真理，对游曦的影响很大。

10月中旬，两次易名，两度被缴枪，历尽艰难险阻的教导团终于开进广州，驻扎在北较场四标营。

张发奎沿途像捧着一块燃烧着的火炭似地来回倒着手，提心吊胆地把这颗拉了弦的手榴弹带进了广州。他把武器又发给了教导团，这次除长短枪和机关枪外，还发了迫击炮。

张发奎很快就要为抢占地盘而大打出手了。

不是冤家不聚头

武汉政府转向，南昌起义军失败，张发奎终是靠不住，使得广州人民的期待被雪蒙霜。但这并没能摧毁他们乘着大革命的雄风竖起的已是伤痕累累的征帆，和向着既定目标顽强挺进的意志。仍是斗争，而其激烈的程度，从周文雍被捕时的情形即可见出几分。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广州市委本月1号召集了铁路工人的示威运动，参加示威者不下三四千人，齐集至汪精卫东山之私宅请愿，作复工之要求。派了八个代表见汪，汪不得已接见代表。大致是说：“这件事是政府职权，政府自有处置，我个人不能负责”。群众大为愤慨，空气十分热烈，大呼打倒汪精卫猪仔契弟，及拥护 C. P. 加入 C. P. 等口号，遂到“公医”面前开会决定巡行。行至惠爱东路，公安局派出之铁甲车保安队，遂大呼打反动派，（被）捕去周文雍等二十余人。缘文雍同志过于勇敢与高兴，曾演讲数次，又手持大旗先行，为人注意，致捕去，对工作损失非（常）之大。既捕人时秩序大乱，颇为狼狈。群众中有表现更加兴奋者。一部分表现恐慌者。

周文雍被捕后，陈铁军焦急万分，马上找组织急商营救的办法。

近两三个月，那些以不同的身份和心态离开广州的人们，在外面兜了个或大或小的圈子，开始陆续地向广州归拢。

“四一五”时逃离广州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多数返回。受省委的指派，他们化装成不同身份的人，深入工厂、学校和郊区，传达省委、市委决定，以党中央反抗屠杀、准备暴动的精神鼓舞和组织群众。陈铁军也从香港回到广州，与周文雍假扮成夫妻，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秘密机关。她协助周文雍，把原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组织重新划分为六个区，组成了秘密的区委员会。当周文雍在龙藏街太邱书院、水关桥木屋等处召开工会骨干会议时，她通常担任望风和掩护的任务。

9月中旬，既窝囊又雄心勃勃的张发奎班师回粤。他在“凯旋宣言”中称此番归来有三大使命，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逆军；二是改善广东的政治，三是扶助工农。其实，他朝思暮想的是怎样从李济深手里夺回广东，好落下个窝。“自由，民主”，他微笑着向工人群众伸出写满大革命口号的手。工人群众也伸出了手，上面写的是“五项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工人组织的活动又由秘密转入公开。张发奎向工人伸出的手在半空猛地攥成了拳头。

10月13日，张大雷自普宁流沙辗转到香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稍晚也到达。15日，在香港坚道一座楼房宽敞的大厅里，张大雷主持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的报告中，张大雷指出：“军队必须在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下的参谋团的指导下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军旗改为红旗。”

张大雷激情难抑地说：“将来还有没有希望？革命路程是不是通向高潮，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很有希望，而且通向高潮。”

随后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指出：“广东的工农斗争决不会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反将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而有更自动努力奋斗之决心。”

会议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及下设军事委员会成员，由绰号叫“毛子”的国际代表纽曼指定。南方局委员有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 6 人；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和杨殷负责军委工作。省委由张太雷任书记，陈郁、王强亚、阮啸仙等 36 人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其任务就是张太雷说的：“各地仍应积极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起义”，努力地扩大暴动。

10 月底，汪精卫也从武汉来到广州。此前，汪精卫、唐生智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孙科等人在庐山进行了争权夺利的谈判，签订了一个互相都不服气的协议。孙科返宁后，南京特委会突然下令讨伐唐生智，唐生智则以牙还牙。同时，唐生智与北洋军阀孙传芳暗中勾结，反汪空气极浓。汪精卫只好怀着“痛愤”的心情跑回老家，依仗心腹张发奎，再作计议。

这些人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归来。它们撞击在一起，立即爆发出了漫天的电闪雷鸣。

10 月 14 日，五千名海员在太平戏院前公开集会，接着举着红旗沿街示威游行，用石头砸死 4 名“改组委员”。

17 日，周文雍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参加人员代表着一百多个工会组织。为使政府答应“五项要求”，会议决定于 24 日举行总罢工、大示威。

19 日，张发奎派出军警抓捕了海员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 75 名委员，解散工人纠察队，并加岗、戒严、搜查，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

23 日凌晨两点，周文雍一声令下，一百个工人小组从各处涌上街头，这千余举着红旗的工人很快汇集在一块，散传单，呼口号，使军警乱作一团。

汪精卫到广州后，又为张发奎戴上了“左派”的面具。

中共广州市委决意撕去画皮，还以真相。省委对广州市委的工作作出决议：

对于市委领导 10 月 14 日海员运动的策略、反对张发奎态度，省委完全认为对的。24 日预定之罢工决定不罢是对的，因为敌人已有充分的准备，而工人又经过重大之压迫。假定我们勉强决定罢，非但罢不成，并且恐要失去现在马上又起来之机会。不过我们事前不能罢，事前有错误，即我们决定罢工的时期太迟了，使敌人有机会准备。现在又继续动作，领导铁路工人披露汪派之假面具，省委亦认为是对的。省委训令市委应积极领导工人利用汪派在广州得势时所给与的机会，尽量发展工人之政治、经济斗争，才能揭破汪派的假面具，才能扩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以推动（翻）反动政权。

11 月 1 日，两千名铁路工人和五百名火柴工人在周文雍的带领下，包围了东山葵园汪精卫的公馆。这些在“四一五”后失去工作的工人愤怒地叫喊着，要汪精卫出来答复“五项要求”。周文雍当场揭去汪精卫一伙的伪装。

事后高呼“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开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行至东皋大道口被汪精卫、张发奎派遣的军警围住。在一片棍棒枪托乱砸乱舞中，周文雍满脸是血，身负重伤。群众架着他冲到文德路口附近，又被迎面开来的大批军警截住，经过激烈搏斗，他再度负伤，与 30 多名工人一起被捕。

为了阻遏工人群众的斗争浪潮，警察宪兵昼夜警戒，巡逻街市，搜查行人；反动报纸每天都刊载张牙舞爪恫吓工人的公告，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杀

气腾腾的标语：“造谣惑众者枪决！”“煽动罢工者枪决！”“扰乱秩序者枪决！”“阻碍军事行动者枪决！”“私自组织团体者枪决！”“聚众闹事者枪决！”完全是“四一五”式的枪决和白色恐怖！

为了营救周文雍，市委专门开会研究部署。会议由市委书记吴毅主持，参加的市委委员有陈郁、沈青、梁国志等人。监狱戒备森严，强行动狱难以成功，他们决定智取。营救周文雍的计划十分周密。

一切都按计划展开。

按照陈铁军的吩咐，洋务工人小陈冒充周文雍的家属，到监狱给他送饭。生姜炒饭，酥炸鱼，辣椒排骨。“不要喝茶水”，小陈说。周文雍早已知道营救计划，每天坚持不喝水。

几天后，周文雍发起高烧，呻吟，说胡话，甚至发狂地叫喊，要求送医院。同狱的难友也跟着起哄，不分昼夜地叫嚷：“他是患伤寒病呀！会传染的，我们都要陪死啦！”监狱长来巡查时，难友们有骂的，有抗议的，有要求送医院的，吵嚷得更厉害。周文雍则咳嗽、气喘不止。监狱长让狱医给他看。已把一张值一百元的大新公司礼单揣入腰包的狱医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证明是患了传染病，而且病情相当严重。监狱长无奈，把周文雍送到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处医治，为防不测，在医院大门口特别设置了警岗，

日夜监视。

周文雍入院当天，模范汽车公司一个姓邓的司机就同医院的救护车司机攀上了朋友，他们东拉西扯了半天。

这天中午12时，大门口的两个警察正在换岗，街上突然鞭炮声大作，警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沈青用手枪点着腰眼缴了枪。医院里随即闯出一标人马，用白布被单把戴着铁镣的周文雍兜头盖住，李源背上就跑，上了门外一辆升火待发的无牌小汽车。

一阵烟尘，小汽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香港开完省委和南方局联席会议，张太雷就赴汕头处理起义军失败的善后工作，随后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事。他离开汕头前写了一篇战斗的檄文。他写道：“在这封建资本主义表现脆弱无能及军阀混战愈入黑暗的政局之下，工农将以群众的力量自动地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解放惟一的希望……”

谁被谁当枪使

在一座漂亮的白色洋楼前，停放着各种最新款式的洋轿车。这就是位于东山葵园的汪精卫公馆。在它杂陈着中国古典红木家具和西洋立式钢琴的大厅里，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人正把酒杯碰到一起。这一碰既狂肆又小心翼翼，就如同他们兴奋而抑郁的表情。几经密谋，几经蹙眉挠腮，终得天赐的良机，把一个驱逐李济深的良策确定下来。

把李济深骗出广州，再来个釜底抽薪，就不信整不垮他的桂系势力，就不信夺不回本应是粤系袍泽的广州。

张发奎率部急冲冲向广州逼近，使倾其军力与南昌起义军鏖战的李济深忐忑不安。李济深明知来者不善，但权衡一番，又自知无力分兵相拒，只得把咬碎的牙齿吞进肚，派徐景唐、马超俊等前往韶关笑脸相迎。

张发奎一到广州，粤系与桂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很快就趋于白热化。

先是老谋深算的李济深想来个将计就计，他亲自找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要他出兵东江参加对叶、贺起义军的作战。这不可能，他黄琪翔、张发奎正作壁上观，等着两虎俱伤好扒下虎皮当升帐的椅垫呢。黄琪翔于是也给李济深出了个难题，作为交换条件，要他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并在广州重立中央。这不是要他李济深折过头来咬自己的屁股吗？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后台老板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而他李济深则是桂系的老大哥。不行！于是就吵，翻一回脸。

再就是争夺第四军的番号。张发奎的部队原是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第十二师，在北伐中扩充为军时，也用第四军的番号，宁汉分裂后，张发奎的第四军属汉系，李济深的第四军属宁系，已互不统属。两人都认为有调整番号的必要，便开会商讨。李济深像绕口令似地说：“我的军原就是第四军，你张发奎、黄琪翔都是第四军的部属，所以，原来的第四军还叫第四军，你们的第四军应为新编第四军。”张发奎不依，说：“第四军是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来，我比你先到第一师当差，所以，我军应为第四军，你的军应为新编第四军。”家的怕野的，李济深只好又把气呕在肚子里烂。

李济深又施韬略，拿出十万川资，让张发奎出洋考察军事。张发奎竖起两根手指傲慢地晃了晃，鼻子里冷笑一声。

张发奎们气焰盛极，一步步逼近自己的目标。他们逼着李济深改组省政府，把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农工厅、军事厅、公安局的头都拉下马，改由他们的亲信接任，张发奎则亲自兼任军事厅厅长。到了火候上，有人主张干脆用暗杀的方式把李济深宰了，使李军群龙无首，以便各个击破，吃掉他的军队。但汪精卫认为这样做会丧尽人心，张发奎的多数将领也认为李济深是多年的上司，杀之为天理不容。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把李济深支走，然后发动一次“护党运动”倒他的台。

就在这时，受南京桂系集团颠覆于8月下台的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为了联合粤方压制把持南京政府的桂系，电邀汪精卫赴沪商计。

10月16日，汪精卫以同去上海开会解决党内纠纷为名，硬是把李济深骗上了去上海的“亚细亚皇后”号轮船。

教导团的驻地四标营离黄花岗有五里左右。营房用木板和竹席构建，葵树叶盖顶，称作葵叶棚。这一天，身着笔挺的军服，执鞭佩剑的叶剑英来到了教导团。

几个月来，虽说叶剑英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凭着大智大勇出招隐蔽接连得手，但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却也并非没让四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生疑。进入广州后，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对张发奎说：“叶剑英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介石对他那么好，结果他反蒋。这个人留不得。”但陈可钰的暗枪没打中靶心，反被张发奎战了一句：“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该反就得反！”叶剑英闻知此事后对张发奎说：“我还是去国外学习吧。”张发奎未允。叶剑英小运智谋便避开了这一枪。

只身虎穴的叶剑英并没有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他很快与广东省军委委员黄锦辉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党组织准备利用张发奎和李济深之间的矛盾举行暴动的意图。后又秘密潜至香港面晤挥代英，详谈暴动之事。为了便于工作，他辞去了兼任的教导团团团长职务，建议由杨澎松代理团长，李云鹏等人接任营长和连长。

叶剑英在全团大会上宣布了杨澎松等人的任命，讲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最后，他语意双关地说：“在我们的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要以高度的革命精神来接受紧张的训练，为巩固革命策源地广东作出贡献！”

回到宿舍，公今寿锵锵走了一回台步，说：“咱这是登上历史舞台了，看怎么大显身手吧。”地面由木板砌铺，走在上面颤颤巍巍吱吱嘎嘎。“什么角儿？”朱道南捧场道。“全武行！”公今寿跺脚展臂亮出架式。像是被他这一脚踩痛了神经，反动排长王圣夫发出凄厉的喊声：“你捣什么乱！”说着从隔壁的值日官房间跑过来。公今寿抱起双臂斜视着他。王圣夫指着鼻尖嚷：“你有什么不满，就写报告，可以自由离开！”太蛮横了，朱道南打抱不平地说：“连走路的自由都没有了，咱小兵敢捣乱？”同室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起哄。王圣夫见众怒难犯，胀红了脸说：“谁敢目无官长，等着关你们的禁闭！”这话又引来一阵哄闹声。

叶剑英根据省军委的指示，在教导团内加紧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党组织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工农兵革命同志会”也迅速扩大。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士兵训练委员会”，指导连队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间作战的训练。全团的勤杂人员，如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兵等300多人也组织起来，于每日午前进行政治、军事训练。“黑眼窝”姚栓柱是个年逾四十的炊事兵，出操时同手同脚走“一顺儿”，反应也慢，像根钢筋，任你怎么掰，你一松手他还是原样。在场上督率训导的叶镛、唐维光摇头不点头。为了校正自己的痼癖动作，熄灯后他一个人在操场上同手同脚地走过来，同手同脚地走过去，弄得大家每晚看“节目”。可一发枪就邪了，就改了过来，还能边走边神气十足地放开嗓门唱歌。

又一天，叶剑英陪着汪精卫、张发奎等来到教导团。叶剑英完全支持张发奎的倒李之策，并且与黄琪翔商定，把教导团作为逐桂之战的主力。叶剑英就是以此为理由说通张发奎和黄琪翔，把教导团从花县调入广州的。为此，黄绍竑对叶剑英恨之入骨，先后两次派人暗杀他，均未能得逞。

汪精卫讲了十分钟光景的话。他先拿出一幅大慈大悲的面孔，反复强调他发明的“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诉说他“在夹攻中奋斗”的苦衷。继而换上一张凶神恶煞的脸，把暗说明指的矛头直对李济深，立誓要“护党救国”。说完，就在一片隐隐的“在夹攻中挨揍”的回声中，由张发奎陪着离开了。

接着，黄琪翔也说了一通。说得兴起，他把领口的扣子狠劲解开：“本

军长领导你们护党，如果不成，就领你们上山当土匪去！”

把“当土匪”作为绝路求生的途径和表达决绝意志的硬气话，在气血方刚的四军少壮派中是一个时尚。

以后的几天里，教导团又补充了一批精良的武器装备，每人还发了十二小洋的饷钱。这一小洋相当于大洋八角，能买好几袋精白米面。

一高兴，公今寿、朱道南几个人，邀上游曦、邱继文等几个女生，同黄埔军校的老乡孙子云来到一家山东饭馆，叫了一桌菜、三斤白干。

三杯下肚，朱道南说：“你们说，上头对咱‘赤子赤孙’咋会这么好呢？”

公今寿说：“好？没听说要把咱当枪使吗？”

邱继文说：“反正我不会上当。”

孙子云情绪抑郁地喝闷酒。大家互使眼色。孙子云仰脖子又灌了一杯，说：“黄埔军校那边斗得也挺凶。监牢里死了不少人，还有五六百共产党嫌疑犯被关着。”

公今寿脱口道：“你们就没一个秦叔宝，没一个单雄信！奶奶，一人一口也把李济深给吞了！”

游曦示意压低声音。她狡黠地说：“那不就被人当枪使啦。”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奕棋之容，望着公今寿。公今寿骨碌着眼珠子，猛一拍脑门：“中！咱就给他狗日的当枪使。当炮，当炮使！”

回去的路上，街上的气氛已大变，“驱逐桂系军阀”，“打倒黄绍竑”，“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标语，处处可见。

11月17日凌晨，李济深与汪精卫乘的船行至黑水洋中途，张发奎下手了。

黄琪翔会同弃李投张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派兵包围了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住宅。随后，将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临时军事委员会警卫团、桂系驻广州新编第四军军部、第七军驻广州办事处、陈济棠第十一师及徐景唐第十三师驻省部队、省防军、黄埔军校兵工团、石井兵工厂、虎门要塞守备部队尽数缴械。与此同时，由黄琪翔以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李福林以第五军军长的名义，陈公博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联合署名发表了“驱李”布告。桂系部队往广西急撤，黄琪翔策马紧追。

教导团接到叶剑英的命令，参加了围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处的行动。二连奉命捣毁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当连长陆更夫带领两个排冲进去时，在梦中被劈雷炸醒的清党老爷们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举着双手连声惊呼：“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共产党，是清党委员！”“抓的就是你！”“不要误会。”“抓的就是清党狗！”“啊呀！饶命，饶命呵！”解决石井兵工厂的战斗也很有趣，执行任务时，叶铺带着一连跑步径直进了兵工厂。岗哨的第一反应大概是：这支每天出操从门前跑过的队伍今天怎么跑到里面来啦？他的第二反应就是举起被夺走了枪的双手。

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抓捕镇压了一批反动透顶的家伙，使教导团逮着了一次复仇的机会，为在“四一五”屠杀中牺牲的烈士报仇。同时也用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补充了自己。

大广东主义打败了大广西主义。一夜之间，广州变成拥汪反李的张发奎、黄琪翔的天下，千里迢迢追求的一个梦变成了现实。他们即在东较场召开“护党”祝捷大会。张发奎自封为国民党广东省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当起了“广

东王”。同时以广东政治分会的名义，任命陈公博为代理广东省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

黄绍竑化装逃往香港，又返回广西，在梧州一带集结兵力，以图卷土重来，与在汕头的陈铭枢形成了夹击广州的态势。叶剑英见机使出“调虎离山”之计，提出全力以赴打梧州的作战方案。张发奎、黄琪翔据此倾其兵力于惠州、肇庆、江门等地御敌，广州只留下了教导团和保安队等少量武装，还有盘踞在河南地区的李福林“豆腐军”。

由于军力不足，张发奎也使出两手：一方面指使公安局长朱晖日严厉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多次要与共产党谈判，协商所谓“共同保卫广州，不让桂系卷土重来”之事。

李济深 11 月 18 日到上海听到恶信，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气得他恨不得将一路上把他当猴耍、给他留下许多耻辱回忆的汪精卫撕成碎片。

借这个机会，南京的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向其政敌大加攻讦，骂汪精卫是“口蜜腹剑反复无常的小人”，斥责汪精卫指使张发奎、黄琪翔驱逐黄绍竑，“实系共党之行为”。

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使蒋介石喜不自禁。这正是他需要的，也是他劳心费神促成的。

蒋介石受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挤于 8 月中旬下野，心怀忿恨，他希望汪精卫与他们对抗。同时，蒋介石对战斗力超过自己嫡系部队的两个第四军早存嫉妒，视为眼中钉，若能使得它们相互激杀，削弱其实力和锐气，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于是蒋介石又施展他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派宋子文到广州，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政府，鼓动张发奎倒李济深，声言驱李成功后他将到广州，再办黄埔，与汪精卫竭诚合作；另一方面，又指示驻粤的嫡系钱大钧以实力支持李济深。现在，同蒋介石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各派都向他伸出了求援的手。

蒋介石要利用这个机会复出了。

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也看中了这个机会。

一个“不顾一切”的会议

张太雷从汕头乘船去上海，于10月22日抵达。

他由地下交通领着，乘上一辆黄包车。无轨电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黄鱼车、拖着白绿两色车厢的有轨电车和吱吱呀呀的独轮车。黄包车在五花八门的车辆之间躲闪穿行，如鱼入水地进了法国租界。理发馆、裁缝铺、帽子店、洗衣店、编织店、烤肉馆……黄包车终于停下了。

张太雷的突然出现，使王一知又惊又喜。两个多月没见了，王一知打量着他的脸庞说：“你瘦多了，也晒黑了。”见她怀中抱着孩子，也使张太雷喜形于色。他一把抱住母子俩：“累了你自己了。”他轻轻地接过孩子，笨拙地学着妇女们的样子左右摇晃着，说：“看你个小东西，像个刚出生的小兔子。”

大革命失败不久，怀着身孕的王一知从武汉来到上海。起先寄住在周姓和宋姓的夫妇家里，三天前在法国租界自己租了间房子，买几件简单的家具，搬进来。是吃不住搬运吧，住下的第二天孩子就提前出世了。此时，小家伙的眼睛还没睁开。

分离的两个多月里，中国革命在血的喷洒与呼啸的火焰中拼死抗争搏杀，使他们的生命和灵魂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这一晚，他们谈了很多。“八七”会议，南昌暴动，潮汕受挫，陈独秀，陈延年，鲍罗廷，周恩来，叶挺，张国焘。提到张国焘，张太雷用鄙夷的口气说：这个人品质恶劣！他说，有一天在汕头开会，忽然听到枪响，张国焘自告奋勇出去探察，却独自溜了，大家一出门就见从街头跑来的军队，幸好房子的一侧是一条狭巷。“只差一分钟呵，我们就完蛋了！”

窗纸上透进了幽白的曦色。他们给孩子起了个名字：知春。

11月9日和10日，张太雷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只限各个主要的省份，因为当时政治形势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有些地方是无法召集的”。

革命无疑已经转入低潮。

这次会议却做出了相反的判断，认为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因此，使劲给“八七”会议引燃的暴动情绪浇油助势。

在瞿秋白主持下，会议接受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或速度上，都呈现“无间断的革命”的局面。“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据此，制走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局面。

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人受到了处分，原因是在以往的暴动中“犹豫动摇”，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是一次“不顾一切”的会议。

它的灵魂是“八七”会议。它有盲目和性急的一面，它将导致中国革命面临大面积的失败。它将使中国革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头颅和成吨成吨的热血。

然而，它对一切革命力量发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组织工农革命军，

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它对国民党疯狂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作出了疾风骤雨般的表达。它对于回击反动势力疯狂的剿杀和围攻，对于后来壮大工农红军和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于推动由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将在探索的道路上再一次跌倒，但它还将以同样决绝的意志爬起来。

自“八七”会议以来，广东暴动就一直在酝酿之中。8月22日，中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起义军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省委迅速制定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暴动计划。9月9日，中央在致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信中说：“中央对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9月22日，广东省委下发了有关暴动的策略的通告，要求各区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指挥当地暴动及暴动胜利后工作。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中央指示省委，要“极广泛地尽可能地发动农民暴动”，“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地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广州附近的农民尤须注意”。中央又于10月12日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因叶、贺已溃败，在最短期内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但要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地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10月底，海陆丰农民武装在南昌起义军余部的配合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段时间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接连在香港开会，研究讨论暴动的问题。装扮成上海富商的周恩来在养病期间，也不顾自己病体虚弱，多次参加会议，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根据中央的精神，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10月15日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由张太雷带到上海呈报给中央。

这个《纲领》指出：“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并预测到“李、黄、张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并且，“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实际上更形高涨。14日广州海员及工人数万群众之大示威，即一实例”。因此，“省委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

《纲领》对形势的判断及做出的扩大暴动的决定，与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但中央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并不满意，遂责成张太雷与苏兆征、国际代表纽曼等一道，进一步研究制定广州暴动的计划，并草拟中央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11月17日，即在张发奎、黄琪翔用武力驱逐桂系军阀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这时候，广东省委实际上已经在实施这个《决议案》。

按照广东省委原来的设想，一旦粤桂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发展成为激烈的战争，就立即发动广州暴动。但是，张发奎做得干净利落，省委一切都还没来得及，他就完全控制了广州。

当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对张发奎还存有幻想。18日，他召集在广州的省委常委张善铭、贺昌以及吴毅等人开会。他说，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现在举行武装起义，

是帮助代表地主阶级的李济深。他主张与张发奎谈判。

哈西斯的主张遭到了激烈反对。他又去香港向广东省委陈述自己的主张。省委和省军委为此分别召开会议，经过讨论，都否定了这个意见，表示绝不与张发奎妥协。

会上还有另外一种意见。比如聂荣臻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是根本不可能的。”

黄锦辉、王强亚等人也这样看。

但同志们因痛恨国民党的无耻叛变，痛恨新军阀的血腥屠杀，而使复仇的心理占了上风。会议研究了暴动的时机问题，认为，目前夺取广州政权尚不可能，但积极准备是必要的。

已是寒光闪闪的冬天，冷风夹带着金黄色的枯叶阵阵扫过。明天是知春满月的日子，张太雷也要动身了。为了庆贺孩子满月，并与同志和亲友告别，太雷特地在家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席间，大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而兴奋，而频频举杯，共勉成功。

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张太雷要走了。王一知几次要起床，都被他按住。王一知想让女工给做点吃的，也被他止住，“人家昨天忙了一天，别让她半夜再起来了。”王一知只好坐在床上，目送着他走出门去。

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右手提着一只箱子的张太雷，迈动穿着骑马裤的长长的腿，轻轻地走出门去了。

王一知没想到这竟是永别，这竟是他留给她的最后的背影。

11月20日，张太雷携带着中央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登上了去香港的“皇后号”轮船。决议案写道：

广东的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两广

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

广东工农群众，尤其是本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若有丝毫依赖张、黄等实力恢复工会、农会的心理或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赞助此次政变的毛病，其影响都是发展机会主义的遗毒和阻碍工农暴动的进行。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

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的私人战争。

总之，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个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决议案》对广东的政治任务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并对宣传、组织、工运和军队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指示。军事方面，要求广东省委“取消广州暴动委员会，统一于市委，市委指定军事同志一人或三人专做工农军事训练之工作”，“省委下设一军委，以熟悉军事同志组织之，为省委之下军事工作机关”。

第三章 惊 雷

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

汪精卫也对罢工工人使出了釜底抽薪的招数。他深知省港罢工工人是广州工人的中坚，便以欺骗手段发给每人 90 块大洋，随之，用强力关闭他们的宿舍和饭堂，把他们驱散。工人们忍受不了被欺凌又被耍弄的这口恶气，便还以颜色。

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属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举行了愤怒的抗议集会。11 月 24 日下午，第一公园里外及临近的吉祥路、连新路都站满了人。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条凳上去演说。人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激烈议论。人们像一支又一支奔腾的火把，汇成了燃烧的漩涡，发出了火的呼啸：

“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工人！”

“誓死不退出罢工工人宿舍！”

每个人都在熊熊燃烧。何衍广的嗓子喊哑了，就哑着声喊。谁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噢，是陈功武！他同每一个相识的人问候、搂抱、打闹着。人群潮水般地大幅度地摆动起来。会场受到了保安队、警察、侦缉、密探、消防队、工贼、流氓和地痞的冲击。又是一出大规模的“全武行”。有人流血，有人跌在地上，有人被捕，队伍被冲散了。但是第二天，愤怒的人们毅然点燃了大东门几座贴了封条的宿舍和饭堂。这是以自伤的方式做出的绝望和不屈的抗争。人们的呼号声和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交织在一起：

“我们无家可归了，跟他拼了吧！”

“烧吧！烧吧！把整个广州都烧了吧！”

又是恶狗群的扑袭，夺命的恶斗，又是流血。这样的场面一次次地重复着。有的工人牺牲了，有的被捕，死在监狱里。他们默默无闻地死了，牺牲了，甚至没有一杯埋骨的泥土，一块碑石，一根借以依恋人间冷暖的野草，甚至没有了名字。但是，他们的生命的光辉笼罩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何衍广的左膝受了棍伤。他强撑着站起，拐动了几步，又跌倒了。他生气地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眼前是杂乱的腿、枪托、棍棒、鞋子，鼻子里灌满了灰尘和血腥的气味。一只手把他拉起来。陈功武架着他逃往万福路车夫馆。途中与教导团的一个连队交臂而过，招至了许多同情的目光。

就在罢工工人焚烧宿舍和饭堂的次日，张太雷即由香港赴抵广州。

当晚，即 11 月 26 日晚，他主持召开省常委会，研究暴动的事。参加的有吴毅、黄平、陈郁、沈青、黄谦、王强亚和纽曼等人。

广东的局势使大家认为，暴动的时机已到。其根据是：一、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的此狗同彼狗的争斗发生后，被逐之狗蓄势反扑，得势之狗则拼命搬兵到西江御战，广州兵力已抽空，而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则为我党所掌握；二、陈济棠等已把中山、汕头的纸币调空，广州纸币亦低落，金融方面在相互的倾轧中相当混乱，市民人心动荡，张发奎亦得不到金融支持；三、广州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屡经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海陆丰等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势头正猛，同时，张发奎对工人的压制加剧。

大家都赞成立即暴动，“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既反对彼狗，又要打此狗，从而建立自己的政权。

纽曼说：苏共马上要开十五次代表大会，暴动如获成功，将会对大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纽曼比张太雷早两天从上海回广州，他原来也像哈西斯一样，想拉张发奎一道暴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只有印刷工人的领袖王强亚持异议。他说，广州的工人处于分裂的状态，受党直接领导的只有铁路、印刷、汽车、省港罢工工人及分散的手工业工人，大部分机器工人则为国民党所蒙蔽和控制，而且武器极少。他认为暴动的条件尚不具备。

其实，一些领导人的内心也很矛盾。据纽曼的遗孀布勃·纽曼后来说，斯大林在暴动前夜曾给纽曼发一电报，要他采取自己能够负责的行动。张太雷此后也向黄平流露过犹豫的心理。但这类冷静的思考被熔炼在滚沸的反抗激情中了。

会议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一、召集全体工会一致行动，准备总同盟罢工；二、组织赤卫队，作为暴动的主要力量；三、加紧张发奎军队内部的策反工作，争取拉出一部分为我所用；四、做好市郊农民的组织发动工作；五、指令海陆丰工农武装向惠州移动，以作策应。

至于暴动的方式，是先举行罢工，还是直接暴动；白天发动，还是夜晚发动，这个问题已争执多次了。纽曼坚持前者。虽多有异义，但纽曼说当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暴动就是这么干的。于是会议就服从了这惟一的成功的经验。

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成员为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三人。张太雷任总指挥，统管全盘及军事，周文雍管赤卫队，黄平协助吴毅和周文雍。

会后，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到第一线，从事紧张、冒险的组织和发动工作。香港只留一个交通处，由恽代英、张善铭、沈宝同负责，其他的人均向广州集中。

万福路车夫馆是一栋简陋的三层楼房，楼下车夫头住，车夫住二、三楼。车夫的住处堆放着白板木展、三角竹笠、生锈的洋铁皮罐、被柴烟熏得乌黑的瓦堡。何衍广跟着陈功武在两排双层木架床之间的狭道上穿行，石喜迎了上来。床上铺着毛边穿洞的草席，油渍斑斑的麻袋片，枕头是大碌竹节和砖头。时已深秋，没有见到哪怕是一床旧棉被。他们走到尽头一个露着黄褐色粗木板的空铺前。

“我们就睡这样的平铺。怕你不惯吧？”石喜客气地说。

“他们怎么办呀……”何衍广愣神发木地念叨着，“宿舍烧了，他们没处去了。”

陈功武说：“我去找沈青，看看有什么办法。石喜，这位朋友就交给你啦。”

石喜说：“放心，都是穷弟兄，拍硬档！”

石喜同何衍广正说着话，出早车的工友们陆续收车归来。石喜把何衍广介绍给大家，就用一只残旧的瓦堡从铁皮罐里挖出些红米，进了楼房后截的厨房。疲惫不堪的工友们边同何衍广搭着话，边脱掉发出汗酸味的面衫，穿条牛头短裤，换上木屐板。他们聚拢过来。何衍广袒出青肿的膝盖。工友们气恨地骂道：“丢那妈黑狗，不剃他的肉折他的骨，出不了这口啖气！”厨房涌出呛人眼鼻的浓烟，在整个楼层弥漫。工友们的话匣子打开了，从张发奎的“护党救国”到金花街四叔婆卖女，从“三武鹅五”的福军魔王脸豆腐

胆到省港班轮被劫，从“改组狗”的阻险到“黑狗”的凶狠……工友们说得拍腿敲桌子，骂声不绝，也不免慨叹忿懑，垂头丧气。

过了两天，陈功武领着何衍广去见杨殷。

次日，何衍广来到郊区芳村的一个秘密兵工厂。王包、袁根等人在忙碌着。他们原是广三铁路的工人。牛奶罐、水管在他们的手里被制成手榴弹和炸弹的外壳。何衍广也用一台老虎钳试着干起来。

11月28日，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

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

我们对于广东目前政局，郑重发表宣言，因为这次事变于全国的政局是有根重大的关系，现在的事实已经一一摆在我们面前了。

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全广东的流血战争，新的反革命政权又向工人阶级进攻了。同时，我们海陆丰的农民同志已经得到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没收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向普宁、紫金、惠州等处发展。

工友们！张发奎军事行动的真意义是什么？南京政府已经完全破坏和瓦解，在这个时候，革命叛徒汪精卫重新与实行白色恐怖及新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勾结起来，想造成别一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都是他们的爪牙。

蒋介石确是11月17日军事行动主谋者，蒋介石是4月12日上海屠杀的刽子手，他是以屠杀工人为职业的。张发奎及其将士都是一些傀儡，他们是在反革命蒋介石的掌握指挥中。同志们！11月17日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暴动吗？我们的答复是：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军事行动，不是为民众利益的民众暴动，但这仅仅是一派军阀攻击别一派军阀——蒋介石、张发奎、黄琪翔一派白色军阀，攻击另一派敌对的军阀李济深、黄绍竑及南京军阀——是大广东主义攻击大广西主义。

工友们！农友们！

在这个军阀阴谋战争中，你们得到了什么？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们仅仅得到了新的锁链、压迫和屠杀。

李济深在4月15日以后，枪杀万千的工人、农民和兵士，捕囚四千余人，霸占工会会所，组织改组委员会，制造并保护那些白色走狗，指挥警察摧残示威大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屠杀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

国民党“新左派”要做些什么？这些可怜的英雄：张发奎、汪精卫、朱晖日、陈公博、黄琪翔及其党徒要做些什么？

张发奎的新政府是：枪杀徒手工人，逮捕我们的代表，制造新的工会改组委员会，霸占更多的工会，制造并保护同样新的白色走狗——革命工人联合会，指挥从前李济深的警察摧残示威运动，驱逐省港罢工工人出宿舍、饭堂，给他们几十元恶浊的津贴，还要换发四成不值钱的金库券……

就是有人用显微镜来看，也不会看出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有什么区别，因为汪精卫、张发奎都是他们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太师蒋介石的高足门生。

工人、兵士同志们！

几天来，在前敌上张发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所有李、黄军队都集中起来从东、西、北江各方向他反攻，而主要的战争将在西江爆发。同时主谋的蒋介石又将欺卖张发奎，而预备同李济深和南京军阀妥协，所以蒋介石已命令陈铭枢军队向东江前进，包抄张发奎的后路。

在这个困难中间，张发奎不知怎样办法，一方面他向有钱的商人磕头，表示只要商人给他钱，他就去杀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迭次派代表秘密的来找我们共产党，要求同他

们协商怎样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

我们是中国工农群众的政党。因此，我们在工农群众面前是没有任何秘密的。我们对于张发奎、陈公博这个秘密的要求，我们公开的、明白的当一切工农群众面前，答复他们如下：

共产党同任何军阀没有一点共同的利益，他们要的是民众起来打倒和消灭一切军阀的统治，你们，张发奎、黄琪翔及其他的先生们，是一样的军阀，一样的反革命。你们逮捕工人，枪杀工人，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解散工人纠察队等等的行动，完全证明了你们与李济深、黄绍竑一样。因此，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工农的敌人和国民的敌人。

现在，你们怕你们在前敌失败，你们更怕广州工人阶级的报仇，所以你们要求我们同你们协商。

我们共产党不反对协商，就是同敌人协商亦可。但我们进行协商，要当一切工人、农民、兵士面前，预先提出我们的先决条件。

我们共产党明白宣言：我们决定奋斗到底，反对强盗李济深回来广州。我们保护广州，用我们最后的力量去攻打李、黄的军队。

同时，我们宣言：张发奎及其将领绝对不能从李济深手里夺回广州的自由。

只有工农无情的革命斗争——工农政权方能抵抗广西军阀的回来。

张发奎当他一方面实行压迫工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之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力量太小，因此要同我们协商。为此，我们提出底下条件：

（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

（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

（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

（四）完全恢复议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

（五）逮捕处罚一切惯于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

（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

在这六个条件实行之后，我们才能预备协商怎样组织广州工农革命的保障，以抵抗李济深、黄绍竑。

工人同志们！

我们知道张发奎、黄琪翔等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

我们知道在张发奎军队中有许多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军官，他们自愿帮助我们一致反对反革命。

我们随时都准备着与一切反对李济深的人们建立联合战线，可是要在我们上述条件之下。

工人、兵士同志们！

广州的问题现在是：究竟让李济深的白色恐怖存在呢？还是建设我们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政权呢？

你们应该选择：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共产党和广大的工农群众。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三千万广大的农民群众。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在海陆丰的工农革命的力量，他们打倒了一切敌人的军队，他们现在有成千的枪和机关枪，他们占据了海丰、陆丰、紫金、汕尾、碣石诸地，到处铲除豪绅、地主、军阀，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一切革命兵士和下级军官，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命令去反对

工农群众；他们愿意来在人民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共同努力国民革命。

广州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

广州的战争要有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

全中国的眼光，而至全世界的眼光都注射着你们！决战的时间快到了！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下级军官们，学生们以及一切贫民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权利而斗争！

为提高一切工人的工钱而斗争！

为恢复广州各工会而斗争！

为复用旧有被驱逐的铁路工人而斗争！

用强力夺回你们自己的工会！

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

杀死李济深一切走狗和侦探！

实行示威和群众大会的自由！

兵士与下级军官到处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违抗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命令，逮捕一切反对共产党的人，预备工农兵的专政！

农民开始全广东的农民革命，普遍到各乡村，照海陆丰农民的办法，夺取一切土地归自己，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

工友们！

在广州各区组织工人赤卫队，反对白色的警察和反革命派！

工友们！

尽你们的力量，夺取一切武装！

有系统的预备广州的总罢工，反对军队！

打倒刽子手李济深！

打倒凶手蒋介石、张发奎！

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

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

保卫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夺取政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

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

用群众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苏维埃的革命万岁！

张太雷把 26 日的会议决定情况函告尚在香港的恽代英等人。恽代英即将此函转报中央。

满身满脸油泥的王包、袁根和何衍广等人，用几台老掉牙的老虎钳、小车床，制出了奇形怪状的手榴弹外壳，有的细长，有的短粗，有圆，有方。

按照杨殷的布置，地下交通李少棠取走一些弹壳，并带着从香港搞的炸药，送到南海县九江去试制。李少棠化装成返娘家的新妇，穿戴时髦；她的三妹装成佣人，挑着四个沉甸甸的红漆礼盒。礼盒的面上，放着鸡、鸭、沙田柚、梅花点熟香蕉；下面是卷成月饼状的确化棉炸药，用有名的“莲香饼

家”的招纸包着；最底下就是弹壳。她们在田基上走着，穿一身礼服的三妹满脸是汗。李少棠说：“我帮不上忙，实在难为你了。”三妹抿嘴笑道：“总有一天我们穷人坐轿子，让阔少奶奶挑担子伺候着。”

弹壳与炸药交给了九江秘密兵工厂的何全、梁九。

几天后，李少棠去了解手榴弹和炸弹的威力。何全让李少棠在山前蹲下，跑到山窝里挖了个坑，用尺量了量，把炸弹埋进土里，点燃了导火线。一会儿，山窝里冒起一团蓝色烟雾，接着是轰隆一声巨响。地上被炸出一个深深的土坑。

秘密制做的弹药，被送到了小北直街的武器转运站。

这个转运站由梁桂华一手筹建。梁桂华曾担任香港地委书记，“四一五”在香港被捕。在狱中，他忍受住各种非人的折磨，没让敌人得到一个字的口供，被铁锤砸断了几根肋骨致残。党组织派杨殷前往营救，聘请律师为他辩护，几经周折使他脱险。回到广州后，他拖着伤残的身子，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转运站门面是酒米杂货铺，挂着“大安酒米油糖发客”的招牌。为了筹集建立此站的钱款，梁桂华曾回到家乡云浮县，把祖屋以四百银元典给了同村兄弟梁甲。临走前，把过去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委任状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证书交给妻子，说：“这两个证件比生命还要宝贵，你收藏好，切勿在人前露眼，除非是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天下。”大有勇士一去不回的气概。

在芳村和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等处制造的弹壳，以及从小北附近“飞来庙”军阀的制弹厂偷运出的弹壳，都送到九江装配，再运到小北直街“大安米店”。存放在“大安米店”的武器，还有教导团送来的来复枪，扮成贵夫人的陈铁军乘轿子送来的枪支，也有石井兵工厂的工人制作的镖枪。这些弹药武器将以卖米的方式，转送给起义队伍。这种筹运弹药的方式，与当年孙中山、黄兴为推翻腐败昏愤的清政府举行黄花岗起义时筹运弹药的方式，几乎是同出一辙。

五羊城故事之一

出四标营大门右侧几百米，是石井兵工厂的围墙和碉堡，往左前方四五里地，就是掩埋着辛亥革命 72 烈士遗体的黄花岗。每天凌晨夜幕还没揭开，教导团的队伍就喊着号子，嚓嚓地踏着沙石路向黄花岗跑去。

他们在归营的途中一路高歌：

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稳着脚步，
要高举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白天，他们以小部队的战斗攻击为主，加紧突击和夜袭的训练。熄灯号响过，后院操场、球场、马棚等处总是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影。星期天一些学生像救火似的，一大早就赶着进城，摸黑回来。女生队的学生进城，还换上工人的衣服。

11 月底或是 12 月初的一天，教导团党员骨干唐维、李云鹏、王侃予等人到市内一个小院子里开会，这地方是在永汉北路向西拐再向北拐的一个巷子里。张太雷向大家传达、阐述了中央和省委有关暴动的决议，并说：“自武汉当局背叛革命后，我党一时未有对策，有的同志主张到外蒙建立根据地，再图向南发展。”他批判了这种想法，指出：“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领导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光英，他原是叶挺第二十四师的参谋长，南昌起义失败后逃至香港，被派来负责暴动的军事工作；另一个是新成立的第四军特务营营长，叫梁秉枢。

当晚，教导团党团召集组长联席会议。秘密的消息犹如一场大风暴的前锋，渗透了四标营的各个角落。

种种征兆似乎很明显，但就像空气和风，可感，却摸不到抓不着。这颗拉了弦的手榴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在手里爆炸。缪培南对张发奎说：教导团吃着国民党的饭，却唱共产党的调，留着它迟早是养痍为患。他献上了消除这块心病的计策：一是“去沙存珠”，把全体学生送到黄埔军校去过筛子；二是“化整为零”，全部分到部队去当下级军官；三是“软刀杀人”，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四是“斩草除根”，用洪山打野外的办法一网打尽。

张发奎没点头，也没有摇头。就像共产党内有人对他存有幻想一样，他对教导团也存有幻想。

一个阴雨天的午后，紧急集合号突响，全团在葵叶棚大饭厅里集合。杨澍松把一个穿银灰色西装，梳着亮净分头的人领上讲台，介绍说：此人叫朱勉芳，曾在德国学过军事，特派来充任本团参谋长，以整顿本团教育。杨澎松并称自己新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团内的事由朱参谋长全权负责，大家要一致服从。

下来是朱勉芳训话。他倒背起双手大侃一通，什么汪主席是孙中山惟一的忠实信徒，张将军是左派的革命领袖，军官教导团的学员跟着他们走，将前途无量，等等。还很起劲地把德国军国主义的教条鼓吹了一番。讲到兴头

上，摇脑壳，踱方步，在原本就搅拌着地方口音的国语里，再兑上“NO,OK”的馊奶油，再兑上装模作样的缩脖耸肩，让几乎所有的人的神经都像是被盐杀被猫的利爪抓挠那样的纠缩难受，窘迫得抬不起头来。王雷云当场送给他一个绰号：土西崽。

朱勉芳是张发奎的表弟，也是亲信。他一到差，就天天在办公室里干叫，这不对，那也不对，要办这个，要办那个。谁一旦被找到岔子，抓住把柄，动辙就抽耳光，关禁闭，以至开除。他还勾结公安局，如发现学生在校外活动，公安局即可逮捕。后来干脆不准私自外出。团里的反动分子有了靠山，也把监视、跟踪进步学生当作乐事。王圣夫经过宿舍门口，见里面有几个人围成一堆，赶紧蹲到窗下听墙脚。

是朱道南的声音：“日本教官气势汹汹地向叶团长猛刺过来，叶团长一个箭步冲上去，大喝一声，举刀凌空劈下。两把刀咬在了一起，叶团长从上往下狠压，那骄横的武士鸟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王圣夫悻悻地走开了。他知道这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学校时的事，是专讲给他王圣夫听的。教导团的实权实际仍掌握在老团长叶剑英手上，反动分子也不敢太嚣张。双方都在心里较着劲。

山雨欲来风满楼。叶剑英先后两次特意来团里讲话，都是带骨带刺，意在压制朱勉芳的气焰。

冰冷的碎雨从铅一样的天空洒落，白鹅潭江面烟水迷蒙。这里停泊着许多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洋船，在它们阴气森森的夹缝中，有一条灰绿色的小轮船，它的十字杆上飘动着蓝底白边三角水纹旗，上书一个大大的“邮”字。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有关负责人会议今天就在这条邮船上召开。

张太雷来到码头上。他穿一身藏青色唐装，戴着金丝边厚玻璃眼镜，金表链横挂在胸前，像是个洋行职员。有几个着黑唐装、黑呢帽，戴墨镜，叼香烟的人在不远处的东桥旁向他张望。其中的一个走了过来。张太雷镇定自若。黑衣人走近，原来是自己人，是布下的暗哨。黑衣人勾指打了个唿哨，江面摆出一叶小艇。张太雷乘上它向邮船靠过去。武装警察划着小艇从他眼前横穿而过，黑狗子还狐疑地追了他一眼。

船舱约有丈把宽，两丈长，四周用帆布遮得严实，只有靠近驾驶室的那扇小窗透进一缕光线。各路工会几乎都有人来，共二三十人，把船舱挤满了。油布篷掀动，张太雷跨了进来。“怎么样？同志们。”张太雷热情地打个招呼，盘坐起双腿，取出怀表看看，兴奋地说：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党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兵大暴动！”

暴动已不是新的话题，但党的明确决定又撩起了新的激动。大家向一个中心聚拢，把张太雷紧紧围在中间。这个说：“报仇的时候到了！”那个说：“广州早就该赤化，还等什么呢！”

被克制住的声音使人感到压抑，只好用拳头擂舱板，有的拳对拳地互相撞击，求得些许发泄。

“什么时候动手哇？太雷同志。”海员工会的何振武问了一句。船舱里骤然变得鸦雀无声，目光都盯向张太雷。

“这个我也说不准，”张太雷从从容容地说，“反正是要暴动。大家知道，咱们忍耐够了！国民党太狠心！上海杀不够，又在广州开刀。难道我们就一天天背着手等着倒霉吗？共产党不是泥巴捏的，那么好欺侮？！你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

张太雷说得非常有感情，声音不高，吐字也不快，但激昂、有力、沉着而自信。

会上讨论了暴动的准备事项。主要任务是：第一，积极训练工人群众，组织革命武装；第二，打击改组狗和黄色工会；第三，宣传发动群众，揭穿反动派阴谋，坚持罢工斗争。

临了，张太雷取下眼镜，用手帕抹了抹镜片再戴上，说：“暴动可是个大事情，一点也急不得，省委决定从现在起，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准备好，就什么时候动手干！”

按照起义总指挥分工，周文雍把分散的“剑仔队”、“工人自救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海员义勇团”等秘密武装，按十一个区编成统一的工人赤卫队。由于隶属不清、居住分散，不便集中指挥，周文雍又同黄平、杨殷、吴毅、陈郁等人重新研究，决定按照地段，结合行业，将十一个区的赤卫队迅速整编成七个联队，每个联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小队有十个人，叫“十人小组”。还成立了由汽车司机组成的独立汽车队，以及破坏交通队、红色恐怖队、敢死队、消息局等负有特别任务的组织。赤卫队的成分为：

运输业：车夫工人，煤炭工人，同德工人，小轮工人，汽车工人，邮务工人，海员工人，派报工人，铁路工人；

店员业：纱绸工人，大新职工，估衣工人；

粮食街市业：炭业工人，酒业工人，米业工人，菜栏工人，瓜菜工人，糖面工人，麻包工人，酱料工人，酒楼工人，粉面工人，猪肉工人；

织造服装业：锦纶街工人，衫袜工人，土布工人，唐鞋工人；

建筑业：建筑工人，搭棚工人，家私工人；

印纸五金业：印务工人，石印工人，铜铁工人；

其他：洋务工人，火柴厂工人，玉石工人。

计有 36 种行当，共 3000 人。此外，赵自选、黄谦、吴勤等人分别到市郊和南海县组织农民赤卫队。起义总指挥部派出徐向前、沈青等军政人员，分任各联队的联队长和党代表，加紧组织和军训工作。赤卫队的总指挥由周文雍担任，梁桂华任副总指挥。

为了壮大暴动的力量，暴动总指挥部努力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争取过来。

争取新编第四军警卫团，并使之充实、加强，这个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当时警卫团有两个营，一个是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的第一营，另一个是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第二营。军官成份良莠混杂，尤其在第一营里，多是张发奎的亲信。叶剑英把着张发奎的脉穴，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张发奎正为广州兵力薄弱，后防不固，且无力压制广州工人运动而大伤脑筋，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叶剑英又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了团长。并千方百计让张诗教、陶铸、蔡申熙等中共党员担任了团里主要领导职务。

梁秉枢一上任，就以团长名义于 12 月 1 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出布告：“奉军长黄令开，警备团士兵缺额，着本团长自行在广州附近招募补充……”经内外配合，300 多名省港罢工工人应征进了警卫团，编为第三营，由中共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班排长大都也是从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

员。

这样，共产党基本掌握了警卫团的领导权，并在基层有了自己的骨干力量。

叶剑英不仅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支武装力量，还要他的堂弟李新俊前往石龙，动员具有革命倾向的七十五团团团长李明等策应暴动，并约定了联络暗号。

黄埔军校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果。教导团的党员骨干王侃予、吴展和何崇校，同杨澍松一道调到了黄埔军校，何崇校当杨澍松的随从副官，王侃予调校长办公厅任秘书，吴展任特务营营长。这使得黄埔特务营也加强了同暴动指挥部的联系。该营有 200 多人，其中有 150 多名朝鲜人，崔庸健当时是第二连连长。

秘密的工作像地火一样蔓延。

这天傍晚，王侃予、陆更夫把贺诚约到大东门一家酒楼。在大革命的颠沛流离中，1925 年入党的贺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思想十分苦闷，回到广州后，他常以四川同乡的名义与王侃予和陆更夫走动，了解到党要举行暴动的意图。

他们在楼上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下。王侃予低声说：“看来张某人要同我们彻底摊牌，我们要赶在他的前面。这几天你要注意，到时候跟着我们干！”

陆更夫神秘地笑笑：“和我们一起干吧！”

贺诚感到一股热血直往上涌：“没说的，一定跟你们干！”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王侃予像是舌根发硬似地大声说：“润之兄，你荣升医务处主任，可是个大喜事！来，把这杯干了！”

贺诚和陆更夫应道：“要得，要得！”

回到第四军医务处，他暗中筹划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仔细分析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人品，找机会同思想进步的人闲聊。到了火候，贺诚把他们召到一块，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哪个心里不是燃着一团爱国救民的火焰？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走上了北洋军阀的老路。难道我们就甘心做他们杀工农，争地盘的工具有吗？”

几个人都痛苦地垂下了头。是张瑞华打破了沉默，她说：“我们不像教导团，有 CP 领导。凭着贺主任的为人，我愿意追随贺主任。”捅破了薄薄的窗纸，大家的内心其实都同样透亮。

贺诚兴奋得扬起了眉锋：“感谢诸位信任，惟愿大家团结一心，革命到底。”

暴动！这两个字像滚滚熔岩，像雷鸣闪电，在工人們的胸中奔突。“十人小组”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从陈郁在龙藏街太丘书院组织起头一个“十人小组”，一下子就迅速发展几十个，上百个。大家积极筹集武器，加紧军事训练，热烈地期待着。

徐向前被分配到第四联队，指导工人的军事训练。在来广州之前，他曾在张发奎的指挥部任参谋，南昌起义暴发后的一天夜里，张发奎把军官们集合在一起宣布：“CP 分子三天内给予保护，三天之后概不负责。”徐向前毅然离开张发奎的部队，独自回武汉又至上海，终于找到了党，被派到了广州。联队里这些打铁、缝衣、做沙发木器、修秤和修蒲团的工人，虽说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没有谁摸过枪。也没有枪，更没有练兵场地。徐向

前训练这些赤卫队骨干，就是每天晚上把他们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怎样利用地形，怎样扔手榴弹，怎样冲锋，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而且，徐向前是山西人，他讲话大家听不懂，大家讲话他也听不懂，谈了半天，有的人还听不出“巷战”是什么意思。黄埔军校毕业，在军队中当过参谋和团副的徐向前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尽管困难，但教的耐心，听的专注，一搞就是大半夜。好在党代表阿陈能从中翻译。

知道怎样扔手榴弹，手就想抓手榴弹。知道怎样射击，就想捣鼓捣鼓真玩艺儿。但到哪几去弄武器呢？

徐向前说：“先找根棍棒！”

阿陈挥起拳头：“对！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丢那妈！”一位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工人捋起衣袖，露出酸枝木般黑实坚硬的手臂说：“没枪一样做世界！你怕那两条硬柴它专吃素哇？到时候没家伙，真拿嘴咬它两口也见血呢！”

“咬！拿条竹杠也能打得黑狗叫娘！”

“海丰那边的农民，就拿锄头担挑打上豪劣绅，一样见功夫。”

“夜晚黑不会去抢黑狗的‘大头六火’么！”

“丢那妈，抢契弟的枪！”

正议论着，李少棠提着菜篮走进来，严严实实地包着头脸，只露两只眼睛。她一声不响，把篮子放在桌上，掀去上面的菜。是两支手枪，还有几颗手榴弹！众人眼睛被扎得一亮。还有吗？没有了。“自己先想办法，暴动起来想多少有多少。”

除正在赶制的手榴弹、炸弹和标枪，武器基本是各联队自己解决。有的人把“四一五”后埋藏的“六八”、“七九”步枪、古老的毛瑟枪、驳壳枪挖了出来。绝大多数的人用的是大刀、长矛、茶仔棍、火药鸟枪、禾叉、短剑、柴刀、扳手、铁尺，甚至用螺丝旋、车轴、水龙头管子来装备自己。

12月4日傍晚，在松柏、黄槐、夹竹桃荫掩的黄花岗，张太雷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他阐明暴动意义，分析国内外及广州的形势，要求加紧发动全体官兵，严密监控反动分子。叶镛、袁裕、赵希杰、饶寿柏、陆更夫、覃正格、唐维、唐嵩、曾干庭、王若冰、叶德生、甘理真、缪云人、蒋日、陈衍漠、郭声荣、李竹修、唐虞、游曦等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对胜利举行武装暴动，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美丽的幻想。

回四标营的路上，有人讲起五羊城的传说：

“那时候，广州这地方还是满目苍凉的穷谷荒丘。有一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饥荒。住在坡山下的一户苦命父子，已经连续几天没米下锅了。可差役们不顾百姓的死活，还是强征硬抢。他们把老汉抓进衙门，限令他儿子三天后的早晨把粮谷交齐，不然的话，老汉的性命就难保。孝顺的儿子求天求地，哭得死去活来。到了第二天晚上，哭得更凄惨了。他的哭声果然感动了天上的五位仙人。这五位仙人穿着五种不同颜色的衣冠，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冉冉地从云间降下来。这五位仙人，每一位手中都拿着一束粳稻株，并列成行地出现在少年面前。年纪最长的上前安慰道：“好孩子，别哭，你的伤心事我们全都知道。我们就是来解救你父亲的。”说罢，他们都把手里的稻株交给少年：“这些都是高产量的良种。你看，每一条主茎就有六条分

枝，只要插在土里，浇水除草，它们马上就会给你长出很多的粮食。天快亮了，你先去把父亲救出来，如果遇上什么困难，就到坡山脚来找我们。”说完，五仙人口念“愿此阡陌，永无饥荒”腾飞而去。少年揩干泪水，把稻株插在土里，浇些水。稻株越长越大，越长越多，眼见着每株都长满了沉甸甸的金黄色谷米粒。少年拿箩筐盛好谷粒的时候，天已大亮了”……

大家匆匆赶回营地，故事没有讲完。

整个教导团的血液像潮汐似地涌涨了。由女生队发起，人们开始交换家庭通讯地址，还有照片，还有类似遗书的家信。如果自己牺牲了，这遗书就请活着的人寄回家。

入夜，空气变得凉爽。大家都没有睡意。他们谈战友、家乡、身世、爱情、母亲、敌人、幸福、苦难、战争、和平、英雄和死……谈得最多的要算即将来临的暴动。他们把它想象成盛大的狂欢的节日，被想象中的胜利鼓舞得难以自禁。有人按捺不住地翻身下床，揣上磨得锋利的刺刀，去反动军官的宿舍前徘徊。

这种激动的情绪也被探视战友的人带到了公安局监狱。

在这座到处都是尿尿的肮脏拥挤的监狱里，除了关押着少量地痞、流氓、杀人犯、强盗，关押的主要是政治犯。政治犯中的军人，一部分是“四一五”时抓进来的，另一部分是在潮汕打散的起义军，逃到香港被英殖民主义者扣留，引渡而来的。探监的官兵带来了震撼人心的消息。纸条子在各监房飞快传递着。有人克制不住地放声唱起国际歌。黑狗们也闻到了什么气味，一改以往的凶狂，用央求的口吻道：“小声点，小声点，别吵着局长。”

监房里的夜晚也是激动的难眠的夜晚。

监狱大门处传来打开沉重的铁门和镣铐拖地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这钝重残忍的声音，格外地刺心刮骨，刺激得人们磨拳擦掌。

是12月5日的凌晨了。张太雷搁下笔，舒展舒展筋骨。他给党中央写了粤桂战争爆发后的广州局势及省委的策略的报告。他写道：“省委在事变前便决定要广州以暴动手段摇动破坏广州市敌人军队，并加以全省农民整个暴动解决全部敌军，建立广东工农兵政权。”

张太雷还写道：即使暴动失败了，“至少亦须借此扫除广州反动势力，并获得多少武装，进行广州附近的农村革命。”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是他无数不眠之夜中的一个。张太雷、周文雍、叶剑英、黄平、杨殷、吴毅、邓发、陈郁、季步高、黄锦辉，还有德国人纽曼，苏联人哈西斯、乌科洛夫等；还有更多的人，为了中国革命，他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同日，中央也在上海给广东省委发出一封信，对省委11月26日作出的广州暴动计划，表示赞同。要求在暴动时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的发动，要召开工代会，让工代会成为暴动发动的机关。暴动后，农民和士兵代表要加入工代会，成为工农兵代表会。

暴动进入倒记时

恽代英和聂荣臻也来到了广州。

此前，恽代英在香港主持留守机构的工作，并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红旗》是半周刊，编好后用五色商业广告包裹，由交通秘密带往澳门印制。恽代英在《红旗》上发表题为《冬防》的文章，号召穷苦的农工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起来吧！便是这个冬天，我们要准备大暴动，解除一切冬防军队的武装，为我们穷苦人们打一条出路。”

聂荣臻是省委军委负责人，致力于军火的筹集的工作。

12月6日，在广州调元街何振武家召开的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上，恽代英宣读了草拟的苏维埃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获一致通过。有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吴毅、陈郁等人参加的这次会议，还拟定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会议结束时，穿着灰布长衫的恽代英用手反捶了几下腰脊，舀一碗凉茶，喝得咕咚有声。

聂荣臻到广州后，和省军委委员杨剑英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一间民房，作为军委的联络点。租房的铺保，就是武器转运站“大安米店”的房东老板。这个老板险些坏了大事。

12月7日中午，司后街一家小电影院里来了许多人。着穿西装的，穿长褂的，有的是刚收车的车夫，穿的鞋子是“前卖生姜，后卖鹅蛋”。他们抽烟，小声谈论，看新闻纸和画报。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张太雷翻看着几份文件。他打开怀表。影院的座钟敲响12点。放映厅里马上变得肃静。

张太雷站起身，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全场。他宽阔智慧的前额闪闪发亮。停了一会，他宣布今天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将通过暴动政纲、广州苏维埃宣言、成员名单，决定暴动时间。他说：

“苏联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个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成功。今天我们暴动，也有两个团的士兵同情我们，打响之后，如果能影响在梧州混战的军阀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今天我们同苏联十月革命时的情形太相似了，正是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好时机！”

放映厅里的气氛扬起来了。接着对政纲等逐项宣读、解释、讨论、通过。

当宣读、解释到“将穷人当赎物无价发还”时，张太雷说得很详细：“分田要等夺得政权后的相当时候才能做到，而这一条可以马上做，表明我们为贫穷百姓谋利益的决心。不要忽视这一条，办好了，能震撼全中国穷人的心。”

有人站起来问：“我们暴动，要是河南的反动派同沙面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跟我们干，怎么办？”

听到这个问题，张太雷摸了摸眼镜，然后说：“那我们也决不饶过他们！”

许多人争相发言，对暴动的结局很乐观。陈功武说：“暴动后如能控制河北，守得个把月，等到与海陆丰农民会师，便可占稳广州了。”

会议把暴动时间定于12月12日。并通过了暴动政纲、建立苏维埃的宣言和成员名单。苏维埃政府成员为：

主 席	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理）
人民内务委员会	黄平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会	杨殷

人民土地委员	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以赵自选代理）
人民劳动委员	周文雍
人民外交委员	黄平
人民司法委员	陈郁
人民经济委员	何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	张太雷
秘书长	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挺
工农红军总参谋	徐光英

事情都决定下来了。张太雷问黄平：何时叫叶挺来广州？黄平说：越晚越好，这样可以减少被捕的机会。又问：是否让叶剑英知道暴动日期？答：他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不告诉他为好，暴动后再请他来。叶剑英被内定为军事副总指挥。

次日，张太雷向中央报告了暴动的准备情况。他写道：“我们的政纲是：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工人监督工厂，政府（抚恤）失业工人，恢复罢工工人原有利益；没收一切土地给农民、兵士；增加一切佣员薪金，兵饷每月20元；消灭军阀战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联合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报告中提出：“我们指导的力量很薄弱，希望恩来兄能即来。”

张太雷并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向与会者报告暴动的政纲及准备情况。工人赤卫队则由各联队召集干部会议，研究暴动的战术问题。

市委宣传部长负责人赖先声召集团市委、妇委、劳动童子团和各区工代会有关人员，研究了组织宣传队，准备暴动标志和横额，抄写标语，宣传品的印刷等问题，并作了分工。会后分别抓落实。团市委和劳动童子团从学校里组织起一批宣传队，并选出毛笔字写得漂亮有力的学生，抄写标语。暴动宣言、文告和传单的印刷，由赖先声与杨殷联系，偷运到澳门去办。妇委承担了制作暴动标志的任务。陈铁军和李淑贤发动车衣工会、土布工会的女工，还有执信、女师的学生，以办喜事为由，三三俩俩去西关、惠爱路各布店，把市面上的红布购尽，赶制红领带、红袖章、红旗和横额。

石井兵工厂的一千只镖枪，也在暗中陆续赶制出来，还有分散在各处制作的五百枚手榴弹和炸弹，都悄悄向“大安米店”汇集，又塞入装大米的麻袋里输送到工人赤卫队各联队。

暴动已进入倒计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汪精卫之流伸出了企图把暴动扼死于摇篮的毒手！

12月9日，上海《申报》刊载广州通信披露：

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宣布护党以后，省内形势为之震变：东西北三江及南路，固卷入战线之内，广州市则工人向罢工会、总工会等处抛掷炸弹，罢工工人纵火焚烧各商店，纸币价格迭生风潮，米柴及各物价值同时飞涨，四乡水陆交通大都停顿……

公安局近据报，有“反动分子”欲乘此军事时期，进行捣乱。其属工人方面，经会同农工厅派员密查；其在市面，亦由侦缉员分头侦察。五日曾在省河截获私运军械数十桶之驳船一艘，捕蛋妇一口，据供此项军械，系由日本商船运来，尚有一大帮在沙面被留。至附近广州各地，如石龙市农民协会日昨开成立大会，竟张贴“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实行焚烧田契债券”，“杀尽土豪劣绅地主”等标语，虽经市政府取缔，惟

仍不断活动。又如军事要区之长洲，亦有共产党由海道侵袭之说。张、黄、陈等处此新环境下，由七八两日起，派“雷震”、“雷兑”等鱼雷艇，另派浅水巡舰，担任省河警戒并梭巡由白鹅潭至三山一带；长洲则由长洲要塞司令部恢复警戒状况，河面泊有军舰两艘，日夜升火巡戈；其虎门鱼珠车歪各炮台，均一律宣布戒严，检查船只。陆上方面，河北由薛岳之一部及公安局保安队担任警戒，河南由李福林部维持，并在花埭芳村石围塘河南尾各地，增派部队，以期周密。惟张发奎仍嫌市区兵力薄弱，复由北江抽调黄琪翔部军官教导团，入市协防，且亲到该团演讲，谓不使广东为灰色，打倒腐化投机分子，不恶化，不右倾，奋斗到底：但该团分子大部分为邓演达任总政治部时之政治工作人员，多经邓演达所训练，该团既驻防广州，市内赤色空气，乃愈浓厚矣。

这则广州通信，与其说是焦虑于广州有共产党举事之险势，倒不如说它是驻粤新军阀内斗的一方向另一方举起的棍子。《申报》刊登此通信，也是意在接过这根棍子，交给国民党内斗的桂系一方去打粤系一方。最终受益的是蒋介石，所以，这根棍子最终是蒋介石的棍子。那么，这根棍子初出于谁手呢？各方面情况表明，是出自于朱晖日之手无疑。根据有四：一是有“公安局近据报”为证。其次，朱晖日对黄琪翔恨之入骨，兼及张发奎。朱晖日的第十一军与黄琪翔的第四军合编后，军长被黄琪翔夺得；朱晖日当广州市公安局长，黄琪翔又要以军事厅易公安局，朱不干，黄便自任卫戍司令，取代朱之职权；朱晖日派人撕黄琪翔的标语，黄琪翔几欲下手令逮捕朱，朱因此攻击黄为共产分子。其三，朱晖日确也掌握了一些暴动的情报，他手下的密探竟能潜入苏联领事馆厕所间，从门缝里窥得秘密会议及标着符号的地图。第四，从汪精卫给张发奎的电报中，可看出朱晖日这一棍子是打在了对手的四寸上。

当然，《申报》披露的只是可见诸于报端的，真正狠厉的还是藏于幕后的乱棍。

正在上海与李宗仁、吴稚晖们争权夺利的汪精卫，本因张发奎推翻李济深，而被指斥为“通共”，他每天都在抗辩，恨不能浑身长嘴。近期纷至的传闻，更压得他七窍窜火。他恨死了被政敌当作武器的共产党。于是连夜派其妻陈璧君赶往广州，“对张发奎一班人说，叫他们要暗中防备，不要让共产党暴动起来。”9日，汪精卫又迫不及待地给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李福林连发三封电报，杀气腾腾地说：“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恕，贻误无穷；并饬军警严拿匿迹苏俄领事署内之共党；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次日，又复电敦促：“坚决反共，勿为敌人所笑，为亲厚所痛。”

电报中还说：“弟因黄琪翔同志掩护共党”，“拟恳向华（张发奎）兄英断，请琪翔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

对于张发奎来说，谁要动摇他的地位，抢夺他的地盘，谁就是他的死敌。共产党要暴动、教导团将参与的事，他早有耳闻，教导团也有人向他告密。他没有下手镇肃，一是因为他的部队正与李济深、黄绍竑剑拔弩张地对峙，精力顾不上；二是因为要利用教导团的想法，加上叶剑英多方劝阻，使他对教导团要参与暴动将信将疑；三是认为“四一五”后广州的共产党元气大伤，还不成气候，有个小风浪也翻不了大船。

汪精卫的三封急电，使张发奎受到了震撼。恰在此时，巡查的军警从米袋里搜出60枚手榴弹，并顺藤摸瓜，破获了“大安米店”，用棍棒火钳从米

店老板口中撬出了实情。

12月9日，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沈青、石喜、李沛群、黄文、邓苏等人来到红花岗。野草杂木，间以黄花，新坟连着旧墓，漫过起伏的土岗遥接天际的阴云。30多位手车夫工会的代表在第三座土岗前站定。这里掩埋着工人的英雄，“四一五”被杀害的工会主席彭世及王世文等四人。

英雄的墓前烛火摇曳，烟缕腾袅。有人燃着了纸钱、银宝，北风吹过，纸灰如黑蝶翻飞。人们鞠躬，默哀，以泪水洗面。彻骨的痛和对敌人入髓的恨拧绞在心头。

沈青拭去热泪，悲愤地说：“敌人打断了彭世同志的腰骨，插烂了王世文同志的十指，可是，敌人没有得到一点想要的东西。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硬骨头！我们要为他们报仇，为劳苦工农打出一片江山！”

石喜浓眉紧锁，腮上的肌肉鼓暴得像一道一道的石棱子。也是在这一天，教导团学生张西臣被反动分子勒死在厕所里。

张西臣在政治上是个天真、糊涂的人。他既拥护共产党，又相信张发奎。8日晚，朱勉芳召集团里的反动分子开会，大概是嫌人少，也叫上了这个糊涂蛋。朱勉芳教授了一些当密探的技巧，要他们加紧收集共产党员的名单，声色俱厉地说：“团里的赤子赤孙们想闹事，必须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

夜里躺在床上，张西臣翻来覆去想不明白。他对人说：共产党不是也救国吗？汀泗桥、贺胜桥这些漂亮仗，不都是共产党打的吗？武汉三镇的收复，在河南击溃奉系军阀，共产党也起到了骨干作用。为什么要与他们誓不两立，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呢？

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勒死在厕所里。他的身上贴着一张纸条，上写“叛徒”两字。

如同冷热空气争搏着形成大块乌云。这黑色的战场将飞舞起耀眼锋利的闪电，将是弹雨纵横。

张发奎连下三道命令：

第一道以查出手榴弹，保障市民安全为由，宣布广州实行特别戒严；

第二道要黄琪翔迅速从前线向广州抽调军队；

第三道是收缴第四军教导团的枪械。

刀已出鞘，子弹已上膛，巨大的火药桶就要爆炸！先动手者，将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

风云突变！叶剑英又一次临危而出。他把敌人的动向即报党组织，并亲赴教导团，向全团通报严峻的形势。“很遗憾，张总指挥听到坏人告密，诬指我们教导团要举行武装暴动，并且准备从外面调部队来缴你们的枪。为此，我已向张总指挥当面辟谣，大家可以放心操练，不要听信坏人的谣言！”他话中有话，“国民党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新旧军阀仍在津浦路混战，叶、贺队伍退到海陆丰，还要聚众闹事”……

此前，他面见张发奎，说：“总指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共产党暴动的情报并不可靠。”

但张发奎衣袋里的三封电报在啸叫。

这一回他沉吟不语，是因为援兵尚未抵达。

紧急命令下达之后

12月10日早晨，一代名将叶挺从香港动身了。他自潮汕退到香港后，与背着“叛将”眷属罪名逃到澳门的妻子李文秀相聚。昨晚，他接到了省委关于提前暴动、他被指派为军事总指挥的紧急通知。

走进九龙尖沙嘴车站候车室，他的目光一沉，一冷。他看见了熙熙攘攘人堆里的胡毅生。此人是胡汉民堂弟，两年前因主谋刺杀廖仲恺被通缉，亡命香港。叶挺扯扯风雨衣领，把礼帽牵至眉沿，买了张三等车票。

午后，叶挺乘硬席车厢到达广州东站，转乘上赤卫队的卡车。专程来迎接的周文雍和杨殷告诉他，由于情势急变，原定于12日举行的暴动被迫提前至11日凌晨3时30分。叶挺无语，他对行动计划及敌我双方的实力尚无翔实的了解。

到了叶家祠，叶挺让妹妹叶香、叶珠帮他找一套时令西服和衬衣换上，顾不上寒暄，便去找负责拟定军事计划的徐光英。他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情况。

汪精卫、张发奎决定先下手，使暴动胎死腹中。张太雷等得此消息，决心改变举行暴动的原定计划，先张发奎下手而下手，立即举行暴动。经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形成了决议。

广东省委向中央作了紧急报告。报告说：“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地向我们进攻”，“省委决定明日即行暴发广州之暴动”。同日，向广州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布了举行暴动的紧急命令。

紧急命令在广州城飞快地四下传递。以一种复仇的感情传递，以激奋和带有英雄气概的情绪传递。

一切都像是有点乱，又确实是在紧张迅速地进行着。

吴毅来到上九路杨巷胜利汽车修理行，这里聚集着海员骨干。吴毅开口就说：“同志们，风声紧得很！”他逐个询问了暴动的准备情况，又说：“要抓紧最后的时间把一切准备好！小北兵工厂被敌人破坏了，有人叛变！教导团也有人告密。今天上午的情报讲，张发奎正在把韶关的军队调来。这龟儿子眼看要下毒手！省委叫我通知各位，暴动时间由原来的12号提前到11号，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30分，四标营一打枪，就动手！”吴毅掏出一个淡绿色的小本，上面写满了数字、地名，还画了好些地图。他逐一布置了任务。最后轮到何振武，任务是严密封锁长堤西濠口一带江岸，不准任何人来往，大小船只，一律冻结。吴毅特别交待他：“你的担子不轻哇！让那些家伙从你胯下溜到李福林那里去，麻烦就大了！”

军委负责人季步高找到省港罢工工人甘宝源。甘宝源兴冲冲地说：“家伙收到了，该‘炒’了吧？”他指的是收到的几支驳壳枪和几枚手榴弹，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分批送来的。季步高以笑作答，说：“齐黑的时候，把家伙送到酒米工会，交给黄荣或是刘楚杰。你再去国民汽车公司找关国，他会把任务告诉你。”甘宝源晃了晃拳头：“是不是——”季步高仍不理睬，掏出一叠烟纸，说：“还有，把这拿去派给酒米工会的赤卫队员，一人一张，晚上12点之前带票到工会集合。”烟纸上盖有邮票大小的红印，篆字。甘宝源便去分派。

张太雷来到潭新街独身老婆们住的姑婆屋。周文雍和杨殷也在这里。杨殷给第三联队、工农特别联队和南海县农军布置了任务。他从铁路工人和建

筑工人组成的第三联队里，抽出两中队人，组成敢死队，由王春、李连任队长，配合攻打公安局，叫黄寿协助指挥。攻击目标还有西区各警察分局和石围塘火车站。张太雷进屋后，同大家逐个握手，作了一番鼓动，然后要杨殷接着说。杨殷拍拍黄寿肩膀说：“公安局是敌人的中心堡垒，对付它要勇敢，还要灵活才成呐！”又对曾伟赞说：“打车站的担子不轻呀，就落在你身上了！”曾伟赞硬气地说：“殷叔，看吧！”随后，黄寿回到姐姐家中，从厨房水围基的砖下取出驳壳枪，去掉桐油纸，往裤头上一插，便赶往旧仓巷的“大夫第”，曾伟赞也先回家，点亮神台上的油灯，搬开香炉，从底下摸出一支德造曲尺手枪，一子弹。他把枪擦净，装上子弹，出门直奔将军庙直街。

手车夫工会支部会在第十甫曾巷举行。第二联队队长沈青宣布：“暴动定为今晚下夜三点钟半动手，听东北角四标营枪声为号！”人们发出一声欢呼。支部书记黄益华把拳头往台上一搁：“同志们，为死难烈士报仇的时候到了！为劳苦工农打江山的时候到了！大家要听从指挥，带领工友勇敢战斗！一切为了暴动胜利！”接着，沈青分配攻击任务。李沛群迫不及待地问：“我们呢？我们第六大队打哪里？”沈青说：“会合其他队伍，打第五区警署。”嘿！不是冤家不对头，手车夫提起警察就恨得牙根痛，喊声打，还不制他肉酱！刚要走，被黄益华拉住。黄益华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油印的《工农兵暴动歌》。李沛群说：“我还以为——起码也给支‘大六火头’呢。”“那土造枪哪能比？”黄益华笑道，“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只提了六个字：面包——土地——和平，就推翻了沙皇统治。”李沛群回到万福路车夫馆，要大家分散走，到禹山市酒楼茶室总工会第四分会楼上集中。随后拉上石喜上街，去通知出夜车的工友。

陈铁军发给陈功武三节双毫银洋，总共 30 块钱，作为当晚的餐费。陈功武还得到一纸委任令，上用铅笔字写道：“兹委任陈功武同志为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政治主任，须听从命令，不得违背。”他发完晚餐费，同工代会的几位工友在大德路的一家小饭馆饱餐一顿。七时，他们来到第一联队的集中地点龙藏街太邱书院。第一联队约有 600 名工友，分属打石、电务、油业、酒米柴炭、瓜菜、派报、颜料、水烟筒、茶叶、起落货、手车、汽车等工会，及部分省港罢工工友，彼此多不相识。所以，门前有三五名守卫检查证件，就是季步高让甘来派发的烟纸。

周文雍到明星戏院，饱蘸浓墨，书写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巨幅横额。随后来到了太邱书院。他对陈功武说：“给你个任务，去小北直街拿手榴弹，立即去。”并有一张两指宽纸条，写道：“兹介绍陈功武到来，请予接洽”。署名“西皮”，是 CP 的谐音。周文雍又同联队长、大队长们围着一张饭桌，对攻打公安局作细致的布置。周文雍说：“公安局的情况一定要记清楚：一入门有道铁栅，门对正是办公楼。穿过天井，北边是警察宿舍，南边是材料库、监仓。敢死队一干掉门警，大队立即冲进去，一部分冲入警察宿舍抓俘虏，一部分绕到后边，把监仓里的同志放出来。”……

由于赤卫队组建得太匆忙，加上一些客观因素，使得赤卫队的序列不健全，不严密，有的甚至统属不清，关系不顺；还由于改变暴动时间太仓促，所以，通知有的早，有的晚，有的到联队，有的到工会，有的甚至没通知到。当石喜叫一位正在拉客的手车工友回去时，那工友仍在呼呼地跑，说：“拉完这趟车就去。”

叶挺找到徐光英，向他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

徐光英掌握的情况是：张发奎的主要力量集结于西江等地，但广州市区的兵力细算起来，仍有不少：新编第二师第三团驻陈家祠；李福林第五军一个营驻河南海幢寺；沙河、燕塘一带驻有炮兵五营；北较场有步兵四连；东山两连；国民党省党部、广九火车站、四军军部、观音山、省长公署、军事厅、文德路等处各驻一营、一连或一排；公安局所辖保安队分驻各警署及机关，有枪千余。总计驻地不下二三十处，兵力七千以上。反观己方：有教导团千余人，警卫团有把握的一个营，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枪械共约一千三百余枝，工人赤卫队仅有数十枝。

而且——叶挺想——工人赤卫队缺乏严格的训练；而且，作为局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不能不同周边的局势联系在一起考虑。

作为一名极富军事智慧又历经沙场的军事将领，叶挺不能不感到形势的严峻。曾参加暴动策划的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后来说：“我们都不相信起义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广州外围反动派的势力太强大了。”但到了此时，叶挺也不能不表现得异常冷静。

晚上8时左右，他和徐光英赶到永汉南路，在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召开军事参谋团会议。

参加会的有张太雷、周文雍、黄平、聂荣臻、杨殷；还有暴动总指挥部新任命的教导团团团长李云鹏，营长叶镛、赵希杰、饶寿白，警卫团的梁秉枢、陈选甫、袁耐坚，赤卫队的沈青、邓苏、李连，农军的陈道舟等。张太雷同叶挺拣要紧的说了几句，便同周文雍匆忙离去。赤卫队各战斗单位是否到位，使他们放心不下。黄平去接应纽曼。

与会人员汇报了情况，杨殷和徐光英又补充了一些敌方情报。加上徐光英先前的介绍，叶挺对手中的作战图表有了整体的把握。叶挺寡言少语，一直在沉思默想。他对作战方案作了综合调整。军事参谋团制定的全盘作战方案是：

教导团第一营主攻维新路公安局；二营各连分别攻打敌学兵营、沙河炮兵团和广九车站；三营解决长堤肇庆会馆第四军军部；炮兵连各排配合攻打沙河炮兵团、省党部、东较场公安分局、新编第一师司令部等处；工兵连攻击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中央银行等机构。警卫团第三营分兵进攻四军军部、仰忠街军械库，占领文德路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二营原地警戒，并在东堤一带设防，严防河南李福林渡河增援；一营警戒观音山一带，防止敌军从北面反扑。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攻打四军军部和广九车站；第三联队攻打西区各警察分局、粤汉铁路局、陈家祠驻军和西瓜园保安队；第四联队攻打大佛寺警官讲习所、大南路警察分局及附近军警机关；第五联队攻打省长公署、观音山驻军和德宣路警察分局；第六联队兵分两路，一路攻打芳村警察分局、保安队和广三铁路车站，另一路攻打佛山；第七联队机动。暴动时间是11日凌晨3时半，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暴动人员一律在颈上系红领带为记。

叶挺对战斗中相互呼应、伤员救护和后勤供应作了提示，并强调了周密侦察和因敌用兵的重要性。

布置就绪后，各路领导和骨干即迅速返回。一位年轻人携带着装有铁锤镰刀红旗和红领带的包袱，随李云鹏等去教导团。

临走时有人问：“那河南的李福林怎么办？”

叶挺说：“急不得嘛，打下河北再过去也不迟。”

杨殷笑道：“是呀，我们手里捏着‘天九至尊’，难道还杀不倒他的‘三武鹅五’？”

大家被逗笑了。李福林的豆腐军素被比作“三武鹅五”，也就是牌局中最小的牌底。“天九至尊”则是“天九”中的王牌。

陈功武揣上周文雍给他的纸条，去“大安米店”领取手榴弹。他带着六七位工友，出龙藏街，经四牌楼、越华路、司后街、二牌楼，上了小北直街，再过一座小桥，到了“大安米店”。他们进去后马上门上板。汽灯捻得很暗，米店的同志接了陈功武的纸条，便从后进屋里搬出米袋。每袋藏有十多枚手榴弹，清点完捆扎好，一袋一袋堆叠在门边。他们不知道，朱晖日派出的警察埋伏在四周，已经苦等多时了。

他们正要运走手榴弹，迫不及待的警察已扑到门前。“开门！开门！”“搜查！搜查！”总有十来支枪撞得门板吱呀欲裂。“快走！”店内的人有的奔到天井里，翻墙而去。陈功武几个人路径不熟，跑入店堂后进的死角。门哗啦一声碎裂，二三十名黑狗蜂拥而入。为首的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满脸是叫人恶心的烟油，他劈面抓住陈功武，抵至柜台边。这个身穿蓝布长衫的家伙八成是警长，他指挥警察分两队，一队守住店门，一队向后进追索。后进有人朝外放枪。黑狗们乱哄哄地退回店堂，“啊呀”、“妈呀”的，还有喊“救命”的。有人被人扑通一声绊倒在地，便又相互骂“契弟”、“咸家铲”。警长喝令守门的黑狗们把搁在通道里的破条凳和烂台板搬开。陈功武瞅冷子拔腿就跑。警长惊退一步，哆嗦脖子举枪就打，“快来人！跑了人啦！给我追！”逃跑的如飞矢，追赶的如惊兔。进了豪贤街，陈功武从兜中掏出发夜餐费剩的三元双毫银洋，抛到卵石路上叮叮当当。身后杂沓的脚步声消失了。

太邱书院的门紧闭着。里面的人打开高门坎，让陈功武横着身子钻了进来。听了陈功武的叙述，有人低声痛骂敌人的狡诈。有人说：“不怕，抓实一条茶仔木，还怕打不倒那几块神主牌！”

施展和苏南按照杨殷的命令，到各赤卫队集结点检查和督促。时候尚早，苏南领着施展先到华林寺，他的一位玉石工友今晚在这儿烹狗肉。

走进厨房，浓烈的狗肉香味扑鼻而来。老和尚笑咪咪地捧出一罐烧酒，又返身去取酒杯。看来他对吃狗肉挺有兴趣。施展捅捅苏南，呶呶老和尚。苏南嫌他少见多怪，说：“嗨，和尚也不全是傻瓜。”老和尚回来，给五只杯子倒满，笑咪咪他说：“来来来，天寒地冷，吃狗骨饮烧酒最惬意。”苏南不饮，只吃狗肉。老和尚却不饶，举着杯子推来攘去的哪像个正经出家人。玉石工人帮老和尚下台阶，插话道：“人说冬至鱼生夏至狗，其实说反了，不如说夏至鱼生冬至狗。冬至快到了，来，干一杯。”于是干了一杯。吃狗肉吃得浑身窜火。

出了华林寺，他们分头检查。施展来到白矿桥的糖面工会。

灯火暗淡的工会大厅和天井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队长刘昌穿黑粗布唐装，腰束布带。他正在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怎样攻打保安队。施展对一个熟识的青年说：“细佬，我们被那帮契弟赶到绝，今晚该轮到整他们啦！”青年说：“当然！今晚老子给他们送终！”“带了什么家伙？”“家伙，犀利啦！”青年撩起衣襟，露出一把用毛竹削成的短剑。

刘昌走了过来，施展问他：“都准备了家伙？”刘昌捂住腰间的手枪把，

神色得意地说：“每人一支！”又问：“都是什么？”答：“当然是枪。”施展不信，刘昌往门口一指。十几名队员扛进来一捆捆的石斑木，丢在天井里。“领枪的来呀，来迟就执输啦！”队员们一人一条，舞弄、对打起来。还真是刀枪如林呢。

施展又来到学宫街渭滨书院。

验过证明身份的纸片，正欲找联队长，一条又粗又长的东西打斜刺里插将过来。施展闪身躲开，一名队员收住架式，扎个四平大马，哈哈地乐。施展说：“喂，你要舞过了劲，到时候还有力气打？”那队员来劲了，他把手中的家伙呼呼有声地横扫了一圈，收住，睁着一只眼睛说：“这一招叫‘狂风扫落叶’，先头那一手叫‘黑虎掏心’。看招！”说着又要露第三手。围上来的众人都乐。施展止住他，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他摆了个金鸡独立的式子：“嘿！此乃齐天大圣的定海神针。敌人拿机关枪，它就变成机关枪，敌人拿的是大炮，它就变大炮……”施展接过“定海神针”，原是一根去掉绳钩的大秤杆。

“怎么样？”队长拿着一大把红领带，从人丛里挤过来，“我们就靠这些‘定海神针’呢。”

施展检查的最后一个点是线香街搭棚工会。这里属于徐向前和邓苏领导的第四联队，队员们缠着红领带，各式各样的武器都已拿在手上。中队长周福举着一面红旗。他腰束藏青布带，衣袖卷起，露着筋爆爆粗壮的小臂。周福告诉施展，徐向前和邓苏带人在别的地方集结，分别打两个警署，他的这个中队打警官讲习所。施展要了一碗水喝。周福顿了顿旗杆说：“要能有支短枪就好了。全队的几支枪都给抢光了。”施展把自己的炸嘴短枪给了周福。

来这里之前，施展还去了龙藏街太邱书院和大南路建筑工会。

此时，各处的赤卫队员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四标营的信号。

回到“金山”号轮船上，何振武向地下党员华容灶和华容根布置了任务。两人都是船上的西餐厨师。他们坐在厨房里，透过窗口望着星光稀疏夜空，默默地抽着烟。

曾伟赞踏进将军庙时，有几个赤卫队员正在舞弄刀棍，其余的人围了一圈，十分热闹。原来，攻打粤汉铁路的这60个人，过去多是铁路纠察队队员，有十来支枪，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但大部分人仍是赤手空拳，便把神像左右兵器架上的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借来一用。风烛残年的老僧叹口气道：“昨日将军显圣，说黎民要造反。造孽造孽。就拿去吧。”曾伟赞说完任务，这位光绪三十四年就端上铁路饭碗的老工人，讲起了当年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

李沛群上了酒楼茶室工会第四分会二楼。这里已挤满了黑脸赤脚，穿牛头短裤的手车夫。他们手里拿着竹杠、木棍，有的攥着菜刀、柴刀和烂车轴。石喜拆下工会的旗杆，包上铁皮尖，做成了一支长矛。他又喝又刺地耍了几把。李沛群说：“好！看拿哪只黑狗先开斋。”他从口袋里掏出《工农兵暴动歌》歌纸，告诉大家，这首歌就是“四一五”之前唱的《工农兵大联合歌》，只是略有改动。

酒米工会设在一个大庙堂里，赤卫队员在下棋、看报、聊天。甘宝源把带来的手枪、手榴弹和子弹袋交给大队长刘楚杰。“好！枪杆子抓在我们工人手上，天就要光了！”刘楚杰像欣赏一件艺术品，翻来复去地把弄着枪。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湖南人。队员们围上来，都想摸一摸。有人问：“就

这么多？”甘宝源说：“老兄，少是少点，用在当筋当骨的地方吧！”刘楚杰指指墙边：“打狗的家伙有的是！”墙边搁着一大堆节日耍狮子和习武用的长矛、三股叉、红缨枪，还有短刀、铁尺。

汽车工会队员集结于公园前的模范汽车公司工人宿舍，准备围攻公安局，接运教导团。

印刷工会队员集结于广卫路省印刷总工会会址，准备协攻公安局。

一队队，一组组的工人赤卫队员潜伏在工会会址和民舍里……

农民赤卫队接到命令后，也紧张地行动起来。

市郊一区的农军集结在芳村谢家南边祠，他们同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合编为第六联队。联队长赵自选将领着农军攻打石围塘广三车站等处。

四区聚龙村附近的农军也聚集起来，在大队长王岳峰和林成佑率领下，准备进城助攻。

在南海县，陈道舟、周侠生和谢颂雅举行了紧急县委会议，制定了在南海九区和石围塘以西攻击敌人，配合暴动的方案。农民赤卫队员拿出纸张和红花粉，连夜裁纸，煮浆糊，磨墨，写标语。再把标语贴到村庄和铁路沿线的树杆、电线杆和墙壁上。

花县的农军于8日袭击了北面的清远县城，接到通知后，300多人分批次急进广州。

甘宝源下一步的任务是侦察、收集市面的敌情。他出了酒米工会，按照季步高的指示，来到西瓜园国民汽车公司。汽车工会的关国找来司机陈永。他们驾着新型的黑色“雪佛莱”轿车出发了。此时甘宝源换上了从估衣店买的“行头”：雪白的箭牌靛衫，企领文装中山服，当时时髦的俄式鸭舌帽。俨然是个阔少。

汽车沿丰宁路缓缓南行，开到太平南西壕口。这里是广州最热闹的地段，大新公司高高的天台游乐场灯火辉煌，映得珠江河水凄红惨绿。街上晃荡着几辆“野鸡车”，与往日手车穿织之景有异。往南尽处，竖着一块十米高的广告牌，上有赫然大字：“秋风起矣，三蛇肥矣！”四周画满了昂头吐舌的“饭铲头”和盘蜷沉睡的“过基硖”。广告牌前站着一个黑狗警察，在甘宝源眼里，自然也是个“饭铲头”。

向东转入长堤，是艳粉腻脂地。镜波楼、玉波楼、怡香楼的楼上，女伶在娇声怨气地“唱会”；脑满肠肥的买办、财东，无恶不作的“大天二”、流氓，在怀着淫心寻欢作乐。江边的熟食摊档被笼罩在这些茶楼酒家的阴影里，小贩们为争到一位食客拉长嗓子喊道：“哇——鲜甜鱼生粥，碌碌滚，五个仙一碗，来咧——”“清心润肺生鱼葛菜汤，饮啦——一个仙两碗！”被压在最底层的“珠娘”站在江边，头发用“刨花浆”梳得油亮，见人就扑上去尖声高叫：“叫艇咧！有艇过夜啊！”为了几个仙而彼此争抢谩骂。

往东行便是南堤。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电报局、海军舰务处等都在这一带，甘宝源格外留神。经过天字码头，碰到敌人一个巡逻班，为首的擎着面蓝布旗，上面有个白色的“巡”字。背着的是打不起精神的老套筒。又撵上两个军官。许是喝过了量，他们拧着皮腰带，歪歪倒倒地哼道：“罢了我的蝴蝶美人……你三鼓时分，变转入形，与我同偕鸳鸯……”有个巡夜警察提着点茶油的防风牛眼灯，从小巷里出来，见来了军官赶忙又闪回巷子。他的屁股上挂着一支古老的“大头六火”土制手枪。

车子驶过东堤，川龙口，经广九车站，大东门，驶往较为僻静的东山。

在梅花村兜回头。顺百子路，惠福路，直往西驶。途经财政厅时，放慢了车速。到第一公园转向南驶。陈永用胳膊撞撞甘宝源。甘宝源看见正在一个生果摊前买什么的罗炳和黎胜。他俩原是省港罢工模范纠察队队员。前面就是维新路公安局。

公安局的围墙上乱糟糟地贴着广告。甘宝源从车窗口伸出脑袋，目光越过了围墙。树影摇曳的办公大楼亮着三五灯火，从外表看，不像有特别的动静。公安局正门被两个瓦数很大的灯泡照得雪亮，两名荷枪的警卫在亮地里踱步，也不像有特别的警觉。公安局对面是一列葵棚，棚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棚楼上架着两挺水龙机关枪，棚内寂然无声。这是保安队驻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戒备。甘宝源兴奋地说：“今晚‘实得米’。”陈永道：“走！回去报告去。”

话刚落音，就见一辆铁甲车迎面驶来。这辆铁甲车是用李济深的座驾改装而成的。这一新情况说明，敌人并非没有特别地戒备。

距公安局几百米远的第一公园，此时是一片寂静和黑暗。在高大的乔木和齐人高的灌木野草中，正静悄悄地埋伏着敢死队员。他们有的是先于旧仓巷“大夫第”集结，转移而来；有的是化装成卖面包的、卖热蔗的、舞狮队练功的，独自而来。王春、李连和黄寿蹲伏在一丛矮树旁。一位性急的队员弓着身过来问：“还未够钟？蹲到脚都麻啦！”王春轻声说：“快啦。别出声！”

又恢复了寂静。音乐亭周围的山竹沙沙摆动。一片落叶刮着了树枝，掉落在地上。

此时，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恽代英、徐光英乘坐小车，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引领，正驰往教导团的驻地四标营。

第四章 赤 夜

一幅创世纪的图景

广州古称番禺，至今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它濒临南海，位于西江、北江和东江汇合处，于沿海、内河运输极为疏便。而且四季常青，气候宜人。由于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创造，到了唐、宋之时，它已成为中国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商埠，来往的船帆如云，侨居在此的外商最高达十万人以上，史书有“珠犀如山，花鸟如海，饮食歌舞之盛，过于秦淮”之记载。到了明、清实行严厉“海禁”的时期，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口岸。

就在明、清交替之际，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到了大清帝国走向腐朽衰败的时候，英国及西方诸列强的工业革命蓬勃兴起。1840年，英法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面对集先进性和侵略性于一身的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有三种回应。一种是闭关主义回应；一种是卖国主义回应；还有一种，是既坚决反抗西方的野蛮侵略，又吸收海外的先进文明成果的爱国主义回应。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广州就充当了这第三种回应的前沿阵地、战场和策源地。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三元里人民反帝抗暴；陈开等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统治，举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以25万之众与英帝国主义抗衡16个月之久；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革命风潮不到8个月就席卷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一切，都可以归入第三种回应，都是中国为谋求光明和进步而在这个南国临海城市留下的带血的足迹。

广州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勇于抗争，勇于牺牲，勇于探索的英雄的城市。

而今，也是由于它的历史和传统提供了根据和可能，陷于困境的共产党人将在这里大干一场，以求为自身也是为中国革命在血与火中找到一条出路。

张太雷胸前的金链怀表一分一秒地走向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叶挺、张大雷等人乘车穿过黑夜驰抵四标营。

在团部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叶挺下令除掉朱勉芳等反动爪牙，立即集合部队。

行动小组的王若冰、许恒、连汝瑶和刘玉麟持枪直扑朱勉芳宿舍。门口的两个卫兵未及反应，就被缴了械。从睡梦中惊醒的朱勉芳慌忙抄起手枪，已冲到他床前的王若冰当头就是重重一枪托，朱勉芳“哎哟”一声栽倒在地。四人用膝和掌死死按住。朱勉芳喊：“我没反革命！”他的嘴里立即被塞满棉絮，双臂也被捆牢。四人推着他去团部，他犟着不走。一不做，二不休，王若冰用上了刺刀的三八步枪猛捅他的腹部，许恒也把刀刺进了他的胸口。朱勉芳挣了两下，死了。

各行动小组都干得痛快淋漓。朱勉芳的同伙一营长方际平、三营长樊少卿等反动军官和暗藏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共50余人，被一网打尽，其中15人被押到操场一角处决。被押赴刑场时，王圣夫先是狼声恶气地说：“早知道有今天！”后又乞饶道：“我反动是不得已。如能释放，我要同你们一道

革命。”得到的回答是：“去你的丰都城革命吧！”还有一粒冰冷的枪子。

没有吹号，也没吹哨子。全团官兵静悄悄地向大葵棚饭厅集中。

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人站在用饭桌和长凳临时布置起来的主席台上。

队伍里发出兴奋的低语声。这几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大革命风云人物，现在就实实在在地同他们在一起，而且要率领他们向黑暗势力宣战了。官兵们被一种神秘而崇高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

誓师大会开始了。

张太雷扫视着整齐的队列。官兵们全副武装，他们撕去国民党军队的符号、臂章、及青天白日帽徽，在脖颈、军帽和左臂上各扎了一根红布带，透着革命的气派。

张太雷激情难抑地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举行暴动，解除广州敌人的武装，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你们是暴动的主力，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

他慷慨激昂地号召说，“革命士兵兄弟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了和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旗帜，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死活外，是没有路可走的！起来吧！广州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

没有口号声，但被热血烧红的一张张脸作出了最嘹亮的响应。

“我们行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政权’；明天是‘赤化、土地革命’；十三日是‘肃清、巩固广州’！”张太雷宣布，“现在时间紧迫，请党代表恽代英同志讲话。”

队伍里又掀起一阵感情的涌浪。恽代英是教导团官兵的老首长，曾任武汉军校党委兼政治总教官，讨伐夏斗寅时是中央独立师的党代表，他以睿智的思想，犀利的口才和醇厚朴实的作风，而深得爱戴。他原就患有肺病，如今显得更加消瘦。在这十二月的凉夜里，他只穿件对襟单短衣，下身是白色条纹单裤，赤脚穿双胶鞋。

恽代英面带笑意而口气坚决地说：“官长们，同学们：我离开你们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都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韶关，反动派一次再次缴你们的械，这回我们要举起枪杆，报仇！暴动！跟反动派算账，讨回血债！”

最后是叶挺说话。像以往一样，他的话干练、扼要，字字咬钉嚼铁：“反动派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政权。这次起义，我们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

他以军事总指挥的身份宣布：“现在开始行动！各营各连进攻目标按预订计划执行！依路程远近，分途出发！”

四标营门口三声炮响，耀眼的信号弹升上了夜空。各营、连、排都打出了红旗，齐刷刷地从腰间抽出刺刀、装在枪管上。几十辆汽车的隆隆马达声震得地皮发颤。

1927年12月11日3时30分，整个广州像一头怒狮暴跳起来了！

看到四标营方向升起信号弹，敢死队立即冲出第一公园，率先向公安局扑去。隐藏在龙藏街太邱书院的赤卫队员也兵分两路，一路由四牌楼向北，经惠爱路冲到维新路北口；一路经惠福路冲到维新路南口，对公安局形成钳形围攻。冲在前面的喊着“冲呀！”“杀呀！”“打契弟个落花流水呵！”

并啪啪地放枪。后面的呼着口号一个劲往前涌。进攻的队伍乱了。公安局周围的桂香街、南朝街、西湖路、教育路等街道一下子都挤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梭标、木棍、铁锤、铁尺、斧头、短剑，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叫着，跳着。公安局就像一座在狂风巨浪袭击中飘摇欲坠的孤岛。

敌人醒过神来，公安局门口的两挺重机枪哒哒哒地响了。冲在前面的赤卫队员应声倒地。公安局内的铁甲车也开到马路中央，喷吐火舌；围墙内高处掩体上也射出了子弹。一时间，维新路的路面上弹雨飞进，火光爆闪，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混成一片，硝烟和硫磺刺鼻的气味四处弥漫，进攻的潮水退了回来。

敢死队和第一联队的赤卫队员退到明星戏院附近，依托戏院门前和沿街骑楼的廊柱与敌人对射，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仍然不见动静，公安局的围墙下就成了敌人射击的死角。王春和黄寿领着敢死队，贴墙根摸了上去。门前敌人的机枪像发了疯地吼叫。硬冲不行，就爬墙进去，从里面打掉敌人的火力。围墙高有三尺，黄寿想起舞狮子骑人采青的把式，便喊：“快！骑马上墙！”一个个队员人踏人地上了墙头，顾不上栽在墙头的玻璃刺扎伤手和屁股，纷纷向里投掷土造手榴弹，炸得院内地动树摇，烟火冲天。敌人高掩体里的火力转向了墙头。有人从墙头跌落下来。爬上墙头的人却越来越多。中弹跌落的人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紧要关头，徐光英和叶镛带领教导团第一营赶到了。急促锋利的冲锋号声像一把高高举起的指挥刀在夜空飞舞闪动，指挥着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向敌人倾泻出仇恨的烈焰。这愤怒的声音同人们的呐喊声揉在一起，还有几十辆汽车在附近马路上飞驰助威的马达声，像山洪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士兵们向公安局发起了进攻。他们有的沿墙根向大门进逼，有的爬上墙头往里扔手榴弹，有的在马路上匍匐前进，前面的人牺牲了，后面的人就用胸脯贴着烈士粘稠滑腻的热血继续前进！

铁甲车摇起了白旗。这时，一直沉寂的保安队葵楼上的机枪开火了。它的枪口不是朝向暴动的队伍，而是朝向它对面的公安局大门。暴动一开始，潜伏在保安队团部的地下党员卢瑞球、姚鸿儒便击毙保安大队长李作明，迫使保安队缴械投降。在公安局门前顽抗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懵了。教导团的士兵迅速冲了上去，摧毁了敌人的重机枪，杀进了公安局。此前，印刷工会的陈棠英等人用粗大木头捅穿后门一侧的围墙，冲了进去。敢死队和教导团的人马也以手榴弹开路，从大门两侧的围墙跳入院内。

王若冰领着一个班闯入办公楼。二楼没有人，到了三楼也不见人，推开窗子，正好看见后院有二三十个黑狗向办公楼跑来。“手榴弹！快！”王若冰一声令下，手榴弹从窗口像冰雹似地倾泻下去。黑狗七倒八歪地躺下一片，血水肉浆一块块溅满了白色的墙壁。没倒下的黑狗像是衣裳着了火，鬼哭狼嚎地四处奔散。守在楼门口的教导团士兵冲过去，缴了他们的枪。

王春等敢死队员跳进围墙后，一路搂着火，用铁尺和四个棱的巨大手榴弹砍砸着黑狗的脑壳，一路往前搜索。退到一座小洋房里的黑狗打出冷枪。黄寿感到大腿一麻，接着是剧痛。一摸，“好你个契弟！”满把又粘又热的血，大腿膝盖头都是。黄寿拐着腿往前跑，拉去保险索，把一只土制的四棱大家伙扔了过去。敢死队员蜂拥而上，踢开房门，又往里扔了几个大家伙。黑洞洞的屋里一片哭爹喊娘声。有人拉着哭腔叫道：“大佬，别打啦！工警

联盟！工警联盟！”“工警联盟”是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亏他们还记得。

王若冰听到这边打得热闹，便带人赶来。不料刚拐出一个胡同，就与一股残敌遭遇。这股黑狗也有二三十人，躲在一条走廊里，依在摆放花盆的矮墙后负隅顽抗。王若冰见一个大块头挥着盒子枪张牙舞爪地叫嚷，知道是个头子，屏气静息瞄准只一枪，就打得他一个大翻身。其余的黑狗撒鸭子便跑，迎面撞上了闻风而来的敢死队，又像没头苍蝇钻进侧旁的胡同。两班人马合在一起，高声喊杀地往胡同里打枪，敢死队又要往里扔家伙。胡同里传出投降的告饶声。黑狗们也够惨的，几乎都只穿着衬衣短裤，有的精赤着身子挂一条子弹带。

这是一条死胡同。胡同尽头横七竖八地搁着桌子和板凳。据俘虏说，枪声一响，当晚留宿公安局的朱晖日就从这里爬墙奔命了。

众多赤卫队员拥向监狱。他们用铁锤狠砸铁锁、窗栅，抡起十字镐在墙上挖洞、撬水沟的窰盖；性急的上了房，揭开屋瓦往下放绳索。800多名饱经折磨的政治犯被解救出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共产党员、革命工会骨干和黄埔军校学生，他们的头发又长又脏，衣裳褴褛，身上伤痕累累，有的被打坏了腰椎和腿骨。他们砸断了脚镣。

军械仓库也砸开了。四五百支步枪和大量的子弹、手榴弹被搬到院子里。赤卫队员们扔下木棍等原始武器拥上去争领枪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们也领到了武器，系上红布带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公安局内外已是一片胜利的沸腾之声。握手，拥抱，欢呼，抛掷帽子和顺手拿到的什物，有的人被高高地抬了起来。远远近近的枪声、爆炸声、呐喊声，汇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广州的天空在熊熊燃烧。

有人唱起了悲戚而雄壮的《国际歌》。所有的人都唱起了《国际歌》。大暴动这场大剧的主题伴着歌声升腾弥漫。

这是一幅世纪末的情景。

这又是一幅创世纪的情景。

是夜，陈公博没回他在东山的寓所，而是跑到了广九铁路附近的葵园去住。葵园在东堤马路的尽头，是香港一陈姓商人的私宅，当时借给汪精卫享用。是因为条件舒适优雅吧，汪精卫不在，他陈公博就来享用。上床不久，就听到北面传来几记枪声。继而像爆豆似地响作一片。陈公博大惊，急忙打电话找黄琪翔，但电话不通。

几乎是在同时，同住东山黄琪翔住宅的张、黄两人都接到了告急电话。张发奎接到的电话是：“北较场教导团驻地有枪声发作，情况尚不明！”黄琪翔则接到报告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大概是共产党搞暴动！”欲问详情，电话已中断。黄琪翔欲下楼，正遇张发奎跑上来。张发奎顿足高嚷：“不得了！不得了！北较场教导团反了！反了！”

对所闻共产党要于12月13日组织暴动，他们已下令往广州调兵，并收缴教导团的枪械。他们没想到暴动会提前。突如其来的情势使他们慌了手脚。

张发奎和黄琪翔急忙跑到二沙头颐养园，找到财政厅厅长邹敏初，由他从小上游艺会借一艘小艇，一同往河南找李福林搬

陈公博是个文官，手中没有兵权，身边只有四名卫兵，此外还有葵园的一个排宪兵。宪兵是否可靠，是否与叛军暗地里有勾连？他又疑心重重。找不到黄琪翔，他显得六神无主。外面的枪声更加稠密了，而且在向长堤蔓延。他不停地给四军军部打电话问东问西，好像同军队有一根电话线牵着，心里

就稳当。也好像是为了了解局势来据此判断自己的命运。

“现在怎么样，情况判明了吗？”陈公博问。

“还没明了。现在已有几十个人在外面攻军部，我们士兵正在门前接火。”四军军部的参谋答。

“什么人？”

“夜里看不清，大概是工人。”

“有穿军服的没有？”

“好像有些穿军服的。”

“军部能够支持多久？”

“不要紧的，他们断断攻不进来。”

陈公博抱着电话不放。但不知是对方嫌烦，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电话又中断了。

暴动打响后，叶挺亲自指挥扑击四标营以东远郊沙河镇敌步兵团和燕塘炮兵团。

这一路从军事角度讲至关重要。一则，沙河是东北方向进入市区的交通咽喉，也是广州通往海陆丰苏区的必经之地；再者，炮兵团有一批威力强大的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如缴获过来，能极大地提高起义部队的攻击力，反之将是极大的威胁。

团长李云鹏率第二营和炮兵连第一排跑步东进。将到沙河镇时，叶挺跃上路边的斜坡，以指挥鞭指着进攻方向，压低声音激励部队说：“赶快，赶快，天快亮了！”

夜色中有人问：“他是谁？”得到的回答使官兵们勇气倍增：“铁军叶挺！”这是每个人的自豪和骄傲，是拱涌在每个人血液和肌体中的激情和力量。

到了步兵团驻地，官兵们以霹雳雷火之势一阵猛冲猛打，迅速占领了有利位置。敌人未及反抗就被打成了一滩稀泥，黑地里满是嚎陶之声和蹬蹬蹬的奔跑声。还可以听出有人摔倒在地上被后面拥上来的脚步踩踏得又尖又涩的哭声。只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俘敌600余人，并收缴了一批武器。

凶狠，利落。这是叶挺的风格，也是叶挺部队的风格。所谓“将吏士卒，动静如身”。

拿下了敌步兵团，叶挺即又指挥部队直捣燕塘敌炮兵团。

炮兵二团在团副黄克白和第八连王指导员等地下党员的策动下宣布起义，转而配合攻打炮兵一团。

接近敌炮兵一团营地附近时，敌人正吹响紧急集合号。教导团炮兵连连长李竹修率尖兵冲到营门口，命门卫缴枪，见门卫欲端枪反抗，他抬手便打。就在这一霎那，李竹修的手枪卡壳了，而敌卫兵的枪响了。李竹修中弹牺牲。营门随即被敌特务连和平射炮连的火力封锁。教导团部队迅即散开，将敌炮团包围，组织力量用手榴弹开路，高喊着“缴枪不杀”、“打倒新军阀张发奎”，向营门发起猛烈的进攻。

是时，敌炮兵一团大部已配属各师开往前线，留守的有一个营和几个直属连队。团长李恒华昨晚进城寻欢作乐，深夜始归。参谋长张光则未归宿。在突至的打击下，李恒华仓皇失措，爬出后窗口，钻入荆棘丛，企图向白云山逃命。营区内大乱，守在营门口的特务连和平射炮连也被打得溃不成军。混乱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老乡，别打啦；缴枪喽——”这极富号召力的喊

声，就像开会要对死还是要活进行表决一样，立即得到各个角落里的响应。反抗的枪声戛然止住，剩下的就是一条声的“老乡，缴枪喽——”

战斗结束后，叶挺命令李云鹏：留下五连看管俘虏，并向广汕公路方向警戒；缴获的大炮清点后，由炮兵连押解进城，听候调用。并派了一个叫梁大浦的朝鲜人负责炮团的技术指导。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是一个有名的炮兵专家。布置完毕，叶挺又对燕塘周围的地形作了一番巡察，便乘车去维新路公安局。

当沙河与燕塘的一千余名俘虏集合在大操场上时，天已破晓。未走脱的李恒华也在其列。炮兵团的一些下级军官原是武汉军校的学生，见到教导团的熟人，苦笑着点头打招呼。俘虏们主动要求协助暴动部队打扫战场，他们从马棚里牵出牲口，套上炮车，共拉出山炮30门，野炮4门，重迫击炮数门，一色的日本造。这些外部涂着土黄色的漆、很适合于北方伪装的炮，原是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其走狗奉系军阀的，武汉北伐军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由投降的奉军炮兵旅长富双英携带而来。此外，还缴获了一批马枪和弹药。

炮兵连押着炮车和俘虏向广州开拔了。沿途围过来看新鲜的男女老少激动地鼓掌，拼命地呼革命口号。官兵们也振臂而呼。到了市区，炮车被围得简直是水泄不通。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六匹马拉着的巨大野炮那样神气十足。

陈公博再打电话总是不通。他有一种无依无托的“空”的恐惧。他的心情就像走在高空的钢索上往下看一样，他没练过这个，只感到一阵阵地耳鸣目眩。

没有别的办法，他就一锅一锅地抽着吕宋大烟斗，拼命地想：这黄琪翔和张发奎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对这样惊心动魄的动静就一无所闻？他们至少应有一个在军部，而且最低限度也应派人来向我报告呀！一会儿又拼命地揣摸：暴动的人既然已从城里跑到长堤攻四军军部，可见已占领了城内的一些机关，最低限度也是在分袭各机关。工人里头夹杂着穿军装的，可见军人也叛变了。想到这里，他又赶忙自语道：“攻打军部不能只来几十个人，这说明他们的力量是脆弱的，也说明军队没有全部叛变”。

他肯定地给自己点了点头。

陈公博一刻也不停地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焦愁耽忧，其所有的行动似乎只有一个“想”，拼命地“想”。主要是“黄琪翔和张发奎跑到哪里去了？”想呀想呀，东方已露出冰冷的曙色。他这才想到还有逃跑这一说。于是，赶紧把那身从实质到外观都如同戏装的军服脱下，换上了另一件戏装：大棉袍。

按照暴动计划分途攻袭各路目标的部队纷纷奏捷。

袭击薛岳司令部是与沙河战斗同时打响的。薛岳司令部的三层大楼坐落在东较场西北不远处，楼南驻有该师特务营，营区围着篱笆。当教导团炮兵连第三排经过特务营时，敌哨兵上前询问口令，在得到回答后，便以惊异而呆痴的表情目送扛着红旗的队伍匆匆而过。司令部大门口悬着强光灯泡，把大门内外照得通亮，四个门卫分站两边。暴动分队到达即散开向营内射击。门卫接着枪贴在墙上，除了避开子弹，什么也没干。营区内赤脚赤膊的敌人惊惶失措地跑出寝室，打个愣，又争先恐后地跑回屋子，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腩地钻到离地尺余的地板下面。暴动分队从仍在发愣的门卫手中夺下枪，冲了进去。各寝室的枪架上整整齐齐架着一排枪，地板前整整齐齐摆着一排屁股。这场战斗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暴动分队又迅疾控制了司令部值

班室，恰值四军军部打来电话。问：“你们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答：“已派值班分队巡查去了。”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已占领电话局的工人赤卫队打来的。不多一会，开来三辆卡车，系着红领带的赤卫队员运走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以及大批枪支弹药。

二营六连和炮兵连一个排向南横扫。炮兵排攻打国民党省党部和一个警察分署，这场战斗一枪未放，只是告诉从梦中吓醒的官老爷和黑狗，他们现在的身份已经是俘虏了。六连再往南奔袭广九车站。接近广九车站时，驻扎在这里的保安队和英军各一个中队已作好准备，遂爆发激烈的战斗。久攻不下，六连便向炮兵求援。正经过黄花岗向市区开进的炮队即派来了一门山炮。当时打炮很有意思，就像过年放二踢脚一样，附近的士兵都围拢过来，看装弹、瞄准，发弹时捂着耳朵躲开，眼光都随着炮弹跑，如果打中了目标，大伙儿便开心地又喊又跳，甚至一拥而上，把炮手抬起来往上抛，以示嘉奖。没击中也鼓掌欢呼，那一声巨响就够刺激的。这时全无危险之虞，因为通常对方没有炮，互打炮仗的情况极少，且架炮位置在对方枪击的有效射程之外。这门山炮不负众望，只打了三炮，就有一炮轰塌了车站一面墙壁，吓得敌人慌忙钻进铁甲车向石龙方向逃遁。于是一路欢呼到车站。

教导团第三营的任务是收拾位于城北的省长公署，然后占领观音山。守备省长公署的敌人不多，他们关上铁门，依窗持枪像是要战斗的样子。三营喊了声“缴枪不杀”，枪就从窗子里扔了出来，门也打开了。三营即赶往观音山。

警卫团的任务是攻打位于南堤肇庆会馆的敌四军军部、仰忠街的四军军械库和文德路第十二师留守处。等到四标营发出信号，团长梁秉枢当即宣布起义。团参谋长唐继元是个反动的家伙，见势不妙，拿起电话想给军部告密，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陶铸夺过电话，就地处决。十连连长黄霖等几个反动分子也被处决。因驻守观音山的第一营营长张强光抗命，梁秉枢决定亲自前往处理，命陶铸继任参谋长，率部攻打既定目标。梁秉枢赶到观音山一营营区门口，被门卫击成重伤，双方激烈交火。未几，教导团三营赶到，会同警卫团起义部队攻占了观音山，控制了全市的制高点。

随后，三营一部又折向城南奔援攻打四军军部和军械库的警卫团部队。

陈公博挺鬼，他先派了一个勤务兵去探路。回来报告说：通往四军军部的东桥桥头插了一面红旗，有十来个穿便衣的把着。这时宪兵们都站在门口，可谁也不拿枪，只是把手插在裤兜里东张西望。看样子即便不暗通叛军，也指望不上这帮人。军部是不能去了。陈公博一横心，带上手枪和50发子弹，决定过江。为了缩小目标，他只带了一名勤务兵。

到了江边，十几个渡艇上的“晁家婆”都不肯摆渡，说半途如遇上兵舰开枪，怕保不住性命。陈公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下一艘小艇，一手举枪，一手掏出了10元钱。“我记得那次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用暴力”，后来他这样回忆。

陈公博在河南的康乐岭南大学码头上岸了。他想先到大学打个电话，又怕教授和学生们折腾他，便沿着凸凹不平的土路向李福林第五军军部海幢寺走去。

此时，李福林正在给张发奎冷脸子看。

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公安局大门前悬挂起“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一面闪烁着镰刀锤子的大红旗在办公楼顶端猎猎飞展。往日阴森黑暗的这座阎王殿此时被红旗照亮，聚拢到这里的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兴奋、自由和喜极而悲的气氛中。

张太雷、叶挺、浑代英、黄平、周文雍、吴毅、杨殷、陈郁、聂荣臻、黄锦辉、徐光英等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都系着红领带。共产国际代表纽曼，苏联领事馆的哈西斯、乌科洛夫也来了。

6时，在中楼楼下的会议室里，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他身穿草黄色呢子军装，开岔皮带，绑腿，咖啡色皮鞋。坐在他对面的叶挺穿一身黑色西装，打一条黑色条纹绸领带。周文雍穿的是宝蓝色长布衫。他们一个29岁，一个31岁，一个年仅22岁，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都年轻、有力，生气勃勃。

会议开始了。张太雷站了起来庄严地宣布：

“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30多位与会者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3名外国同志离座与大家握手致贺。

张太雷接着说：“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可说是受了光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像海潮一般汹涌澎湃，蓬勃发展，英国几十万人罢工，中国的省港大罢工，都对世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说：“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一天天壮大，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一天天削弱。英美争夺海上霸权，正在‘海缩会议’上争吵不休，矛盾在加剧。这正是我们起来革命的好时势！”

张太雷最后说：“中国工人阶级处在几重压迫之下，身受的痛苦太多太重了！今天要挣脱枷锁，砸碎镣铐，扬眉吐气，抬头做人，做新社会的主人！同志们，我们开始了！”

早晨的阳光透进了会议厅。

随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并决定以广州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的名义发布《广州苏维埃宣言》：

一切一切一切工农同志们：

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赤卫队和教导团联合夺取了公安局及一切政府、军事、财政机关。城里几次次要的地方尚在肃清中。红军用他在公安局夺取的铁甲车、机关枪、大炮解决各反革命的反抗。

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在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

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你们的胜利，为世界革命为你们的领袖第三国际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们，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驱逐黄琪翔、张发奎，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与李济深、黄绍竑一样。应该逮捕和枪毙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这是我们在贪脏受贿的国民党指导之下不能做的，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才能做的。

同志们：

广州苏维埃在他的第一次会议中有下列的决议：

一、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

二、苏维埃的武力：组织三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革命方面的军士组织而成。

三、为保护苏维埃，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下级革命军官应该到红军中去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派。在最近几天至少应该组织 5 万红军，我们所有的战利品可以武装我们的红军。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志愿的革命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的腰包服务的，是为给米予工人吃，给土地予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广州工人们即刻来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四、应该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为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

五、应该即刻给工人 8 小时工作制。

六、没收一切大资本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

七、苏维埃政府应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其需要若干，先由各自工会制定预算并报苏维埃核发。

八、苏维埃宣言：维持并增加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利益和特权。

九、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才有一切自由的行动，什么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和什么国民党自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其实是反革命的工会），应该即刻封闭。他们这三个工会领袖不是工人，而是白色恐怖的走狗，应该扣留起来即刻枪毙，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工会改组委员也应枪毙；至于在这三个工会下面的简单工人，他们反对他们领袖的，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同我们做一样苦的工作，得同样子的工钱，因此，我们不追究这些工人，并且希望这些工人即刻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

十、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他的一切组织应即取消，若是为国民党宣传的，应该受革命的裁判。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是革命党。以前工人依重国民党，现在还有很大的敬重于国民党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他是帝国主义的仇敌，人民的朋友，虽然他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蒋介石 4 月的政变和汪精卫 7 月的政变以来，国民党完全变成了反革命、帝国主义的工具，枪毙工人、农民，欺骗士兵，真是国民革命的叛徒。国民政府的军队是拿来保护资本家、地主和富农利益的，他们的领袖南京派和张发奎都是一群不革命的、强盗的、压迫的和杀人的反革命分子。因此，现在还在国民党内留着的工农兵应该即刻退出国民党，依靠着惟一可靠的苏维埃政权。

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在广州有伟大的胜利，但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而且到处还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用我们最后一点的热血，保障广州苏维埃的政权，我们应该解放全广东和全中国的被压迫民众，我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帮我们。三千万农民开始全广东的暴动，一致与他们前进，依靠广州英勇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我们的胜利，将是不可估量的。

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朱晖日！

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工人、农民革命万岁！

共产党、共产国际万岁！

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万岁！

会议正开的时候，系着红领带的贺诚来了。他兴冲冲地说：“我们四军

军医处参加暴动啦！我是特地来报告的！”贺诚已领着军医处的人杀死了胖处长。张太雷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太好了！革命正需要自己的医生。”又有人进来说，在南楼的夹道里有一具“白俄”的尸体，问怎么处置。叶挺命秘密埋掉。

朱晖日的办公室被重新布置了一番。昔日那些丑恶、肮脏的威严和法度，教养和傲慢，统统被当作垃圾，用扫帚和畚箕清除掉。还有其它的办公室，它们被改变了性质，迎接新的主人。

广州苏维埃政府会议室、办公室和工人赤卫队总部设在中楼，工农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北楼，南楼是办公室、苏维埃警卫连连部及发放宣传品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一系列机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还组建了财政处，秘书处，红军编导处以及粮食队，救护队，宣传队，交通队和运输队。

中共广州市委设在明星戏院，广州工代会设在学宫街渭滨书院。

受压迫，受奴役的人们挺起了腰杆。

他站立在痛苦的黑色基石上，背映着血、火焰和早晨的阳光调拌在一起涂染的天空，像烧得暗红的铁板一样的天空。他劈开双腿，举起双臂奋力一挣，天地间爆发出一声金属迸裂的巨响，他挣脱了血迹斑斑的锁链。他掀开了人吃人社会的沉重墓盖，扑向弥漫着青草和鲜花气息的空气。他贪婪地吮吸着，尽情享受当家的自在与荣耀。

他挥舞拳头，放开嗓门，拼命地释放着内心的欢乐，拼命地释放着积淤在胸中的郁闷和愤怒。

他几乎什么都还没有得到。就像在节日中一样，他享受着的是自己的意志、想像和心情。

公安局门前一片喧沸。缴获敌人的枪械从各处一车车运来，众多的赤卫队员和老百姓在争领枪支。从维新路到惠爱路，排列着卡车、马匹、小汽车、粮食等战利品。地上有血迹和鞭炮的碎屑。穿着破衣烂裳的农民自卫军到了。烈士的遗体被轻轻地抬到汽车上。红旗飘舞，绣着双龙戏珠或丹凤朝阳的大红被面在哗哗飘舞。一批批俘虏沮丧地坐在街道两侧。小孩把三角小红旗插在领后，像京剧中的将军有板有眼地练着把式。腕上还戴着断镣、脸黑得像煤矿工人的“政治犯”与寻来的亲属抱头痛哭。登记赤卫队名册和领取银元的地方人头攒动。有人抓着棍棒石块扳着一个个俘虏的下巴寻找仇人。街道上方拉起一幅幅横标，墙壁刷上了革命标语。满街的人波动起来，押解炮车的队伍到了。人们的脖子上都系上了红布条，其中有孩子和老太太。人群中忽起骚动，有人在暴喝着追逐什么人。挑担子的拎篮子的送来了香气四溢的红烧肉和白米饭。曾经镇压过革命者的罪犯被指认出来，死得更惨，死在石块和愤怒的拳头下，还要被人踩踏、被人唾骂。赤卫队的大小负责人、交通员川流不息，有的来报喜，有的报急。改作宣传用的铁甲车开过来了，宣传队员站在上面敲锣打鼓，散发传单，拿着马粪纸糊的喇叭高唱。更多的人在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我们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杀绝敌人！

我们前进，我们奋斗；
我们暴动，我们胜利！
推翻那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
一切权力归于我们工人农民兵士！

一曲唱罢，人们鼓掌，欢呼。

“苏维埃万岁！”

“广州苏维埃政府万岁！”

从维新路到各主要街道都悬挂起了这样的巨幅横标。

“苏维埃是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走，看看去！”人们对“苏维埃”这个舶来的名词并不清楚。于是，有人凭着自己的理解说：“嗨，这还不知道，苏维埃就是苏兆征嘛！工农兵政府主席苏兆征！”这也没说对。然而，就其对问题赋予的实质内容而言，却也不见得就不对。

叶剑英穿过嘈杂的人群走向公安局。他身穿工人服，戴一顶鸭舌帽。

凌晨，他接到四军军部的电话。电话中说：“广州有人暴动了！”叶剑英克制住兴奋的心情，沉静地说：“叫教导团派两个连去对付？”对方急火火地说：“暴动的就是教导团！”放下电话，他便到地下交通李运全家中换上一身早已准备好的工人服装。

到了公安局门口，正在卡车旁发枪的黄平看到了他。黄平领他进了办公楼。

在军事指挥部里，叶挺正聚精会神地伏在一张广州市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圈画着符号。徐光英、聂荣臻、黄锦辉站在一旁。

见到叶剑英，大家热烈地握手。他已被任命为副总指挥。

叶剑英轻捶叶挺一拳，埋怨道：“老兄，这么大的事怎么不通知我呀！”

叶挺笑了一下：“大佬，我也是在几个钟头前才知道的，怎么能通知到你呀！”大佬是大哥的意思。叶挺把地图推到叶剑英面前，准备向他介绍整个局势。这时，通信员送来了一份传单：《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

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势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东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这次暴动。12月11日晨4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队，用手枪、炸弹、长枪等，占据了一切反动政府的机关；许多革命军队，占据了广州一切军事要隘。现在我们已经占据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及粤汉、广三、广九三车站。其他要项机关，尚在肃清中。市上发现用红纸红布书写之种种标语，多写“工人要饭食，农民要田耕，大家要太平，谁给与我们，惟有工农兵苏维埃！”

这个传单显然是事先写好的。

“说得太乐观了一点，四军军部等处到现在还没打下来么。”叶挺沉吟片刻，舒展开眉头对叶剑英说，“你看，这就是一夜发生的变化。工人兄弟的功劳可不小呵！”

激动人心的大围猎

叶挺将地图挂到墙上。地图上的红圈不断增加。各路赤卫队的胜利消息仍然是纷至沓来。

凌晨3点30分，就像是谁划着一根火柴丢进了灌满煤油的沟沟槽槽，暴动的滚滚烈火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燃遍了大街小巷。埋伏在各处的赤卫队向各区警察分署、保安队、火车站猛冲猛扑过去。

第一公园前模范汽车公司、天字码头对面汽车工会、西瓜园国民汽车公司前响起惊天动地的轰鸣，几十辆汽车全部开足了马力，呼啸着驰抵四标营。载上教导团的官兵，又驰返市区。

“金山”号轮船上的何振武等人在右臂上缠起红布条，扑向通道、梯口，不放走一个有可能给敌人通风报信的人。急得英国老板敲响报警钟，大叫大嚷。

手车夫冲出了禺山市场酒楼茶室工会的会址。石喜高喊“工友们！跟我冲呀！”喊声随之连成了一片：“冲呀！铲平警察局！”“报仇呀！打黑狗呀！”途中，他们与学源里涌出来的一支队伍汇合。冲到永汉南路如茶楼时，从高第街杀出的沈青一支人马已与敌人交上了火。沈青、石喜、李沛群、冯苏，黑压压的人群一个劲向前冲，冲垮了警察分署，有的人忙着收缴枪械，有的人去追杀逃命的黑狗。冯苏掂着一支步枪喜滋滋地说：“抓车把的抓枪把，顺手。”李沛群也掂着一支步枪：“车把手抓印把子才更有意思呢！”

徐向前率领队员们冲上去了。陈功武冲上去了。刘楚杰、刘昌、黄益华……密密麻麻的人群汇成了狂飙，扫荡着一个个的警察分署。周福中弹倒下了，施展接过红旗和炸嘴枪往前冲。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黑狗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满世界乱跑，恨爹妈只给了两条腿。街巷里到处是喊打喊杀声，枪声和刀棍的砍击声，咚咚的奔跑追逐声。有的黑狗把枪扔了，把黑皮扒了，可他并不认为他就不是黑狗了，还是拼命地跑，直到自投罗网。一个跑入漆黑死胡同的黑狗紧紧贴住墙，屏住呼吸，他根据杠子打来的风声忽儿闪避，忽儿下蹲，本来是扫在腰上的杠子却打在了头上。一棵树的树冠像经不住寒冷似地抖战，有几个人举着尖串像收获抽子一样往树上捅，那上面有个紧抱着树干吓得就要掉下来的黑狗。阴沟洞里发出嗡嗡的嚎陶之声，有个黑狗栽在洞口像大虾一样拼命往外退，他原想钻得更深，但这会儿有人在按着他的屁股硬往里塞。

这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大围猎。这比围捕受惊的山兽要过瘾得多。这能获得一种咬牙切齿而又淋漓尽致的快感。

曾伟赞带领队员们冲出将军庙，直扑粤汉车站。在水塔附近的铁路工会小楼扑了个空，又扑向如意坊附近的路局大楼。敌人依窗射击。手持长矛大刀的赤卫队便发起攻心战：“喂——路警兄弟，你们被包围啦——！”枪声变稀了。又喊：“缴枪不杀！”警长朱荣升回话了：“各位工人兄弟，高的手，唔好打。请曾车长上来答句话。”曾伟赞高视阔步地单刀赴会。朱荣升把电灯扭亮，哈腰说：“曾车长，小弟不知是纠察队的兄弟回来，误会，误会。”曾伟赞说：“废话少说，把人集合起来！”朱荣升转身便喊：“集合集合！丢那妈，还不快点！”路警站好队，听曾伟赞训话。“你班契弟都抵死！纠察队返来了，还敢开枪打？给你八个大洋一个月，买烟仔都不够，就同人家卖命？架枪！”于是就架枪。朱荣升的手枪没法“架”，便“搁”。

攻打石围塘火车站的第六联队和南海县农军，在赵自选、周侠生等人率领下，从大小窝、水蛇围、荔枝基、杨桃基等处杀将出来。石围塘火车站位于白鹅潭西南岸，是从西南方向出入广州的要地，驻扎着李福林军、路警、机器工会的500余人。在暴动队伍夹击下，几路敌人像箩筐泻蟹似地溃不成军，有的夺路而逃，有的被击毙，有的束手被俘，有的登船逃跑被挤落水中淹死。两支暴动队伍在火车站胜利会师，相识与不相识的人热烈地握手，拍打和拥抱。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笑呵呵地向黄寿举手致意：“各位兄弟！不知望了许久，今天大家终于打回来啦！”此人不是李栋吗！工会不少人都因这小子的出卖而被捕牺牲。黄寿眼冒火星。险遭其害的火车司机黄威大喊“丢那妈，叛徒！”边喊边抓扑上去。体健擅武的李栋一掌把瘦小的黄威打倒在地，拔腿便跑。黄寿抽枪便打。黄威爬起来边打边追，但他的土制小左轮似乎没什么准头。李栋越跑越远。这时斜刺里闯出一个农军，黄威一口咬住左轮，从农军手中夺过马枪，来了个跪姿瞄准，只一枪就结果了这个叛徒。

花县农民军经过几个小时急行军赶至市区，一举攻下省政府，抓捕了血债累累的省政府议员、花县大恶霸地主冼少甫，就地正法。

天亮时，拿下预定目标的赤卫队有的去公安局领受新任务，有的直接奔向枪声密集的长堤援战。

张发奎、黄琪翔等人一到河南，张发奎就做出要投江自尽的样子。黄琪翔拉了他一下，就没跳。他们到了海幢寺第五军军部，但李福林不在军部，他平时喜欢住在乡下的大塘村。只好步行去大塘村。

此时他们的形貌委实狼狈。张发奎的眼角、鼻沟处凝结着盐渍和混浊的粘液；黄琪翔穿西装却没打领带；邹敏初套着夹猴，胳膊窝里夹着一件长衫。李福林对着他们这幅窝囊相故意挤鼻子斜眼，还把汪精卫利用共产党力量赶走桂军的蠢招损了一通。张发奎紧催李福林出兵“靖乱”，李福林只是态度暧昧地说：“不要紧的。”

李福林曾是土匪头子，别号李登同，绰号“灯筒”。传说一次闯入民居抢劫遇到抵抗，因手里没有武器，就顺手操了个熏黑了的灯罩权当巨大的枪口吓唬人，居然成了事，便得此绰号。李福林拥兵坐镇河南，他只管他屁股底下的那块领地，别的一概不问。而且，他手下的匪兵抢杀老百姓还行，打仗不中，因此有“豆腐军”和“三武鹅五”之称。他的一兵一卒得用在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张发奎赶走李济深，他就立马归顺了张发奎。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愿受张发奎的调遣。

张发奎和黄琪翔连哄带骗，比如许以多少规、饷、权、缺，李福林就是没松口，只答应去军部再作计较。李福林早上要遛弯，就一道步行去海幢寺，总归是你急我不急。

与院子里及院外街道上的沸腾场面不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里是一派紧张而冷峻的气氛。军事指挥员们在研究局势，指挥各路暴动队伍向纵深推进，以扩大战果。

叶挺一手执电话，一手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他放下电话，敲敲地图，扫了周围的人一眼。大家凑拢过去。从地图上标示的情况看，敌四军军部、军械处、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团部等处仍未攻克。叶挺在四军军部的位置又重重地画了个蓝圈。

四军军部所在的肇庆会馆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背倚珠江，易守难攻，铁栅门外及附近建筑物上也筑了工事，街道要口也设置了路障。而

且，卫队每人都携有手提式自动枪，武器精良。门前大街上还停着一辆铁甲车。由于从四标营等方向听到枪声，卫队已在窗口和阳台上戒备，警卫团一到，便被猛烈的火力压住，造成了一批伤亡，身先士卒的九连连长王如壮烈牺牲。不久，教导团三营赶到，但队伍尚未展开，铁甲车就开着重机枪迎头冲上来，九连伤亡甚大。起义部队于是改从城隍庙、致美斋一带侧攻，依仗街道两侧的廊柱和楼房窗子与敌对射。手车夫冒着弹雨呼呼啦啦送来了装满沙包的手车，作为活动掩体。

已经发起过四五次冲锋了。敌人的步枪、机枪子弹像夏天的暴雨泻在马路上，掀起一阵阵灰沙。沿江的树木被削得只剩下树干。战士们前赴后继，浴血拼杀。阵亡人数在增加。

红军总指挥部决心吃掉这个顽固的据点。

叶剑英对四军情况和广州地理情况比较熟悉。他命令李运全设法与四军军部联系，要他在四军当副官的堂弟叶简修迅速行动，组织已争取过来的人从内部策应，最低限度也要退出来，以瓦解敌人的军心。又命令炮兵连长唐虞率人到观音山，先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再在山上架炮，轰击四军军部。

叶挺也命令梁大浦率炮兵轰击尚未攻下的十二师留守处和紧挨着它的李济深公馆。叶挺嘱咐说：“你们开炮时，可不要损及附近的房子。”

他还督促曾干庭加快收编俘虏，命何振武带人到东较场军械库搬运武器，安排救治警卫团长梁秉枢，下手令向商人征粮……叶挺冷静、果断地处理着繁杂的事务。纽曼说，他打算向海参崴发个电报，通报广州暴动情况，并要求能派船来支援。叶挺即命李云鹏领纽曼去已占领的无线电台。

其间，叶挺与徐光英还驱车到市区各处巡察。叶剑英去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后又去文德路城隍庙等处指挥作战。

叶挺来到第四军医院时，贺诚正在组织救治送下来的伤员。一些女学生见到血肉模糊的伤口，双手哆嗦得不听使唤。叶挺鼓励她们沉住气，说经过锻炼就不怕了。叶挺看到了警卫团长梁秉枢，关切地向他询问了负伤经过，嘱咐贺诚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军械库离这里太近。

张发奎、李福林等人到了海幢寺，惊魂甫定的陈公博已候在那里。陈公博劈头就冲张发奎和黄琪翔说：“怎么你们也来啦？”黄琪翔面朝李福林道：“今番我若不来，连我都要被先生疑为共党了吧？”李福林笑曰：“不错。凡事不要说让他人相信自己，就是自己信自己也不是容易的事呀。”陈公博又问教导团既已缴械，为何又把枪发还他们。回答说这是参谋长叶剑英的主张。这又让陈公博惊了一把。但他却相当英勇地对李福林说：“登哥，请你速派两营人过河，我和向华都可以指挥。我担保半日之内就可把暴动镇压下去！”为了套近乎，他以李福林和张发奎的别号相称。

“灯筒”看猴似地瞥了“大棉袍”一眼，说：“潘枝团远在北江，目前河南实在是无兵可调。”

几个人急了。张发奎问：“河南连一两个营都没有吗？”

“即使有，战斗力也不强，”李福林说话也有水平，“万一出个岔子，连河南也保不住！”

磨磨叽叽车轱辘话说了足有一小时，李福林还是李福林。张发奎等人无计可施，又不敢发作，只好舍近求远，拟发两封电报，一个给在肇庆的许志锐，一个给江门的邓龙光，要他们马上回师攻扑广州。邮电局已被暴动队伍

占领，就派人去沙面租界拍发。

就在这时，机器工会头目李德轩和海军处长冯肇铭来了。冯肇铭报告，“宝璧”、“江大”两艘军舰已抵士敏土厂码头听命。海军没“叛变”！这使得两眼一抹黑、相互之间都心存猜忌的张发奎、陈公博等人喜出望外。年轻气盛、情绪极易大起大落的张发奎陡然来了精神。他果断地“命令”李福林扼守河南，又叫李德轩派人潜往市区各据点，传达反击的命令。同时，命令前线经过重新整编的四军5个师：

一、东江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立即率部回广州，扑灭共逆；

二、西江缪培南之十二师并二十六师七十八团立即回广州讨共，余部由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指挥，继续与桂军对峙；

三、南路薛岳的教导第一师之一、二团，由副师长邓龙光带回南石头附近，由黄琪翔指挥，与讨共各部协同作战；

四、南路教导师之第三团及四军独立团，继续在单水口和江门一带对桂军设防。

李福林见状也向他的部队下了命令。

命令下达后，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等人即登舰实施反扑行动。

如同蒋介石一样，张发奎也撅起下嘴唇，刻意摹仿外国将军的姿势，手扶船舷，目视远方作沉着镇定状，作深刻博大状。

暴动队伍继续在沿珠江的南堤一线艰难地扩大着战果。

“南堤小憩”背临珠江，面向交通要道，是国民党军阀吃喝嫖赌，消闲寻乐的地方。时近中午仍久攻不下。这地方也只能继续硬攻。汽车司机罗炳等人琢磨出一个硬攻的高招。他们找来一辆大货车，用沙包在车上构筑了工事，上去十几个人，在尾部朝后架起三挺机枪，还带上几十颗手榴弹。罗炳发动了汽车，慢慢倒至丁字路口，拐过弯猛地一踩油门，汽车倒退着向敌人据点疾冲而去。车尾的三挺机枪抖动着喷出仇恨的烈焰。教导团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在马路两侧跟进。敌人疯了，车上的沙包被打得哗哗直响，路边的水泥柱铮铮地冒烟。车上有人中弹。消灭这群王八蛋！罗炳血脉贲张，把稳方向盘向敌据点逼近。近了，又近了，还有二十米了，车上的人劈头盖脸地把手榴弹砸过去。敌人的机枪哑了，楼里楼外浓烟滚滚。这时不知从哪儿涌出那么多人，像海潮一样扑向敌人据点。也许是敌人发信号求救了，一艘外国军舰靠过来接走了残兵败将。

中央银行大楼位于长堤大街的北面，身后是挤在一起的民房，左右两侧是店铺，只有南面临街，守敌据势负隅顽抗，且有附近机器工会守敌的火力支援。教导团无屏障可据，只能背朝江面，伏在岸沿与敌对射。战斗成胶着状态。沈青带着赤卫队员闻讯赶到后，挥舞着缴获来的指挥刀喊道：“马上找沙包、木桶做障碍物！快！快！”米店的工友飞快回去背来几捆麻袋，到无线电局后面的铁塔下装满泥沙。石喜和冯苏找来几部手车，把沙包堆上去。教导团的士兵就仗着这种土“坦克”发起了新的进攻。土“坦克”越来越多，很快达至一百多辆，进攻场面十分壮观。机器工会也被炮兵打得缩起脑袋。起义部队终将中央银行攻克。

敌十二师留守处与李济深公馆相邻，守敌以机枪把守大门，并在楼顶拼命扔手榴弹，用密集火力封锁了狭窄的街道。教导团的战士抱枪在弹雨硝烟中一路翻滚向前，接近大门时猛然翻身而起开枪强攻，由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下，不少人壮烈牺牲。

梁大浦带人把一门山炮和五发炮弹拉到城隍庙。经目测，他对只炮击李公馆和十二师留守处而不累及民房感到没把握。去无线电局发报经过这里的纽曼说：“别管其它的房子。开炮！”

梁大浦不愧是炮兵专家。第一炮就击毁了李公馆的顶楼。第二炮打偏。第三炮击中了十二师的三楼。

守敌惊恐万状，纷纷往楼下跑。但教导团进攻部队因使用了汽油喷射器，燃着了周围的建筑物，无法穿过火屏攻进去。敌人怕火势蔓延至不远处的四军军械库，使库内存放的四万发迫击炮弹发生爆炸，军心极度混乱、动摇。留守处主任黄春和在私下里考虑是否开门投降，或化装成难民，携带师部保险柜中的20万元港币潜逃。

唐虞率的炮连一部胁迫叛军警卫团第二连缴械投降后，即把大炮拉上观音山山顶，炮口对准长堤方向。从山上俯瞰全城，房屋鳞次栉比，辨别不出哪座楼是第四军军部。就找来一个赤卫队队员。经他指点，炮手精确地测定了射击距离。

四军军部的楼顶被炮弹命中。整座大楼连带周围的地面像受寒的牙齿颤颤地叩响。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军心大振，纷纷跃起冲锋，呐喊声和冲锋号声震天撼地。铁甲车里的敌人弃

车而逃。用作构筑工事的米袋被打得白米四泻。叶简修也带着一部分人退出了军部。

见大势已去，困守四军军部的敌人在窗口摇起了白旗。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在司后街的一座宅楼前，沈藻修悄悄把大门拉开一道缝，把他的一张蝙蝠脸贴了上去。僻静的街上，有七八个赤卫队员正踏着鹅卵石路面匆匆走来。脚步声显得格外地惊心动魄。他慌忙把门关上，回到卧室，想点燃一支烟。外面传来了砸门声。他发抖的手怎么也擦不着火柴。麦芦青等人砸开五道门闯入卧室。麦芦青喝道：“起来，跟我们走！”

“去去去哪儿？”沈藻修的声音像筛子上的豆腐。

“去你的还乡台！”麦芦青掂了掂手里的钢刀，白光飞动。

沈藻修夫妇被押往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公安局。刚到大门口，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一个蓬头垢面的人猛扑上来。“咸家铲！你也会有今天！”他边把沈藻修夫妇往电线杆上捆，边告诉大家：“这家伙是国民党市党部清党委员、法院院长！我们不知有多少同志死在他手里！”捆好后，他举枪就打。

“杀死他，替同志们报仇！”另外也有几个人边喊边开枪。围观的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好地助威。麦芦青见状，跑到赤卫队注册的桌旁写了一张布告：

“枪毙国民党清党委员、屠杀工农学生的刽子手沈藻修一名”。

此时，张太雷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他面带微笑地听取每个人的陈述，哪怕是几个人同时开口。他机敏过人，耳听、口答、手写，迅速而从容地处理着繁杂的事务。昼夜不眠的紧张工作，使他的脸上挂着倦色，但他仍然是那么情绪饱满、精力充沛。他甚至脱去了外衣和绒线背心，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衫。

张太雷在《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上改动了几处，让赖先声拿去印发。文告号召工人和士兵行动起来，逮捕包括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黄琪翔、朱晖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在内的仇敌，“有能割取上述每一要犯头颅者赏5万元”，“不管他生的或死的，都解送到革命裁判所来”。文告号召一切工农兵立即到红军方面来，立即武装起来，“誓死保卫我们的政权”。

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又送到了张太雷的案头。

广东省委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工人农民书》。指出：虽然“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已经被撕碎”了，但是“你们亦一定要记住，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还潜伏在广州以内，还包围在广州的四周，要巩固目前的胜利，你们还一定要继续奋斗！”“你们要将一切零碎斗争的力量集合起来，用一百二十分的努力继续奋斗，以巩固自己苏维埃的政权”。

此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还发表了《告青年兵士、警察及保安队书》。文告说：“兄弟们！同志们！你们的枪是保卫工农的，你们的枪头是向着反动军阀的，你们不要为了几块钱的军饷便替他们拼命。你们要为自己的政府——工农兵政府而奋斗！”

苏维埃政权诞生第一天的工作是繁琐凌乱的。但它有一个中心，就是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除了继续打击敌人的军事力量，其具体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肃清反革命；一个是组织、扩大革命的武装。

暴动总部——公安局门前的维新路上隆隆的车声不断，有的卡车只有三个轮子有胶皮外带，另外一个铁轱辘刺耳地辗轧着马路。它们先后运来了大约8000支枪，还有许多手榴弹和炸弹，运到即一发而空。领到枪的赤卫队员、

学生、“政治犯”、市郊赶来的农民，有的立即投入战斗，大部分人被带往各处进行编训。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打枪。

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操场上挤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有枪或是手榴弹。

总指挥部的代表讲完话后，即由教导团的官兵登记、编组、补发红领带、指定小队长和中队长。但人们不习惯同陌生人在一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大声呼喊熟人的名字。省港罢工工人，海员，码头苦力，榨油、金属、印刷、酒米、估衣、酒楼、编织等各业工人，修鞋匠和杀猪卖肉的，赤着脚的农军，渐渐地按各自的行业归拢到一起。

费了好大的劲编完组，便由教导团官兵教练上子弹、瞄准和射击，对领到手榴弹和炸弹的则分头教如何拉弦投掷。但麻烦又来了。人们听不懂外乡人的话，加上不习惯安静听讲，当时又兴奋异常，训练了半天，收效甚微。在广九车站、东较场、惠爱中路芳草街口等处编训的情形大致相仿。

无论效果怎样，编训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一队队武装起来的工人被带到大门外的维新路上，有的立即开赴长堤，有的原地待命。这些队伍参差不齐：高个子里夹着几个矮小的，矮个子里忽而冒出一个高大的；人们聚成一个圈，分不清队首队尾；手车夫因人数多，又自动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多边形队伍。他们一天之前还是任人宰割的奴隶，而现在已经当上了主人；手中的枪在一天之前还像毒蛇一样窥视着他们，而现在对准的却是毒蛇。工人们把玩着手中的武器。这些带着火药的铁家伙就像铸进了他们火热的身子，使他们感到浑身上下都硬邦邦胀鼓鼓的，要爆炸，要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有人扛着枪像铁锤夯砸似地用力踏步。有人焦急地望着战斗的方向。有人在激动地议论。

“美妙呀！自己人都聚到一块儿了！这个世界该是我们的了！”

“世界倒是我们的了。只是要美妙，还得铲了李福林！”

省港罢工工人何衍广也在队伍里。他一直在注意着一个人。那人穿着黑布对襟短衫，蓝布裤子，脖子上系红领带。何衍广说不上那人在这儿使人感到别扭。黑衣人鬼鬼祟祟，似乎也在注意着他。何衍广脑瓜一亮，闪出11月24日在第一公园门前罢工集会时的一幕，那人不就是带着黑狗来冲击会场的密探吗！何衍广的膝头又癢癢作痛。他掂着枪咬牙切齿地走了过去。黑衣人见势不妙转身便跑。何衍广大喊：“抓反革命呀！”人们不知喊的是谁，也不知要抓的是谁，愣愣地看着。何衍广冲出人群举枪就打，但搥不出火，没上子弹。就这么生生地看着黑衣人拐过街口跑了。何衍广懊丧地砸了自己一拳头。

早晨的苏维埃政府会议开后，肃反委员杨殷和司法委员陈郁就各司其职，布网抓捕反革命。铲除对象主要是作恶多端的清党委员，从乡下逃来的地主恶霸，警察、叛徒、改组委员等在“四一五”以来负有血债的恶势力。现在其实是收网，任务在昨晚就已经布置了。

是报仇雪恨的时候了。政治大学等各校冯兴华、郭曼果等七八个地下党团员既兴奋又焦急，他们聚集在长塘街的一间民居里激动地讨论了一夜，根据杨殷、陈郁的要求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确定了十多名逮捕对象。他们杀了鸡，喝了酒。暴动开始了，他们摸进一个警官家中，缴了他的左轮手枪。就凭这支破旧的左轮枪和几根木棍，先后抓到了四名血债累累的家伙。在押往维新路暴动总部的途中，反动嚣张的中大学生张资江还在耍邪，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打死在大街上。几个被暴烈沸腾的革命场面吓破了胆的家伙同样没能走进公安局。围拢上来的赤卫队员个个都似严厉的法官，先是斥责桩桩

罪行，说着就激起了无法抑制的怒火，就动手痛打。冯兴华等学生受此感染，也动起手来。真个是痛打落水狗。

打下惠福警署后，油业工会的赤卫队员侯桂平等人在门前设下哨卡。上午9时，见两个肥胖大汉行动躲闪，便上前截住检查，果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国民党的文件。当把他们送到总部大门口时，几个刚出狱的同志认出这两个人是反动官员，其中一个还是双手沾满共产党员鲜血的刽子手。人们吼叫着扑上去，把刽子手推倒在地。这个嗜血的家伙得到了报应。

法官学校的共青团员廖辅叔等人搜捕本校的反革命分子，东跑西颠一个也没抓到。有人气恼得哭起来，拼命跺着脚嚷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那么多，现在一个仇人也抓不到，对不起他们呀！”怨怒之气难消，就提笔在墙壁上泼写诅咒国民党的标语。意外收获发生在回来的路上。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棉布长衫的人低着头疾步而行，正当交臂而过时，一位学生把他认出来了。原来，这个又高又胖的家伙是《民国日报》的袁总编辑，蒋介石叛变后，他拼命地写文章骂共产党。捆上后，一名学生拉开枪栓就瞄准，吓得他扑通跪下告饶不迭，要大家把他解送到苏维埃政府去处理。

罪恶昭彰的家伙被群众自发地即捕即杀，还有一些送到总部后核准枪决，这样一共杀了有100人左右。另有200多人被关进了曾经是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监狱，这中间包括从警卫团、炮团押解来的反动军官。群众擅杀反革命并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指令，但由于未能建立起审判机构，关进监狱的嫌疑犯基本没有受到处置，以致遗为后患。

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行动起来了。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地的报纸在当时及后来对此都有所报道。

《民国日报》：迨晨六七之时，则闻枪声四起，密如串炮。知事起非常，乃即派干员入城侦探，探见各街口各路口已满布军队及工人和男女学生，荷枪实弹，禁止行人通过，严阵以待，颈绕红中，又喝口令。

《大公报》：市街上遇有穿长衫者，即目为土豪劣绅，须受身体检查。

《顺天时报》：又检查市内之反动派，女子共产党员亦参予其事，时有二八妙龄女郎，拦阻欲行之伟丈夫，而检查其家财。

《晨报》：工人相率往各反共工会复仇，如机器总工会所属各分会，广东工总会，悉被捣毁。

《益世报》：同时东西南三方面农军蜂拥入市。

《大公报》：中大学生小部分加入，共产党妇女持红旗沿街高呼解放口号。

《晨报》：市内青年同男女学生，各提新式驳壳枪加入作战。

《民国日报》：如果共产党在街上遇见从囚牢出来的犯人，以及工人、苦力等，便给他们武器和红色徽章。

《大公报》：新闻工人，即行罢工，一切消息机关，即行停止。

《晨报》：印务总工会亦发出传单。

《民国日报》：谁没有入门证，便不能进邮政局和电报局。

东方社香港电：海员工会即下令罢工，搭乘各轮船之海员一律下船而去。与香港之联络船一律停开。

各报还刊登或摘录了苏维埃政府印发的传单和文告，其中有一份题为《工人武装起来》的传单，内文如下：

广州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广州了，工人阶级要自己负起保卫广州的责任！

还有许多军阀、豪绅的残余势力正在窥视着，寻觅向广州进攻的机会，工人阶级要自己起来，抵抗这一切反动的进攻！

工人们！武装起来，保卫广州苏维埃！

保卫广州苏维埃，便是保卫自己的政权，便是保卫自己一切政治经济权利。

不要失去这个武装的机会，不要让敌人侵犯苏维埃，不要让敌人侵犯你们自己。

工人们！武装起来！准备与一切侵犯苏维埃（的敌人）作战！

恽代英、周文雍、黄平、纽曼，每一个人都在忙着发枪、写文、演讲、巡察、调集人员和食品，东奔西跑地处理各项事务。他们相互之间甚至一天都没怎么照面。

由于一切都围绕着保卫和巩固苏维埃这个中心，各项工作都显得热烈、繁忙。由于事起仓促，缺乏准备和经验，各项工作又都显得纷杂、无序。

按原定计划，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将于午后 2 时在第一公园举行。

一些赤卫队员和学生陆续来到公园。准备前往会场的周文雍和吴毅也已走出了总部大门。这时，有个赤卫队员气喘吁吁地跑到周文雍面前，指着观音山的方向，气不连声地说：“那边……敌人……打……打过来了！”吴毅一听就火了：“看你怕得这副样子，把话说伸抖点！”周文雍忙说：“他原来就有点口吃。”又说：“快！老吴，马上组织反击！”

敌人已经冲到第一公园前面，向公安局发起了攻击。

闻知此讯，聂荣臻立即带领在总部的人员投入了战斗。他们搬出米袋筑起工事，架起机枪阻击敌人。从发起暴动，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没等周文雍下令，赤卫队员们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呼叫声、喊杀声、咒骂声、爆炸声、金属的撞击声、肉体的扑倒声，乱成一片。赤卫队员个个都英勇无畏地往前冲。他们追打着退却的敌人，一直追到大元帅府。他们看到了观音山脚下大队的敌人。冲，三角红旗在头顶猛劲挥舞着。冲，不顾一切，热血汇成的山洪裹带着天崩地裂的轰鸣，冲呀！

“哒哒的，哒哒的……”守卫长堤的教导团一部赶到了，司号兵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许多赤卫队员砰砰地搂了火，他们以为吹冲锋号就是叫开枪。后面的人也开了枪，不会开枪的也开了枪。有不少冲在前面的自己人应声倒下了。糟了！何振武连忙爬上一个土坡，用手护成喇叭筒猛喊：“后边不要打枪！打着自己人啦，冲锋号是要前边打枪。”咆哮的人群继续在前压过去。

这一仗打得淋漓痛快。

也许是衣裳褴褛的赤卫队员第一次尝到了打败头戴钢盔的正规军的滋味，要饱饱地品尝这滋味；也许是自己爆发出来的超常勇气感到吃惊，要再体验一遍给予确认；也许是没捞着杀敌人，要补回缺憾；也许是余怒未消，余恨未泯；也许是怕敌人没有死透——不少队员跑到敌人的尸体旁，用刺刀往上面捅窟窿。那些装死的敌人“炸尸”了，忙不迭地爬起，翻身跪在地上哭喊求饶。

由于忽至的这场战斗，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只得改在次日中午召开。

兵力优势与精神优势

冲到第一公园附近的敌军，是驻在城西北陈家祠的新编第二师莫雄团。

暴动打响时，莫雄住在市内南关中南坊家中，副团长孟敏派来一名排长，要他回团主事。莫雄被硕雷狂飙般的暴动场面吓得龟缩不出。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石井兵工厂厂长罗梓材，请拨子弹 20 万发应变；一封给孟敏，命他火速持函洽领子弹，占领观音山，再派兵到副官邝干生家接自己。莫雄则伺机跑到位于观音山脚的邝干生家。

一营持函从石井兵工厂每枪领得 200 发子弹，由营长杨得胜带领，沿广花公路向大北直街摸过来，一气冲上了观音山。守在观音山的工人和学生毫无作战经验，但十分勇敢，没等敌人立住阵脚，又呐喊着往山上冲。敌人硬是被吓得退到了北面山脚下。中午，敌二营营长杨道生率部赶到，两个营再度发起仰攻，剧战约 1 小时，以死伤 100 多人的代价，始占领观音山。随后便下山接团长大人。

于是就有了中午在第一公园前同暴动部队的交火。

也就在这时，张发奎等人在河南岸分头上了两艘军舰。他和陈公博上了“宝璧”号，黄琪翔和冯肇铭上了“江大”号。两舰的桅杆上挂起了黑白两色旗。

黄琪翔被南京一帮人疑为共产党，心里既愤懑又恐慌。这些都在他的肚腹中转化为仇恨，一古脑地算在了共产党头上。并且，他也迫不及待地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上舰后，他急忙爬上吊桥，指着北岸拼命喊叫：“那些颈系红带者都是敌人！给我狠劲扫！”“江大”舰于是由东向西疾驶，临近增沙大巷口，见中央银行门前系红带者甚众，即发排炮轰击，打得岸上烟沙滚滚。到了肇庆会馆前，又向围攻四军军部的暴动部队猛轰。黄琪翔喝打声不止，恨不能自己就是一门大炮。

停泊在沙面江中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军舰助纣为虐。它们相互打起旗语，接着卸去炮衣，向天字码头一带的暴动部队阵地猛轰。

“帝国主义军舰放炮啦！”“这帮咸家铲红毛烂仔！”在江北沿岸防守李福林的赤卫队和警卫团极为愤怒，诅咒、酷骂，但却没有重武器予以反击。适逢叶剑英副总指挥巡察到此，他截住一辆卡车，要司机传令教导团的炮兵急速驰援长堤。

炮弹一发一发在离岸不远的居民区爆炸，烧红的金属片四处横飞，巨大的气浪把瓦片、断木和什物掀到半空。在爆炸的间隙，可闻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房屋倒塌，烈火熊熊，浓烟被急风压得贴着地面翻腾。

炮兵连和沙河炮兵团的一些士兵携带几门山炮赶到了，架好炮就放。大家围着山炮跳着脚地鼓掌叫好。但山炮是陆战炮，它的榴弹和榴霰弹对军舰铁甲并没有什么破坏力。一连发了几十炮，敌舰却猖狂如故。

不一会儿，一门十五公分口径的重迫击炮也按叶剑英的命令运到了。但它迟迟不开炮。原来，旧军队里的炮兵认为杀人作孽，只有得到直接命令才开炮，因为这样作孽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上司。这个沙河炮团的炮手，也恪守着老信条。

叶剑英知道这个可笑的规矩。他跑过来厉声命令道：“快给我开炮！开炮！”

这个炮手大概是个神炮手。这门重迫击炮也确实有威力。轰轰几发炮弹，

接连击中几艘敌舰的甲板，损及指挥塔、炮塔和其它设备，水兵也有伤亡。敌舰们见势不妙，急速驶往白鹅潭方向，在距重迫击炮射程之外的水域游戈，仍频频向天字码头一带猛烈轰击。

本来，四军军部顽敌的意志防线已被英勇的暴动部队击垮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大”舰和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北岸。这无疑是给四军顽敌注射了强心剂，使死王八变成了活乌龟。窗口的白旗收回去了，吐出来的是更加癫狂的毒焰。

中枢神经的意志牵动了残肢断臂。各处敌人脱壳而出四处逸散的鬼魂重又附体，他们聚集起来，顽抗，反扑，或伺机反扑。

军械库的守敌铁了心拼死顽抗。十二师留守处主任黄春和接到军部电话，也重振旗鼓，命监护连士兵把库房中积存的被服全都搬出来，堆作掩体，并调整了火力，与互为犄角的军械库紧密呼应。

不甘失败的残敌四处放火，高第街、东堤、仰忠街一带火势冲天。有的躲在暗处打冷枪。

珠江南岸机器总工会的敌人架起机枪，隔着江向中央银行门前不住地狂扫。

溃败的保安队 300 余人渡过白鹅潭，窜至葵蓬洲芳村警察署大楼盘据，与在石围塘车站立足未稳的工农赤卫队形成对峙，并对南海、三水等地农军奔援广州的通道构成了威胁。

暮色降临时，张发奎和陈公博登上了去肇庆和江门搬兵的轮船。自给许志锐和邓龙光发出电报至天色转暗，非但不见援兵抵达，甚至连回音也全无。二人心急火燎，决定亲自前往。途中陈公博眼睁睁地望着迎面驶来的每一艘船只，每遇较大一点的，他必要迫不及待地喝问是否援兵。但都不是。搬兵的船在冰冷的月光下疾驶。

从凌晨 3 时半发起暴动，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多个反动势力的堡垒、据点和驻地，把反动统治的军政机器冲击得七零八落，取得了意义非凡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的意义也许只在于它非凡的“意义”。它在军事上的胜利是短暂而脆弱的。它在敌人的四军军部那里就被阻扼了，这倒不是因为四军的敌人特别能打，而是因为它注定要在这里打上句号，即使不是在这里，也不会离此太远。现在，张发奎、李福林、保安队、警察、工贼、地主民团，还有帝国主义势力，已经缓过劲来，开始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了。

形势的严峻，还不仅是来自广州市内和外围的敌人。

在红军总指挥部里，叶挺紧皱着眉头。从昨天早晨到现在，他没有合上眼打个盹，今天一整天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但他干了什么呢？指挥攻打四军军部。此外就是茫无头绪地接待一批批前来汇报或请示的人，领枪的事也来找他。中午群众大会流产，扩编红军计划抛锚，农军增援呈零星状态，肃清反革命捕杀的大多是走狗小卒，缴获的大炮由于技术力量不足很少能派上用场，枪支有的被混迹于工人中的工贼流氓冒领，后勤工作糟糕得连指挥部的人到现在还米未沾牙……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可以看出，暴动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就连指挥部本身也是忙乱不堪，甚至可以说是混乱。到现在为止，领导人还没碰过头。他这个总指挥也因陷于琐碎事务的漩涡中，无暇考虑和处理全局性问题。

叶挺与刚从火线返回的叶剑英冷静分析了形势，然后一块找到纽曼和乌

科洛夫，晓以大局，建议将暴动队伍迅速拉到农村去，但这个建议当即就被纽曼否决。

叶挺抱着双臂，用红蓝铅笔顶住下颏，拧着。

“现在的局势很严重。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走过来说。他的心情也同样焦虑、沉重。

叶挺沉思不语。

聂荣臻接着说：“工人作战固然勇敢，从狱中出来的同志，有的甚至在紧张的战斗中累死了。但他们没有作战经验，好多人连枪都不会打。我们的部队却只有一个团多一点，照此打下去，只能造成更多的伤亡。”

叶挺点点头，说：“是啊，明天的局势会更加紧张，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应该有所部署。”

他们一同到张太雷的办公室，建议迅即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制定对策。

张太雷同样是忙得不可开交。

何振武和几个海员来到中央银行。他们奉吴毅之命而来。从观音山回到总部后，吴毅叫住他，要他带人来这里收缴银元，因为总部连买小菜的都没有。撬开铁门摸进去，起初什么也看不见，渐渐能借着透进门窗的月辉看出些轮廓。幽暗中有几个人影在蠕动。“谁？”何振武问。没有回答。何振武又厉声喝道：“是谁叫你们来的？”黑影答腔了：“政府叫我们来的。”

“政府？哪个政府？”

“国民政府。”

“丢那妈！你这班契弟！”

何振武几个人破口大骂，冲过去要收拾这些趁火打劫的家伙。但黑影们迅疾越窗而去。大厅里已被翻腾得一团糟，除了三个无法开启的保险柜，其它东西早已被裹卷尽了。只得留两个人守着，回去报告。

刚出大门，就听到西南方向传来爆豆般的枪声。又见两个人骑自行车飞快地蹬过去，见人就喊：“日本仔在西濠口上岸啦！快去堵呀！”

他们一口气跑到大新公司门口。赤卫队员正依托士敏土墙壁和粗大的方柱开枪射击。有人忙着堆叠沙包。何振武在一堆沙包后伏下，看了半天，才发现像翻了一车西瓜那样滚散在黑糊糊柏油马路上的钢盔。何振武结结实实地扣了几下扳机。这下看得更清楚了，就像一根藤上长几个西瓜，一挺机枪由几个日本鬼子推着，爬爬打打。几挺机枪后面还匍匐着一大片持步枪的。鬼子越爬越近了，大约只有二三十米了。就在这时，在西濠口的丁字路口冲过来一大群赤卫队员。何振武纵身跃起高喊一声：“打！打番鬼呀！”子弹、手榴弹顿时像暴雨般地向日本鬼子倾泻过去。鬼子也发着喊往前冲，冲了几步又怪叫着往回跑。鬼子退了。

海关大楼的钟锤不紧不慢地敲了 12 响。这响声被日本军舰的炮声吞没了。

经叶挺、聂荣臻多次催促，时至深夜 12 时，张太雷才得以抽身召开紧急会议。

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天没有吃东西，几乎所有的人眼中都网满血丝，几乎所有的人都精神抖擞，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充溢着一种只有超越了个人生死才具有的神圣光泽和表情。

会上，大家对暴动第一天的形势很满意：只用了几小时就攻下敌人几十个据点，俘敌两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取得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

对未来的形势也相当乐观：广州的工人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海陆丰和全省工农的斗争正在高涨，加上粤桂军阀火并的格局不可逆转，广州暴动必将得到各地工农的响应，广州苏维埃政权将得到巩固，全省范围的大革命也指日可待。

一直沉默不语的叶挺发言了。他以一个卓越军事家的才略，对局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肯定了胜利，也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了面临局势的严重性：敌魁首出逃，必将率军反扑，加上帝国主义的支持，将对我构成包围之势。我军经过一整天的苦战，损失很大，已转为守势。在此形势对我越来越不利之际，切不可麻痹大意，更不可盲目乐观，应当机立断地拿出应对措施。

叶挺沉吟片刻，以他惯有的略带冲动的口气，又一次提出了经他深思熟虑的建议：“为了避免四面受敌，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趁敌人大军到来之前，用缴获的武器尽快武装参加暴动的工人，扩大队伍，明天就撤出广州，去海陆丰与彭湃汇合，在农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叶挺的话无异于往烧红的铁板上泼冷水，众人都很吃惊，都感到不解。

副总指挥叶剑英表达了一致的意见，省军委委员黄锦辉也赞同。

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说：“坚守广州看来是没有出路的，应当放弃广州，转到乡下去，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保住实力，再作打算。”

如果这个意见被采纳，对处于不利地位的暴动部队将是一个转机。有时候，避开敌人的撩牙利爪就像冲上去扼住它的咽喉一样有力，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

“这不行，”纽曼发话了，“绝对不行！马克思主义武装暴动的原则就是进攻。我们要进攻，进攻，不停顿地进攻，绝对不能退却！”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是暴动的指导者，几乎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这位26岁的年轻人既精明能干，又主观武断；既热情洋溢，又傲气十足；虽意志坚定，却不懂军事。他死背教条，死抱住彼得堡暴动那一套，一味地主张固守阵地，向敌人进攻。

说着说着，这位德国人漂亮的蓝眼睛里甚至透出了敌意，他的日耳曼血性在燃烧。

他转向叶挺，挥动着拳头，言辞激烈地说：“撤退，撤退！你这是在政治上动摇！你这是想去当土匪！”

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此刻的意识，大概就如同他的同胞歌德说的一句话：“我从圣坛带来了圣洁的火种”。但却少了歌德紧跟着的另一句话：“我所点燃的却不是圣洁的火焰”。从他当初对张发奎存有幻想不赞成暴动，到如今主张不顾一切地进攻，都说明他对中国的事情隔着一层，更不用说他还缺乏军事经验。

叶挺又沉默了。他的两臂撑在桌沿上，两拳支撑着下额，不再说一句话。

张太雷在把纽曼的话翻译过来时，就已掺入了自己的倾向。他对纽曼确信无疑，就像当年对待鲍罗廷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不是要考虑失败，而是要去想胜利！”

“是的”，纽曼的口气像是在宣教，“我们要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勇敢地去夺取胜利！暴动就同战争一样，是一门艺术。”

会议开到深夜两点多钟，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并将战

线推向郊外，发动和组织农民，以迎击敌人援兵；打通与海陆丰的联络道路；今日中午未开成的群众大会改在明天中午举行。叶剑英说，吃饭的问题也要解决。

按照纽曼的主张，张太雷下达了新的攻击令，要求暴动武装于凌晨 4 时迅即肃清长堤敌人，然后向军械库和河南李福林进攻。但由于当时的情况混乱无序，部队经过昼夜激战又疲劳已极，张太雷的命令实际上等于零。

第二天，也就是 12 月 12 日，整个局势急剧恶化。

第五章 英雄

五羊城故事之二

12日凌晨，一支队伍从广州东南方向的鱼珠出发，在夜色中向西疾进。它是黄埔军校特务营。

黄埔军校位于广州东南20多公里的黄埔长洲岛。由于暴动事起仓促，通信、交通不便及敌人的阻扼，这支队伍没有得到提前暴动的消息。

平日，军校前的江面很是热闹，从拂晓到中午，渡船总是川流不息。但11日的情况异常，空荡荡的江面上连一条小船也不见，电话也不通。这引起了共产党员、特务营营长吴展和校长办公厅秘书王侃予的注意，也引起了教育长杨谢松的警觉。杨谢松要副官何崇校乘汽艇到驻广州办事处探知究竟。办事处主任是一个豁牙老头子，他见面就说：“教导团暴动啦！后半夜枪声都打麻了。”何崇校问他怎么不通知校本部一声，老头儿牙口漏着气说：“一早就有教导团学生守在这里，不许打电话，电话铃响也不许接。”正说着，一个教导团士兵冲了进来，问：“是谁乘电船跑到这里来了？”士兵系着红领带，手持的步枪上了刺刀。“是我，”何崇校说，“黄埔军校的，我原来也在教导团。”士兵打量他一眼，点点头，意思是似曾相识。何崇校问：“朱勉芳参谋长呢？”话音未落，西面传来了枪声。士兵匆忙往外跑，在门槛上去了句“给我们杀啦！”何崇校给杨谢松拨了个电话，就乘汽艇回校。

听何崇校讲完情况，王侃予、吴展蹙眉凝思。这时，传达长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杨教育长亲启”。传达长说杨谢松已乘电船去了虎门。信瓤是一张条笺，上用淡墨毛笔草草写道：“共党在广州称兵作乱，正在调兵扫平中。黄埔、鱼珠一带治安，请兄主持负责。”落款黄琪翔。他们走到窗前，遥见江面有一艘吐着黑烟的灰绿色军舰向西而去。吴展终于作出了决定：“我们赶紧去广州！”

当日下午5时，吴展、王侃予、宋湘涛率特务营及部分官生渡江至北岸鱼珠，一举收拾了蟹山炮台的敌人。12日凌晨，这支500来人的队伍即沿着公路赶往广州。

黄埔军校特务营到达广州市东北郊的瘦狗岭附近。吴展令队伍在公路边的一片丘陵地休息整顿，并派人进城与指挥部联系。初曙的东方一层一层蜕去灰白的薄翳。担任警戒的排长跑过来报告：西南方向有黑点移动。大家都霍地站起来。吴展命令第二连迅速占领右前方一座高地，其它连队作好战斗准备。二连连长是朝鲜人崔庸健。

吴展举起望远镜望了望，挥手高喊：“左边来的队伍是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同志，大家不要打枪！”

这天凌晨，当黄埔特务营自东面向广州运动时，西南郊的农军向敌人频频发起了进攻。

首先打响的是葵蓬洲警察署的战斗。占领石围塘车站的工农赤卫队分为三路，从南塘汛地头、洞企石围和山村渡头向敌人扑去。从城里退守在这里的300保安队显然有了准备，加上多挺机枪和坚固的大楼，使只在人数和勇敢精神上占有优势的赤卫队员伤亡累累，久攻不下。

警署大楼的西面和北面弹如雨下，声如雷鸣，而在它的东面却显得平静。东面是一座废弃了的木制造船大工棚，棚外是曲曲弯弯的偏街小巷。熟知情

况的黄寿想到从这里用火攻。于是，他和黄威、汤计、杜龙等 10 多个队员跑到车站库房，抬出了四五罐煤油。他们深一步浅一步，沿着涌边摸黑跑向葵蓬洲。进了内街，拐了几个弯，摸了敌人的一个岗哨，就到了工棚。木棚被淋上煤油点着，大火轰地就抬起了棚顶，借着风势，直扑警署大楼。

巨大的火势就像一面狂舞的旗帜，各路工农赤卫队奋力呐喊，拼死向前，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有的从窗口跳江，有的冲开后门奔窜，中弹和溺水而亡者众多。此战俘敌六七十，缴枪一百余支，其中有机枪两挺。

周侠生率领农军马不停蹄，又杀向大沥圩。

大沥圩是广三铁路以北的主要集市。拿下它，同芳村、西村、花地等处连成一片，就可以完全控制广三铁路沿线。

此时，另一路农军在原农运特派员谢颂雅带领下，正划着小艇由龙溪向距大沥只有一箭之隔的滘口逼近。12 月的五更天气寒流袭人。身穿单衣的农军都裹着稻草，一来可以御寒，二来可作伪装。在朦胧月色下远远望去，就像是运禾杆的小艇。

周侠生赶到，即以三记单发枪声发出信号。恰值谢颂雅抵岸。两路人马遂像一把烧红的巨大铁钳，从东西两边直剪大沥圩。在这猛力的剪击下，一个民团局的守敌立成钳下之物。

大沥圩竖起了两面大旗。一为犁头旗，一为锤子铲刀旗，都同样地血红。九区农军在兴仁善堂设立了总指挥部。一批未及逃走的大恶霸被处决。四乡农民纷纷前来要求入伍。镇内镇外一片忙碌、欢腾的气象。一支经过挑选的精壮农军登上小火车。他们大多赤脚，每人斜背一袋炒米，拿着大刀、禾杈、棍棒、长矛、火药鸟枪，也有少量较新式的七九步枪。这支队伍一路高呼口号，耀武扬威地开往石围塘。

可以看出，万众一心的暴动队伍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不能够一致行动。而相反的情形是，向来相互使绊子的反动力量却勾结在一起，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保卫市内医院在长堤登岸，被工人赤卫队击退后，各国驻粤领事团紧急集会，决定调英军 2000 人、法军 400 人、日军 300 人，在沙面租界布防。还派出代表，面见李福林，谓：“全城百万生灵，已陷于赤色恐怖之中，如有相需渡河之处，则愿尽力帮助。”

李福林见张发奎站稳了脚跟，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自然不甘放弃捞取筹码和显示英雄本色的机会。他命驻河南的两个团统统在脖颈上系上白布条；又遣人找来一块大白布，上写“主席张”三个粗励黑字，挂到“宝壁”舰上，与红边蓝底白心狗牙旗相挽。一大早，他就指挥两个团兵分两路，由机器工会工贼引领，在“宝壁”、“江大”的掩护下，东路由岭南大学渡江向猎德进袭；西路由河南戏院码头渡江，从正面强攻长堤西濠口一带。果然，英舰“摩轩”号、“莫丽翁”号，美舰“沙克拉明”号，日舰“字治”号均出动，掩护反动军队渡江。

在张发奎的严辞催令下，驻黄埔、虎门、江门以至韶关等地敌军，先后驰援广州，于 12 日拂晓后陆续抵达，并向暴动部队发起攻击。驻韶关李福林军周定宽团乘火车抵达西村，即以一部向黄沙开进，准备攻长堤；一部向观音山开进。驻江门的薛岳部两个团、李福林军潘枝团和驻虎门的许志锐部也乘拖轮往广州急赶。此外，还有黄埔的黄慕松团，佛山的林营、李营等，均先后抵达向广州反扑。韶关的李福林军陆满团也已出发。驻陈家祠的莫雄残

部，也分兵向西门和观音山反扑。地主民团也聚集在河南沿岸，向北岸射击。敌人对暴动部队形成了夹攻之势。

小火车载着 300 农军，呜呜地开进了石围塘车站。黄寿又领着其中一部分乘木船渡江至黄沙，直奔暴动总指挥部。一为报告情况，二为领取武器。

凌晨的会开后，张太雷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同恽代英拟写了一份通告，以省委秘书处的名义，指示省内各地党部要广泛宣传广州暴动的意义，“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向着广州进展，保护广州暴动的胜利！”

搁下笔，张太雷站起来，伸胳膊伸腿走了两圈。他掏出金链怀表看看，对脸色白里透青的恽代英说：“你睡个半点钟吧。一会儿我叫你。”

恽代英瘦弱，疲惫。他打个哈欠，摘下眼镜揉揉双眼，戴上。把手骨节捏出一串脆响，对张太雷笑笑，又拿起笔。

张太雷也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坐下。他不再劝。

筹备中午的群众大会，起草给共产国际的电报稿，处理在新的一天的战斗中将遇到的种种问题。他们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

李少棠端进两碗热气腾腾的米粥，一股温暖的粥香味扑鼻而来。他们咕咕响的胃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粥放在桌上，李少棠又从腋窝里抽出一包饼干。张太雷说要多煮些粥和饭，给在前线作战的同志送去。

“你们放心吃吧，粥有的是，从公安局门前一直到西湖路口摆满了粥桶，还有从大堆栈中没收来的饼干、糖果。”李少棠说，“有些女工和学生装了两汽车食品，去长堤了。”

正说着，苏联“暴动专家”乌科洛夫进来，要求去中央银行看看。张太雷让他去找黄平，叫黄平领他去。乌科洛夫刚离开，赖先声来了，杨殷领着黄寿随后跟了进来。

相互打过招呼，张太雷把省委秘书处的通告交给赖先声，说：“把这个通告印好发出去，要快！《红旗日报》编得不错，第二号要赶快出。”

赖先声说：“第二号准备出对开一张，首版刊载苏维埃政纲、命令等，其余各版是暴动的新闻，主要是战报和群众热烈参加暴动的新闻。”

张太雷和恽代英都说好。

赖先声去了《红旗日报》所在的七十二行商报社址。

杨殷把黄寿拉到张太雷面前，说：“这是第六联队的中队长黄寿。他们昨天打下石围塘火车站，今天早晨又拿下了葵蓬洲警署。大沥圩也被我们攻占了。随小黄来了 300 来名农民兄弟，想要一些枪。”

张太雷用双手一把将黄寿握住，有力地摇着说：“好，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公安局剩下的枪都是废旧不能用的，我再问问别处，看看还有没有缴获了没拉来的。”

黄寿说：“昨晚在车站总机房，我们截听了敌人的长途电话，有几批敌人要在今天赶到广州。”

张太雷皱起眉头：“我们已料到了，不想他们来得这样快。你们要坚守住车站，尽量多运农军到广州来。”

黄寿点头道：“广三铁路沿线还没发现敌人。周侠生、陈道舟和谢颂雅他们正在各区组织农军，今天估计会有更多的人来，我们的小火车一趟能载 300 人呢。”

杨殷说：“形势会变得很复杂。你们那里联络不方便，要见机行动。”

张太雷沉思着说：“要是能顶住三四天，主动权就能掌握在我们手里。”

沿着珠江的长堤上是一派热烈而又肃杀的气氛。它的每个路口都悬挂着红布巨幅，墙壁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革命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它冷寂、危险、行人稀少，沿街散布着烟火弹痕、被毁坏的建筑、血迹和仍在燃烧的火焰。

从东头的广九车站至西头的沙基口，它临江沿岸筑起了许多工事，用灌满泥沙的麻袋、木桶、铁桶、木箱筑得相当坚固。

从早晨开始，守在西濠口岸垒的工人和士兵已击溃了李福林军的数次进攻，他们利用战斗的间隙，一边嚼着总部送来的饼干，一边加固着工事。

教导团的李华躯干矮瘦，但扛起麻包来却惊人地快捷。劝他休息一下，他反而干得更欢。尹相升用炫耀的口气告诉大家，他的战友李华只有19岁，但却是一名神枪手，每回实弹演习都是三枪三中，弹无虚发。众人一阵惊叹。一位长着两撇胡须的赤卫队员说：“有这样的弟兄，两个‘灯筒’也打烂它！”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有几个市民也跑来帮着搬运沙袋。尹相升见其中的一位老者干得挺吃力，就去劝这位老者少干点。老者头一横，说：“别的队伍，不要说叫我做，就是让我闲着看，我也没功夫！”原来，他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说，知道这支队伍流血打仗，是为了让工农坐天下，过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他信。为了证明自己信得有根据，老者的头又一横，说：“刚才叶连长还同我握手，喊我老大爷呢！”

这时有人高喊：“李福林契弟又来啦！”

骤密的子弹追着喊声倾泻过来，打得沙袋喷出股股细烟土柱。

大家一下全扑到工事里，几十支步枪，还有两挺机枪响成一片，向敌人猛烈还击。

敌人驾着五六只汽艇，用机枪狂扫一通，很快又缩回了对岸的巢穴。

大家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嘲骂着“三武鹅五”的“豆腐军”。尹相升感到左臂不对劲，侧脸一看，袖管上浸透了血。剧痛立时抓住了全身。这时，他看到了卧在血泊中的李华。

“李华，李华！”尹相升把李华的脑袋放在自己屈起的一条腿上，摸摸前额，尚有余温，但脉息已经停止了。19岁的江西青年李华牺牲了。尹相升轻唤着，哽咽着。大家流着悲恸的泪水，轻手轻脚地解下李华身上的刺刀和子弹带，把遗体抬到马路对面的廊下放稳。大家拭泪的动作刚劲而有力，这动作里包藏着无畏的意志和复仇的决心。

此时在城北的制高点观音山，暴动部队也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观音山的山脊上有一道古老的城墙。山顶有一座高28米的镇海楼，俗称“五层楼”，为明代抗击倭寇而建造，上有清人所撰一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早晨，在得到由韶关开来的敌军已迫近北郊的情报后，教导团第三营、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在饶寿伯和沈青的带领下，奉命前来扼守观音山。饱经沧桑的镇海楼已是一派破败之象，城墙也已倾倒颓圮了。士兵和工人们就以镇海楼为中心，利用它东西面的城墙构筑起临时工事。

修筑好工事，有了一刻短暂的清闲。由于连日紧张征战，不少人在冰冷的砖石上伏下就睡着了；也有些人点起生切烟，聚在一起聊天。这时候，有人又讲起“五羊城”的传说。

“上回讲到哪里啦？”

“讲到少年用五位仙人给的稻株种出了谷子，连夜用箩筐盛了。”

“那就接着这儿往下讲——

“天亮的时候，也就是交粮的限期已满时，那少年担着谷米送到了衙门。逼债的官老爷抓起一把，放在两块小木板上一碾，只见米粒两头尖细，像黄玉一样晶莹油润。贪馋的官老爷看着两大箩筐谷子，口水不争气地挂下了两柞长。心想，这样的丝苗上米我有很久没吃到了，这些贱民是把好米留着自己吃呢！不给他们点颜色看，是吃不上好米的。但眼前骨瘦如柴的少年不像总有好米吃。官老爷马上板起面孔，厉声喝道：‘这米是偷的，还是抢来的？快从实招来，不然就打八十大板！’少年害怕，就一五一十地供出了实情。少年的话点燃了官老爷的熊熊欲火，他当即带着差役到坡山脚去捉拿五仙人……”

正说着，城墙北面起伏的小山岗像疯子发作似地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飞蝗般的子弹铺天盖地地扑来。周定宽团和莫雄团各一部联合向观音山发起了猛攻。

故事又是没有讲完。

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杨殷等指挥暴动部队，在长堤一线连连击退强行渡江的敌军。但广州陷入敌之合围，已成定局。长堤请求兵援，观音山请求兵援，西门、猎德、东山等处均吃紧，苏维埃政府等各机关要地也需加强警戒，以对付伺机而动的潜伏与渗入之敌。有言道：“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指挥员们懂得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凭着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忠诚和献身精神，沉着冷静地机智用兵，甚至亲临前线激发部队与敌搏杀。

观音山打响后，叶挺、叶剑英命总指挥部副官陈赓速往督战，并率教导团、警卫团各一部抗敌；命徐向前率赤卫队跑步运送弹药，并协守关隘；又将南海、花县等地来的农军组织起来，派往助战。

为了更多地调动农军的力量，叶挺又亲自拟写了两个命令：一是要周文雍“速即飭令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一是任命凌津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要他率农军“在粤汉铁路沿途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为了瓦解和迟滞敌 25 师，他还让该师一位叫雷文渊的连长去运动该师 75 团倒戈。

中午时分，攻击观音山的敌之一股绕过防线，沿着吉祥路向起义军总部发起进攻。叶挺闻讯即至总部门前，镇定自若地站在用沙袋垒筑的工事后面，指挥守卫在这里的士兵将敌人击退。

在炮火中坚持

周文雍的眼中网满了道道血丝。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两天来，滚沸的血液在他并不高、但却精壮结实的躯体里一刻也没有平静过。编训队伍，鼓动演讲，火线巡察，调兵遣将，冲锋陷阵，他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由于在长期的工运中与工人结下了亲同手足的感情，他干得是那么地愉快，那么地得心应手。

他出了张太雷的办公室，找到洋务工会的负责人、赤卫队大队长梁志国，要他马上去西瓜园布置会场。“会场要尽量做得大些，来的人多。”周文雍说着，把一卷用簇新红布做的会标递给他。梁志国在腰胯间拍去手上的尘污，接过红布。周文雍又把拟就的大会标语交给赖先声，要他抄写张贴出去。标语口号共有三条：

打倒帝国主义！

工农兵起来拥护苏维埃政府！

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

梁志国已不是第一次布置会场了，但这一次非同寻常。他跑到丰宁路西瓜园，对着场地设计了一番，然后回洋务工会找几个人，一同到反动的省总工会找材料。

屋子里很是狼狈，遍地是倒搁的破门扇、镜框、衣架，碎玻璃、废报纸，断腿少面的桌凳。二楼也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搭主席台。“鬼窝！”几个人抡起破条凳，把残存的玻璃窗、磨沙灯罩打个粉碎。灰土和霉腐味窒人鼻息。梁志国制止道：“别打，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打的人理直气壮：“丢！哪个要这些烂家伙，我们做新的！”

终于找到一张大餐桌，几个人夹手夹脚地把它抬到西瓜园，摆在场地东头的中间。又找来十几张椅凳。又从一座破工棚上拆下两条长竹杆，把红布会标打横穿好，举起，拉开，用绳子把竹杆下端捆牢在餐桌的腿上。

“好耶！”“胜利！”“万岁！”已经到场的人们呼啦啦围拢过来，又是鼓掌又是欢呼，有人敲起舞狮鼓点，有人朝天鸣枪助势。梁志国看到了洒满阳光的会标：

广州工农兵士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

市内的街道上相当热闹。一队队的人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子，在工会会旗和锣鼓的引领下，向西瓜园汇聚。许多市民跑到街上围观，不少店铺也下铺板营业。有个面颊抽搐着、表情似惊似喜的中年妇女跑进了参加会议的队伍。她边走边跟人唠叨，她听人说广州来了一个叫“苏维埃”的主席，命令当铺把穷人的典当物无价发还。她不信有这事，就拉了一个识字的邻居出来看告示。这下她心里踏实了，她丈夫死时典质的衣物能赎回来了，冬天有指望了。她要去亲眼看看这个大恩人。

时至11点，西瓜园有了浓厚的大会气氛。由于准备仓促和战斗紧张，到会约有300多人；这绝不可算多，但却有着充分的代表性。他们中间有赤卫队、农军、教导团、警卫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海军和俘虏兵的代表，还有妇女代表、青年团员和青年学生、店员、小贩和其他市民。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系着红领带。他们在认真地说笑，严肃地逗闹，在想象着美好的未来而高

谈阔论。广州的群众集会历来不少，所不同的是，这次集会不是为了支持许诺帮助自己的什么人，或什么党派、政府，而直接就是为了支持自己，表达自己，作为主人的自己，作为政党和政府的自己。因此，会场里涌动着一种来自灵魂和内心深处、像《国际歌》里蕴含着的崇高的激情和力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何衍广又发现了那个神秘的黑衣人，黑衣人感到自己被发觉后就溜了。溜了就溜了，何衍广并不去追，似乎黑衣人就像是在巨人脚下的一只无足挂齿的草蚁。

两套狮子鼓在会场边缘咚隆咚隆地来回走着。

主席台一侧居然还有一个军乐队，吹着大喇叭，敲着大洋鼓，煞是长威风。

观音山和珠江传来的枪炮声，也融进了庆祝的喜响。

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在喧闹声中挤到台前，仰望着会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了声。

“苏维埃就是俄国那个苏维埃？”许是老人自己的耳朵有些背，他大声问道。

“是的！苏维埃就是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府就是工农兵独裁政府，不是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啦！”回答的人是张太雷，他来到了会场。

“啊啊，”老人布满折皱的古铜色脸上露出笑容，“是了，10年前俄国就兴了这个政府，我们老板怕极了，不敢再驶船去俄国了。如今轮到我们这里啦！”

张太雷微笑着点点头。

他同叶挺、恽代英、陈郁、周文雍、黄平、杨殷等领导人走到了主席台前。

周文雍摇响铜铃。人群静了下来。军乐队奏起雄浑激越的《国际歌》。奏毕，周文雍宣布开会，由张太雷同志讲话。

张太雷在热烈的掌声中站了起来。他还是穿着那身草黄呢子军装，那宽阔明亮的前额，饱含智慧和忠诚的眼睛，深邃而激情四溢的气质，给人一种坚定有力、完全可以信赖的印象。他首先报告了当前的形势，举行暴动的过程和意义。他的声音虽不高，但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全场群众的注意力。

他提高了音量，慷慨激昂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就像把珠江搬到了这里，热烈的掌声，翻飞的旗帜，掀起了滚滚排涛巨浪，欢呼着人民政权的诞生。这时候，人群中忽地站起一个穿海军队服的大块头，朝着主席台磨拳擦掌地大喊大叫。这小子竟敢捣乱会场，真是胆大包天！人们纷纷站起来指着他，喝道：“你想干什么？”“不准吵！”“把他拉出去！”有人边喊“打”边往前扑，维持秩序的赤卫队员也持枪跑过去。但这场小骚动很快就平息了，这是一场误会。大块头是参加暴动的海军士兵代表，他用普通话喊的是革命口号，诸如海军陆战队坚决拥护苏维埃政府等等，他太激动了，但人们听不懂普通话。误会化释了，人们又转而向他鼓掌叫好。

张太雷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

首先是对全体劳动人民的政纲：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各式军阀和军阀战争。保证劳动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对工人的政纲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工人监督生产。国家保证工资。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

立刻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惟一的工会组织。解散一切反动工会。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全无产阶级利益而帮助工农民主政权。

对农民的政纲是：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镇压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田界。各村各区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权。

对士兵的政纲是：国有土地分给兵士及失业人民耕种。各队部之中应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每月20元现洋。

对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是：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居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取消劳动者一切捐税、债务和息金。取消中国年底的还账。没收当铺，将劳动人民的物资无价发还。

对外的政纲鲜明而响亮：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张太雷每念一个条文，都要停一下，微笑着让群众相互议论一阵，然后他再做讲解。会场上一会儿悄然无声，一会儿哄哄闹闹，眉飞色舞的，忘情鼓掌的，使劲点头的，放声喝彩的，这一致而又纷乱的热烈场面充满了感情与活力。张太雷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他抑制不住地越念声音越高亢，镜片后面的眼睛烧灼着兴奋的光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了，一小时后，他将为革命事业倾腔泼血。

张太雷还宣读了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名单、给共产国际的电报等，都得到了大会的拥护和通过。

张太雷讲完后，是各界代表上台讲话。工人代表是印刷工会领袖王强亚，他热情奔放，讲话如火轮飞滚，且助以刚烈的手势，极有煽动性。他挥指着西瓜园一侧反动的省总工会大声斥骂：“陈胜那个契弟，不是人！他带住一帮工贼来摧残我们工人兄弟，替资本家效死，我们要拥护苏维埃政府，打倒那帮咸家铲！”在广州的方言俚语中，“契弟”类同“相公”，而“咸家铲”则是全家死光之意。王强亚痛快淋漓地骂了足有半个小时，激得人们面孔涨红，煞是带劲、解恨。

开会期间，四处的枪声和爆炸声一直响个不停。观音山枪声越来越剧烈了，好像已翻过了山头，向市区蔓延。张太雷当机立断，宣布散会。

不知从何时聚集起的乌云，给会场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落下一阵雨，雨点稀疏，硕大，打在脸上又硬又冷。老百姓叫它白撞雨。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得到了党中央和团中央的有力支持。

党中央先后发表了告民众、告工人、告农民书和党内通告，高度评价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动员全党和全国民众给予支持与配合。

党中央指出：广东工人和农民的胜利，就是全国工人和农民胜利的开始；广东工人和农民得到的解放，就是全国工人和农民得到解放的开始。

党中央发出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敌人的势力还有很多很多没有铲除，他们一定勾结起来，一定勾结帝国主义，来进攻革命的广东，他们正在各地死命的压迫剥削我们的工农、兵士、贫民。我们应当以全力来进攻反革命的势力——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应当拥护革命的广东工农，我们要一致拥护广州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

党中央要求全国党团组织实行一个宣传周，“尽可能利用种种方式如群众集会、游行、飞行集会、文字标语、画报等等，把广东暴动的事实和意义向工农群众作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宣传，以唤起他们继广东而起的斗争。”

团中央也向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青年致书，呼吁全国青年“赶快起来拥护中国第一个的工农兵苏维埃，给广东兄弟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举行总罢工，开会庆祝；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和革命的工会，组织工人、军队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广州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英雄壮举，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并得到了它热情洋溢的肯定和声援。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的广州》的社论。它由衷地欢呼：“历史的飞速发展再一次粉碎了关于中国革命已‘死亡’和‘失败’的荒谬的机会主义预言！中国工农运动的伟大力量再次显示了出来：工人和农民已把铭刻着无数革命英雄业绩的广州占领了！”它指出：这是“工农群众发动的第一次获得胜利的起义”，其力量的源泉是“劳动群众具有与中国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和刽子手斗争到底的革命激情和决心”。它振臂高呼：“红色的工农广州万岁！”

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也发出了呐喊，呼吁各国工人“快来援助中国革命”。由于“中国的军阀、地主、买办、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和‘左派’，同日本、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一道，将广东的工人和农民像铁桶一样紧紧包围了起来，以图将渴望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劳苦大众的这次起义血腥镇压下去，”所以它呼吁：“让我们建立起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卫我们的中国兄弟！大家都来援助广州工农政府！”

与此同时，对广州苏维埃的诞生，国内和国际反动势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扼杀而后快。这种情绪从海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反馈了出来。

东方社香港电：今日共党在中央公园开大会，议决杀资本家，人心大恐怖！

路透社香港电：广州已按苏俄政府制设立国民委员会，其委员之一，即海员工会首领，其人甚仇视香港。鲍罗廷前秘书长任陆军委员。上流社会中人避难香港者络绎不绝。据确讯，前广州反赤政府之大员多人曾存巨款于香港银行。昨日广州无线电称，外县外人纷来香港，共产党现仍握权，开枪纵火事，时有所闻，惟尚无排外之形迹。

路透社香港电：共产党首领已出示令，歼灭地主，销毁地契，没收银行钱庄，没收大商店，没收资本家房屋给工人作宿舍，当铺无条件将物件交还贫民，给罢工工人权利。英副领事昨乘英炮舰往救东山外人出险，计救回英人11名，美人15名，德人55名，均安抵沙面。该炮舰曾受北岸共产党猛轰，幸无死伤。

东方社香港电：市内商业一齐停业，市外惟见臂缠红布之武装工人，与手持锄锹、斧头等物之农民，除此而外，途无行人。市内贴有各种传单，其中如打倒农民、工人之敌李济深、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打倒反革命之国民党，及耕农民以田，食工人以米，与民众以和平者，惟苏俄农民兵士，惟中国共产党而已等文字。红军有组织，不可轻视。

路透社巴黎电：《小巴黎人》报评论广州事变，谓少数赤党在它处失败，乃至广州复仇，此变由俄国煽乱者数人及中国军界数员运动工会及赤党而成。但广州之烧劫残杀，不能更改南方之命运，因军备不足之共党，难望战胜富庶中等社会赞助之国民党。

《申报》北京电：使团对粤变如有排外行为，即以剿海盗办法，直接行动，决不犹豫。又英、法、日、美义和所组之审查南海海盗案委员会，因粤

变而更促剿办案之成立。

《申报》：蒋介石今演说，谓必须与英、法、日、美各国联合以反对第三国际。

然而，广州苏维埃政府得到的支持只能是精神上、道义上的，而面临的剿杀却是现实的、活生生的。

西瓜园大会开着的时候，敌人正从四路围攻广州。进攻观音山的敌人已突破了部分防线，向市区渗透。张太雷宣布散会后，领导人即乘车回公安局，指挥抗击敌人的反扑。与会的士兵和赤卫队员也分赴观音山和长堤等处增援。

参加大会的农军也纷纷请缨作战。枪支不足，就组织敢死队，把有限的枪支配给敢死队员。这些赤着泥脚、衣裳破烂的农民兄弟个个争着报名，他们都抱定了生为苏维埃而生，死为苏维埃而死的决心。争执不下，有人提出用“执筹”办法，在与人数相等的纸条上写上“生”字或“死”字，凡是拈到“死”字的，就参加敢死队，余者作后备队。

这真是个极为庄肃，极为感人的场面。为了保卫苏维埃，这些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的人，似乎也没想到自己能在将来过上好日子，就这么义无反顾地交出了选择生与死的权力。

“誓为保卫苏维埃而献身！”

抓到“死”阍的敢死队队员举起攥得铁紧的拳头，高吼了三声。

他们出发去了观音山。

张太雷之死

一股敌军越过观音山冲入市区，扑袭公安局。徐向前奉命率领工人赤卫队冲往吉祥路，配合陈赓指挥的部队，激击敌军。队员们有的举刀枪搏杀，有的冒弹雨运送弹药，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激战相持一阵，敌人往后退一程。几个回合下来，敌人终于被打得像炸窝的马蜂溃不成军。徐向前、陈赓挥动驳壳枪，领着队伍一举冲上了观音山，夺回失去的阵地。

守在山顶上的饶寿柏营和沈青的第一联队打得相当艰苦。周定宽和莫雄的大队人马一到山下，饶寿柏就感到自己处于明显劣势。交火后，他即派人下山要求援兵，但团长李云鹏硬是没派，只是要他顶住。由于兵力不足，疲劳，新兵和工人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的轮番攻击下，防线渐渐收缩到了镇海楼两边的一段城墙边。见来了援兵，浑身蒙着尘土，头上脸上留有烟痕火迹的士兵和工人显得很兴奋，同认识的人隔老远就打招呼。一直在发牢骚骂娘的饶寿柏这会儿也消了些火，抓紧时间组织人把伤员抬下山。

不一会儿，敌人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机关枪子弹像失火的飞蝗稠密地成片压过来。这次进攻从东西两头先打响，正面敌人继而发起强攻，火力格外猛烈，起义军被压得抬不起头，那飞进的沙石烟火，逼得人简直睁不开眼。

敌人的机枪扫射了一阵，城墙北面小山岗上传来了冲杀声。

“敌人上来啦！打啊！”是谁喊了一声。“拼啦！”“打呀！”工事里立即喊成一片。火性子公今寿把迫击炮筒扛在自己肩头上，用拳头猛击着山岩连喊发炮。朱道南咬住嘴唇把炮弹投入炮筒。炮弹发出时，公今寿的身子向上跳动了一下，他低着头，跪在地上，前胸死死抵住一块山岩，双手抱住发烫的炮筒。从敌人手里缴了这门迫击炮后，他一直都这么干，鼻腔里已被震出了血。

机枪、三八大盖枪、土杂枪、七九式步枪、驳壳枪、左轮手枪、老套筒、鸟铳，还有手榴弹，自制的四方形家伙，交织成震天撼地的打击乐。在这满世界撕裂金属般的声响中，充满了喷着怒火的眼睛、扭曲得变形的面孔、颤抖的烧红的枪管、刚劲有力的腾跃、燃烧的头发和树、带着烟缕划抛物线的大家伙、喷涌的热血、山石般的倒塌、浓烈的硫磺味、灼烫的闪光的空气……和誓死保卫苏维埃的最强音，和崇高伟大的死。

滚滚黑烟卷过，徐向前又上好一梭子弹。他听到有人在喊：“党代表负伤快不行了！”

党代表“阿陈”头上流出的血浆像是给脸颊和脖颈涂上了浓稠的红漆。徐向前在他身边蹲下。他紧紧拉住徐向前的手，挣扎着说：“你们，要继续战斗，守……守住阵地……”他吐出了生命的最后一缕气息。徐向前点点头。25岁的“阿陈”永生了。

终于又把敌人压了回去。饶寿柏狠跺一脚，亲自下山请求援兵。

张太雷、叶挺等从西瓜园乘车回到总部。饶寿柏比他们稍晚一步赶到。饶寿柏找到李云鹏就大发牢骚，呼哧呼哧地责问李云鹏为何不派援兵。李云鹏说敌人正从四面围攻，部队都已派往各处扼守，总部现在除担任警卫的二营，已无兵可调。并说，他曾命令二营待命，但请示叶总指挥未得批准。李云鹏说完，饶寿柏冷静了些，简明报告了观音山的危急情势。李云鹏急往总指挥办公室。

观音山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且占有可进可退的地理位置，在目前全盘

战局告危的情况下，它的得失尤为重要。叶挺站在地图前凝思有顷，他已看好了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了。经与叶剑英商议，他命令李云鹏立即带队增援观音山，尽全力确保阵地不失。李云鹏急调第一营和炮兵连奔援，他自己也奔赴火线。叶挺又下手令，命在长堤御敌的警卫团转到观音山镇海楼一线防守。

张太雷听说观音山告急，便同纽曼登上小汽车，欲亲赴观音山指挥反击战。

小车经过公安局大门口时，遇到一支开往黄沙车站作战的工人赤卫队。刚才，黄平在院子里的广场上给他们编好队，讲了一番激发斗志的话。出了大门，赤卫队向南而去，张太雷和纽曼向北，急驰观音山西麓的大北门。

李云鹏带队登上观音山，即在镇海楼下召集第一、三营营长、各连连长和炮兵连长开会，传达叶挺总指挥的命令，布置各连的任务，并组织了简单的进攻协同动作。徐向前和沈青也参加了会议。随后，各连进入攻击阵地，同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各连多路出击，军号声、枪声、杀声惊天动地。刚刚抵达的农军也一股劲往前冲。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逐出在山顶上占领的部分阵地及城墙以北的小山岗，坐滑梯，翻筋斗，煞是狼狈地退到了观音山北麓。

此后，敌人的后继部队源源而来，连续向山顶发起冲击，均被击退。敌人死伤枕藉，起义军伤亡亦重，并有两名连长血洒山头。战斗间隙，起义军正在补充弹药，往重要关隘增派兵力，警戒的士兵发现了敌人的又一支援军。这支援军离观音山还有一段距离，老远看去像一溜蠕动的黑色甲虫。这时炮兵连已把一门山炮拖上了山顶。陈赓一条腿踏在城墙垛口，举着望远镜，命令炮兵来他个迎头痛击。炮兵显神威的时候到了。他们有板有眼地架炮，调距，瞄准，装上榴霰弹，表演了一个急速射。炮弹打出后，大家屏气凝神地盯着。似乎过了好长时间，敌人的队伍突然乱了，像掉在地上的断线珠串，小黑珠儿四处乱蹦，然后才传来沉雷般的爆炸声。士兵和赤卫队员们兴奋得拍手叫好。

一名欢呼大炮威力的农军突然中弹倒地。山北麓的敌人又依仗优势兵力发起了冲锋。这已是第几次进攻了？8次还是10次？战斗至为激烈，直打得水压重机枪里的水滚沸冒烟。敌人又在半山腰弃下横七竖八的尸体。英勇的工人和士兵每个人都像一颗坚固有力的牙齿，起义军死死地咬住山脊不放。

天空还在下着又冷又硬的白撞雨。这时，一个残酷的消息开始在雨中传递。

这个消息传到长堤要比观音山早。由于保密，由于人们对这个消息极度排斥的心理，它的传递起初是以猜测的方式开始的。

长堤同观音山一样，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血战。李福林军在南岸重机枪和帝国主义军舰的火力支持下，一次次对西濠口和天字码头等处发起强攻，企图登上北岸。守岸的工人赤卫队协同教导团、警卫团部分部队顽强死拼，奋勇御敌。南岸敌人的重机枪集中火力狂扫起义军的炮兵阵地，子弹打在山炮的护板上当当爆响，火星飞进。士兵们仍前扑后继装填炮弹，击沉击伤敌人小火轮及木船多艘，并几次打哑了南岸的重机枪，迫其变换阵地，使得敌人的强渡未能得逞。

施展担任着通讯员的角色，他骑着自行车在东堤、西堤和公安局之间不断地兜圈子，来回传递情况。这次从公安局回来，他带回了一种不祥的气氛，说苏维埃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他并不知。这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向所有经

过的人询问，甚至派人去公安局打听。“有一个苏维埃领袖负重伤了。”有人耳语道。“负重伤的是张太雷，说是他牺牲了？”人们怀疑地低语着。渐渐地，人们开始以一种沉痛的口气公开议论张太雷牺牲的消息。有的说他是在观音山督战时牺牲的；有的说他是在苏维埃政府门前中了流弹；有的说他是在黄泥巷口遭人行刺；有的说他是在西瓜园开完会，乘车回苏维埃政府，途经大北直街路口时被敌便衣队狙杀。这些个消息因说法不尽一致而蒙上了神秘色彩，但是，张太雷的牺牲确乎已被证实了。

张太雷和纽曼乘车出了公安局，直驰枪声剧烈的大北门。车头上的小红旗在风中啪啪作响。张太雷腰挎手枪，双手还拿着一支步枪，镜片闪闪的脸上，充溢着刚强和激动。过去他常用手枪和步枪打靶，比如在越南革命者胡志明住广州的房间里打，但持枪上火线，在他还是第一次。他坐在左边，纽曼坐右边，他们的警卫员分立在两边的踏板上。

车至大北直街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机器工会的匪徒突然窜出左侧的巷口，对着小车就是一通乱射，张太雷还未及反应，就被一阵子弹击中了头部和胸部，歪靠在车厢里。司机洗流和他的警卫也当即中弹牺牲。靠右边的纽曼和警卫迅疾跳下车，跑到街旁的骑楼下依柱开枪还击。

附近的赤卫队员闻声赶来，有的当即去追击匪徒，有的跑到小汽车旁。

车身弹痕累累，车胎被打爆，血水淌出车门，在地上积了一滩。

张太雷还没断气，他无力地半睁着眼睛，像是疲劳至极似地用俄语喃喃了一句：“哎哟，可恶的魔鬼。”

他头一歪，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太雷死在了战斗的最前沿，年仅 29 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无论是就生命的亮度、强度和纯度而言，还是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言，他的一生，均极大地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1898 年 6 月 17 日，张太雷出生于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父亲张亮采是个穷秀才，因无钱娶亲，招赘于西门外薛家。太雷 4 岁时，父亲托人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谋得文书职业，全家迁往。他 9 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不忍将父亲客葬异地，硬是翻山涉水长路迢迢地扶柩归里。回常州后家境更形窘迫，只赖母亲代人作针黹以维粥米。靠了亲友的接济，他得以进一家私塾读书。他家隔壁是生产铁锅、犁头的作坊，那叮当叮当的锤击声和工人们在熊熊炉火边冒着高温吃力劳作的情景，自然使太雷联想起安源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同时，由于离家不远的运河是运粮要道，帆墙林立，两岸货栈成行，太雷自小就看到大腹贾们靠剥削欺诈而过着奢侈糜烂的日子。家境贫寒，世道不公，和母亲的坚毅性格，从小就熔铸着他对穷人的同情心和对黑暗社会的逆叛精神。后来，在一次上学的路上，一位黄包车夫的帽子被大风吹掉了，张太雷边忙跑过去拾起，给车夫戴好。同学问他干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拉着车子，停下来拾帽子很费力，而我这样做很容易。”

历史上，古城常州出过众多英雄豪杰。如英勇抗击倭寇的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誓死抵御英、法帝国主义及清军联合围杀的太平军杰出将领陈坤书，等等。张太雷上中学时的常州府中学堂，是就元代护国寺遗址而建，南墙根的袈裟塔就为宋末抗元和尚万安而建。当年，万安携杖率众与元兵巷战而死，遗体遍寻无着，遂将所遗袈裟入葬建塔。张太雷与同学瞿秋白等，常来此凭吊，口吟万安的名句：“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功绩均被太雷汲入骨髓。

张太雷入常州府中学堂那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校长屠元博及几名教员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积极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主爱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和黄花岗 72 烈士的英雄壮举，每到悲壮激烈处，太雷总是热泪盈眶，血脉贲张。受此熏陶，太雷对孙中山的反清斗争和瞬息万变的国家政局十分关注，他大量阅读具有新思想的报刊书籍，与学友们感慨议论，引吭高歌，还上街游行示威。他也曾一度倾心耶稣，每周周日一早必从西门赶到东门教堂听传教士布道，未曾缺席，但一经发觉说教并不合理，立即摒弃，以至有一次出门乘火车，太雷起而驳斥在车厢内讲道的传教士。在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下，太雷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一剪刀剪了，说：“尾巴似的东西，留着毫无道理。” 17 岁时，学校指责太雷行为不轨，勒令限期悔改。太雷不堪受辱而愤然离校。族人张绍曾借太雷聪颖精干，要太雷去他开的钱庄做事，张太雷回话说：“我最痛恨的是铜臭十足的人，最不愿做散发着铜臭的事。” 他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法科。

1916 年至 1920 年，张太雷都在北洋大学学习。这一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受其影响，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划时代地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太雷一边贪婪地吸收俄国革命的光辉，一边投入演讲、请愿、抗议等活动，在五四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弄潮。他才学出众，各科成绩优异，英文尤为出色，担任了该校《华北明星报》的英文翻译。时事造英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滋养，使他脱颖而出。1917 年，他对同乡学子李子宽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去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在北洋大学毕业后，他便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0 年，他参与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0 月，加入李大钊的北京共产党小组。而后在天津、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筹办工人夜校和工会，宣传和培养工运骨干。他与李大钊、邓中夏常走访工人低矮阴暗的陋居，吃窝窝头，睡土坑，用省出的生活费买茶叶、糖果招待工人。1921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使者赴俄，担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其后几年，他多次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魏金斯基、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与李大钊、孙中山等会晤，从中协调、建议、口译和笔译，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四处奔忙。他多次参与筹备、联络并参加共产国际、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重要会议；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授课，演讲，办刊，撰文，培养革命骨干和指导工人运动，鞭挞革命的敌人。在繁重的工作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充沛的精力，爽朗、热情而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以对事物逻辑严密、深入本质的见解，表现出作为革命家的卓越才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革命家优秀素质的另一面，张太雷有着强健的体魄和广泛的情趣。他喜欢打球，下棋，听戏，郊游。对中外史籍及文学艺术，涉猎也广。在莫斯科时，他常与其他同志结伴去游列宁山。这时候，他会眉飞色舞地赞赏罗丹的雕塑艺术，评价邓肯的瑰丽而崇高的舞姿，回味苏联艺术家表演的歌剧和芭蕾舞，甚至对驯兽绝技也津津乐道。作为一种例外的是他对古体诗词兴趣不大。尽管如此，他对岳飞的《满江红》却很喜欢，不仅喜欢，且时常记诵抒唱。巧的是，在这次广州暴动的领导人中，叶挺和恽代英偏也对《满江红》情有独钟。人生道路可以殊途同归，但相似的志趣，多少能说明他们的精神趋向与心路历程的相似。

张太雷执著革命，热爱生活，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理想。一次，在广州市郊的屋顶花园俯瞰广州市容时，他满怀温馨和激情他说：“生活多可爱呵！我们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然而，张太雷不会看到这一天了。他只能以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同他所挚爱的事业与生活永远地融合在一起。他的一生，像烈火雷霆般轰轰烈烈，在向黑暗如磐的旧世界猛烈的轰击中完成了从凡人到英雄伟人的升华。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写道：“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责任；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当时党的另外一名重要领导人罗章龙赋诗曰：

间气钟灵秀，
太雷人海龙。
轩昂渡岭表，
广暴作先锋。
镇海扬镰斧，
珠江帅工农。
红花岗上望，
千载贯长虹。

就在张太雷牺牲的这一天，1927年12月12日，广州苏维埃发表了由他亲手签发的《追悼死难烈士宣言》。它是对太雷，对所有在暴动中英勇敢献身的烈士们的最深切的抚慰：

本苏维埃代表广州全体的工人、农民、兵士，极诚恳地致哀于昨日为夺取政权而死难的烈士，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先锋，他们的牺牲是革命的巨大的损失。

广州全体的工人、农民、兵士，只有以极大的努力，继续死难烈士之志愿，为保护广州苏维埃，扫荡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而奋斗，以补救这样的损失。

现在，广州的工人、农民、兵士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烈士，一切的成就都是他们努力与流血的成果。永远要纪念这些烈士的奋斗精神，永远要保持这些烈士所成就的事业。

要用全力维护苏维埃，要实行苏维埃已经宣布的政纲，没收银行、钱庄，没收大商店，没收阔佬房屋给工人居住，当铺物件无条件发还贫民，这些烈士是为这奋斗而死的，我们一定要继续着奋斗。

本苏维埃为工人、农民、兵士自己的政权机关。本苏维埃要不顾一切的为工人、农民、兵士的利益奋斗。死难烈士的志愿，便是本苏维埃的志愿，他们的精神永久与苏维埃政权保障着农民、工人、兵士，而且要领导他们继续向前。

死难烈士的精神不朽！他们是广州苏维埃的创造者！他们是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先锋！继续为完成他们的事业而奋斗！……

张太雷的名字和精神刻在了中国革命的丰碑上，光照千秋！在那辆流着鲜血的小汽车旁，认出了张太雷的赤卫队员大惊失色，拔脚就奔往总指挥部报信。

周文雍、黄平等闻讯十分震惊。但情形紧张危急，他们来不及体验痛苦。

在遭到沉重的当头一棒后，或者是变得更加坚定，或者是一下坠入恍惚。周文雍一边派赤卫队到现场警戒，一边要汽车工会调车抢运遗体。

汽车工会的负责人袁松、杨绩、梁梅枝等人开了一部大客车到现场。人们急快而轻稳地把张太雷的遗体抬上大客车。张太雷警卫员和司机洗流的遗体也抬到了大客车上。

暮色中，张太雷的遗体运到了总指挥部，周文雍让抬入中楼的一间屋里，放在一张床上，用蚊帐盖住。周文雍在一旁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明天要开追悼会。又对哭喊而来的洗流遗妻安慰了一番。随后去西关等地指挥赤卫队的战斗。

张太雷的面孔像大理石一样宁静、安详，他的拳头还紧紧地握着。

“出师未捷身先死”，太雷呵你定然有憾！

无声的撤退命令

张太雷牺牲，各处传来的消息又均是“危急”二字，使叶挺的内心更加沉重和矛盾。

当他提出撤退建议被纽曼否决后，也许更早些，当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次暴动在军事上注定不会成功的命运后，就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尽管他镇定自若，竭智运筹，力图使凌乱不整的有限军力凝聚成拳头致敌以全力打击，但，他知道这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后来他在报告中写道，他“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作为一个身怀雄才大略的铁军将领，胜利是他唯一的光荣与梦想。当要他去指挥一场无望获胜的战斗时，他的心情就早已搅入了在失败后被对手残杀的人群发出的惨叫声中了。

而且，眼下的情形还刺痛了他记忆中那块新鲜的伤疤。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抵长汀，就南下东江的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主张长驱直下潮汕；而叶挺等人主张先以主力占领大埔北部一带，理由是：先在大埔一带吃掉敌军主力，则潮汕可不战而得，否则将会被敌分而围歼。但苏联顾问纪功代表的大多数否定了叶挺等人的主张。起义军占领潮汕后，立时像叶挺预想的那样陷入险境。这时，叶挺又提议放弃潮汕以集中兵力迎击敌军，再遭否定。结果，南昌起义军落得大败。

战国时的军事家孙臆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叶挺有着冰清玉洁的政治品格，个人有再大的委屈他都能承受，然而，他不能容忍由于主观蛮干的瞎指挥给革命队伍一再造成无谓的流血牺牲。

黄昏时分，叶挺叫上聂荣臻，跑到距总指挥部一箭之地的财政厅，登上可以纵目瞭望全城的办公楼顶。

四处都是枪声。他们凭借军人的耳朵，听出了起义军正在凭勇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军，正深陷于逸散着瘴病之气的黑暗泥淖中苦苦挣扎。他们转着身看了一圈：一股敌人又突破观音山部分阵地，向山下运动；市面混乱，有些街道在进行巷战；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舰在珠江上游弋，烟囱里吐出的滚滚浓烟涂黑了天空；长堤的广九车站、黄沙车站、中央银行等处烈焰熊熊……

敌人的包围圈正在合拢，起义军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现在怎么办？”聂荣臻知道叶挺邀他来这里自有深意。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叶挺酷爱的《满江红》此刻定然在他的胸中翻腾激荡，而血色的夕阳残照又给他倔强而敏感的内心抹上了一层凄恻的沧桑之感。

他不语，像铁打铜铸一般站着不动，英气四射。

“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就有被全歼的危险，”聂荣臻说，“我们应该当机立断。”

叶挺冷峻的脸上微露宽释之色。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在凌晨的会议上已有共识。

他们就此分手。殊不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叶挺的雄才大略，他纯洁的精神境界及忠讲义胆，他的正直、倔强，也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1946年4月8日，叶挺在从重庆去延安的途中于黑茶山遇难。悲恸万分的聂荣臻挥泪写长挽，颂悼叶挺坎坷而英烈的一生及缅怀铁肩战友之间的刎骨之情。长挽

写道：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饮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羈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挽救起义军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最后关头。

就在叶挺和聂荣臻做出撤退决定的时候，位于广州市西南角的黄沙车站已陷于敌手。

大约是在一小时之前。

担任警戒任务的李连在车站到如意坊一带踱着步，队员们的眼睛熬得像“猪红李”似的，都被他安排去休息了。他看见从如意坊直街过来一队弟兄，他们有的端枪，有的提棍，脖子上都系着红布带。李连向他们挥挥手。队伍越走越近了，李连感到这队人都很陌生，便问：

“你们是哪一队的？”

“自己人。”对方加快了步子。

李连顿生疑窦，大声喝止。那队人立马散开，蜂拥而上。李连抡起驳壳枪砰砰撂倒两个，又一闪身，躲过劈头砸下的一记重棍，反手一把夺下木棍，大吼一声：“打死你班契弟！”还他个头壳开花。再回棍扫一个“老树盘根”，让一个家伙的脚和嘴倒腾了位置。他感到天地突然一暗，岩石般沉重的黑色从眉眼倏地直灌到脚下。

这股冒充工人赤卫队的敌人，是早晨乘火车赶到西村的周定宽团一部，也有一些是机器工会的流氓。曾伟赞、王春随后指挥赤卫队，利用路轨、车厢、房屋、月台作掩护奋力抗击。王春跃上一个车卡高喊：“兄弟们，唔使怕，打呀——！”敌人后继部队到了，鼓噪呐喊着猛冲。王春又从掩体里跃上烟尘滚滚的车卡，用已经嘶哑的声音喊道：“兄弟们打呀！同苏维埃共生死……”他突然地顿住，从车卡上栽落下来。赤卫队员个个像困虎发威，边喊边打。双方均有众多死伤，但由于赤卫队员人数少，减员就很显。最后的30多人退到了车站的东南角，已濒于弹尽粮绝。曾伟赞点名留下几个队员掩护，命其他人留下弹药迅速撤退。但没有人肯走。他们夺过曾伟赞的枪，绑起他的双手，把他推到河边的一条小道上，他们说：“曾车长，你要出去找殷叔，对他说我们没有把车站白白让给敌人！”

余下的十几名队员打光了每一颗子弹，用枪托和棍棒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抓住，推到黄沙桥下用乱枪杀害了。当凶手们下了毒手，余悸未消地上桥坐下，想点颗烟松弛一下神经的时候，桥下突然爆发出“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声。凶手们吓得魂飞魄散，全都卧倒在桥面上。桥下，李连血淋淋的身子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重又倒在了血泊中。

敌人占领了黄沙车站，一可以通过铁路运输援兵，同时掐断了市区起义军与江对面石围塘等地农军的联系。

从黄沙站吊个大斜角，在广州东北市郊的瘦狗岭，反动地主民团聚众造势，对起义军的退路构成了威胁。早晨，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瘦狗岭相遇的队

伍并非自己人，当那支队伍行至距特务营约 300 米处，突然呜呜地吹响海螺，放着枪猛扑过来。王侃予和宋湘涛立即看出这是由土匪组成的地主民团。为了不被它拖住，他们率部向北转移，又遭到北面地主民团的围攻。特务营腹背受敌，与凶狠狡猾熟悉地理条件的地头蛇展开了搏斗，苦战竟日，至傍晚，打退了民团的一次次进攻，己方亦受重创，伤亡与失踪 300 多人，崔庸健的第二连几乎拼光。这儿距沙河近在咫尺，是广州通往海陆丰的要道。

12 日一整天，观音山、长堤的拉锯战在激烈进行；猎德、红花岗等处对峙双方的对射间达高潮；珠江上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舰时而发炮逞威，日、英军还上岸骚扰；市内的机器工会匪徒更加猖狂，以背后袭扰、在楼顶放冷枪的方式打击赤卫队，并四处放火、抢劫；被击溃的警察也重新纠合起来，在九个区与赤卫队展开了巷战。

而且，敌人的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就当叶挺和聂荣臻去财政厅时，张太雷牺牲的噩耗已在总部传开。一名赤卫队员把张太雷的金链怀表交给了黄平。就像被一记重棍打懵了，黄平顿时变得神志恍惚。作为主要领导人，他既没有把情况告诉在总部指挥战斗的恽代英，商量对策，也没有对下一步该如何办作出打算和布置。他这时只感到漂浮无依，尽管他勇敢地想到了死，想到了与苏维埃共存亡。

聂荣臻离开财政厅后，急匆匆地回到总指挥部。在门口遇到恽代英和陈郁，他说敌人大部队就要攻上来了，让他们赶紧撤离。说着正好有一小股警察冲到附近，聂荣臻迅速进入沙包垒筑的工事，与一位朝鲜籍机枪手一道击退了敌人。随后，他到北楼找到黄锦辉，经过简短的磋商，决定分头命令起义军先撤至黄花岗集中，再经沙河去花县。黄锦辉懂广东话，负责通知赤卫队，聂荣臻通知教导团。

恽代英到中楼办公室，要黄平、吴毅等人赶紧撤退。黄平让恽代英先走，以后好写广州暴动的始末，他和吴毅等人留下，豁出去同敌人拼了。

这时，纽曼、杨殷来了，徐光英也来了。徐光英决然对大家说，敌人已到小北，十五分钟后即可抵公安局，我来负责组织部队撤退，你们文人跟部队走没什么用处，不如隐蔽下来继续斗争。纽曼说形势既然如此，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军事人员留下指挥。恽代英坚信失败是暂时的，他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要接受教训，今天失败了，明天定然成功。

大家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挥泪而别。

出了公安局，恽代英迎面碰到警卫团的陈同生。恽代英告诉他，总部已决定撤出广州，你们可以转到东江去，与彭湃的农民赤卫军和红二师会合，继续斗争。

聂荣臻找到李云鹏，要他马上集合教导团组织撤退。黄平步行去西关住所的途中，遇到周文雍。黄平把徐光英的话转告给他，说你也应该转入地下做秘密工作。他竟然忘了周文雍指挥着赤卫队，是一个军事干部，赤卫队也同样是应该撤出广州的一支军事武装。

穿一身工人服装的叶剑英此时仍在长堤阵地指挥战斗。他听说彭湃的农民赤卫军已到了东山石牌，就找到司机罗炳等人，要他们马上找车子去接运，当叶剑英回到公安局，总部人员已撤空，他跑上楼，见办公桌上满是五十元、一百元一张的钞票。他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离去。

观音山部分阵地又被敌人攻破，两军犬齿交错地激战到天黑，敌人停止

了进攻，只是抽风似地间歇放上一阵子枪。由于指挥系统和阵线混乱，撤退命令有的通知早，有的通知晚，有的无法通知到；已通知到的也有一部分因同敌人胶着对峙，不得摆脱；也有的打红了眼，拒绝撤退，要与敌人血战到底；还有一部分留下来担任掩护。

山上的赤卫队没接到通知。队员们饥饿难忍，有人跑走找吃的，就没再返回。对于下一步的步骤，徐向前觉得有必要去请示一下。他独自一人跑到公安局。办公楼空荡荡的，屋子里乱得一团糟，地上摆着一些打开盖子的木箱，里面净是银毫子。徐向前迅速地作出了判断，他从木箱中抓了几把银毫子，转身走出公安局。这时有六七个官兵从他眼前跑过。其中一个回转身拉住徐向前说，老兄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快到黄花岗集合！此人是朱先墀，在武汉军校时是徐向前所在区队的区队长。

在四军军务处，贺诚正指挥往卡车上装药品和器械。他在北医大上学时的女同学黄淑明闻讯赶来，低头柔语道，你该明白局势有多险恶，爸爸从美国来信要我去留学，我们可以一道去，凭你的才学和毅力，一定能取得荣誉和地位。黄淑明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漂亮小姐，苗条端庄，性情温柔，使贺诚倾心。但贺诚决计不改变自己的选择。黄小姐的脸色渐渐变得阴郁。

长堤有多处房屋在燃烧，劈劈啪啪的大火爆裂声中，夹杂着忽密忽疏的枪声。接到营长叶镛命令，尹相升、张晋庭所在的排迅速撤出阵地，跑到集合地点。叶镛宣布全营立即出发去黄花岗，接受新任务。途中，到处都是死尸，里面有敌人，有市民，也有参加暴动的同志。有些交叉路口和街道上遗弃的箱子、包袱、杂物遍地皆是。到了黄花岗，陆续到了几只队伍，叶镛让全营停在路边等候。不久，各连排基本到齐，全营人数比暴动前少了近半，气氛顿觉苍凉，大家默默无言相互握手，与其它营连汇成一股向沙河、花县方向而去。

徐向前带领十多个赤卫队员也上了路。一路上，见到零星人员就喊，到这边来，跟我们到黄花岗集合！到了黄花岗，主力部队已转移。他们继续往花县赶。

药品和器械都装上了车，贺诚把早已写好的一纸赠言交给黄淑明，便毅然登上驾驶仓。卡车开足马力，驰进了厚厚的夜色。赠言写的是：“我以同你一样善良的心为你祈福。今日一别，或为永诀。披荆斩棘的人会有死亡；然而，没有道路将只有死亡。忘却我这个冷酷的人吧。”

深夜 12 点左右，周文雍从西关回到公安局，证实了黄平的话。他立即派何添到如意坊，向那里的工人赤卫队传达撤退命令；派简发通知坚守观音山的赤卫队，命他们掩护教导团撤离后即行撤退；又命通讯员通知洋务工人赤卫大队负责人梁国志，要他带领有枪的队员去长堤加强布防，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何添开车至惠福路口，见马路中间躺着个人，背着马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像是教导团的士兵。他连忙下车，在将这人扶起时碰落了军帽，方知是个女兵。何添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是在开得很快的卡车拐弯时没把稳被从车上抛下来的。何添把她抱上车厢。她嘴里念叨着在昏黑中伸出手四处找她的枪。何添顿生敬意，并感到她摔得不轻，便把车头调转了一百八十度，驶往位于东山的中山医院。

差不多是在周文雍下令的同一时间，李沛群接到沈青要求增援的纸条，被通信员的手汗弄得字迹模糊的纸条上写道：速派队增援，多带弹药！李沛

群把陆续来到队部的赤卫队员和工友集合起来，派上了观音山。

梁国志领着人到长堤后，不知何为布防，又没有士兵指导，就凭想象隔个两三丈远留几个人一字儿拉开。

工人赤卫队由于组织松散，基本上是各自为阵，又少有军事素养，在当时紧急复杂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有效地实施命令。他们所具备的，是战斗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

张太雷的死讯，如果曾给总指挥部带来军无主帅的慌乱，在工人赤卫队中却极大地掀动了英雄主义激情和复仇的怒涛。

第六章 悲 怆

失败的另一种意义

聂荣臻通知部队撤退之后，摸黑回到在八旗会馆附近租用的住所。途中，曾与商团遭遇并被搜身，他处险不慌，因不会说广东话，就一声不吭，结果被搜走了一支钢笔。他怕招致敌人的眼线没有敲房东的门，就在楼梯口坐待天亮。此时他开始咀嚼这次暴动的得与失。此后的三天里，他关在屋子里写了一份总结暴动的意见书。他认为，正是由于不断研究五十几年前巴黎公社的经验，列宁才得以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鉴此，为了指导今后工作，对于我党自身刚刚经历的暴动加以总结就更有必要。他的这段话中有两个闪光的东西，一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眼光；一是揩干净血迹爬起来再干的百折不挠的斗志。

聂荣臻在意见书中首先写道，广州暴动是高擎镰刀斧头红旗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且产生了苏维埃政权，具有非同以往的意义。但是，暴动最终是失败了，这里面有哪些教训需吸取呢？他这份近距离总结的主要笔墨当然是放在了具体的教训上面。教训大致可归纳为 10 点，其中很重要的几点，一是事起仓促，组织和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二是军事指挥机构不健全，对工人赤卫队等不能实施有效协调的指挥；三是撤退无计划，秩序混乱。

情况的确是这样。

就当参加暴动的主力部队撤离广州，聂荣臻在住处楼梯口坐待天亮的时候，作为广州暴动之一翼的市郊农军对佛山普君圩的攻击才刚刚开始。

按照杨殷原先的布置，12 日起事后，当周侠生领导的农军第一团得手石围塘和大沥，即与吴勤的第二团配合打下佛山，控制广三铁路线，巩固广州外围。但原定时间未到，驻候在佛山附近雷岗一带的吴勤就听到了暴动打响的消息，而且一日三变：广州已经全部拿下了；教导团将要开来协助打佛山；陈公博、朱晖日、李福林正在调兵驰援，英美军舰已炮轰起义军、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登岸进攻；周侠生已在大沥奏捷……纷至沓来的消息中就是没有军委的指示，这把张飞性格的吴勤急得如火烤油煎。12 日晚，当听到敌人反扑重又占领观音山时，麻脸胀红的吴勤一跺脚说：“周侠生不来，我们自己干！”

农运特派员梁复然说：“战斗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特殊情况周侠生不会不出动。再等一等看吧。”

吴勤急得跳了起来：“复然呐复然，你真成了‘偷鸡佬’啦，哪来的这个耐性！我吴勤等来等去就等的这一天，不拉队打，还革他妈的什么命！”平时说“偷鸡佬”，是谑指梁复然穿着教书先生式的长衫，今天恐怕是蔑称像教书先生一样迂慢的梁复然。

梁复然还是沉得住气：“没有肥佬周的配合，能有把握打得进佛山？”

吴勤马上说已同钱维芳、周金、还有敦厚和水涉等处的农军商定，一打进普君圩他们就拉队响应。吴勤激动地来回踱着大步，忽地站住，一把拉开对襟衣扣，嗓子沙哑地嚷道：“不提革命吧，我还有家仇，不打下佛山我是五火攻心啊！”

梁复然知道，“四一五”时黑狗抓吴勤未逞，便跑到他家杀了他不满周岁的儿子。话送到了痛处，梁复然也已然是血涌三丈。打！先打佛山的门户普君圩，再视情打进佛山。

农民赤卫军第二团出发了。那情形就像是一幅粗犷的油画，画框里塞满了发怒的眼睛，头发，枪和砍刀，暴突的肌肉块，火焰和向四处疾速飞散的夜色。还应该刻意描绘那些赤裸的或穿着破草鞋的脚，粗壮，急切，杂乱，充满苦难和它们踩在大地上的力量。

队伍疾抵普君圩牛肉巷口五街公所近旁的鸭仔廊。

“密实实，双无底——丢佢老母！”“长三六大，骰辘六小，摆乌龙啦——契弟！”公所楼上灯火通亮，黑狗们推牌九仍在兴头上。吴勤指指连接着公所的跨街越屋的木板天桥，要大家就瞄准它和楼上的窗口打，他独自一人上去轰窝子。梁复然让他多带几个人。“一个人上去连鬼都不知。”吴勤说着便消失在夜色中。

大家散开刚找好位置，就听到吴勤一声吼：“我系豆皮勤——炸弹！”

楼上顿时开了锅，惊呼声，跌倒声，咒骂声，重物碰撞声，混成一片涌上了天桥。赤卫军一部分跟着冲了进去，一部分等在天桥下面举起枪，像打鸟一样，基本上是顶着屁股扣扳机，黑狗子纷纷惨叫着从天桥上重重地栽落地面。不出一袋烟的工夫，30来个黑狗竟全数毙命。

梁复然吹了吹冒烟的枪眼，问吴勤：“你的炸弹呢？”

“呶，”吴勤指指自己的嘴巴，“这，炸弹！”

公所前厅的两张八仙桌上散放着骨牌和银毫，地上鞋子、木屐东一只西一只。几支七九步枪搭着子弹带挂在后屋墙上。二楼的几张床上都摆了烟局，烟枪、烟托满床乱抛，荧荧烟灯尚未熄灭。梁复然捡起几根烟签，在烟盘里摆成一道栅栏，说：“佛山街头街尾都有这玩艺。”吴勤瞅着说：“傻仔才去冲栅，不会挖个墙洞钻进去吗！再有个一两百人，打佛山就不成问题了。”

打普君圩的战斗结束了，但配合进攻佛山的队伍仍未到。吴勤又忍不住地埋怨起周侠生来。

这时，周侠生已无法实施行动计划，因为敌人援军韩汉英等团和民团两千多人向大沥圩展开了反扑。在大沥的军民赤卫军第一团只有二百人，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硬拼或死守均为不利。县委紧急决定兵分两路突围，驻仁兴善堂总部的一百多人由周侠生、陈道舟和谢颂雅率领，驻忠义祠的七十余人由张霭泉率领，到松岗集中，再北上花县。

但是，张霭泉没能冲出来。就当周侠生带队在赤脚与泥泞唧唧有声的凄冷伴奏下穿越于黑夜细雨中时，张霭泉率队与追杀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子弹织成的火网一网网地打捞着生命。赤卫队员只剩下十多人了。张霭泉把打光了子弹的左轮手枪别在腰间，照护一位伤员到田边喝水，背后一声枪响，伤员倒下了。张霭泉被一支马枪和一支手枪顶住脊背，他看到持马枪的家伙正是在“四一五”时屠杀过无数农军兄弟、追捕过自己的恶霸邝剑平。这一刻他的眼睛肯定是烧红了，甚至还有头发梢。张霭泉裂嘴朝邝剑平笑笑，借着对方一瞬间的困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夺过他的枪并打死了他。张霭泉也中弹了，慢慢地倒在了血红的犁头旗下。

周侠生、陈道舟也没能冲出包围圈。见张霭泉没跟上来，已经脱脸的周侠生、陈道舟和谢颂雅又返身接应，途中与追赶上来的大批敌人遭遇，他们且战且走，在张边围河泅渡时，周侠生和陈道舟被敌人的乱枪击中。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水。

周侠生在大沥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普君圩，还有周金在山紫村被李福林的军队抓走，钱维芳孤身突围后不知去向。吴勤听到的尽是坏消息，但

他仍准备自己干。张发奎闻讯派陆满团来镇压，身为南海人的陆满过去与吴勤有旧，为避免祖坟遭劫，陆满透过私人关系告诉吴勤广州暴动已失败。也算是通牒。吴勤经证实后含着悲愤退走。这已是稍后发生的事了。

而在当时，教导团主力及部分赤卫队经由广州东北郊的沙河，正向花县撤退。

黄埔特务营余部打退了地主民团的围攻，与警卫团撤出部队及教导团零散官兵会合，在黑茫茫四处海螺的鬼哭狼嚎声中且战且走，也赶往花县。

也是由于事起仓促计划不周，原定于15日赶到广州的朱德部队，在抵达韶关时就得到了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海陆丰革命武装也于驰援中途得悉失败而折回。

而赤卫队大部及少量的教导团、警卫团士兵仍据守在阵地上，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聂荣臻当时指出的具体教训还有：后勤保障不力，以致总部连买小菜的钱都没有；无明确俘虏政策，俘虏的穷士兵没能争取过来；战术和技术指导欠缺，缴获的机枪大炮极少发挥作用；侦察工作轻疏，对敌情茫然不知；未能有效地控制邮电系统，敌人被打退后仍能利用其调动部队；未能破坏粤汉、广三和广九三条铁路，敌人仍能通过铁路快速运兵；肃反不彻底，尤其是未把军政头目抓起来，以致使他们逃往河南后能指挥反动军队迅速卷土重来。后来，有人从敌我双方的实力来加以考察，认为许多事情在当时根本就无法做到，特别是抓获敌军政要员，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事。这也没说错。甚至可以用聂荣臻自己后来的话说，他当时指出的经验教训只是关系到成败的大小和快慢问题，而不是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是不是可以说，聂荣臻在当时指出了广州暴动为什么会这样快就遭到失败的直接的具体的原因。

张发奎、陈公博于12日夜由江门和肇庆搬兵后回到广州。此时，所调薛岳、许志锐师等部队均已抵达，从江西撤回的缪培南师也已到北江制造局一带，加上李福林军驻守及回援部队，已有四五千。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朱晖日经谋划后，命令各部分为四路总攻：一路由石围塘渡至黄沙登陆，从如意坊突入；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江，进攻西壕口；一路由土敏土厂进攻东堤；另一路由猎德渡江，沿广九铁路向东堤夹击。命机器工会千余人组成敢死队，佩戴白领带白臂章，驾汽艇引路。海军各舰亦分域发炮助战，掩护渡江。同时电令莫雄猛攻观音山，周定宽在黄沙接应渡江部队，其它已登上北岸及从陆路到达的部队协同进攻。李福林在集合部众训话时，曾有一名军官向他连击三枪，可惜未中。此无名勇士抱恨殉义。

命令发出后，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朱晖日即登上“宝璧”、“江大”二舰亲驾督战。张发奎又掀起下唇，手扶着船舷只看不说，好像打了胜仗的人故意不谈战争，说笑话的人故意自己不笑一样，尽遣一幅不可一世加深不可测的派头。其他几个人受其感染，也都摆出一副可笑的博大深沉的样子。

13日拂晓，四路敌军同时开始了渡江大反扑。

胆怯的胜利

主力部队已经撤走了，守在观音山镇海楼一带的主要是工人赤卫队，还有市郊农军和少量士兵。没占到便宜的敌人在后半夜停止进攻后，沈青在阵地上走了一遭，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并组织调运食品，把伤员和烈士遗体抬运下山。大家这时才感到了饥饿和冬夜的寒冷。像钝重木棍一样的困倦一下一下地敲击着脑门，他们趴在又冷又硬的石头上，渐渐沉入了梦乡。山上出奇地静，偶尔响起的枪声像玉珠滑过银盘一样清晰悦耳。这是担任警戒的赤卫队员在狙击偷运尸体的敌人。

天空下起了浙沥小雨。

自韶关紧随周定宽团乘火车南下的陆满团，因在源潭修复被当地农军拆毁的十余丈铁轨，耽搁了时辰，于13日凌晨方抵达西村。陆满下了火车，又接到李福林于11日发给他的急电，这份由广州铁路局转交的急电称：“目前广州有少数工人举行暴动，着南下到达江村停止，警戒、探明回省。”他就按照李军长的嘱咐，派出一个营布下警戒，再抓几个当地居民询问情况，又与驻陈家祠的莫雄团部取得了联系。随后，他决定以全团兵力扑击战略要地观音山。陆满挺鬼，他让莫雄和周定宽在正面仰攻，自己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一路由磨盘岭、登峰路抵至镇海楼左侧，另一路由西门转至三元宫侧攻观音山右翼。天蒙蒙亮，即发信号开始了攻击。陆满团配有炮兵营和重机枪连，火力甚猛。正面周定宽的部队也蜂拥而上。

这一次来势可真凶。这一次是三面受敌。这一次，机枪的子弹像暴雨；炮弹连成片地爆炸，灼烫的气浪像一股股横冲直撞的小台风，相互撞得粉身碎骨，带着尖利的火粒和硫磺味硬扎扎地刺进人的鼻腔、喉咙和肺。

细雨绵绵，空中布满了细密坚硬的物质。

沈青挥舞着指挥刀嘶哑着嗓子一连声地喊打，喊为太雷同志报仇，赤卫队员们都嫌手中的家伙赶不上心劲。未接到撤退命令的教导团三营十连的二十多名士兵，在连长邱维达指挥下于观音山左侧与敌接战。还有因回团部搬运子弹与上级失掉联系的炮连王雷云一个班，还有背挂铜鼓帽的农军敢死队。农民弟兄不但有勇，还挺有谋，只听到林扬珠等人不停地喊：“朝扛旗的打！朝扛旗的打！”阵地上竟然还出现了四名女扮男装的队员，她们剪一色短发，穿对襟唐装，操着海陆丰口音发喊。在观音山的右侧，由于不及防备，工事被一股敌人突破，赤卫队员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沈青连着几个虎步跃过去，瞪圆双眼一阵横劈竖砍，杀得血污四溅。“缴枪！”“丢佢老母！”“契弟！”“咸家铲！”咬牙切齿的咒骂声，和铁质木质肉质撞击声刺刀扎进肉体声石头滚动声躯体倒扑声粗重的喘气声恐怖的惨叫声吃力的踩踏声燃烧声崩爆声枪声炮声在战争的搅拌机里汇合成一个大声音，那就是极度的痛快，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悲愤，极度的残忍，极度得让人失去了对这些感受的知觉。

敌人像扑上礁石的浪头一样退下去了。一些杀红了眼的赤卫队员不顾一切地跟着冲了下去，一直冲到山下，就再也没有返回。

不久，敌人又组织起新一轮进攻。一次，又一次。

在张发奎发出总攻令后，各路敌军同时杀气腾腾地向广州猛扑。英国军舰“莫丽翁”号和美国军舰“沙克明”号的海军陆战队，在英国副领事郝尔的带领下，借口救护侨民，在长堤登岸协攻。机器工会在市内的千余人也充

作内应。守卫在西濠口、东堤、红花岗和如意坊等处的工人赤卫队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血战。

除了观音山，战事最为激烈的要算是长堤西濠口了。当观音山的敌人发起一次次冲锋时，强行登陆西濠口的敌人也在一次次地溃退，留下了层层叠叠的尸体。陈功武咽下一口噎嗓的干火，把满腔的仇恨全都压进枪膛，喷射出去。刚才，他跑到明星戏院，只见那儿空寂无人，传单撒了一地，原定在那儿给张太雷开追悼会的计划怕是泡汤了。陈功武返身奔回西濠口，打一枪，骂一句，他的血管几乎都要爆裂了。工人赤卫队打得极为悲壮，二百多队员在不断减少，受伤的队员依旧倚着沙包街垒一枪一枪地射击，有人打着打着就断了气。从黄沙登岸的一股敌人也冲了过来。天空中的乌云像一锅沸水剧烈地翻腾着，它溢出来了，细密的小雨顿时变成瓢泼大雨，把温热新鲜的血冲进了滚滚珠江。正杀得难解难分，几名队员突然被从背后打来的子弹击中。“不得了！嘉华银行的大楼上有机器工贼！”何振武惊呼一声，马上带几名队员去撬银行大楼的铁门，但怎么也撬不动。由于腹背受敌，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赤卫队撤出了工事，人人都是一身血、雨水和泥污，沿着太平南路的骑楼且战且走，向西瓜园和丰宁路一带退去。

东堤的战斗也极为猛烈。游曦带领邱继文等一个班的女兵参加了这场残酷的战斗。她们是昨晚从团部赶来增援前线的，此前她们一直在做宣传和救护伤员的工作。她们到达东堤时，教导团和警卫团主力刚撤走。她们同工人赤卫队并肩守着街垒阵地，与登岸的敌人反复搏杀。女兵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子弹也已告罄，形势十分危急。游曦并不知道撤退的事，她派了一名女兵去总部报告。敌人又摸过来了，游曦指着插在阵地上的一面红旗高声呼道：“同志们，只要我们有一人活着，就一定要高高地举着这面红旗！”她们向靠近的敌人甩出了最后的几颗手榴弹，就同敌人开始了肉搏战。游曦的身体很壮实，又苦练过刺杀，喊叫着涌上来的敌人一连被她捅死了两个。她的刺刀拼缺了口。终于，她的后腰中了一刀。她的腿、臂、胸，都中了刀。

红花岗交上火后，在惠爱路一带担任警戒的工人赤卫队、农军和学生都跑到山上增援。他们居高临下，以山上的乱坟堆为掩体，高喊着“杀呀！”“为太雷同志报仇！”“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甘宝源打得性起，一连发了十几枪，关国提醒道：“睇准了再打，一粒子弹也别白花了。”话还没落地，甘宝源正好又撂倒了一个，关国连忙夸奖道：“老甘真好枪法！”大伙越打越长精神，一位背着药箱、穿学生裙的女学生也在战斗中学会了打枪。对垒了几个小时后，敌人见正面攻不下，就绕道向省党部转移。关国说敌人这是想从侧后包抄，大伙亦认同，于是后撤。果然，在东皋大道一带又与敌人形成对峙。到了下午，突然从红花岗方向扫来一阵密集的弹雨，赤卫队、农军和学生猝不及防，死伤过半。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撤。大家把身负重伤的同志扶到偏僻的地方，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他们。那位女学生背着一位已经停止呼吸的男学生，哭着不肯放下。他们边打边退，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打。留在原地的重伤员们挣扎着射击敌人，用最后的一滴血掩护自己的同志。

敌人从各个方向涌进了广州市，市区到处响起了“抓红带友”嚎叫声。被打散的工人赤卫队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敌人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遇到从窗口和门洞射出来的子弹。骑楼方方正正的土敏土支柱，也成了打击敌人的有利掩体。在用桌椅、麻袋、砖石构筑的工事前，搏斗极为酷烈，有的赤卫

队员已经牺牲了，但他的双手仍然紧紧掐住敌人的脖子，敌人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最后一把子爆发力，惊吓得大喊大叫；有的队员把刺刀扎入敌人身体时，自己也被刺中，他们双双倒在血泊中仍保持着突刺的姿势；有的队员负伤躺在尸丛里，当敌人围拢来时，也许是他刚刚苏醒，也许是他忍着巨痛一丝不动就是在等待这个时刻，他忽地跳起，拉响了手榴弹。

雨下下停停。观音山上到处都在冒着缕缕黑烟，散发着焦臭刺鼻的气味。英勇的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军和革命士兵面对十倍二十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地拼死搏杀，打得眼睛烧红了，枪筒也烧红了。这真是英雄的山头！有的子弹打光了，就抱起石头和烂城砖砸。敌人冲上山头，就用刺刀和枪托拼，有的受伤倒下了还死死地抱住敌人用牙齿咬。他们已经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暴动主力已撤退，敌人包围并已攻入了广州，守卫观音山的队伍又饥又冷又疲，已是弹尽粮绝。面对这种形势，沈青、邱维达等不约而同地作出了撤出观音山的决定。

“为什么要撤退？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血不就白流啦！不是太便宜了这帮契弟啦！”赤卫队的勇将、中队长冯苏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反对说。

“我也想不通。想不通也得想通。现在坚持守下去的结果只会把队伍拼光，撤走是惟一的生路，能保住力量以后再干！”大队长石喜开导说。石喜的红领带被烤成了焦黑色，对襟蓝布夹袄已被煤炆、黄泥和血渍涂染得面目全非。他和冯苏每人腰里都别着三四把刺刀，这是牺牲战友的遗物。

“要是一撤退，不是什么都毁啦！”冯苏的口气更冲，“穷人还是吃苦受罪，天下还是地主买办的天下，机器工会那帮契弟又要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昨天在西瓜园宣布的政纲都成了空话，那样，我们工人还有什么路可走！”

看着冯苏被烟熏火燎的脸膛，沈青的鼻子一阵发酸。他沉了沉，坚定严肃地说道：“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怎么会一天里就什么都毁了呢？同志们，实现政纲是要经过长期的奋斗的，流血牺牲也不单是在今天。路还远着呢！石喜说的对，今天撤退，是为了明天的进攻。”

敌人的冲锋号和机枪又响了。已不容许也无必要再迟疑了。石喜、冯苏要求带领他们的队员殿后。满脸痛楚悲戚的沈青一咬牙，毅然率领队伍撤离了阵地。邱维达的十连和农军也相继撤离。

冯苏大喊一声，猛地跃出工事，迎着冲上来的敌人扑过去，一连刺倒了三个敌人。他突然站住了，踉踉跄跄地挪了几步，用脊背靠牢一块石壁。他身中数弹，衣服上洒出好几块殷红湿亮的血迹。他就这么挺立着，慢慢地阖上了眼皮。敌人一窝蜂冲上了山顶，石喜带领最后的几名队员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拼杀。他抡起枪托打飞了一个敌人的帽子，又连着砸翻一个，自己的左肩和右腿也受了伤。当他向第三个敌人砸去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枪杆脱手飞出去老远。他大喝一声向敌人扑去，对方的枪响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双手也掐住了对方的脖子。他凭尽最后的力气死命地掐，同敌人一道翻滚着跌下了山坡。

沈青带领赤卫队向西突围，在半山腰与一股敌人混战了一通，队伍又被撕成几块，有的终落虎口。沈青一路打到山下的大北直街，回头一看，跟下来的只剩十余人。这时，满城都是大火和烟雾，在房屋劈里啪啦的爆燃声中夹杂着稀稀落落的枪声，燃着的汽车轮胎散发出难闻的焦臭味。几乎每个路口都有颈系白领带的机器工贼把守。就像闯鬼门关一样，每过一个路口，他们都要付出鲜血乃至生命。他们边闯边化整为零，逐次隐蔽起来。

邱维达带领余部向东追赶主力部队，在黄花岗附近遭敌阻击，激战一小時许，杀一条血路退进墓后的乱岗密林深处。邱维达决定暂时在此隐藏，等待机会突围。他让剩下的十二名士兵摘去暴动标志，嘱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不想傍晚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有的被捕，有的分散逃脱。邱维达本人后来脱险去了韶关。王雷云等三人退到沟底，沿着弯曲的沟道绕进了市区。他们每闯过一个街口，都要引起一阵嗖嗖追逐的子弹和“抓共产党”的叫嚷。七闯八闯，他们闯到了中山大学，翻过紧闭的大门进了校园，从川籍同乡那里找几件便衣换上，躲进了学生宿舍。

各路农军是各走各的。市郊一区的二十多人不敢回家，他们徒步南下，辗转转到中山县小杭镇，乡农会会长何福热情地安置了他们。四区农军有的三三两两去了泮塘，在泮塘农会兄弟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有些撤到了东面的各县，八九天后行乞返回；还有一支队伍到了西村，在广雅书院附近秘密商议今后去向，不想被工贼跟踪，他们同闻讯而来的敌人又干了一仗，临了又有斩获。

石喜牺牲时，衣袋里还揣着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顾一切》。这本小册子是6月23日沙基惨案两周年纪念大会散发的宣传品。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在1919年被杀害前夕写道：革命的航船正向着它的目的地坚定而自豪地前进，“不管达到目的时我们是否还活着，我们的纲领将永存；解放了的人类将主宰世界。不顾一切！”

他写道：“被杀害的战士们的尸体将复活并向那些应受诅咒的人追究责任。今天还在地下隆隆作响的火山明天将会爆发并把他们全部埋在炽热的灰烬和熔岩巨流之中。”

陆满和周定宽团攻下了观音山，即遣部众下山压向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公安局。从黄花岗、西濠口等处突入市区的敌军也向公安局合围。

周文雍从昨晚到现在，就一直呆在公安局。开始，他是想在这里组织赤卫队撤退的，由于情况很乱，他根本就无法做到。早晨，从各处溃退到这里的人员越聚越多，他们大悲大怒，群情激昂，要求誓死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作掷命一拼。周文雍年轻的心脏加速了跳动，周身的血液加速了循环。他把陆续到来的赤卫队员组织起来，分派他们到可控制要道路口的围墙、楼窗、屋顶等处，加固了大门外的沙包街垒，并在那里安置了两挺机枪。干着这些的时候，周文雍不会不知道，凭着赤卫队残余的这点力量要想顶住庞大而猖獗的敌军，哪怕坚持一天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所要保卫的苏维埃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与敌再作一搏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意志和热血的张扬，愤怒和痛苦的宣泄，就在于在失败中坚持住革命信念和执著希望的种子。

这是一场实力异常悬殊的战斗。但是，它就同这几天发生的大小战斗一样，工人赤卫队始终占据着心理上的制高点。颈系白领带的敌人一次次冲过来，又一次次被压到墙角和骑楼柱下。经过多次反复，弹尽援绝的赤卫队员伤亡大半，机枪也哑了。下午3时，周文雍率领残部冲出公安局，杀出一条血路，穿过四牌楼的几条横街出了西关，经泮塘、西村南岸向北撤退。另有一部分突出东门，遭到在东较场设伏的黄慕松团围击，余者逃往车陂、龙眼洞方向。

赤卫队撤离后，公安局楼顶上的那面铁锤镰刀红旗仍在猎猎飞展，它好像有一种余威，好像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团团围定公安局的敌人无人敢贸然冲进公安局大门。于是，敌人特地调来了大炮，发动了一场攻打红

旗的炮战，令人啼笑皆非的唐吉珂德式的大战。在十分热闹滑稽的隆隆炮声中，旗杆终于被打折了，敌人终于取得了胆怯的胜利。这种胜利给人的印象仿佛是：胜利比失败更令人沮丧。依此给人的另一个印象该是：有时失败也是胜利。

从西濠口退出的赤卫队员，一部分退入嘉南堂与敌人死拼，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另有一些退到西瓜园，又同敌人打了一阵巷战，便分散潜走。陈功武领着几名队员跑回他家，在大水缸里烧毁了文件、传单，改换衣服分开隐蔽。施展在长庚路口与一帮机器工贼发生枪战，摆脱后，在茫然无助中决定投奔打铜街生和泰玻璃镜画店，他知道店中司理黎威的两个侄子也是赤卫队员。施展果然住了进去。何振武潜至家中，把油印工具埋在水缸底下，正想烧毁文件，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何振武揪住手枪扳机，轻轻拉开门门闪至门后屋角。门开了，几个一色海员装束的彪形大汉一拥而进。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暴动几时开始的？”问得多怪，又多么让人伤心！原来，他们是按原计划从香港潜回广州参加暴动的海员，但暴动已经失败了。何振武把他们安置到黄竹岐村隐蔽。长堤其它据点的赤卫队退而展开巷战，后向北及东郊方向撤出。洋务工会长枪队在太平桥被敌人截住，三十多名壮士全部战死。梁国志的短枪队打散后分头隐蔽起来。

李沛群撤出联队队部，和从香港来参加暴动的谭达胡乱穿街过巷，不觉到了禹山市，见手车夫工头胡国清家门虚掩，就闪了进去，没见到胡，也没找到吃的。听到外面一拨一拨“抓红带友”的闹嚷声，谭达恨恨地说：“家伙！早把陈公博、朱晖日、张发奎这帮契弟抓住，不让他们溜到河南打电拉队就好了！”李沛群接腔道：“四围的农军早些赶来也好，里外夹着打，就不会走鸡了。”他们瞅准空子转至西关的黄益华家隐伏。

在红花岗与敌相抗的二百多人生者不到三十，甘宝源到四牌楼他表弟开的鞋铺里躲了一夜，第二日去了乡下。驻守如意坊的队伍从西门撤入市内。

将近下午五时，抵抗的枪声终于沉寂了。那些还在突发性器响的枪声是敌人在毙杀革命者和市民群众。

轰轰烈烈的广州武装暴动和新生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三天血雨腥风的搏杀之后落下了猩红黑暗的大幕。

它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一道锋利的闪电，在一霎那间劈开了巨大而沉重的黑暗。它在一霎那间逝灭了，以牺牲自身的方式表达了革命者的理想、力量和决心。它或许也以这种方式否定了歧途，即：城市暴动不适于中国革命。

张发奎们胜了。张发奎、陈公博等即致电在上海的汪精卫：“业已于本日傍晚，尽将广州共产党余孽一概肃清。”

对于“胜利”，大凡胜者都是要利用它做点文章，在舞台上亮亮相的。

一攻下观音山，陆满、周定宽都上了山顶。莫雄团的副团长孟敏赶紧派了一队人把仍窝在邝副官家的莫雄接上了山。他们在山顶上见面时，很是豪爽地拉手，很是自信地腆起还不到时候的肚子嘻嘻哈哈相互戳鼻子，个个做出弹冠相庆状，沉稳从容状，英雄挥洒状。

下一个节目是接见官兵，并拍电影纪录片。莫雄找来一套军服把便衣给换了。谁知那位特地赶来抢拍镜头的澳门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恰是莫雄的老朋友。此人没准是个喜剧大师，他让莫雄骑上马背挥舞手枪摆出指挥部队攻山之状，机器搬过来弄过去地绕着莫雄折腾了一圈。日后，这些镜头一

度在港澳的银幕上出现，并配以饱含着对大英雄敬畏之情的绘形绘色的解说，曰：“莫雄英勇杀敌，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率部一举攻下观音山”。各报也争着选载此类照片。把个几天来一直躲在屋里搂住惊魂百般抚慰的莫雄炒作成了首功人物。

照理说，充当急先锋的团长们的表演，只不过是陪衬和注脚，真正唱主角的应是统领全局的“主席张”之流。“胜利”对于他们，那才更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意义，他们才应该远近招摇，举宴把盏，表功请赏，张张扬扬地弄出个举国瞩目乃至撼及海外的大动静。然而，此刻的他们却全无此心情。

这一场被汪精卫称之为“急煞人的广州事变”，对同宁方争斗处于逆境的粤方来讲无疑是个雪上加霜的灾难。

本来，粤方的如意算盘是，由汪精卫把李济深骗出广州，而后张发奎一举“驱李”，这样，既夺得一方地盘，又可以此向蒋介石献上一礼，还能向南京特委会逞以武力。握有此三个筹码或可在与宁方争权夺利的较量中占点便宜。殊不知汪精卫在上海却成了众矢之的，被攻击的要害是说粤方通共。南京国民政府并以此为口实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陷入困境的汪精卫赶忙召开新闻记者茶会，一面回击李宗仁、吴稚晖等人的攻讦，一面为 11 月 17 日的广州事变作辩护，并声明自己坚决反共的立场。但特委会方面并不罢休。12 月 3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7 日，吴稚晖一干子人提出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案，要求取消三人出席全会的资格。果然如此的话，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重新担纲就成了一枕黄粱。无奈，汪精卫决定“以退为进”，“拥蒋自救”，突然抛出一个《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的提案，还递交了一份《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但他早已沦为蒋介石手下的一着棋。蒋介石复职提案通过后，吴稚晖、李宗仁把加倍的恼怒泼向汪精卫，蒋介石权衡利害，便把他冷落在一边。

就在粤方新军阀走背字的这个节骨眼上，共产党举行暴动，就使得在“驱李”之举中借助了共产党力量的张发奎、黄琪翔又露出了破绽。消息传到上海后，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新账老账一起算，向汪精卫发起了更其猛烈的围攻，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张发奎和黄琪翔直接就是共产党，广州暴动是“准共产党”与共产党的合谋。这下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因为事情确乎有根有据。

在恼怒惊惧之余，张发奎、黄琪翔一定会诅咒叶剑英，骂他是个无信的小人。其实，他们的同路是偶然的，就像不能说张发奎从来就是一个阍人，对他曾有过的“贞洁”一概不能承认一样，叶剑英与他们分道扬镳乃至成为敌手，是得自于他们各自清醒的选择。选择才是人格的总和，才是命运和超越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信义有时就是这样超越了宵小恩怨而照亮了大道和大不道。

备感窝囊的张发奎没有心情享受“胜利”。陈公博也只是不住地嘀咕埋怨张发奎和黄琪翔。黄琪翔倒是接受了记者采访，其用意主要也不在表功，而是在诿过。

据说，“黄军长身穿黑绒西装，黄皮革履，具有一种活泼之精神威严之气象”。

黄琪翔对记者说：鄙人 9 号于前线返羊城时，即得到有人要搞暴动的消息。鄙人想，兵是自己的，与自己素无隔膜，而工人暴动成不了大事，故不以为意。没想到教导团和警卫团竟参加了暴动。说到警卫团团团长梁秉枢，鄙

人还在当连长时，他已当营长，一向苦乐与共，堪称同志；且在讨伐贺龙时身负重伤，犹奋勇向前努力；且屡次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叫鄙人焉能不信？于是怜其才勇将其由保安长提升为警卫团长。岂料竟变生肘腋，终叫鄙人信了“两父子都不能知心肝”的俗话。

黄琪翔说：近有反对派云我第四军有共党在内，无论如何鄙人誓不承认。但吾人此次未免轻信暴徒，未能防范于前，说是犯了疏忽的错误是可以的，说我是共产党则誓死不承认。鄙人今天并非欲在敌人面前表白，信不信由他。唯鄙人见反对派每每架以共党之大帽子，以淆乱民众视听，孰知这正中中共党的奸计。共党想方设法把“共党”二字加于执政者身上，使得执政者皆胆战心寒，不敢上台，而共党乘机大行其道。对此，明眼人一看便知。

还说：鄙人极诚恳地忠告东西江的敌人，深望从此各人悔祸，同心协力肃清共党，不可再给对方戴“共党”的帽子。若人家一上台，就加以“共党”大帽，则无一不是共党，则凡来广东执政者都是共党，打之不绝，冤冤相报，祸无终日。鄙人由心坎里发出此言，惟求避免再给广东人民带来灾难。

黄琪翔还谈到 11 日李福林如何磨磨叽叽，而自己如何智勇双全地亲临督战，打得共产党纷纷逃命，恨爹娘生少了两只脚。还说他对混迹于政治舞台已心灰意懒，决意辞职出洋游历或闭门读书。他还特别提醒记者一桩“千古奇闻”，说是朱晖日的小车司机竟当了三天共产党的公安局长，此人在他夺回公安局后一枪给毙了。说到此，黄琪翔带领记者一道哈哈大笑。果然是“具有一种活泼之精神”。

李福林也做了一个动作。他于 13 日发了一个通电。他与共产党不沾包，处境与张发奎们有所不同，但也一边给自己评功摆好，一边表白自己与共产党绝无干系，并说由于失察之过而愿与张、黄二人联呈请过，“福林赋性愚直，视权位如敝屣，久欲解除职务，息影林泉，今苟获地方宁谧，则翩然引去，随即可将兵权抛弃，毫无留恋”。他该不是在挤兑张、黄吧？

要说广州的将领们为闯了大祸而恹恹郁闷，在上海的汪精卫可是着着实实地被压在嗡嗡碾动的磨盘底下苦苦挣扎了。13 日这天，汪精卫发表宣言，称张发奎等人与共产党发动的广州暴动绝无关系。他还硬撑着说：“如今国内有两种恶势力，一是腐化，一是共产恶化，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对腐化势力奋斗的时候，共产恶化的势力便来袭击我们；我们对共产恶化势力斗争的时候，腐化恶势力便也来袭击我们。”如果说在此之前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还暗含着某种策略，暗含着微妙的平衡机能和讨价还价的筹码的话，那么，现在这些筹码都已成了过时的钞票，变得分文不值。尽管汪精卫仍似雄心不减地说“这奋斗是不容易的，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此话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大概只是探究它内里的虚弱和胆怯了。接到张发奎等人的报功电后，汪精卫咬牙切齿地复电道：“共党余孽，必去之务尽；即浮薄少年，好为偏激之论者，亦宜痛斥，不可录用”；“此次虽由共产贼徒乘虚窃发，然亦由于乎平日过事宽大，以致变生肘腋，为地方人民大患。惩前毖后，愿与诸同志共勉之也。”

13 日的胜利真是胆怯的、惶恐不安的胜利呀。

庆祝这个胜利的方式，是歇斯底里的大搜捕、大屠杀。

剿杀生命的原色

屠杀从被老百姓称作为“丘八”的反动军队进城时就开始了。由于参加暴动者是用生命的原色红色为标志的，这帮犯了“恐红症”的刽子手是见红就杀，甚至是不问清红皂白，见谁不顺眼就杀，就抓，还放火抢劫，残暴到了极点。马路上时有仓皇之人飞奔传信，所经之处店铺关门，行人走避。

在城隍庙附近，一个好奇心重的店铺老板听到外面有了动静，把门板牙开探头张望，岂料“嘎嘣”一声枪响，他被几乎是顶在脑门上的枪口崩倒在自家门口。这是一队从大东门进来的反动军队，他们的脖颈上系着白布带，由几个穿着工装的工贼匪徒带路，散开在马路两边杀气腾腾而又战战兢兢地向前移动。又是一枪，和“哎唷”的惨叫声。又是一阵枪响。这帮人经过城隍庙，向西走到李占记钟表店门口停住，从店内搬了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往马路当中一放，就弄成了类似检查站的机构，杀人也就成了合法的勾当。随后，“咧个系红带友”，“我唔系呀”，“嘎嘣”，“哎唷”和“扑通”的一条龙声响一次次重演。一具具的尸体横卧街头。临暮，一个身穿军装的十三四岁少年手捧漱口盅从此处经过，几个匪兵一下围住他：“小共匪，别想跑！”孩子刚操着普通话喊出“我不是呀”，就被“嘎嘣”了。

一支反动军队从西关冲入市内，至十八甫大观桥口附近，迎面遇到一辆黑色小汽车，车头上插着一面红旗。匪兵们不由分说就是一通狂射猛扫。小汽车像个贪杯过量的醉汉，左右扭了几扭，一头撞上了路边骑楼的柱子，车上七八个人尽数死于非命。这是一名富医的全家老小。为了逃脱战火之地，此富医耗资逾十万，经过几天的努力打通了诸多关节，并以重金雇了小车，准备冒充“红带友”经沙面租界转逃香港，没料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全家人带上了黄泉路。车上所携钱物被洗劫一空，连死人身上的内衣也被扒去。另有一个资本家也如是筹划，不同的是扮作了迎亲的车子，也惨遭同样的灭顶之灾。

张发奎、黄琪翔从长堤登岸后，下令将长堤被俘义军及伤员全部枪决，又下令挨家挨户实行全城大搜捕，并亲自乘车四处督察。张发奎手里摸着一份刊有“广州苏维埃职员名单”，还获知了叶剑英“反叛”的消息，下令要特别注意抓捕“匪首”，“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他们更是要严惩不殆。熟门熟路的李福林“豆腐军”充当了大屠杀的操刀手。

疯狂复仇的警察也三五成群地四处滥杀，他们常闯入民居杀死冤家仇人，然后将一条红布带抛于死者身上。

李德轩、曾西盛也带着机器工会的匪徒们回来了。他们的任务是给丘八带路、协助搜捕可疑分子及维持其所谓社会治安。这帮匪徒捕杀了许多参加暴动的工人和与他们结有私仇的人。他们还趁机放纵自己邪恶的欲望。在西濠口附近，几个匪徒闯入一户殷实人家，杀死了老夫妻，吓得他们的女儿缩在屋角瑟瑟发抖。匪徒们淫笑着向她围过去：“李主席说了，女共产常在裤裆里夹带军火。”“李德轩还说，搜出金仔、西纸、玉镯、戒指，就共他的产。”当这帮匪徒离开时，这个浑身被剥得精光的少女躺在血泊中，她的胸脯和下身都让刺刀戳得稀烂，左手戴着戒指的一根指头也被剃去。

被起义军关押在公安局而未及处理的200来名反动分子出来也像疯狗似地四处指认赤卫队员。炮团团长李恒华以跪步迎接黄琪翔，以求戴罪立功。当初真该杀了他们。王明后来写道：巴黎公社未曾坚决地肃清反革命，以致

遭受极残酷的失败和屠杀；1917年十月革命时莫斯科暴动的工人捉了许多少年士官生，在他们声明改过自新获释后，又跑到各地组织白军延长了内战；此次广州暴动亦有同样的教训，不能不深深地记取。

对于满城的暴行，有开明绅士黄艺博看不过去，劝陈公博加以制止，陈公博冷冰冰地说：“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被捕的工人和零星士兵越来越多，有的当即被害，有的被就手绑铐在闸门、栏杆、电杆上。他们三五人被一根绳子捆成串，押往南关戏院、珠海戏院、太平戏院等集中关押地点。

街头挂出了“杀绝共产党”的白布横幅，“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标语随处可见。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朱晖日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告示，谓：

1927年12月10号夜间，在驻粤苏联公使馆唆使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人，号召本地匪徒和变节的军队，搜杀广州全城，焚烧重要商业区域，占领行政机关，肆行抢劫屠杀。

广东政府已于12月12日夜以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薛岳、朱晖日领导之革命军，完全击败并消灭广东之共产主义，翌日恢复和平秩序。

一大帮反动军队包围了位于东山的苏联领事馆，他们拥到大门口发疯似地狂呼乱叫，并把系着红领带的赤卫队员拉到对面大街上殴打、枪杀。昨晚从公安局潜回的副领事哈西斯要求工作人员准备自卫。大家拿起了勃朗宁手枪和毛瑟枪，有的把斗犬领在身边。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予以制止，说抵抗毫无用处，他命令密码译员波波夫立即将机密文件烧毁。13日晚8时，这帮匪兵冲进了院子和洋楼，扭住了所有的苏联人，搜空衣兜，摘去眼镜，把他们全部缴械，然后连同家属和孩子共11人，以及领事馆雇佣的中国翻译、厨师、花工、保姆等，一律用宽皮带两个一对地捆上。同时，匪兵们没放过捞外快的机会，将从写字台、留声机到孩子玩的洋娃娃洗劫一空。“仅于庭前见纸片、家具抛于遍地”，日后有记者写道，“有秽如豚豕之白卫军兵士多人，足登草履，盘据于夙有美丽如花坛盛名的庭前，置有中国军队特有之大釜，将此处作为炊事之所。”当时，匪兵们推搡着苏联人踏过扔在地上的苏联陆军军旗出了院子，押送进城。一路上，匪兵们像开玩笑似地变着法儿折腾苏联人，曾经几次把他们带到类似广场的开旷地，让翻译告诉他们马上要执行死刑，并举枪瞄准，使他们经受了数次心理枪决。

他们来到四军军部的一个大厅里。一个军官走到哈西斯等人面前，试了试绳索，转身踢了押送的士兵一脚，喝令绑紧些。绳索勒进了皮肉，并捆住了脖子和双脚，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歌台旁的铁栏杆上。总领事五岁的女孩被狠狠地扔到他妻子的膝盖上，受了惊吓的孩子跳起来挥舞小手向一个军官喊叫。那军官拽住孩子的头发，使劲把她摔在地板上。当晚又先后来了两拨子军官，要求总领事交出钱款和保险柜的钥匙，搜身时竟至脱下了他的鞋袜，翻来覆去地捏摸。

哈西斯们就这么强忍着手腕、脚腕和脖子被绳索勒出的剧痛，听着不知在何处用他们的留声机放出的美国狐步舞曲，挨度着漫漫长夜。痛得狠了，就用头撞击铁栏杆，就大声吼叫。

他们看到四军军部进进出出忙乱不堪，敌人在彻夜搜杀。

14日拂晓，隐藏于沙面租界的叶剑英在地下交通李运全的协助下，装扮

成铁路工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播宝”号轮船。甫一上船，就碰上了搜查和盘诘，一股刀锋般凛冽的杀气迎面扑来。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走到统舱，找了个地方坐下。警察、保安队、便衣侦缉、工贼轮番上船搜查，只要发现脖颈及身上任何地方留有红色痕迹或是持外地口音的人，就立即带走。何衍广也上了这条船，当他走过叶剑英身边时眼睛一亮，他去暴动总指挥部时曾见到过叶剑英。此时，何衍广既感到吃惊，又受到了鼓舞。施展也上了这艘船，他装扮成一个富商阔少，坐进了二等舱。

临开船前，李德轩亲自带着一帮机器工会的打手上了船。十几个打手一字排开，开始像梳篦似地从前舱往后边搜查边收船钱。何衍广掏出仅有的五角钱。“五角？不行！你们这些红带友，剥了你个衫！”一个家伙狠声恶气地说。气氛顿觉紧张。何衍广稳住神应付道：“都给你们了，先生。”那家伙照着何衍广的脸上就是一巴掌，顺手把五角钱夺去，说：“没钱？去去去！到火舱烧煤炭！丢！”何衍广被推搡着往舱外走。“慢着！”一直站在旁边的一个黑衣人喝道。何衍广这才看出，此黑衣人正是曾与他几度交手的那个家伙。黑衣人用驳壳枪挑开何衍广的衣领，得意地狞笑了。李德轩带着打手们又拉走了十几个人。

汽笛悲抢，船开动了，滚滚烟尘扑进了舱内。叶剑英望着缓缓移动的广州，刚毅的表情中透出一缕不易觉察的痛苦。在他旁侧有船客议论起暴动的事。有人说：“这班红带友好紧张，香港码头捉了大把！”

叶挺起初隐伏在叶家祠的密室里，稍后转到他岳母在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坊家中。此时，反动军警拿着他的照片四处搜捕，还曾派人追查到他的家乡惠阳。几天后他装扮成育人，在妹妹叶珠的掩护下，也乘船潜往香港。

其他领导人恽代英、周文雍、黄平、杨殷、聂荣臻等也陆续从广州、东江等地秘密去港。纽曼与穆青一道也辗转去港。

在广东公医院治伤的警卫团长梁秉枢把饭菜嚼烂，吐在痰盂和地板上，装作普通病号，躲过了一批批军警的搜查，换上胞妹送来的长衫、毡帽、眼镜、手杖等物，并穿上从一具死尸的脚上扒下的布鞋，混出了医院。后扮成商人赴港。

工人赤卫队的骨干如沈青、王强亚、李沛群、何振武、梁国志等二百多人，后来也去了香港。

他们都是幸存者。

刽子手们肆意烧杀抢掠的狂欢节，自 13 日后持续了整整一周。广州城充斥着死亡、血腥、惨叫、火焰、废墟，幽灵与厉鬼穿行其间，其阴森惨怖超过了吴承恩和但丁笔下的魔窟和地狱。

一位叫德富的日本记者亲历了这惨烈的场面，《顺天日报》刊载了他对此的描述：

正欲转入小巷，忽见路旁仰卧着全身蒙满泥土的工人尸体，不禁向前走了几步，只见其头上围有赤巾，无疑是共产党的战士，其前额部及右颊已不知去向，苍蝇喧聚，争食其肉，是何等惨怖呵！睹此情景，已无勇气前行……

距此不远的西瓜园，是共党军抗击李福林军的最后激战之地。崩塌砖壁之后，林木之侧，不论路上，不论河中，都伏满了死尸。余驰车而过，至长堤的广州卫生局前，那里有二十四五名被粗绳捆在一起的工人坐在地上，脸上是一幅绝望的表情……

途中到处可见遭惨杀之尸体，大有血流成河之势。吾人睹之，不禁栗然而惧；而该时尸体，似多已被收殓。嗣又见道路上有丈余地皆为赤黑人血，并有脑与脏腑杂于其间，大可想见残杀时的情形……

抵公园之广场时，见有三台满载尸骸的货车向观音山右角而去，七八名人伏尾随其后。右侧之丛莽中，有十数名血腥之尸体，似新被枪毙者。而无情之鹧鸪，翱翔于上下。时夕阳衔山，遥闻群众凄惨之喊声，且有似杀人之枪声若远若近……

各地报纸对此也多有报道，仅录几则。

《晨报》载：自剿灭农工暴动后，今日之广州真可称为“鬼城”！据当屠杀时所摄之写真，见有运货车多辆载共产党尸体，高垒至三四重，络绎行过街市，运往葬地，马路伏尸累累，堆积道侧！

《大公报》载：有女共党多人，被用棉花包裹起来点燃火油烧毙。反赤军还曾拘捕剪发女子数人，14日当即按剪发罪枪毙之，宣布的罪状是她们的短发即为赤化之证据！又载：12月17日至少有华人600人，因有共党嫌疑被处死刑。

《益世报》载：福军夺回广州后的几天里，杀戮共党五千余人。凡与此次暴动有关及负有嫌疑之数千人，均遭杀戮！

东方社香港19日电：街头路隅，至今尚有烧成黑炭之尸骸，横置地上。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尚不下百人，被抢之家，四壁萧然，不遗一物，实呈稀有之奇观。被焚之屋，尚有余烬，乞丐三五，于残垣断瓦之中，将灰抓取，似有所觅，恍惚当年东京之大震灾复见于此地也。

不少报纸含愤而呼：广州大屠杀造成“人类世界未曾见不忍言之惨状！”“鬼城惨象，不堪回首之广州城市！”

几天里，反动军警密布，警车猖行，暗探、奸细、叛徒四出，日夜进行梳篦式搜捕。机器工会的匪徒寻街搜巷，在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家门前画上符号，搜出“窝藏”有共产党的，全家大小连坐。凡是脖子上手臂上留有雨痕红迹的，着装带红或别异的，面带饥色及疲惫之色的，脚上有镣铐印的，持外地口音的，剪短发的妇女，一概在捕杀之列。

大佛寺广场，第一公园门前至维新路，永汉南路，太平南路等处积尸遍地，血淤汪汪。野狗在舔着未干的血迹。有些尸体已被人悄悄按照当地习俗盖上了“红白被”，旁边还点着一支大蜡烛。

天字码头是大屠杀的一个刑场，在这里横竖倒卧着百余具尸体。游曦、邱文达女兵的遗体被拖到这里剥衣刈乳，受到病态的凌辱。游曦更是被断躯悬尸，其状惨绝人寰。途经此处的欧新见之悲愤不已。

欧新是四牌楼李朋记鞋店的学徒，参加了攻打公安局的战斗。敌人进城后他跑回鞋店，叩开门即遭到老板的当头训斥：“你们这么容易打倒资家！开玩笑！”老板留下他当烧饭的伙计，遣他背上菜篮上街买菜。他刚要离开天字码头，见有一支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押着8名二十来岁的女青年自北而来。女青年们高声对路人说：“我们是执信女子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好人！”走近天字码头时，她们什么都看到了，这8名行将就义的女英雄于是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并情绪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刽子手们拳脚相加地大施淫威。当女学生群起反抗与挣扎的时候，兽性发作的刽子手撕碎了她们的衣裤，继而将她们毙杀于码头。一个刽子手还灭绝人性地用一根竹片玩弄她们的尸体。欧新怒不可遏地说：“人都死了，还要侮辱她！”那骚蛮大汉停手

盯视着围观人群中的欧新。欧新正埋头专注地点数买菜的铜板。

永汉南路南关戏院里关押的五六百人，长堤海珠戏院里关的数百人，西瓜园附近的太平戏院关的数百人，等等，被数十人数百人地用绳子捆住手臂，经文明路等街道押至东较场，架起重机枪集体扫杀，或者活埋，或者装进麻袋用船载到白鹅潭抛入江中。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梁桂华在 12 日奉命担任长堤警戒任务中，带领赤卫队员与攻岸敌人殊死肉搏，身负重伤，被送入韬美医院救治。敌人把他拉到韬美医院门前残酷杀害。许多人走向刑场时高呼着“打倒反革命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苏联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馆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被害于 14 日。敌人推搡着要把他们带往刑场时，大家坚强地互道永别，乌科诺夫大声对妻子说：“你要把女儿培养成苏维埃公民！”马卡罗夫喊道：“留下来的同志们，请把我们的名字传下去！”哈西斯唱起了《国际歌》，其他人也合着节拍跟着唱了起来。他们背着“俄共分子，万众诛之”的斩标，行走在尘土滚滚的大街上。一些仇恨他们的人沿途用小刀扎他们，向他们掷石块、吐唾沫。他们在公安局门前被枪杀了。哈西斯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到树杈上。龙狄邦等十余名中国雇员及孩子也一同被杀。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竟然还将大屠杀场面拍成电影，以向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讨好邀功。

从 13 日至 19 日，共有五千七百名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革命烈士和死难者的每一滴血都不会白费。第十二期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悼念文章如下：

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

广州伟大的暴动，几万工农兵士群众参加的暴动，曾经创造中国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李福林等，得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侥幸战胜广州的苏维埃政府；这些军阀，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为保持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起见，竟大施屠杀，在 12 月 14 日至 19 日五六天中，杀死了五千七百多人。这些工友、农友以及革命的兵士，为拥护广州的苏维埃政府而死了，为拥护自己的政权而死了。但是，无论反革命派如何残杀，我们工农兵士的革命意志，是始终坚决的；我们号召全中国三万余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积极诚恳的致敬礼于革命的先锋——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人的工、农、兵士，并且继续他们英勇的精神起来奋斗，不达到解放的目的，誓不中止！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书》。它控诉了敌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指出：反动军队在广州掀动的残酷血潮，其凶暴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它号召全国民众不要灰心丧气。它号召说：“我们要记忆着死难同志的鲜红血液正是争斗中的旗帜，我们必须高举着这个旗帜勇往前进，坚定我们的意志，誓死争斗，不达到胜利不止。”紧接着又写道：“但可不是立即总暴动起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他们正希望全中国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现在就手持枪械出作巷战，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争斗长期沉没于血海之中”。共产党人已开始把热血激情和冷静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血祭中汲取力量。

此后，赤色职工国际发表了致各国工人书，对中国无产者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的中国兄弟不光是为了自己，不光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在流血牺牲，他们是在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们是全世界劳动大军的最优秀的战士。”

从12月13日起，国民党反动势力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大肆搜捕和杀害中苏共产党人。南京国民政府14日宣布与苏联绝交，照会撤消对驻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停止苏联银行及轮船公司等国营商业机关营业，令俄侨领取执照，侦查拘禁苏联共产党人。同日，下令免除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的职务；16日更决定派兵讨伐，下令查办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

中共中央于15日决定派李立三赴香港指导暴动失败后的工作。

第七章 远行

五羊城故事之三

身子好像在往上飘，又好像被千斤铁镣拖住了双脚，走着走着，公今寿睡着了。他仍然在往前走，不管是土坎、泥坑、水洼，只是机械地往前走。他太疲劳了，自从暴动以来，他还没睡过囫囵觉。队伍里有许多人都是边睡边走。也许人的脑袋上真的长着第三只眼，他们就凭借这第三只眼保持着方向和队形。天空断断续续地下着蒙蒙细雨，山路泥泞不堪。有人惊叫着滚进了山沟。公今寿睁开充血的眼睛，他听到叶镛在高声招呼大家。

这支队伍十分奇异，军装与民服相混，携带的枪械很杂，戴红领带和红臂章的地方被染红了一片，被雨水洗去尘土的脸上挂着烟痕火迹和饥疲之色。

他们是在太和圩汇合的。在大和圩，徐向前带领几十个赤卫队员和掉队的士兵追上了教导团。袁耐坚、陈同生带领的警卫团和王侃予、宋湘涛带领的黄埔军校一部也赶上来了。贺诚带领四军医务处的同志也到了。还有一些小批迫赶上来的士兵和赤卫队员。教导团由叶镛领头，团长李云鹏在黄花岗剃掉胡子开了小差。

现在，几支队伍汇合在一起，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前进。

花县距广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但其境内几乎村村都有民团，起义军每过一村都要打上一仗。在离县城不远的象山遇到的地主民团要算最大的一股。这些杂匪没准喝了血酒画过符，他们在螺号的带领下此起彼伏地嗷嗷吼叫，有的竟然冒着冷风寒雨赤膊上阵，招式拉得还挺严肃庄重。起义军又被阻滞。徐向前跑到前沿观察了一下，说：“民团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松得很，一冲它就垮。”果然，本来像是长满了胸毛的螺号声在铜号吹响时一下子就胎瘪得病病殃殃的，不中用也未必中看的民团被冲击得作鸟兽散。冲进象山街市时，一些怒气难消的官兵放火点着了土豪劣绅的房屋，叶镛发现即命令将火扑灭。这引起了这些官兵的不满，他们指责叶镛是在重蹈叶贺的覆辙，说所谓“仁义道德之师”不是革命者所持的态度，革命者应该到一处就毁灭一处的旧制度。15日下午，起义军始抵县府人员已逃空的县城，把红旗插上了古旧城楼。

花县县城为景色秀丽的山峦环抱，街道和房屋朴拙而整齐。

12月16日，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工人赤卫队的骨干在花县县立高级小学召开了党的会议。首先讨论部队的整编。从广州撤到这里的部队有一千三百多人，加上从花县农军中吸收一批骨干，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人。编为一个军人数太少，而编为一个团，似乎又多了些。就暂编为一个师。朱德领导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已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在海陆丰有董朗为师长的红二师，大家是知道的。

“我们就叫红三师吧。”有人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是由刘履道领导的琼崖游击队改编的。”

“那就叫红四师吧。”袁裕说。他的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一致赞同。

红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团。由唐维和王侃予提名，会议一致选举叶镛任师长，宋湘涛任副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袁裕任参谋长。唐维担任

师党委书记。三个团的主要负责人是：十团团长白鑫，党代表徐向前；十一团团团长赵希杰，党代表缪云人；十二团团团长饶寿柏，党代表陆更夫；贺诚任军医处处长，党代表是刘从。后来到海陆丰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改组了师的班子，一些任职有变动，如师党代表由袁裕担任，王侃予改任政治部主任。

下午，全师集中在县立第一小学操场上举行庆祝大会。官兵们脸上的倦色和迷茫褪去了一层，个个显得兴奋、精悍。每个人的枪口都插着用红布或红纸做的三角形小旗子，象征彻里彻外已赤化了的热血生命。王侃予、叶镛、唐维、袁裕等走上了主席台。首先由王侃予宣布全师各级领导干部名单。第一个是师长叶镛的任命。台下响起了热烈掌声。叶镛是四川人，黄埔三期学生，北伐时在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中勇猛出色，在教导团很有威信。他身材魁梧，又平和风趣，因脸上有几点麻子，被称作“麻子同志”。

在一阵阵的掌声中，台上竖起了红四师的军旗。这是一面绣有铁锤镰刀和步枪的红旗。叶镛宣布红四师正式成立。他领着全师同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的全体同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先烈遗志，坚决打垮反动派，为革命事业的胜利战斗到底！”

由于侧迎斜阳，朱道南、公今寿看不清前面的人，只感到每个人都披着斑斓的金光金雾。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冉冉上升。公今寿的喉节滑动了一下，喃喃地说：“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甘赴汤蹈火，碎尸万段。”

大会结束前是一位高颧骨的农民代表讲话，他说：“我们老百姓坚决跟共产党走！红军同志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救星！”

师部的党代表办公厅也成立了。办公厅设组织、宣传等部；宣传部下设一个报社，油印出版《红军生活》和一个叫《造反》的通俗刊物。办公厅有十多个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如报社的编辑危拱之、郑梅仙等。军旗就是郑梅仙领着女友们用剪刀和针线缝制的。当时不知道军旗该是个什么图案，郑梅仙说：“我们是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军队，军旗上应有代表工人的斧头，代表农民的镰刀，和代表士兵的枪。”事情就这么定了。全师共有三十多个女同志，都分配在师、团机关工作。

现在，这支队伍机构健全，有筋有骨，结实而充满活力。

但是，队伍编成后该往何处去呢？在当时恶滔滚滚的形势下，一个师是孤独的；而且，花县离广州又太近，且紧挨铁路线，必须尽早离开。上午的会议决定去北江，找朱德的红一师会合。但红一师到底在北江的什么地方，还在不在北江，谁也不知道。师部派人往韶关方向打听。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消息。

受地主豪绅的指使，花县的反动头子江侠庵纠集起民团杂匪千余人，以仙阁村为据点，不分昼夜地骚扰围攻红四师。这些地头蛇滑得很，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你一不在意，他就不知从哪儿呼呼拉拉冒出来一片，又是咋呼又是打枪，你一打，他就跑，跑了再来。有时你刚端起饭碗，他就叮当你几下，十分讨厌。

徐向前愤愤地说：“讨嫌的民团，非得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不然，我们路都走不出。”

程子华说：“真是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却不把它当回事：“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

围在一旁的官兵们轰地笑了。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道：“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吗？有的人拿根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有的

人举起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

经叶镛同意，徐向前带着部队出击打狗了。出了县城，正好遇上一群狂吠着扑过来。徐向前高喊：“打这帮狗！要一步不退地猛打猛追！”他举起驳壳枪带头冲了上去。

这一次一直追打到8里外的象山，使得这群狗家伙的尾巴耷拉了下去。

此后，又如此几番抄棍追打，并在花县农军协同下捣毁了设在仙阁的狗窝，缴获了一批枪械弹药。疯狗被治服了。徐向前的“打狗战术”因此成了经典。

大家在休息待命期间都没闲着。党员都实行了登记，各团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贺诚因找不到两个人作证明，只得重新登记入党，登记处的同志见贺诚急得额头蒙汗，安慰他说：“先这样办，找到证明人可以再改过来。”由十多名说客家话的同志组成了先遣队，在队长钟必达的带领下，发传单、贴标语、挨家挨户敲开店铺和群众家的门。军需部门在筹措粮草衣物，徐向前把在公安局抓的银毫子全部交给了团里管军需的彭镜秋。又有零星人员自广州而来，描述起死亡的广州，激起的悲忿情绪和控诉之声久久不息。有人还抓紧机会结了婚，贺辞中有“赶快生个红小鬼，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吉庆话。

又有人讲起了“五羊城”的传说。在广州时，已讲了一位穷老汉交不起粮谷，衙门抓走他，并令他的儿子限期交纳，少年得五位仙人给的稻株种出了丝苗上米，贪婪的官老爷差人去坡山脚捉拿五仙人。

这个传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少年出了衙门，脑子里怎么也甩不开那狗官狰狞贪欲的面孔。不好，他必然会加害五位仙人！少年一口气跑到了坡山脚。此时，五仙人正并排坐在草地上歇息，在他们的旁边有五只正用双角相互抵架的羊。少年气喘吁吁地把这两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听罢，五仙人中最年长的一位说道：别怕，我们自有办法，你赶快回去把那些稻株都插到土里去，那些狗官就抢不去了，你们也会不愁衣食了。话未尽，差役到了，穷凶极恶地扑向五仙人。五仙人立即腾空而去。差役们眼睁睁地望着天空发愣。正惊愕间，忽然听到咩咩几声，原来五只羊还留在草地上。差役们从五个方向把羊包围住，当他们向前一扑，五只羊却像生了根似地，任怎么拖也拖不动。仔细一看，哪里是羊呢？原来是五块根深蒂固的大石头！”

叙述人往烟斗里填饱了生切烟，足足地吸了一口，说：“因为有这样一个传说，广州又叫作五羊城。”

在花县停留的第三天下午，外出的同志回来了，他们没有带回红一师的消息。师部当晚作出赴海陆丰会合红二师的决定。

19日一早，部队开拔了。红旗，红头巾，红领中，红袖章，红绑腿，还有红色的热血，还有赤胆红心，这可真称得上是一支彻里彻外的赤军。

各村村口知趣地插出了木牌，上写：“欢迎来境，欢迎过境”。

位于广东东部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的东江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发源地。素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海丰，则是东江地区的红都。海丰县有一个彭湃。

彭湃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在民主革命复杂环境中长大的他，养成了对腐朽势力的逆叛性格。他结婚的第二天，就把妻子裹得密密实实的小脚放开，挽着她去逛大街。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海陆丰的土豪劣绅为“清乡”统领林干材造了一座石像，抬进了尊有文天祥像的表忠祠，

彭湃乘黑夜卫兵不备，用铁锤和凿子把石像的鼻子嘴脸砸了个稀烂，次日揭幕时，看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一副怪样的林干材气得暴跳如雷，把拍马屁的土劣们臭骂一通，命人把石像抬出去扔进了海里。彭湃 1917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海丰，于 1922 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自 1924 年起，多次发动农民斗争和起义。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海陆丰乃至东江掀起了“讨逆”怒涛，农民自卫军改为工农讨逆军，并猛攻县城和重要圩镇。地主武装则命名为“白旗队”、“讨赤团”，对农民自卫军加以镇压。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发，彭湃赴南昌参加了国共联席会议，后随起义军南征。9 月，起义军在潮汕地区与李济深的部队激战，彭湃发动农会修铁路、运弹药、收容伤员，他还亲赴前线直接参战。10 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普宁流沙镇败散，他也乘船去了香港。10 月 15 日，他出席了张太雷召集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此前，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进入海丰县境，编为红二师。10 月 30 日，中共东江特委乘粤桂战争一触即发之机，领导红二师和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及农民群众，举行了该地在当年的第三次起义，一举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全境。彭湃于此返回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两县于 11 月中、下旬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广州暴动前夕，彭湃接到省委通知，让他率领海陆丰工农革命军尽快向惠州方向移动，好与广州相呼应、联成一片。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时，彭湃还被推选为人民土地委员。但是，暴动来得太快了，失败也来得太快了，奔援广州的海陆丰农军行至半途就中止了前进。

12 月 20 日，东江特委书记彭湃接到省委的一封信函，信函中说：“广州暴动退出之武装，现已到花县，有二千余人，在花县一带实行土地革命。省委已经派员前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北江一带帮助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希望能够做成新局面和海丰一样。”这里的第一师，同朱德的第一师不是一回事。当年 8 月，广东省委把东江工农讨逆军改编为广东东路工农革命军，海陆丰为第一师。这里用的是海陆丰工农革命军的番号。

而此时，从广州撤出的部队已自行改编为红四师，并已离开花县向海陆丰而来。

红四师由花县农运特派员刘绥华作向导，日行夜宿，经从化、良口、龙门、杭子担、绕道南口蓝口渡过东江，经过十几天的跋涉，进入罗浮山脉东侧的紫金县境。

所经之处，到处是灰暗、荒凉、贫穷破败的景象。大概是农闲期，田里没有人干活。一些村落狭窄的石板小道两侧的人家几乎都在做生意，有的开小酒店，有的卖自制的土织布，也有开鸦片烟馆的。更多的是女人坐在房檐下卖花生、瓜子、熟地瓜、柑桔之类，她们同身后门洞里单调黯淡的色调融合在了一起。但在一些村子的墙壁上可见画有镰刀锤子的宣传画及写有革命口号的传单。这为毫无生气的生活情景涂上了一抹亮色，也为官兵们疲倦的目光提了精神。

格外提精神的，是官兵们在紫金参演的一场颇为有趣的活剧。

紫金县县长邱国忠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虽早已不在军界，却整日身着佩衔戎装，残暴屠杀革命工农，仅在龙窝南炮子圩的一块“古井丘”里，

就曾集体屠杀了 450 多人，“古井丘”后被称为“血田”。10 月，南昌起义军一部即红二师进入东江；11 月下旬，为了配合广州暴动，当地刘琴西的工农武装协同红二师一部向紫金境内的南岭发动了攻势，这使得负有累累血债的邱国忠惊恐不安，屡电广州反动政府请求兵援。邱国忠没想到，这使得他在无意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陷阱。当徐向前率领红四师第十团率先进抵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国忠以为是援兵到了，赶忙派人出城联络。叶镛和徐向前将计就计。次日大早，冒充援军的红四师整装列队开赴县城，喜出望外的邱国忠带着县府官员 17 人出城大礼恭候，就这么成了自投罗网的傻鸟。

红四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紫金县城，从监狱里放出了“政治犯”，并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资财和粮食分给了劳苦群众。四乡群众在中共紫金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带领下，组织起醒狮队、后勤队、妇女洗衣组慰问红军，家家户户还自发地舂米糕、打糍粑、炒米花、煮擂茶，邀红军作客。应群众的强烈要求，红四师在炮子圩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判枪决了邱国忠和一批反动头目。是时，会场上悬挂着“血债血还，血海深仇今朝报；公事公办，公审台前案注销”的对联，六千军民怒声如潮。

红四师还在龙窝镇与被桂系军阀赶出广州的许志锐部队激战了一番。

红二师一部在工农武装配合下苦战经月，终于用挖地道的办法炸毁了南岭敌人的炮楼，在回师海陆丰途经炮子圩时，巧遇红四师。他们看见红四师闪着蓝光的三八大盖和广东七九步枪，羡慕得直咂嘴。他们用的多是老式的漏底七九枪。

海丰县城依山临海。新年前夕，这里处处张灯结彩，红旗喧响，墙壁用红土刷得一片鲜红，街道也以马克思、列宁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领袖的名字重新命名。红墙上贴着许多革命标语口号、打油诗和顺口溜，随手摘取一则，足见其见识不浅。它写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三民主义，糊涂到底。建国大纲，官样文章。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乌烟瘴气。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胜利。帝国主义官僚土豪全被打倒，工人兄弟农民兄弟皆大欢喜。从此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处处欢乐歌舞，高插红旗。”海丰笼罩着浓厚的“赤化”气氛。

1928 年大年初一，红四师抵达海丰县城。闻讯而来的群众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捧着水果、鸡蛋和茶水簇拥在大街两旁，口里称呼着“广暴同志”，热烈欢迎自己的队伍。红四师这些硬打硬磨的汉子们顿觉血流加快，有的眼中满含泪水，有的为克制内心的激动而扭动着脸上的肌肉。

大街上，一群人迈着大步迎了上来。走在头里的是一个身材不高，脸长而白，穿着粗布衫和草鞋，既像书生又像是农民，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智慧和力量的年轻人。这人就是彭湃。

参加广州暴动、南昌暴动的两支英雄部队，和海丰工农革命武装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会师了。

晚饭后，彭湃、叶镛、董朗、王侃予、袁裕、唐维、徐向前、颜昌颐、白鑫、赵希杰、缪云人、饶寿柏、陆更夫、贺诚及当地的同志傅大庆、林道文、杨望、刘琴西等聚集在苏维埃政府的一间大屋里。他们谈到广州、南昌和海陆丰暴动，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谈到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前途；他们决心合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拳头，向紫金、五华、惠来、普宁等方向迅速扩大红区，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喝着茶水，吃着瓜子、花生、地瓜干、糕点等年货，他们热烈地谈了一个通宵。

在一个农户家里，主人拿出炒米茶、自酿的米酒、海鱼、蛤蜊和上白粳米饭招待朱道南和公今寿等人。他们也兴奋地聊了一个通宵。说到彭湃，主人总是以“彭菩萨”相称。此称呼有来历。主人说：每到年底，一些欠债户的全家老小都要被地主抓去吊在屋梁上，叫“吊猴子”。彭湃的父亲是出名的大地主，有一年他家的屋梁上也吊着几十个“猴子”。一个姓汪的“猴子”答应年三十还清欠下的五十块小洋。年三十这个年轻人果然来还债了，大地主问起钱的来历，年轻人说把老婆卖了，大地主听罢哈哈笑道：“好！你真聪明，你这个穷种要老婆干什么，不如卖了身上轻松。”正在此时，彭湃出现了。他满脸胀红，从父亲手里夺过钱还给年轻人，大喝：“不准收租，不准要债！”飞起一脚将厅屋的八仙桌踢了丈把高，把他父亲吓得瘫在门角里。彭湃旋又跑出大门高喊：“农民兄弟们，想要打倒土豪劣绅、不纳租不还债的，就跟我来！”农民们拿着尖串聚拢过来，越聚越多。从此就叫彭湃“彭菩萨”。农民之间哪怕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只要“彭菩萨”说声要团结，双方马上会歃血发誓，亲如兄弟。再顽皮的小孩，只要说你这样的小孩“彭菩萨”不喜欢，就没有不老实的。

在这间破陋而充满年节喜气的屋子里，说的人虔诚得泪光闪闪，听的人信服得使劲点头。

大年初二是一个响晴天。下午，东江革命委员会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几万人的欢迎大会。至于红场，红四师的官兵早有所闻，广州的反动派说它是用一千个人的血涂红的，是彭湃开人头大会的地方。反动派的谣言使红场充满了神秘的力量。而今，红四师的官兵真的就有了一种半人半神的体验。

彭湃首先讲话。他的普通话说得极为流利，声音是纯钢的，当当响，没有一点渣儿。

彭湃说：“我们热烈庆祝红四师与红二师会合！这是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军阀一个有力的回击！”他的话被惊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了。

说到广州暴动的失败，彭湃用力一挥手：“这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失败是光荣的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失败，失败了，跌倒了，爬起来再干！革命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又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彭湃说：“当然，我们在战斗中总要牺牲一些亲爱的同志。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是要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什么是共产党的法律？抓住地主杀他们的头，就是共产党的法律！”台下高呼：坚决跟共产党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在过去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海陆丰的农民吃的是地瓜和稀饭，小孩都是肚子大屁股小，现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吃上了大米，小孩都变得肚子小屁股大了，发育正常了。”讲着，他向大家发问道：“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红四师和红二师来这里会合了，要是成千上万的敌人来进攻我们，能不能打败它呢？”

台下像是一个巨人扯直了嗓子回答：“能打败它！”

“当然能打败它。就算它来一万人，我们有一百万英雄的军民，两个拼一个，用两万人就把敌人拼光了。”彭湃的讲话极富鼓动性，“同志们，乡亲们，我们是为工农兵自己的利益而战的，我们一定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做新世界的主人！”

殷红的夕阳从山头倾注下来。红墙红场火红的气氛把每一张激动的脸融

汇在了一起，像海潮一样掀动着，奔涌着，沸腾着。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要把红旗插遍中华！
我们是世界的主人！

此后，红四师与红二师及本地工农革命武装并肩作战，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参加广州暴动的另有两百人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在韶关附近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合，经过艰苦转战，于 1928 年 4 月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还有一部分撤出广州后辗转至广西，在北流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参加了在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爆发的由邓小平、张云逸和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分别到达以赣南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琼崖、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继续参加武装斗争。

真理的尴尬

“播宝”号轮船驶抵了香港码头。如临大敌的英警、华警、密探、被称作“摩罗差”的印籍英兵、挺着大肚皮的帮办等，荷枪实弹，一窝窝地围拥着一溜同时只能通过一人的卡口，要每一个乘客报出来港所投之地，进行梳篦式盘查。叶剑英与李运全以表兄弟相称，走到卡口时他虚报了个中环荷理活道的地址。

“抓住他！他是共产党，抓住他！”迎面一个身穿古铜色绸衫，手里玩着两个大铁球的家伙突然大喊大叫起来。

叶剑英神态从容地盯视着他。

那家伙边喊边把叶剑英推入卡内，扑向他后面的人群。原来此人认出了走在后面的施展。他是施展家乡的大劣绅，与施展是在农会运动与“清党”行动中的老对手。施展被一拥而上的港警抓住，在叶剑英痛切的目光中被押上了警笛嘶鸣的囚车。

出了港卡，找到李运全的弟弟李运庆。叶剑英由李运庆领着到九龙油麻地北京饭店住下。第三天晚上，叶剑英遇到敌人眼线的缠问，幸得李运全的朋友廖保伯仗义解难。又转到新界王新民家，后又数次转换住址。其他来港领导同志也多有涉险渡难的经历，如聂荣臻的红领带连同衣服一道装在箱子里，敌人检查了这只箱子，幸好没有发现。到港后他们巧为安置，并相互接上了头。李立三也于12月20日到香港。

1928年1月1日至5日，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对广州暴动进行总结和检查。由于失败惨痛，一些赤卫队骨干把痛苦和悲愤的感情转化为满腹怨气，把失败的原因一古脑地都算在了主要负责人的头上。李立三原本就对广州暴动的结局抱有主观的判断和成见，到香港后，上述赤卫队骨干的怨气正好使他找到了根据。而广州的主要负责人迟迟未向他报告情况，又无异于往火上浇油。所以，李立三不可能冷静，也不可能客观地对暴动的意义和教训作深入的考查和总结。他对暴动已有评价，并给会议定了调子，即：淡化暴动意义，清算暴动领导者。

会议地点是省委机关在西环坚尼地城秦皇台23号四楼的招待所。只有一间约为20多平米的屋子，另有一厅。被通知到会的人员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黄平、陈郁、吴毅、杨殷、邓发、聂荣臻，还有沈青、罗登贤、黄谦、王强亚等。也许是由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叶挺和叶剑英不是省委委员，他们没有被告知参加。

会议实际由李立三主持。他提议全体起立，为在暴动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

而后，李立三迅速使会议气氛升温。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作为暴动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黄平，说他知识分子味十足，毫无指挥能力，紧张时刻慌乱、动摇；说因为由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持了领导权，因而在一些重大环节上一错再错，致使一场伟大的武装暴动流于“军事投机”，最终惨遭失败。

公正地讲，黄平在暴动中的表现并非毫无愧色，李立三的指责也并非毫无根据，但李立三夸大事，只攻一点，采用的又是直接攻击和否定人格的方式，这就让黄平难以忍受。而且，李立三拿黄平开刀，同时也就给了黄平代表“知识分子”的资格。情绪激动的黄平当即评摆自己在白色恐怖下所做的工作，及张太雷领导暴动总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作的艰苦努力，与之

争辩。

李立三气得脸色紫涨，拍案吼道：“你还不肯承认错误！我要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你！”

黄平仍不甘示弱。就这么一个批，一个顶，会议的温度越来越高。未了，李立三怒气冲冲地宣布：“我现在决定，撤销黄平的广州市委书记职务！”

此后几天的会议，气氛一直极度紧张。

会议第二天，李立三宣读了沈青、罗登贤、黄谦和王强亚于前一天晚上联名写的书面意见。李立三以这份观点与情绪均偏颇的材料为武器，继续对暴动领导人施以无情打击。这种错误的导向，反过来又使得一些赤卫队骨干肝火更旺，竟向知识分子大兴问罪之师，以致用“你班知识分子都是衰仔！”“丢那妈，知识分子都是温笨屎！”这样的语言破口辱骂。暴动领导人简直就成了敌人。招待所工作人员范桂霞在给李立三续水时紧张得碰倒了茶杯。

恽代英、吴毅等人对李立三的做法十分反感，提示他要慎重对待这次暴动，不要有负数千死者，也不要过于伤害了生者的革命热情，并举无产阶级领袖处理和看待巴黎公社的方式为例。但李立三硬是坚持自己的逻辑，把持会议强行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如果说这个决议提到了暴动的意义，那更像是为了行文格式的需要，因为它显得浮泛而不经意，相反，对暴动的指责鞭挞则有18条之多，它最后总结道：“此次暴动的意义，客观上是工农群众革命要求的爆发，但是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以致使此次暴动的胜利不能维持，尤其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李立三给这段话打了重点号。从这个决议中，感受不到暴动那风雷激荡的磅礴气势，感受不到暴动中工农兵群众血洒江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感受不到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感受到的是混沌，屈辱，恼忿和悲哀。决议案还提出了惩办主义的决定，开除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等人省委委员等职务，并予留党察看及调做下层工作等处分；叶挺留党察看六个月，徐光英开除党籍。

会议还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它认为：“广州暴动虽然暂时的失败，但是就全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革命潮流并不因此而低落，反是继续高涨。”因而，“整个的广东仍然是一个暴动的局面，一直到夺取全省的政权”。

会后，李立三派广东省委书记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挤满了人的囚车里憋得人透不过气来。到警察署监狱下了囚车，施展就吐了口浓痰。一个英籍警官见了冲过来就打了他两耳光，随即怒冲冲地把他扭到囚房门口，一脚把他踢了进去，咣当一声关上了铁门。囚室里也挤满了人。

香港东方社电：香港政府对于避港难民之身体检查极严，因有共产党员之嫌疑而被逮者，百名有余。

到香港的同志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在反思失败和挫折，苦苦求索着中国革命的出路。

短短几个月时间，轰轰烈烈的南昌、广州暴动均遭失败，暴动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这条路该怎样走呢？叶剑英买了一本《洪秀全野史》，边读边思索，并把书推荐给聂荣臻。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和今天的失败中，他们仿佛捕捉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就过去了，不巩固所占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越谈越投机、越深入，不觉天色已晚。聂荣臻匆匆赶回住处。他全然不知他正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的魔爪。

当时，每天都有撤退到香港的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省委秘密机关。有一位农民党员不知道自己带着一只“尾巴”，刚同省委机关接上头，这个机关就被破获。聂荣臻的地址也落到敌人手中。在暮色中，当聂荣臻走近住处，看见他雇的阿姨正在往楼下搬行李，又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楼前闲逛。聂荣臻觉察到了什么，他接住阿姨的一个眼色，装作路人从楼前走过。此时，敌人已抓住了与他同室而居的杨剑英，正在屋里乱翻腾。一个特务翻到一张南昌起义后的东江地图，递到杨剑英眼前问：“你说你不是共产党，这地图是哪里来的？”杨剑英操广东话回答：“是在东江打仗时留下的。我原在广西军队，前天才到香港。”敌人带走了杨剑英。

恽代英到香港后，他的妻子沈葆英随后抵达。他们租住的民房，同时是省委的一个秘密机关。一次，几个党员正在他家开会，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沈葆英未及反应，房东已打开门，蜂拥而入的巡捕抓获了开会的同志。当时恽代英不在家，沈葆英装成乡下婆的模样也得已幸免。巡捕离去，沈葆英赶紧收起挂在窗外作为暗号的红辣椒串。三天后两人才见面，恽代英说：“革命免不了风险，我们的每根神经末梢都要参加战斗”。

就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党内开始实施他的惩罚政策。他把周文雍派往广州“贴标语，撒传单，发动群众”。吴毅等人后来也被派往广州。广州的敌人杀人杀红了眼，更主要的是，周文雍等人在广州的知名度相当高，且是敌人追缉的“首犯”，他们此一去无异于赴汤蹈火，李立三不会不知。黄平也被派往西江。出发前两天，因中央要求遂改派他去上海汇报暴动情况。

李立三的做法使党内思想产生了混乱。徐光英不能承受“恐慌退缩”的指责，给省委写信，力陈当时情况及自己历来表现，希望能洗刷冤屈。叶挺被栽上“消极”罪名，心情苦闷，终致积郁成疾而数番咯血，加之香港当局应国民党要求对他的追搜日紧，春节后，启程去马来亚吉隆坡山区亲友处暂避风头。

恽代英、吴毅、陈郁、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暂且留港的同志，一边痛苦反思，一边紧张工作，组织寻找、接济、救助来港的党员群众和工农骨干。施展就是在杨殷的安排下，请了律师保释出狱的。

成功经验固然是财富，失败的教训往往是更为宝贵的财富。广州暴动的失败，对于连遭噩运、急于在黑暗中找到一条出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笔宝贵财富。它聚集着中共所有领导人的目光。它就如同一张涂满血火的迷宫图，中共所有优秀的大脑都在寻找它的出口。这是在危急时刻关系到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出口，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历史走向的出口。真理与谬误往往只相差一步。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把握全局，还是偏执一点；是用气血攻心的盲目激情去思考，还是用汲取了激情的理性去思考，得出的结果便会大相径庭。

中央对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逃到上海的纽曼。就在广东省委扩大会期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决议案，肯定了广州暴动的意义。它是这样认为的：“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认为在暴动中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虽然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

策略上，实在有极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和成绩”。1月4日和8日，中央两次致函广东省委，要求正确总结广州暴动。

中央和省委的两个决议案在互往的途中交臂而过，并都在收到对方的决议案后于1月16日开会讨论。此后，由于意见分歧而发生了争论。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讨论中央的决议案，并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决议案》。此决议案对中央的决议案批评甚烈，指责其使用的材料有“吹牛皮主义”之嫌，如把发送传单十万份说成七百万份，把开枪竟误伤自己人的赤卫队说成是很快就能使用大炮机枪等。最后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不怕有错误，而怕不将自己的错误拿出来公开的批评使群众得到广大的教训。”

当晚，李立三又以政治局候补委员名义给中央写信，坚持原来的意见，不接受中央的结论，并迁怒于纽曼，说中央所得不实之情如果是来自于纽曼的虚报，他要求中央建议共产国际惩罚纽曼。省委并决定再派罗登贤前往上海作进一步汇报。黄平因中央要求也一并前往。

就在1月16日同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听取了沈宝同的报告，讨论了省委的决议案及李立三的做法。会议认为广东省委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其做法影响很坏，对领导同志的严厉处罚尤为不妥。根据会议决定，周恩来于会后为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广东省委的长信，表示中央坚决不同意广东省委会议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指出其根本错误在于把讨论和注意的中心集中在追究个人责任上，太重主观责备而不顾客观困难，作出的指导和估量极不正确。并强调指出：“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力量尚薄弱。

1月21日至22日，抵达上海的黄平和罗登贤代表省委就广州暴动情况再行向中央汇报。周恩来作了记录。中央经研究于25日致函广东省委，要求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假使省委还有意见，须待2月中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行讨论”。决定派邓中夏去广东代理省委书记，执行中央的决议，纠正错误，妥为处理善后。责成李立三于邓中夏到后即到中央“面谈一切”。

邓中夏到港后，于2月9日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及对省委意见的答复。会议由邓中夏主持，出席的有李立三、吴毅、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鸣、罗登贤、王强亚等人。地点仍是西环坚尼地城秦皇台23号。

从这次会议的讨论发言中，可以透见党内当时对广州暴动评价的矛盾性质，及在探索中国革命之路进程中步履的艰难和颠蹶。

邓中夏：今天专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根本不同。中央听了国际代表的报告后，认为广州暴动一切准备都完善，省委提出的口号和政纲非常正确，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也达到了沸点，所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暴动。中央对这个暴动非常满意。虽然因为主客观原因失败了，但其意义和影响是伟大的。它是苏维埃革命的开始。中央决议的根本精神是对的，它是“八七”会议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决议。中央接到省委决议后非常惊骇，认为它狭隘，偏颇，动摇，差不多完全抹杀了暴动的意义，所以命令省委停止讨论。至于中央决议中有与事实不确之处，如说教导团兵士有十二个营，命令、传单、日报发了七百万份，都是无妨根本精神的枝节问题。当然，中

中央决议毋容讳言地带有少许宣传意图，因为还要把它发到国外去。这绝不是什麼“吹牛皮主义”！无论怎麼讲，中央决议根本精神是绝对正确的！

李立三：对省委决议我要负主要责任。现在我对中央决议仍有很多不同意见。省委决议，中央认为是受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参加暴动的同志的一时激愤，一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决议是经过各同志充分讨论的。省委对中央决议之决议，认为中央决议中阐明暴动意义及政治分析部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暴动过程的叙述与事实不太相符。这样会让知情人说成是“吹牛皮主义”。省委认为中央决议中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无视群众发动不力的事实，反说参加群众又多又团结。真是如此，又何以会失败？对此如不据实指出，不是导致群众消极，就是引起军事投机的倾向。还要郑重声明的是，省委与中央意见不同，并非想与中央对抗，而仅限于理论上的辩论。

吴毅：我同意中央决议的根本精神，但事实不大符合，就不大好。省委的决议确实是受到愤激情绪的干扰，偏重批评错误，而忽略估量意义。但它把主观上的问题说得很透彻，是一个优点。暴动原来有周密的计划，由于形势逼迫而事起仓促，群众未能充分发动是事实，应写入决议。失败原因，是敌人的强大，但主观原因也应尽量说明。退却时的情况很糟，这不能全都归咎于知识分子。处罚决定不能完全推翻。

黄钊：最近去惠阳巡视，下面的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我回答不了。军事投机怎麼解释？因为汪精卫打电报要解决教导团，我们被迫提前暴动，这是否就是军事投机？谈及知识分子，省委会议时差不多说完全靠不住；惠阳县委同志说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走狗，无产阶级当然可以利用他。我只能按立三同志的观点，说布尔什维克化的知识分子，可用，畏缩、动摇、投机的就让他滚蛋。我们同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关系？政治纪律不能一概抹杀，否则各地同志会反感，工农群众则会以为受了骗。

王强亚：中央决议，偏于意义的宣传；省委决议则偏于检讨主观的错误。中央决议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刚才提到一些，还有没提到的。我们做的果真像中央决议说得那样好，最终还是失败了，那胜利还有无希望？总括讲，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都有缺点。中央决议不作修改，会使同志们丧失取胜的信心。处分负责同志，影响很好。香港同志认为处分得还太轻！

恽代英：许多想法我与吴毅同志一致。还有几点要说。省委决议确实是受了激愤情绪的影响，重心不在暴动的意义，而完全偏重于指责错误，批评同志。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央决议暴动意义说得多，事实材料少；省委决议积极意义说得很少，但事量都投入到军事行动中，同时，在发动后遇到交通断绝等客观困难，即使有好的计划也难以施行。

叶耀球：暴动中有许多地方是群众打下来的，把暴动完全看成军事投机是说不过去的。

沈宝同：省委会议对暴动的评价是摇摆不定的。起草第一稿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问题黄平同志否认，执笔的同志像讲人情一样说服他，才勉强写进去。对负责同志的批评也比较客气。后几天的讨论愈来愈偏，但也没有肯定说此次暴动是军事投机。立三同志说决议第一稿是个机会主义的决议，于是重新选出起草委员，重新写出后来的决议。应该说，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是事实，是暴动中的一大缺点，但事起仓促，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遂以军事为主力。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以军事为主力。所以，不是没有发动群众不力等错误，也不是暴动不应该。政治纪律程度可作加减。

张善鸣：中央决议对政治分析、暴动意义、将来策略等方面说得全面详细，根本精神是很对的，一些不实之处要修改，但细微处不必吹毛求疵。省委决议对暴动意义无一个明确认识，在激愤情绪影响下有偏向，应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发动群众有所疏忽，但也做了，两万群众参加便可证明。退却时很乱，是组织问题，不能归咎为负责同志怕死、动摇、畏惧、欺骗群众。杀反革命杀得太少是一个教训。

香港代表刘永炽：广州发起暴动香港市委竟然不知，消息是在报上得到的。市委曾决定召开拥护广州暴动的全港工人大会，地点一在九龙，一在跑马地。省委对此亦无计划。13日群众到达会场时已传来了失败的消息。纪律处分影响非常之好。过去的处罚是去莫斯科留学，引起诸多同志不满，这回能革除重要职务，大家非常开心。香港同志还认为太轻，记得当时有人听到太雷同志的死讯愤然说他该死，由此可见群众激愤情绪之一斑。处分决定连文字都不必改动。

海筹：这次暴动固然不能说成是军事投机，但各地农民的确没发动起来，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处都未响应，只有近郊农民参加。这的确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李立三：省委决议确有所偏，宝同同志说愈走愈偏，我承认。中央决议说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也不能否认。和各同志相同的意见就不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12月11日的暴动是否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的情形和西欧各国不太相同，产业发达国家阶级斗争达到沸点时发动暴动容易成功，而中国产业工人很少，也许可以先发动暴动，群众随之跟着起来。据此，以军队作发动的主力也未尝不对。但广州暴动用的是军事投机的方法，恐怕也没说错。说暴动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及对负责同志的严厉批评，我仍然坚持。教训最主要的还是应从主观上去找。

邓中夏：各同志发表的意见，大体没有反对中央的根本精神。我党自“八七会议”、特别是叶贺失败后，发现党内存在两种错误，一种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种是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包括在内，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指知识分子充满了指导机关。两种错误是我党目前最注重的。广州暴动受挫，省委同志也从中找这两种错误，无形当中把它们同广州暴动混在了一起，加到负责同志身上，于是就把失败归咎于负责同志的错误，进而抹杀了广州暴动的伟大意义。这就是省委决议只追究主观错误而不顾客观困难的根源。相反，中央决议明明指出六点主观原因，省委上回讨论硬说中央决议只说客观未说主观，连立三同志也这样，我实在不解！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军事投机，省委的这些结论都站不住脚。要是指导机关所犯错误真有省委决议说得那么严重，那负责同志应当即枪毙。总之，指导机关并无政治方面错误，所犯错误可说是组织上或技术上的。所以，中央主张取消政纪处分，并主张彻底取消省委决议！

李立三：失败原因究竟在哪里？中夏同志还是没有作出解答。发动群众是不是重要原因？如果真的像中央来信中所说，在客观上有那么多困难，那根本就不该暴动；又说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做了许多工作群众都没有广泛发动起来，还谈什么暴动的意义！广州工代会底下的群众有七万人，反动工会的群众也可争取，但当时就以配红带者计算，也不过两万，这里面有不少是为了通过赤卫队的警戒才配戴的。我认为群众没能充分发动起来，的确是伟大的教训！

恽代英：中央决议应把未充分发动群众加到失败原因中去。“五卅”运动刚开始群众也很少，由于重视，印了二百万份传单，很快就发动起了几十万人的大罢工、罢课和罢市。

罗登贤：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可说是我们办法不多，缺乏经验。

吴毅：当时对能有多少群众起来，确实没有多大把握。但即使是对农民特别是四郊农民，也有所计划。也曾写信给香港转告各县。

邓中夏：发动群众只能说计划不周，执行不力；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指责为军事投机，简直是笑话；撤退时有的同志是慌乱，但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知识分子都很英勇。事实太不符合的当然可以修改。省委决议应取消，政纪处分另外定，这是今天讨论的原则！

李立三：我提四点建议：一、省委发一个通告，说明中央决议如何好，中央决议适用而省委决议不适用；二、把中央决议马上发下去，不过要声明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三、按中央决议精神写一个“广州暴动的经过”报给中央；四、请求中央修改中央决议中不符事实之处。

邓中夏：最要紧的是指出中央决议适用而省委决议不适用。可以按立三同志的意见通过。

表决结果是无异议通过。

这一整天的会，使连日操劳的邓中夏感到困乏，又感到有些轻松。有好些日子没洗澡了，在上海太忙顾不上。晚饭后，他由一位香港同志陪着，在蒸气腾腾的澡堂子里泡了个痛快。他也许还有个无意识的动机，即以洗澡的方式来增进回忆，享受回忆。他曾在香港和广州工作过，并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对生命中那一段峥嵘岁月深含感情。

3月中旬，周恩来又受中央委托来港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对广州暴动的认识。为了遮蔽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利用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座张灯结彩的公馆里举行。会议还宣布撤消了对叶挺、恽代英等人的处分决定。然而，对于周文雍，这个温暖的消息只能抚慰他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了。

走向死亡或者是婚礼

西濠口码头斜对面的马路边，站着一个人身穿企领中山装的青年。他旁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幅人体解剖图，呈露着肌肉、静脉和动脉、被剖示的腹部。青年在用一根小棍指点着解剖图讲解人体构造。在他身边伫步的行人寥落无几。

附近古老的青砖窄巷里传来凄恻悠长的二胡声，一个抖战的苍迈嗓门伴着琴声如诉如泣地自说自唱。

半个多月前，这里到处是枪炮声、吼叫声、熊熊烈火的爆燃声、滔滔江水的冲激声，到处是沙包和木桶筑的街垒、标语和系着红领带的战士，到处是厮杀、是流血、是死，欢乐的死。是赤红的夜空下盛大狂欢的节日。

这里还曾有过这样的情景：游行队伍宛若红色的巨流滚滚向前。每个人手里拿着的三角纸旗与几百面写着各自工会名称的大旗交相辉映。鼓手们奋臂猛擂由几个人用棍子抬着的大鼓，带领签、笛、锣、钹、喷呐、鞭炮齐鸣。一艘插满彩旗的巨大轮船在稳健地前进。长龙摇头摆尾，狮子们张嘴闭嘴、睁眼合眼地扑闪腾挪。

对于周文雍，这些也许是同时呈现的场景。周文雍从这同时的场景中穿过。

他打扮成从南洋回来的“金山阔少”，在海员的掩护下从香港返回广州。先期回到广州的陈铁军来码头接他。

一路上，所触所感尽是一派恐怖肃杀的气氛，红色没有了，白布白纸的横幅和标语比比皆是。那些杀气腾腾的口号，既有冲着共产党的，也有冲着张发奎的，比如“打倒焚杀广州的张发奎”，“打倒叛徒张发奎”。借着广州暴动，吴稚晖等一口咬定汪精卫通谋共党，逼得他再一次亡命法国。并称张发奎和黄琪翔直接就是共产党，在广州的屠杀是苦肉计，而大兴讨伐之师。李济深、黄绍竑的桂军直扑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无奈，把军队交给缪培南和薛岳指挥，携陈公博潜逃香港。李福林看风头不对，也把军权交予副军长邓彦华逃港。桂军先锋于12月29日抵河口，邓彦华立马向李济深投降。桂军又驱兵追歼撤逃之张、黄部队。双方打得两败俱伤，被蒋介石当作台阶堂皇登位，是稍后的事了。

此时黄绍竑入主广州。比之张发奎等，桂军的反动与残忍要更加坚决、彻底。

回到荣华北街住处，陈铁军的妹妹铁儿、她嫂嫂的妹妹李淑媛已准备好了热饭热菜。同过去一样，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他们的住处仍是党的秘密机关。铁儿和淑媛与他们同住，掩护和帮助他们。

陈铁军端来了荔枝湾艇仔粥。她知道文雍喜欢吃，特地叫铁儿熬的，里面放了鱼片、海蜇、炸花生、虾皮和姜丝葱丝。吃饭的时候，陈铁军说她已同李少棠联系上了，李少棠掌握一些潜伏同志的情况。无滋无味扒着艇仔粥的周文雍停下了筷子。当晚，他就同陈铁军出了门。

第二天下午，周文雍、陈铁军又来到安乐坊李少棠的住处。李少棠找来了邓东、曾国钧、李耀先和沙文求。大家见面后百感交集，咬牙切齿地痛谈起敌人残酷暴行和广州遭劫的惨景。当说到张太雷的遗体最终没有下落时，大家格外地悲愤。

沙文求忿然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则天外有天，地下有地，

这就是杀不绝的革命党人，这就是杀不绝的劳苦大众自己！”沙文求曾就学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说话带着文气。

周文雍点头道：“我这番回广州，就是要找寻失掉联系的同志，重新恢复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同敌人死拼！”

会上，各人都介绍了自己了解的情况：邓东介绍的是铁路工人，曾国钧是东山区委，李耀先是河南地区，沙文求是学校。还说到广州有一个国际济难会组织，隶属于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日本人木村、印度人莫米丁、朝鲜人金昌溜、越南人阮爱莲等，此组织收容了不少警卫团、赤卫队离散人员，参加暴动的朝、越人员，发给衣物和路费转送各地。周文雍交给每人一份暴动前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的名单，要求大家在自己的区片逐门逐户地寻找失散同志。他自己负责石井兵工厂和手车夫工人。大家担心包括反动军警和特务认识他的人太多，目标大，认为他的活动不宜过多过广。周文雍说这样更有利，因为自己人会提供更多的掩护，而敌人则会麻痹。末了，周文雍提议去红花岗凭吊死难的烈士。

“四一五”大屠杀时，红花岗是许许多多革命志士英勇就义的地方。暴动后又有一大批英雄在这里殉难或被掩埋。

夜黑得出奇，夜空的星光也亮得出奇。几个人站立在寒风哨响的红花岗上，站了很久很久。

回广州开展工作，周文雍是如鱼得水，哪怕是翻搅着冰碴和泥沙的水。

1905年，周文雍出生于广东开平县茅冈的一个贫穷塾师的家庭，自小就在父亲的启发下立志做一个文天祥那样有骨气的人。贫穷和有志，是他成长的底质。1922年考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他便来到广州，并开始接受革命思潮的熏陶，在学生运动中经受锻炼。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工作，成为广州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崧的得力助手。在斗争的险风恶浪中，他激情丰沛，胆识过人，为同道所钦赞。登台从校长手中夺话筒的事就是一桩。那是1925年夏天，广州搞市长选举，当周文雍得知这成了反动政客操纵的一出丑剧，即写文章、作演讲，予以揭露。这使得顽固守旧的“甲工”校长萧冠英十分气恼，便在学校召集大会，厉声指责周文雍是在“胡闹”，并大拍候选人的马屁，为候选人颠轿子吹喇叭。周文雍当即跳上讲台，以实情予以驳批，并要求把选票当场发给师生，闹得个萧冠英戳在台子上卖呆。周文雍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能力，也使自己由一块优良的矿石变成了一块纯钢。这在“四一五”之后他领导的历次斗争中有充分的表现。

此次回到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不顾个人安危，机智沉着地避开敌人耳目，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周文雍经常化装成苦力，深入工人居住区，与取得联系的工会骨干研究如何团结更多的工人。有时，他同陈铁军打扮成巨商夫妇，以打牌作掩护，同党的负责同志接头、开会。一次，周文雍在玉华坊的联络点召集会议，会议开始前，一位潜伏在敌公安局的同志急匆匆地跑来，说此联络点已暴露，暗探马上要来抓人，他们立即撤去门前的布幌，从容离开，行至街口，已见有腰胯间支支棱棱藏掖着不善之物的便衣在紧张地布网。

不久，周文雍就在陈铁军及其他同志的协助下，利用自己对情况熟悉和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重新建起了联络网和交通线。

在险风恶浪中搏斗的水手，哪怕船被击打得粉碎，哪怕他只抓住了一块船板、一根桅木，他都要用它作为武器同风浪厮杀，否则他就将溺毙，他没

有别的选择。斗争就是这么残酷。广州的工作刚开始恢复，革命的力量刚开始积蓄，刚从昏迷中苏醒，尚需咬紧牙关强忍浑身创伤的剧痛，便要坚强地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1月中旬，根据省委的指示，周文雍和广州的同志开始酝酿发动一次叫作“春季骚动”的政治攻势。春节期间，他们将在公共场所、繁华的闹市和街道大量散发传单，告诉广州民众，暴动虽遭失败，但革命没有完结，共产党人仍在奋斗；并号召工农民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

工作的开展极为艰苦。这不仅是因为敌人的刺刀和密探，同时还因为工人内部的分裂。当时的中国，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新型进步阶级，它们都年轻、幼稚，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威胁，生存的逻辑使它们本能地要挽起手来。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能够统一集合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而当斗争的矛头直指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军阀时，无产阶级的阵营就发生了混乱。在广州，对比省港大罢工、北伐征战与“四一五”之后直至暴动中工人队伍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四一五”之后，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掌握的工人并不多，多数都控制在由国民党把持的广东总工会手里，广州暴动没能充分发动群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广东总工会属下的机器工会更是充当了镇压暴动的帮凶。

越是困难，越是具有挑战性，就越能激发周文雍的斗志和激情。他与后来返回的季步高等人一道昼夜奔忙，研究计划，筹集资金，印制传单，鼓动群众，在荆棘丛莽中坚定有力地推进各项工作。“春季骚动”的筹备很快就有了相应的规模。在此期间，陈铁军忽儿打扮成女佣，臂挽漆花瓷篮子；忽儿扮成中学生，背着书包，来往穿梭于各个秘密联络点，递送党的指示、传单和小报。春节前夕，她又扮成贵妇，同陈铁儿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佛山家中，从时已家道中落的三哥处筹得现款及一张银单约二百元，为了缓解活动经费短缺的困难。

“春季骚动”的传单四处传递，秘密蔓延，有的难免落入敌手。回到公安局长交椅上的朱晖日惧恨万分，命令在全市大肆搜查。安乐坊秘密机关被破获，被捕者中有人叛变，供出周文雍和陈铁军的住处。朱晖日如获至宝，即遣大批军警围扑荣华北街市委机关。周文雍外出未归。陈铁军见势不妙，让陈铁儿经凉台爬入楼上邻居家走脱，但已来不及摆出“危险信号”。狡诈多端的黑狗头目命捉住陈铁军，在屋里屋外布下锁扣。未几，周文雍推门进来，黑狗头目兴奋得跳了起来，说：“行了！你们到齐了，局长有请！”周文雍坦然依旧。陈铁军以蔑视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办事也不爽快，还是等我穿上件衣服再走吧！”她换了件干净衣服，披上一条蓝色围巾。他们从容步出家门。

吃一堑，长一智，朱晖日命令给周文雍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还加上粗大的铁锁，把他和陈铁军推入特别监狱的单间死牢，并派大批军警日夜把守。

朱晖日知道周文雍的价值，他要亲自审讯，从大名鼎鼎的周文雍口中挖出重要情报。他先来硬的”施以“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种种酷刑，周文雍多次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泼醒，这一火一水，证明周文雍是一块纯钢。硬的行不通，又以高官厚禄诱惑。一硬一软同样证明周文雍是一块纯钢。朱晖日绝望了。为了履行一道程序，朱晖日用嘴努努桌上的纸笔，示意特务拿给周文雍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纸笔，一气愤笔疾书，写下了敌人的无耻和罪恶，把个朱晖日气得鼻子眉毛拧成一团。

周文雍拖着铁镣和冷冷血痕回到死牢。他激情难捺，又要笔墨，挽镣在墙壁上挥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命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陈铁军也备受摧残。她像周文雍一样坚定顽强。

敌人没有选择。周文雍走上了敌人的法庭，这最后的法庭。

法官：“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周文雍：“是！”

法官：“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周文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法官：“还有谁是共产党？从实招来！”

周文雍：“全中国的工农都是！你去抓吧，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敌法官宣判周文雍死刑，也宣判陈铁军死刑。周文雍和陈铁军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法官问周文雍在死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沉吟了一下。他与陈铁军在严酷的斗争中假扮夫妻，真心配合，建立起了纯真的感情。这是一种崇高的爱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应该将它公诸于世。也许是想到了这些，周文雍说：“我要同妻子陈铁军照一幅合影。”

于是，就留下了这样一幅永芳之照：在冷森森的铁窗前，一条二尺宽的长围巾围住他俩的肩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爱，刚毅和希望。

1928年2月6日下午，监狱里响起一片狰狞扎耳的点名传令和铁门开启声。周文雍和陈铁军大步走出牢房，被分别押上两辆手车，解赴刑场。敌人怕途中遭劫，前有警官骑马开路，后有黑鸦鸦一片荷枪实弹的警察押阵；马路两旁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竖着亮晃晃的刺刀。这真是一个隆重异常的送行仪式。周文雍豪情顿起，抛镣而立，向马路两旁的群众大声演说。他听到了后面车上陈铁军的话，戛然噤声，吃力地向后扭过身子。

“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以前我们假称夫妻，其实是再纯洁不过的同志关系。现在，我们就要同这个世界告别了，我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做婚礼的礼炮吧！”在斜射的阳光下，陈铁军胸部挺得高高的，一缕弯曲的秀发搭在细长的眉梢上，美得动人心魄。

聚在街道两旁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冷风飕飕，寒雨蒙蒙的红花岗。惨怖的红花岗。亲切而温暖的红花岗。黑鸦惊飞。一簇冬天的枯草霎那间被鲜血染红。

尾 声

暴动失败和党内重责的双重打击，并没有动摇叶挺的信念。他著文说，敌人想用蚊香驱赶蚊子那样，用武力驱杀革命群众，但是，“你们的蚊香已经潮湿了！”

1928年6月，叶挺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他抱病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暴动的材料，详细报告了暴动的经过、力量对比、经验和教训，并针对国内外有关他在暴动中“消极怠工”等责难提出申辩。他仍然坚持认为，当时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暴动难以取胜，暴动发起后应迅速把部队撤往农村。

黄平先叶挺也来到莫斯科。他是来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

在莫斯科，他们一直没有见上面。

6月18日至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地主的庄园里召开。会前，斯大林同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黄平等谈了一次话。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是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因此，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倾向。斯大林的讲话，与这一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议否定了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在具体关涉广州暴动的一章，批评了纽曼在指导广州暴动中犯的的错误，如发动群众不力等，但对整个暴动给予了肯定，认为它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中共六大以斯大林的意见为指南，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同时也坚决主张肃清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对于广州暴动，大会赞同共产国际作出的评价，并“认定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大会通过了《定广州暴动力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每年12月11日都要纪念它，要“号召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去纪念它，去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的历史事业”。

7月17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片山潜宣读了共产国际告中国工农书，指出：“广州起义已使劳动人民认识到，它是中国工人最伟大的英雄气概的典范。”

然而，叶挺的申辩非但没有得到答复，却使他受到米夫及其追随者王明的压制和打击。一贯信奉“城市中心论”的米夫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在他的影响下，叶挺受到周围很多人的冷落和刁难。叶挺自忖何罪之有？消极怠工？政治动摇？身经百战的刘伯承曾经在29年说，他没有见过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刻的军人，有谁能像叶挺这样沉着。这应该是叶挺作为军人和革命者的一贯风范。我无愧于广州暴动，也无负于党！生性内向而又倔强暴躁、而又视政治品格如水晶的叶挺遭此泼污，深深地陷入了委屈、矛盾、痛苦的漩涡，不能自拔。百感交集之下，他脱离了党，只身流亡德国柏林。

12月，黄平也来到了柏林。他是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来参加国际反帝同盟会议的。邓演达也出席了会议。

黄平找到了叶挺。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相逢在异国他乡，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叶挺请黄平到康特大街一家中国饭馆吃饭。恰好宋庆龄

和她的弟弟宋子安也在这里用餐。叶挺告诉黄平，何香凝、黄琪翔等也在柏林，他们都支持邓演达筹建新党以反对蒋介石等新旧军阀的主张。此时，蒋介石已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他们喝着酒交谈，从这半年多来各自的遭遇，溯及广州暴动的大格小局以至战斗细节。叶挺对长堤四军军部老是攻不下来仍耿耿于怀，说，如能用上毒气弹或是更大的炸弹，也许可以把它拿下来。

饭后，叶挺与黄平冒着风雪漫步到德皇皇宫前。1918年11月9日，李卜克内西带领起义队伍攻占了皇宫，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当他说到赞同建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请举手时，高举的手臂像是一片林海。起义很快就在本国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许多优秀的战士惨遭杀害。

广州暴动与这场革命的情景和结局是何等相似呵！

革命、人生和民族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他们在迷茫风雪中久久地思虑，彷徨。

那时，他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将通过怎样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会推倒三座大山，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陈独秀，瞿秋白乃至斯大林，当时也没有想到。

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俩中间的一个后来归国抗日，被蒋介石打入囚牢五年，抗战胜利后在去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而另一个被国民党抓捕后有变节行为，从此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他们同样没想到的是，恽代英、杨殷和吴毅被捕牺牲，徐光英当了叛徒，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后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陈郁则担任了广东省省长职务。

没有先知，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历史最高的主宰是历史本身。

最伟大最彻底的辩证法是历史本身。

本书参考资料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3. 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32 年出版
4.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广州起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5.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实录》，花城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6.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7. 朱道南：《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年出版
8. 欧阳山：《三家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9.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10. 卢权等著：《叶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11. 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12. 田子渝等著：《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13. 冯彩章等著：《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14.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15. 《徐向前传》编写组：《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16.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1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M.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19. 《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20. 《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21. 《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22. 《回忆陈郁》，工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23.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24. 于吉南：《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25.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26.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27. 蔡德金：《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28.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第三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29.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第四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30.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第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31.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第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32. 《不屈的共产党人》（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33. 《不屈的共产党人》（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34.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广州英烈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35. 《革命回忆录》（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36.《革命回忆录》（十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37.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38.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二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39.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40.《广州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62 年出版
- 41.《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42.《广东文史资料》（第四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1 年出版
- 43.《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44.《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45.《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46.《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47.《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华书局 1960 年出版
- 48.《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49.《党史资料丛刊》（总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50.《党史资料丛刊》（总第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51.《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5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重印
- 53.陈清泉：《陆定一谈【八七】会议》，《党的文献》1995 年第 4 期
- 54.《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2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55.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 56.周树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57.王尔玺等编：《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 58.《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59.《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60.《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6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61.《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62.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6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6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65.何智涛等译：《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66.【苏】C. A. 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67. 【苏】A. B. 勃拉戈达托夫著，李辉译：《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出版
68. 《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